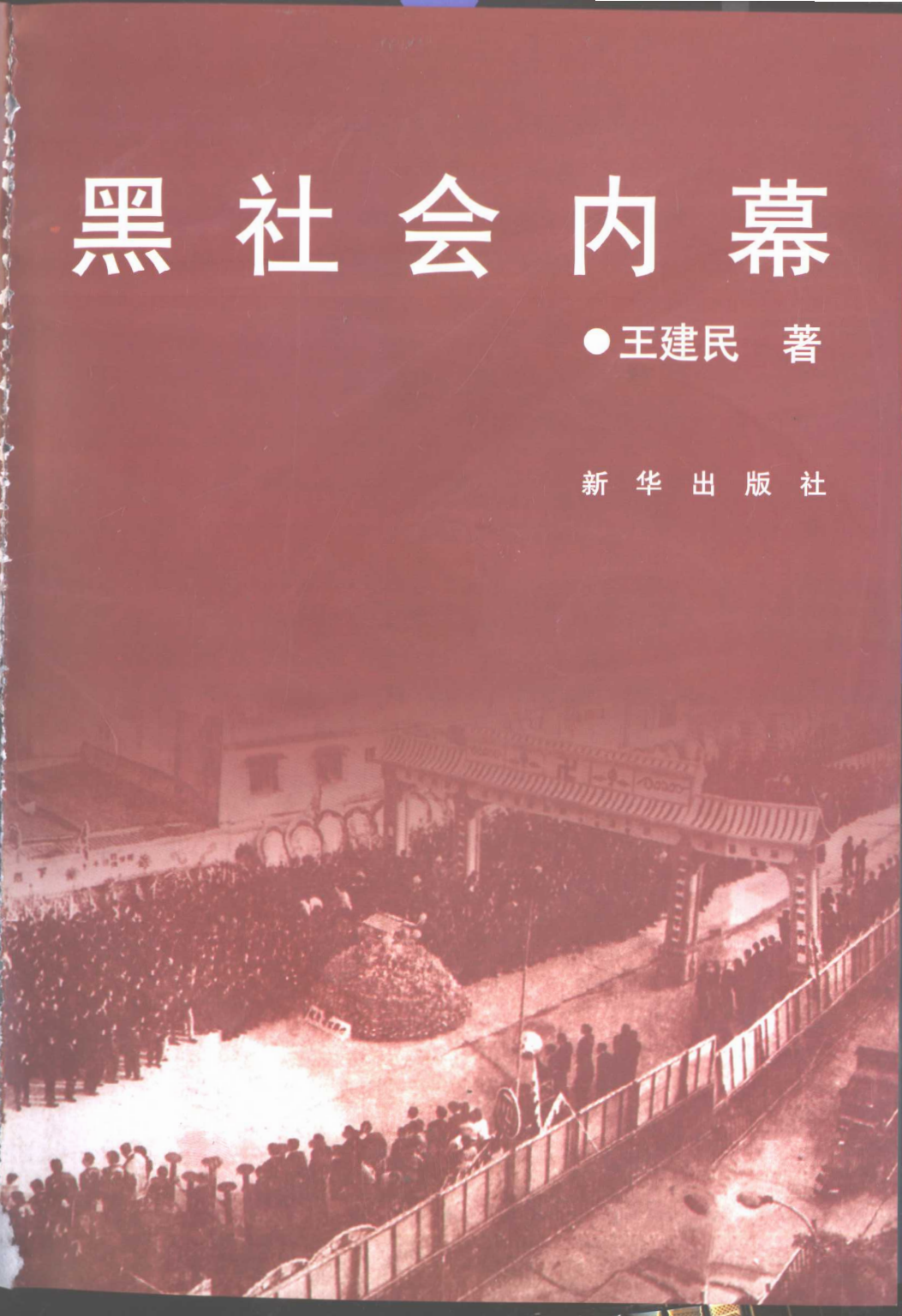
台湾黑社会内幕

●王建民　著

新华出版社

台湾黑帮老大的葬礼



前　言

作者长期关注与搜集有关台湾黑社会的情况，本着尊重历史、尊重现实的精神，经过多年的努力，写成《台湾黑社会内幕》一书。目前，祖国大陆还没有全面、系统地介绍与研究台湾黑社会问题的书，这本书的出版可以说在某种程度上填补了祖国大陆在这一领域研究中的空白。

台湾黑社会历史源远流长。据现有史料记载，台湾黑社会组织可以追溯到清朝时的台湾秘密结社。雍正四年（1726年）端午节，台湾诸罗以蔡阴为首的13人聚会结盟，成立“父母会”，是为史料记载台湾出现的第一个秘密结社组织。后来，这些秘密结社组织变为具黑社会性质的组织。同时，台湾一些繁华集市也出现以地域为特征的黑社会帮派。1895年，日本占领台湾后，对台湾黑社会进行大规模整肃，原有的秘密结社组织基本解体。但黑社会问题并没有解决，不仅出现了日本式的黑社会组织，而且本土黑社会帮派也逐渐发展起来。这也是直到今天，台湾与日本黑社会关系极为密切的原因

之一。

1945年，台湾光复后，社会处于大转变时期，黑社会活动不仅未被清除，反而得到进一步的发展。尤其是随着1949年前后国民党政权败退台湾，大陆一些黑社会组织与帮会人士也随之到台。在特殊的历史背景下，台湾出现了主要由眷村子弟创立的类似大陆传统帮会的黑社会组织，同时以本地人为主的黑社会帮派角头也迅速发展。尔后几十年，台湾黑社会组织不断蔓延发展，尽管台湾当局展开了规模大小不同的多次扫黑行动，但一直未能解决台湾的黑社会问题。

台湾究竟有多少黑社会组织？有多少黑帮成员？这是一个难以有准确答案的问题。根据台湾警方公布的资料，1973年，台湾首次办理帮派解散登记，结果登记在案的帮派有568个，计3334人；1978年，第二次办理帮派自动解散登记，又有189个帮派解散，961人宣誓脱帮。1984年，在“一清专案”之前展开的为期4个月不良帮派登记自首或解散的“自清”运动中，共有651个帮派、3000多名帮派分子办理自首解散手续。同年底，登记在案的帮派组织达1236个，成员10582人，可以说达到一个高峰。

不过，由于“江南命案”的发生，台湾当局展开了有史以来最大的一次扫黑行动，即所谓的“一清专案”，许多黑社会分子被抓、被关，给黑社会以沉重打击。但

多年后，这些黑社会分子陆续出狱，黑社会又重新抬头与发展。1990年开始，台湾又展开了“治平专案”与“迅雷专案”的扫黑行动，直到今天，这一波扫黑行动还没有结束，但并未能收到实质性的效果，黑社会仍在发展，势力仍大。

1996年6月，台湾“警政署”首次公布了普查的各县市列管的流氓帮派和犯罪组织共计126个，成员2607人。人数最多的帮派为“竹联帮”，共600余人；其次是“四海帮”为500人；第三是“天道盟”400余人。这次普查的黑社会人数，均是有案可查的重要人物，而大量的黑社会分子并未包括在内。台湾实际的黑社会成员远不止此，估计至少达数万人。

何为黑社会组织或帮派，在世界上虽有共同性，即具组织性、非法性与犯罪性，但各国或地区的认定仍有区别。台湾官方对黑社会组织的认定也有差别。据1996年台湾“立法院”通过的《组织犯罪防治条例》第三条，黑社会组织是指“三人以上，有内部管理结构，以犯罪为宗旨或以其成员从事犯罪活动，具有集团性、常习性及胁迫性或暴力性之组织”。不过，根据1995年台湾“内政部警政署”所编的“警政工作概况”，把黑社会帮派划分为“角头型”、“组合型”和“组织型”三种类型，这三种帮派组织分别占台湾帮派总数的41%、47%与12%。所谓“角头型”，是指以一定区域为界限，有固定地盘的地方流氓恶势力；“组合型”是指由黑势

力组成的松散联盟；“组织型”是指内部有严密的组织结构和严格的帮规纪律，凝聚力强，势力庞大。不过习惯上，人们一般把台湾黑社会帮派分为以地域为主的帮派角头型与具有中国传统帮会性质的高度组织型。

随着经济发展与社会变迁，台湾黑社会生存与活动方式也发生了重大变化，已基本上企业化与国际化。尽管赌、毒、黄仍是黑社会的基本生存条件，但大型黑社会组织已基本上实现了企业经营，多以公司行号的名义从事各种经济活动。一些公司行号本身就是其总部或堂口。同时，台湾黑社会组织已经国际化，欧洲、北美、日本、东南亚、非洲、拉美等世界各地都有台湾黑社会的影子与活动。特别是祖国大陆改革开放以来，随着两岸往来的增加与经贸关系的发展，台湾黑社会分子以各种名义逐渐渗入祖国大陆。这几年，台湾加大了扫黑与打击黑社会帮派的力度，岛内许多黑道老大潜逃祖国大陆，对祖国大陆社会治安带来新的挑战，已引起有关部门的重视，并展开了多次打击港台黑社会的行动。

值得关注的是，台湾黑社会在90年代还出现了新的发展，积极向政治领域渗透。李登辉上台后，利用地方黑社会势力巩固政权，提名具黑社会背景的人参与各级地方“民意机构”的选举，结果出现黑社会人物的“漂白”风潮，黑道老大纷纷进入县议会，甚至“省议会”、“立法院”与“国民代表大会”，形成所谓的“黑道治

县”与“黑道治台”，台湾“黑金政治”自此形成。这也是导致国民党在2000年3月台湾“大选”落败的一个重要原因。此足以显示台湾黑社会问题的严重性与危害性。

本书较全面、准确、客观地介绍了半个世纪以来台湾黑社会的历史与现状；揭示了台湾黑社会的组织内幕与地域发展特征；披露了台湾黑社会老大驰骋政坛、纵横商海的传奇人生；描绘了台湾黑社会无处不在、无所不有的怪状；勾勒出一幅幅惊心动魄的黑社会血腥风雨的生动画面。

这本书的出版，不仅有助于广大读者了解台湾黑社会内幕与台湾帮派势力介入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而且对祖国大陆加深研究台湾问题、打击台湾黑社会向祖国大陆蔓延也会有所帮助与警示。

作者简历

王建民，1960年冬出生于陕西渭北高原。曾获中山大学经济学学士、现代国际关系研究所法学硕士。现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台湾研究所副研究员。主要从事台湾经济研究，同时涉及台湾政治、社会与两岸关系等。在内地及港台地区报刊发表学术论文和其他评论、分析性文章共计200余篇，参与十多部工具书与其他书籍的编写。出版了《海峡两岸经济贸易投资大全》(主编)、《台湾何处去》(合著)、《海峡季风——多棱镜下两岸关系透视》(主编)、《台湾政商家族》、《塑胶霸主——王永庆》、《台湾军力》、《台湾的黑金政治》等著作。

台湾黑社会内幕

「四海帮」老大陈永和葬礼，场面宏大，令人瞠目

台湾黑社会内幕

「松联帮」兄弟参加「四海帮」老大葬礼

台湾黑社会内幕

1 2
3 4

1 “四海帮”前老大陈永和
2 “竹联帮”前孝堂堂主花继忠
3 “竹联帮”帮主黄少岑
4 前“竹联帮”黑道教父陈启礼

台湾黑社会内幕

1 2
3 4

1 “四海帮”金主老大蒋启弼　2 “松联帮”老大朱立伟
3 “天道盟”太阳会吴桐潭　4 “天道盟”顾问杨登魁

目　录

前言 …… (1)
引子 …… (1)

第一章　北部黑社会的大本营 …… (10)
五光十色、灯红酒绿的台北市，是各大黑社会帮派争夺的要地。台湾三大黑帮——“竹联帮”、“四海帮”与“天道盟”总部均设在台北市，同时将势力范围向周边县市扩张，与当地黑社会势力展开较量，黑道火并事件此起彼伏。

第二章　中部黑社会利益争斗 …… (21)
中部地区黑社会帮派有“海线”、“山线”与“在地”三大势力之分。“十五神虎帮”的“胜煌”与“美国博仔”、“太湖帮”的“辉哥”与有“中部黑道教父”之称的张清池等在中部黑道圈最负盛名，相互之间展开了一场永无休止的利益争夺与复仇行动。

第三章　南部黑社会恩怨情仇 …… (32)

南部黑社会多为土生土长的本地帮派，嘉义更以盛出黑道人物闻名。曾为“西北帮”的’妈注仔”、“夜市场帮”的“跛脚炳煌”、“芳明馆”的“大江”与“库玛”等帮派及老大之间引发一系列恩怨情仇。不少知名歌星、影星也卷入其中。

第四章　第一大帮“竹联帮”内幕窥探……（52）

“竹叶飘飘片片生，狂沙万里皆竹联，傲笑八方唯竹尊”，就是“竹联帮”的帮意。“竹联帮”是台湾黑社会中组织最完善、帮规最健全的黑帮，势力已伸向欧美、日本与东南亚等世界各地，成为国际性的黑社会组织，并以制造震惊世界的“江南命案”名扬天下。目前在原有的堂口制下，建立了新的“中央委员会”。掌控“竹联帮”几十年的老大陈启礼已退居幕后，“么么”黄少岑出任总堂堂主。

第五章　第二大帮“四海帮”的沉浮……（66）

“四海帮”与“竹联帮”是一对死对头，自诞生之日起，双方就展开一系列的厮杀火并，尤以涉及武打名星王羽的“杏花阁酒家喋血案”影响最大。“四海帮”老大个个命运多舛，先有大哥赵大鲁的自杀，后有大哥刘伟民在日本帮派火并中的身亡，再有大哥陈永和在台北被暗杀，老大蔡冠伦与杨光男的入狱，现任老大赵经华流亡海外。

第六章　新兴大帮“天道盟”的崛起……（84）

诞生于绿岛监狱，由一批本省黑道人物成立的最大黑社会组织，在各地设有分会。策划者包括了“文山帮”的

老大罗福助、永和角头李博熙、基隆“田寮港”的吴桐潭与彰化“阿不倒”谢运通等。盟主罗福助一度入主政坛，“天道盟”势力大增。

第七章　黑道教父陈启礼的江湖人生 …… (98)

“旱鸭子”陈启礼在与“四海帮”的势力范围争夺中屡创战绩，奠定了他在“竹联帮”中的地位，被拥为帮主，在台湾黑社会中更是一言九鼎，被称为台湾“黑道教父”。他财力雄厚，一度垄断台北市一半的消防工程。1984年，陈启礼因“江南命案”入狱。出狱后，陈启礼皈依佛门。1996年，警方发出通缉令，陈启礼逃亡海外。

第八章　“硕士级”黑道大哥“白狼”张安乐 …… (116)

拥有硕士学位的“竹联帮”大哥“白狼”张安乐，开创了“竹联帮”在美国的一片天地。他因在“江南命案”中全力营救大哥陈启礼而声名大噪，却被美国情报局“设计”入狱。1995年，张安乐出狱归来，87岁的老母不胜感叹：“我一直希望他成为教授，稳稳当当地教书，没想到他却成为游侠”。儿子张建和在一场黑道格斗中被刺身亡，让隐身幕后的“白狼”伤心不已。

第九章　黑道小弟“青蛇”邓国沣的传奇经历 …… (133)

“杏花阁酒家喋血案”凶手邓国沣，在案发后逃亡海外。他先在香港制造了轰动一时的“银楼抢劫案”，然后潜逃菲律宾，又打劫赌场。靠着劫来的巨款在美国经商有成。30年后，这位当年的通缉犯在台湾情报机关的保证下，风风光光重返故里。

第十章 所向无敌的黑道杀手刘焕荣 …… (140)
昔日的棒球好手，无意中成为“小梅花帮”的兄弟，在老乡董桂森的推荐下加入“竹联帮”，成为台湾十大枪击要犯。他逃亡菲律宾后，为一段爱情制造了杀害华商陈玉照一家的惨案。他又逃到日本，因黑道赌场恩怨，被人出卖被捕。

第十一章 黑道军火大王许金德…… (156)
曾号称“台湾地下国防部长”的许金德，曾控制了台湾三分之一的军火市场，也是台湾黑道武器装备的主要来源。为打掉这个军火集团，蔡姓警官打入许氏走私集团内部卧底。在一次抓捕行动中，双方发行枪战，许金德侥幸逃脱，偷渡菲律宾。

第十二章 黑道大哥在东瀛的峥嵘岁月 …… (177)
战后，台湾一帮黑社会大哥长期混迹日本黑道圈。黑道兄弟陈三郎闯荡日本多年，一度成为日本“山口组”首领田冈的左右手。另一位黑道大哥何茂汜在日本黑道圈闯出一片天地，调解日本黑道之间的纠纷。今天东京新宿就是台湾黑社会在日本的大本营。

第十三章 黑道兄弟杨双五大逃亡 …… (185)
1987年12月7日晚，日本东京新宿久保大厦发生一场黑道枪战。“四海帮”老大刘伟民与“风狂暴雨帮”兄弟王镇华死于枪下，杀手杨双五潜逃。消息传出，“四海帮”大哥迅速从各地赶回台北，悬赏500万元捉拿杨

双五。日本与台湾警方也发出紧急通缉令，展开全球追捕行动。

第十四章　“萤桥帮”老大张真大陆起伏记 …… (198)
1992年2月15日晚，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台湾黑社会“萤桥帮”老大张真被我公安机关抓获，并遣返台湾。在台湾犯下多起大案的张真偷渡大陆，先在厦门经商，后北上发展，通过关系结识大陆一知名画家而红极一时，成为北京市的“模范市民”，但最终未逃出黑道不归路。

第十五章　“竹联帮”与情报局的暗杀行动 …… (214)
台北永康街台湾情报局招待所。副局长胡义敏、第三处处长陈虎门及陈启礼与电影制片人帅岳峰，秘密商会。1984年10月15日凌晨，华裔知名作家江南在旧金山帝利市家中被人杀害，震惊世界。两周后，美国联邦调查局特工组发表声明，宣布侦破命案，确定凶手就是台湾的“竹联帮”老大陈启礼、总护法吴敦与忠堂堂主董桂森。台湾随即展开一场大规模的扫黑行动，陈启礼与吴敦先后被捕，董桂森大逃亡。

第十六章　黑道赌场揭秘 …… (242)
黑道生存离不开赌场。台湾黑道赌场有“文场”与“武场”之分，赌法有赌现金与A仔场之别。场赌上流行种种诈赌术，外人每赌必输。黑道兄弟为赌场抽头（红利）经常发生冲突。讨赌债成为黑道的一种职业，“打猎”也成为道上不成文的规矩。

第十七章 职业棒球赛背后的黑色大赌 …… (260)
台湾十分盛行的棒球赛造就了一股黑色赌潮，赌法众多，赌资巨大。球员常常受到黑道大哥金钱、美色的引诱与暴力的控制、威胁，台湾棒球赛笼罩在一股黑色恐怖之中。

第十八章 黑道军火走私交易 …… (271)
武器装备代表着黑道帮派的实力。各帮派纷纷采购枪支，造就了军火走私的盛行，美国的转轮手枪、以色列的美制滚筒式冲锋枪、菲律宾的汤姆笙冲锋枪，以及比利时、德国、捷克、巴西等50多个国家的各类枪支无所不有。马来西亚“拿督”、台湾侨务委员陈沛雄利用特殊身份与“竹联帮”合作大规模走私枪支，在追捕行动中发生枪战。

第十九章 黑道与情报员联合跨海大洗钱 …… (286)
台湾“调查局”截获一份重要情报：香港黑社会组织和台湾黑帮合作，走私一批枪支到台湾。台湾“调查局”迅速展开侦察，无意发现一笔从香港汇入的数亿元巨资在一天之内被人提走，案情重大。消息指出，这笔钱正与香港华懋集团负责人王德辉被绑架、失踪案有关。情报部门发现，秘密派往香港的情报员程其源与香港警署前警长钟维政涉案嫌疑重大。

第二十章 黑道工程围标 …… (294)
1996年4月1日，《中国时报》头版报道：台湾通向国际的空中大门——中正机场二期航站工程遭到黑道围

标。顿时舆论哗然，一场涉及黑道帮派、政治人物与多个知名企业的黑白两道围标工程弊案黑幕全面爆发。

第二十一章　黑道与公司经营权之争 ……（309）
为争夺上市公司的经营权，所谓的“公司派”与“市场派”纷纷引进黑社会势力壮大实力，甚至控制股东大会。台湾“法务部长”宣示：黑道分子在上市公司中兴风作浪，介入董事监事，操纵公司运作，进行利益输送，危害极大，政府将坚决打击。

第二十二章　演艺圈黑影幢幢 ……（320）
台湾影视界演艺圈与黑道关系复杂微妙。“竹联帮”的吴敦、周榕、沈晓印等皆是演视界的闻人。曾入选“金马奖”的电影《金大班最后一夜》制片人帅岳峰不仅是“竹联邦”元老，更是“江南命案”的关键人物。“青蛙王子”高凌风、“千万大导演”刘家昌无不卷入黑道是非，演员山茅更惨死在与黑道的搏斗之中。

第二十三章　黑道大哥入主政坛……（336）
台湾警方统计：台湾省有黑道背景的“民意代表”超过150人，在县市议会已超过总数的三分之一。台湾有一套黑道漂白的公式：“先当兄弟，再当议员”，结果台湾出现了“黑道治县”、“黑道治台”。议会暴力冲突不断，政坛谈黑色变。

第二十四章　扫黑大行动 ……（356）

台湾警方实施“A10”扫黑搜索行动，迅速包围黑帮重要据点与堂口。台北市“四海帮”安敦大厦总堂口被查封，一举查获2000多名黑帮成员名册与88个堂口资料。老大蔡冠伦被押送绿岛。接着在高雄、台中等地展开全面搜索行动，一批黑道兄弟被捕。不料，风声提前走漏，真正的黑道老大远走海外，扫黑功亏一篑。

附录：今日台湾青帮与洪门 …… (372)

引　子

台湾黑社会发展历史较为悠久，起源颇为复杂，且多元化。部分黑社会组织是由中国传统帮会发展演变而来，部分是当地社会历史发展中形成的地域性“角头”势力，更多的则是战后台湾社会结构变迁与多种矛盾中发展起来的新兴黑社会帮派组织。

清政府收复台湾后，以“反清复明”为主要宗旨的秘密结社从大陆传入台湾。从荷兰人手中收复台湾的郑成功，就是中国洪门的“武宗”。郑成功还在台湾首开洪门金台山明远堂，并令蔡德英等人到内地发展洪门组织。这时台湾的帮会与大陆的帮会很相似，具有浓厚的政治色彩，曾组织了多次反清起义，如台湾的“八卦会”与“天地会”的反抗活动。日本占据台湾前，青帮、洪门组织在台湾发展也十分迅速，遍及各个阶层。然而，清末民初，大陆青帮与洪门逐渐成为一股黑社会势力，台湾的青帮与洪门性质也发生相应变化。

1895年，日本占领台湾后，日本殖民者曾对台湾的秘密或公开社团与组织进行大规模的整肃，原有的秘密帮派组织受到重创，大部分解体。为了进一步控制台湾社会，日本殖民统治者从日本派大批“浪人”到台湾，形成一个特殊的社会阶层，让他们控制当地的混混与帮派组织。

台湾光复后，这些日本“浪人”被遣送回国，台湾一些本地

帮派或地痞流氓失去原有靠山，部分也转往日本发展。这也是今天日本的台湾黑社会势力庞大的原因之一。一些当地混混或流氓以地域为界，占据地盘，聚众为帮，成为地方角头，形成社区型帮派。如1946年间，台北艋舺（当时台北最繁华地区）的“十二生肖帮”，就是这类角头帮派的典型。当时较著名的帮派还有“大桥头帮”、“大龙洞帮”、“牛埔仔帮”等，他们以在自己的地盘内收取保护费或搞赌场为生。

1949年前后，国民党政府率数百万人逃台，极大地改变了台湾的社会结构与历史发展，也改变了台湾黑社会生态。

国民党政权迁到台湾后，原来已有的一些黑社会组织不但没有受到打击与控制，而且黑社会势力还出现滋生蔓延之势，这与国民党政权历来同黑社会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有关。一是一些日据时代的帮派组织，如“芳明馆”、“大桥头”、“华山帮”、“犬龙峒”、“牛埔仔”等帮派死灰复燃，重新开始活动。二是大陆的“青帮”、“洪门”及“厦门帮”等黑社会组织也来台发展。其中“厦门帮”因讲闽南语，与警界关系良好，在外省帮中独领风骚。同时，一批大陆的青帮与洪门重要人物来台，但因被禁止公开活动，他们便改头换面，以商人或政治人物的面目出现，仍在地下秘密发展。三是从大陆来的国民党军公教等各界大陆籍人士子女，因不适应新的生存环境及避免遭受当地人的欺压，也纷纷组织帮派。受“2·28事件”的影响，外省人与本省人的矛盾加深，外省子弟受到排挤与排斥，加上失学与失业，纷纷出现了外省籍帮派组织。当时台北的“小九龙帮”、“十二刀把帮”、“十三太保”、“十三太妹”等就是其中的典型。后来，“四海帮”、“竹联帮”等帮派兴起，一跃而成为横跨全岛的大帮派，对台湾社会影响甚巨。于是，台湾警方于1955年开始取缔黑道流氓，称之为“伏妖专案”，主要是打击“地痞流氓”等黑社会分子。

到60年代中期，台湾黑社会帮派组织发展到一个高峰，仅

台北市就达数十个帮派。除了“竹联帮”与“四海帮”等大帮外，“飞鹰帮”一度声势浩大，号称成员1000多人。黑社会组织的迅速增加与社会治安的不佳，台北市刑警局于1968年8月展开扫黑行动，破获许多帮派组织。

1973年，台湾警方为取缔黑社会帮派组织，首次在全省办理黑社会帮派组织自动解散登记。警察与情报部门还联合发表了一封“告台湾黑帮书”，声明全台湾所有不良帮派，应自本告示发布之日起在一个月内，自动到所在治安机关登记，否则将严加惩办。结果获得登记的黑社会组织就达568个，其中有3334人登记脱离帮派，可见台湾黑社会组织之多。

1978年，台湾警方进行第二次黑社会不良帮派自动解散登记，结果只有189个帮派前来登记，黑道人物只有961人。似乎黑道帮派有所减少。其实不然。一些黑道吸取上次教训，除非警方已掌握情况，不然就不会自动登记，否则警方就掌握了帮派活动情况，以后每有事件发生，都会前来找你“约谈”。

到了80年代，台湾黑社会组织已发展到一个更高的层次。它们不再是依靠开赌场、收取保护费、替人当保镖等来维持生存与活动。保镖曾是台湾黑道上最流行的一个行业。保镖通常分为三种：第一流的保镖，名气在黑道上无人不知，所以只要聘了一流保镖，就无人敢前来滋事。第二流保镖，多少有一点实力与知名度，一些想闹事者事先会打听保镖在不在，如果在，闹事者就不敢轻举妄动；如果不在，就会前来闹事，索取保护费，然后再请出道上“大哥级”的人物出面收拾残局。第三流保镖，只能是做样子，经常会遇到闹事者，只能在事后出面用武力讨回面子。

这时候黑社会组织已介入各个行业，应召站、茶室、私娼寮（妓院）、地下酒家、理发厅、按摩院、地下钱庄、讨债公司、期货公司、电影娱乐公司、运输公司等等，黑社会的影子已是无所不有，无处不在。在台湾，演员的拍片，歌星的登台演唱，公共

工程的招标，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种选举，等等，都有黑道人物的介入与操纵。所以在台湾社会的各个角落，各个阶层，各个行业，各项活动，无不有黑道人物的影子与影响。黑社会成员可以说已经成为台湾社会一个特殊的社会阶层，黑社会帮派组织已成为社会结构的一部分。

台湾的黑社会组织与黑社会分子有多种称呼，如地方帮派、流氓帮派、黑道人物、帮派角头。一般而言，黑社会角头与帮派有所不同，角头大多是以区域为界，即占有固定的地盘，很少向外扩张，也不允许其他角头侵占，由于地方性强，历史较久，根深蒂固，统合性高；而帮派虽有自己的地盘与领域，但不限于此，常向外扩张，进入其他地区。

台湾的黑道帮派组织多而复杂。据1995年台湾“内政部警政署”所编“警政工作概况”，目前台湾地区黑道流氓帮派的组织可分为组织型、组合型与角头型三类。组合型帮派占帮派组织总数的47%，角头型帮派约占41%。组织型的帮派集中化程度高，约占帮派总数的12%，主要集中在台北，像“竹联帮”、“四海帮”、“松联帮”和“天道盟”。其中“竹联帮”最大，堂口多；“松联帮”最小，但是最凶狠。在“一清专案”之前，除“天道盟”尚没成立外，其他帮派都有自己的地盘，如“松联帮”的活动范围在台北松山区，“四海帮”的地盘在中山区，“竹联帮”在大安区。但此后，这种分界不存在了，所有的帮派组织与角头全省化了。

台湾黑社会有所谓的“纵贯线”、“海口线”（海线）与“中央线”（或山线）等三条知名的黑道线。“纵贯线”是指活跃于从南（屏东）到北（基隆）一线的黑道人物。“海口线”是指台中县沙鹿、清水、大肚等一带的黑社会势力；“山线”是指活跃于台中县的丰原市、东势镇、草屯镇等地的黑社会帮派。

台湾黑道上一知名大哥根据自己在道上的经验，将台湾的黑

道流氓（黑道分子的另一种说法）分为五类。第一类是“家立”；第二类是“村立”；第三类是“乡（镇）立”；第四类是“市立”；第五类是“省立”。“家立”（家庭）流氓在外头挨打，一点也不敢放肆，回到家才找父母兄弟姐妹们出气。“村立”流氓虽敢在村子里乱叫乱闹，出了村，叫他立正，他不敢稍息。“乡（镇）立”流氓整天在乡镇上鱼肉乡民，也整天等着被移送管训。“市立”流氓拥有一股恶势力，稍有名气，同时也拥有自己的赌场，但知名度及势力仅限于区域性的市区。出了市区还是一样叫不响，吃不开。至于“省立”流氓，也就是“纵贯线”大哥或小哥那一类流氓，他们不仅有四通八达的恶势力，并且还有枪，有俱乐部（组织），有背景，有财力，住有高级别墅，行有名牌轿车，穿的是舶来服装，戴的是AP金表或劳力士金表。手下公司一大堆，拥有董事长、总经理、顾问、理事等头衔一大堆。

更有专家将台湾黑社会分为社会型、经济型与政治型三类。社会型黑道多半是本地黑道结合外地流窜型黑道，无稳固的经济来源，暴力倾向严重，经常进行恐吓、勒索、威胁；经济型黑道多半有地下事业，如赌场、色情业、走私、地下酒家等，也有名义上的合法事业，如经营电影、娱乐、餐饮事业与工程围标等，主要是本地黑道；政治型黑道多半是本地出身，由经济型黑道发展而来，即依靠经济实力介入选举活动，进而进入地方政治圈。

南台湾与北台湾黑道在行事作风与组织等方面有很大不同。北部黑道分子在处事与生存之道上，较善于斗智，而南部兄弟较重于斗力。据台湾一位资深警官分析，南部帮派和北部帮派最大的差异就是，北部的黑道组织和美、日帮派一样，多已公司化，不仅通过公司组织吸收成员，进行人员培训和掩护洗钱，而且转投资其他合法暴利事业，以达到彻底漂白的目的。但南部的帮派则仍以“角头”为主，同一帮派间不同的大哥领导不同的人马，各自为政，组织较松散。他说：“北部的黑道大哥尽量脱下汗衫，

改穿西装，南部角头则最多把拖鞋改布鞋，还没到穿皮鞋的程度。”

黑道帮派都很重视自己的武器装备，这也是黑道帮派实力强弱的重要表现。早期，黑道拥有的器械是各种刀具、九节鞭、扁钻、木棍等，可以伤人但一般不会致命。所以尽管早期黑道火并频传，但伤多死少。到了70年代末与80年代初，黑道变质，江湖流转，黑道上将拥有枪作为实力强弱的标记。枪被认为是护身符，是武力强大的招牌。特别是在黑道火并时，枪便成为最具威力的武器。黑道上将有枪的兄弟称为“鸭头仔”或“勾仔”。

黑道上拥有的枪支，常见的主要有038左轮手枪，023左轮手枪，044大型白郎宁手枪，022小型白郎宁手枪（俗称掌心雷），双管12号散弹猎枪，单管猎枪，三连发与五连发猎枪，045手枪，卡宾枪，M16自动步枪，美制手榴弹，袖珍手枪，土制钢笔手枪和经改造的左轮手枪等。

随着社会的发展，黑道伦理也发生历史性变化，过去角头大哥呼风唤雨，威镇八方，小弟服服帖帖。现在不同了，大哥不敢再随便招摇过市，不敢随意对小弟不客气，否则枪火不认人，小弟对大哥也不再殷勤。

由于历史的原因，台湾的黑社会组织有“本地”与“外省”两大系统，又称“本省挂”与“外省挂”。本地帮派是直接由过去在台湾本地活动的秘密团伙或组织发展而来，也有一些本省籍青少年组织的新兴本省帮派，多是地区性，如一区一帮，像“万华帮”、“桥头帮”、“牛埔帮”等等。“外省帮”是指从大陆黑社会组织延续到台湾的黑社会组织帮派（如“厦门帮”、青帮），或是战后由大陆来台湾的外省籍人或其后代为自己的生存利益而形成的，如“青岛帮”、“竹联帮”、“四海帮”等。目前，“竹联帮”与“四海帮”是外省帮派的代表；“天道盟”则是本省帮派的代表，其他诸多地方角头均是本地黑帮。

在黑道全省化发展下，本省与外省籍黑道走向大联合。在台湾政治上族群矛盾激化的时候，黑社会帮派虽有省籍之分，但融合的程度较高。有人讲，“帮派是族群融和最好的地方”。事实上，台湾主要黑社会帮派之间不像早期那样关系紧张，经常进行火并，而是关系十分密切，老大之间是好友，经常有来往。在“竹联帮”兄弟开的公司，常有“四海帮”兄弟去串门。1994年底，云林的地方大哥北上和台北的“竹联帮”大哥级兄弟谈事时，“竹联帮”大哥用手机通知手下兄弟，要懂得待客之道，招待这位来自地方的大哥。“四海帮”大哥“大宝”陈永和、“竹联帮”的蔡姓老大以及当年和“竹联帮”同辈的“老四”于1994年先后南下高雄和“七贤帮”、“西北帮”洽谈合作事宜。1995年，“四海帮”老大陈永和被枪杀后，在举行的隆重公祭上，“竹联帮”、“松联帮”、“天道盟”及南部黑道老大均前来参加与告别。

1996年初，一名实力派的帮派负责人，邀集重要帮派的负责人及大哥级人士聚会，倡议建立跨省籍、跨帮派的联盟，处理围标工程利益分配、仲裁帮派纠纷。7月底，岛内进一步传出，“竹联帮”、“天道盟”、“四海帮”与“松联帮”等四大帮派，联合邀请具有黑道身份或色彩的“国大代表”与“立法委员”，针对台湾治安单位扬言制定“反黑条款”一事，展开反击，提出筹组“正义党”与之对抗，且在台北、高雄、台中等地筹组“正义联谊会”。

然而，由于岛内形势的急剧变化，这一黑道合作计划出现新的变数。据台湾警方情报，“竹联帮”、“四海帮”、“北联帮”等三大外省帮派正计划组成一个合法政党，以进行完全的“黑漂白”，希望在以后的各项民意代表大选中推出属于自己的参选人，以便在政坛争取各种政治、经济利益，并保护自己，并与已介入政坛的本省帮“天道盟”抗衡。这再次反映出台湾黑道生态正在

进入一个新的重组与发展时期。

1984年因“江南命案”的发生，台湾展开历史上从未有的大规模扫黑行动，即所谓的“一清专案”，一大批黑道分子被送进监狱。同时展开第三次不良帮派分子自动登记解散行动。在短短4个月内，自动登记解散的黑社会帮派组织达到651个，涉及黑帮人物3000多人。到该年底，台湾警方登记在案的台湾黑社会帮派组织达1408个，总人数高达7295人。到1985年底，警方共抓获黑道流氓20372人。扫黑3年后，黑社会组织又重新达到一个高峰。特别是昔日因扫黑被抓进牢里的黑道人物纷纷出狱，出现了以“天道盟”为首的本省籍跨地区的黑道组织。到了1987年台湾选举前夕，台湾又一次展开扫黑行动，查获的黑社会组织达756个，真可谓“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

台湾的黑社会并不因警方扫荡而有所抑制或消亡，相反，却在不断地发展。特别是李登辉主政后，利用黑社会势力来巩固自己的政治权力，使得黑社会反而在90年代出现了更大的发展，纷纷介入地方政坛，甚至进入省级、“中央”级民意机构，而被称为“黑道治国”。在强大的社会舆论下，台湾又不得不继续采取行动，打击黑社会活动。1990年，台湾警方又展开“迅雷扫黑”行动，但因风声走漏，许多黑道大哥远走异乡，包括对岸的大陆，结果只抓到一批黑社会帮派的小混混。

为掌握黑社会发展情况及进行有效打击，台湾“警政署”对台湾黑社会帮派发展情况进行了一次总普查。1996年6月25日，“警政署”首次公开各县市列管的黑道流氓与重要黑社会帮派的普查情况。据清查，台湾共有约1000个大小帮派组织，有组织形态的约126个，成员5800多人。人数最多的是“竹联帮”，有600多人；其次是“四海帮”，约500多人；“天道盟”居第三位，有400多人。其中警方有案可稽、列管的重要黑道人物2067人。分布情况如下：台北市与台北县1250人，属于“竹联帮”、“四

海帮”、“松联帮”、“芳明馆帮”、“飞鹰帮”、“猪屠口帮”、“天道盟”等帮派；宜兰县有113人，属“红卫兵帮”、“员山帮”等帮派；桃园县有434人，分属“竹联帮”、“十三神鹰帮”、“小南门帮”等帮派；新竹县有134人，分属“飞砂帮”、“三光帮”、“十三神鹰帮”等帮派；台中县有350人，以“四海帮”成员最多，其次是“四大天王帮”及其组合分子；台中市有350人，仍以“四海帮”势力最大；彰化县有393人，以溪州组合成员最多；嘉义县有177人，主要是“竹子脚”组合分子；云林县有127人，其中以“吴家班”组合成员最多；台南市有167人，有“夏林派”、“东门帮”、“小公园帮”等帮派；高雄市有1153人，分属“七贤帮”、“沙仔地帮”、“圣公妈庙帮”、“夜市场帮”等帮派；屏东县有275人，主要为“三十兄弟帮”；澎湖县有31人，属“车头帮”。另外，苗栗县有帮派成员157人，南投县156人，台南县218人，台东县74人，这些地区的帮派以特定人物的组合及角头组合为主，但原有的不少组合已被“天道盟”吸收，成为其分会。这次普查的黑社会人数，均是有案可查的，而大量的黑社会分子并未包括在内，因此其统计数远低于实际情况。不久，台湾警方便在全省展开一场大规模的扫黑行动，抓获不少黑道人物。

然而在台湾，黑社会组织虽然遭到一次又一次的扫荡与打击，但却不会消亡。一个低潮过去，另一个高潮又会出现，并不断衍生与发展。

第一章
北部黑社会的大本营

北部黑帮以台北市与台北县为中心，包括周边宜兰县、基隆市、桃园县、新竹县、新竹市等地带。其中台北市是台湾黑社会最集中的地方，台湾“三大帮派”——“竹联帮”、“四海帮”、“天道盟”总部均在台北市。

台北市黑社会帮派组织最多，计有100多个，分布在各行政区内。

主要帮派有“竹联帮”、“四海帮”、“牛埔帮”、“新兴市场帮”、“血狼帮”、“顶厝帮”、“下厝帮”、“青龙帮”、“华山帮”、“新村帮”、“黑蛇帮”、“龙江市场帮”、“统一口帮”、“三板桥帮”、“头厝帮”、“树林帮”、“五大色狼帮”、“下塔悠帮”、“伊通街帮”、“长春路帮”、“下埤头帮”、“殡仪馆帮”、“圆山车站帮”、“锦联帮”、“一成帮”、“四兄弟帮”、“信义新村帮”、“金山街帮”、“六张犁帮”、“卧龙帮”、“东门帮”、“宝宫帮”、“十二星相帮”、“中仑七条龙帮”、“黑旋风帮”、“敦化联帮”、“龙虎凤帮”、“黑麒麟帮”、“信义路五六巷帮”、“高厝帮”、“许厝帮”、“詹厝帮”、“陈厝帮”、“中仑帮”、“下门埔帮”、“芳明馆帮”、“将军庙帮”、“新加坡帮”、“八脚帮”、“贵阳万宗帮”、“河沟头帮”、“后菜园帮”、“会社（火车）尾帮”、“龙山寺口帮”、“祖师庙帮”、“古亭八小帮”、“三环帮”、“十三玫瑰帮”、“七炮王帮”、“重庆南路帮”、“西门町帮”、“狂风暴雨帮”、“天罡帮”、“新天罡帮”、

“雷虎帮”、“龙虎帮”、“十二生肖帮”、“201帮”、“八国联军帮”、“七间仔帮”、“万国帮”、“飞鹰帮”、“西门口帮”、“车头帮”、“复兴口帮”、“第二水门帮”、“八虎帮”、“路店帮”、“店仔口帮”、“库江汀帮”、“八张犁帮”、“公馆帮”、“一百间帮”、“小南门帮”、“五朵云帮”、“嵌顶帮”、“新监狱口帮”、“苦海虎堂帮”、“龙口帮”、“五号码头帮”、“龙虎四票帮”、“震田帮”、“大学口帮”、“南门口帮”、“和平东路帮”、“七龙帮”、“南机场帮”、“万里飘帮”、“牯岭街帮”、“九姐妹帮”、“萤桥帮”、“龙口广告帮”、“红合会”、“骷髅头帮”、“厦门帮”、“狮管巷帮”、“新舞台帮”、“南门街帮”、“鸟桥头帮”、“鸭寮帮”、“黑虎帮”、“朋仔帮”、“兰花帮”、“九号水门帮”、“宫口帮”、“大光明帮”、“旧市场帮”、“龙虎门（盟）帮”、“圆环帮”、“北门口帮”、“菜（柴）寮帮”、“祖厝口帮”、“大正街帮”、“下厝庄帮”、“后湖帮”、“大同帮”、“四嵌帮”、“大桥帮”、“太平帮”、“十四水门帮”、“神鹰帮”、“漳水街帮”、“松联帮”、“海盘帮”、“山脚帮”、“忠孝东路帮”、“纳粹帮”、“富台帮”、“小东势帮”、“吴兴街帮”、“五分埔帮”、“松山十字帮”、“建北萤桥帮”、“福州帮”、“七兄弟帮”、“五龙帮”、“七虎煞帮”、“神盟帮”、“后港里帮”、“棺材帮”、“神鹰帮”、“义贵帮”、“旧街帮”、“北联帮”、“开心俱乐部帮”、“新营帮”、“软桥帮”、“陆光帮”、“花蝴蝶帮”、“小北联帮”、“忠义联帮”、“马虎俱乐部帮”、“石牌兄弟帮”、“十八罗汉帮”、“黑鹰帮”、“四利煞帮”、“黑燕帮”、“西鹰帮”、“天下九龙凤帮”、“十五分帮”、“沟子口帮”、“龙帮”与“十二兄弟帮”等。

台北县主要帮派有“天台帮”、“长泰帮”等帮派；新竹县与新竹市主要帮派有“三光帮”、“风飞砂帮”、“农会口帮”、“院口帮”、“三环帮”等帮派；桃园县有“血鹰帮”、“十三铁会帮”、“竹林帮”、“自立帮”等帮派；基隆市主要帮派有“车头帮”、“十二生肖帮”、“公园帮”等帮派。

为掌握黑社会发展情况及进行有效打击，90年代初，台湾“警政署”对台湾黑社会帮派发展情况进行了一次总普查，首次公开各县市列管的黑道流氓与重要黑社会帮派的普查情况，台湾共有约1000个大小帮派组织。其中在台湾北部的分布情况如下：台北市与台北县1250人，属于“竹联帮”、“四海帮”、“松联帮”、“芳明馆”、“飞鹰帮”、“猪屠口帮”、“天道盟”等帮；宜兰县有113人，属“红卫兵帮”、“员山帮”等帮派；桃园县有434人，分属“竹联帮”、“十三神鹰帮”、“小南门帮”等帮派；新竹县有134人，分属“飞砂帮”、“三光帮”、“十三神鹰帮”等帮派。这次普查的黑社会人数，均是有案可查的，而大量的黑社会分子并未包括在内。不久，台湾警方便在全省展开一场大规模的扫黑行动，抓获不少黑道人物。

基本上，全岛性的大帮派只有“竹联帮”、“四海帮”与“天道盟”三大帮，其总部均在台北市。而地方角头式的帮派则分布在台北市各区域或其他县市。不过，全岛性的大帮派在各地几乎都有它的分支机构。近年兴起的“至尊盟”黑社会组织总部也设在台北市。

“至尊盟”是由台北市大同区“下厝庄”帮派分子侯廷达等人在旅居日本期间，与到日本的多名台湾黑社会帮派分子老大聚会，提议仿照日本黑社会组织“山口组”蚕食股市经营的模式，建立一个新的黑社会组织。1995年3月，侯廷达等人开始筹组“至尊盟”，在台北市南京东路二段80号8楼廷达公司设立筹备处。4月，在台北市西宁北路37号三楼正式成立“至尊盟”，对外以“至尊盟实业股份有限公司”挂牌，侯廷达自任总会长，下设副总会长、秘书长、执行长、执法、顾问等。随后，在全岛各地设立分会，计有“尊龙会”（台北县三重市）、“尊将会”（台北县）、“尊中会”（台中市）、“尊圣会”（高雄市）等。在1996年台湾高兴昌公司因公司派与市场派争夺企业经营权，公司派的副

董事长吕恩彰因市场派扬言要破坏股东会，乃求助“至尊盟”。“至尊盟”派出高雄分会的“尊圣会”6名成员参加股东会，对市场派施压。事后，高兴昌公司支付“至尊盟”20万元车马费与120万元特别顾问费。

松山区的“松联帮”在“竹联帮”与“四海帮”因“一清专案”受挫之际而坐大，成为台北市一支颇具实力的帮派，成员凝聚力强。据知，这个帮早期是一些外省籍的聚合分子，正式成立于1983年。下设龙、虎、狮、豹4个堂口，内设堂主与护法等职，与“竹联帮”类似。早期势力范围以台北市松山地区为主，在松基与妇联等眷村有较大势力。80年代中期后，“松联帮”得到迅速发展，并以台北市东区公子爷西餐厅为主要活动据点，当时几乎控制了东区所有特种行业的围事与保护费的收取。前“松联帮”老大是覃志伟。“松联帮”与“四海帮”因争夺一笔价值十亿元新台币的土地，引发双方的恩怨。覃志伟在大陆厦门被人所杀。覃的贴身保镖王鑫认为是“四海帮”分子所为，便教唆美国“华青帮”分子于1996年在台北将“四海帮”的陈永和枪杀。自覃志伟遭狙击后，“松联帮”的力量受到影响，目前台面人物以“小豹”、“小潘”为首。

“飞鹰帮”也是一个高度组织化的帮派，实行“旗制”，目前除原有的“红、黄、蓝、白、黑、铁、血”等旗外，近期又增设了“金、木、水、火、土”五旗，以扩展实力。

在台北市中山区活动的帮派多，而以“牛埔帮”为最大。“牛埔帮”历史悠久，早在日据时期就已存在，当时称为“牛埔仔”，是典型的本地角头。早期活动于台北市华泰饭店到中山国小一带的牛埔仔地区，也因此得名。1961年，“牛埔帮”老大“牛财”成立“狮团”，借名保护德惠街一带的酒吧、酒廊等商家店面收取保护费。这一带特种营业店面林立，各帮派为争夺地盘而不断发生拼斗。1968年，“牛埔帮”与最大的“竹联帮”对

阵，首次使用土制炸弹，震动台湾。70年代后，该帮开始经营企业，目前拥有多家宾馆、酒廊、理发馆和赌场，是中山区最具实力的帮派，成员有1000多人。今天的活动与势力范围主要是在中山北路、德惠街、林森北路、民生东路西、重庆北路一带。

帮派之间除利益争夺而发生冲突与复仇外，也常因为内部矛盾而发生内讧，引起枪杀。“牛埔帮”近年就因江湖恩怨发生多起内讧。1994年12月18日晚，“牛埔帮”重量级元老“细汉莫利”胡茂盛在过完隆重的生日晚宴后，与女儿及女友行至台北市中山区民族东路32号时，被人连开四枪而死亡。次年1月7日晚，“牛埔帮”另一要角“空斌”谢文斌与黄国清及“小咪”等几个兄弟在百花红酒家用酒之后，在返回胡茂盛的灵堂时，又遭两名杀手狙击，谢文斌与黄国清当场死亡。

对这两起帮派分子的枪杀案，江湖传言甚多。有的说是胡茂盛在处理南部一块土地时，与帮中青壮派在利益分配上产生矛盾，引起后者的不满。也有传言讲胡茂盛有意培养曾与警方发生枪战、行事作风强悍的谢文斌掌握该帮大权，引起其他兄弟不满。也有传说是因为女人惹祸上身。据警方多年调查证实，这两件令黑白两道震惊的枪杀案，是“牛埔帮”内部一些新兴势力不满元老“细汉莫利”胡茂盛行事作风，有意取而代之，雇用杀手埋伏狙击。胡死后，他的身边要角“空斌”谢文斌扬言要报复，再次被杀手干掉。这次帮内内讧雇用杀手的代价达2000万元新台币，杀手共计四男一女，由罗姓男子指挥调度，由刘姓女子在胡茂盛住处附近租屋观察胡的出入习惯，然后寻机作案。事后，杀手已逃至海外。

万华地区是台北市早期最繁华的地区，位于台北县与台北市的交通要道，是周围农村人口讨生活的去处，是过去黑社会角头最活跃的地方。随着新市区的发展，万华地区逐渐衰落，这里的黑道角头也随之没落。现在万华区可数的黑道角头主要有“头北

厝帮”、“芳明馆”、“龙山寺口帮”、“大众帮”、“华西街帮”、“堀江町帮”、“咖呐帮”等，而像“会社尾”、“九间仔帮”、“垃圾市帮”、“一百间仔帮”与“廖馆口帮”等已势力不再。其中以“芳明馆”历史最悠久，实力最强，活动于现在的宝斗里红灯区，它是以日据时代台北最大的一家艺妓馆“芳明馆”而得名。初期，并没有固定组织，人员复杂，派系多。到70年代初，形成“库玛”林春发一派、“流氓”连明彦一派、“水泥桶”廖胜美一派、“大江”一派和“三八庆江”一派等。这五派差不多瓜分了整个万华地区。其中，该帮以经营赌场闻名，曾有台北最大的赌场，赚了不少钱。为了争夺利益，各派之间明争暗斗不断，对帮务的发展影响重大。万华地区的西门町是早期本省角头帮派的势力范围，但在西门町旧式商业衰落与新兴商业兴起后，“竹联帮”与“四海帮”势力逐渐渗入。

1996年8月，万华区又发生一起区外帮派与本地帮的火并事件。8月18日夜，台北市万家灯火，五光十色的霓虹灯闪烁。广州街红花阁酒家，生意特别的好，不断有客人出入。凌晨4时许，台北市中正区“华山帮”分子绰号“神经明”黄德明和万华区“华西街帮”重量级老大、绰号“小赵”郑启扬、“阿麟”、陈忠宪等人一同到万华区“崛江町帮”角头所开设的红花阁酒家一包间内喝酒。朋友相聚，你一杯，我一杯，喝得痛快。很快，酒量不大的黄德明已略有醉意。

黄得知大同区“下厝庄帮”角头绰号“晓帝”吴老大的侄子“细汉芋果”、“天道盟”的“济公会”的人马在另一包间喝酒畅谈，这些都是道上的朋友，于是只身前往敬酒。可惜已半醉半醒的黄德明说话颠三倒四，话不中听，敬酒为高兴却弄得对方不快，自己也扫兴地回到包厢。在座的“华西街”老大便要陈忠宪、张立住、郑启扬扶黄下楼，送他回家。

谁料下楼时，黄又与对方撞见，并发生争执，一直争到餐厅

外面的马路上，绰号“小赵”郑启扬居中调解，对方却不谅解。这时，黄德明的贴身小弟、绰号“王霸”的黄崇榕听到争吵声，迅速冲出，不由分说拿出一把左轮手枪向对方连开两枪，却枪法不准，连连打空枪，没有人被击中。对方怎会示弱，迅速卧倒，利用旁边的摩托车作掩护，拔枪向对方射击，连开5枪。黄崇榕尽管也躲进个体摊贩架子下，但仍被击中多枪，随即倒地。郑启扬也被乱枪击中，另有两位行路人受伤。黄德明却迅速离开跑掉。

警方接到报案，万华区警察分局局长陈连侦立即率员到现场侦察了解案情。警方在现场发现90手枪弹壳14个、子弹1发及左轮手枪1支。然后，展开搜索，并迅速在一家医院将两名嫌犯陈忠宪与张立信逮捕。

初步审查，这是万华区黑道角头与外地帮的火并。红花阁酒家就是万华角头“崛江町帮”所有。这个角头控制了西昌街、广州街一带的老社区，多从事“阿公店”餐厅生意，并依靠上了年纪的女招待陪酒来支撑场面。“华山帮”是指过去华山车站一带的角头。过去这一带黑道角头主要是以搬运货物的工人为基本成员。但在地下铁路发展后，黑道角头逐渐转变为以特种营业的“围势”（香港称“围事”，即保护的意思）或介入各种商业经营为主要经济来源。而“下厝庄帮”是下厝庄边缘地带的“黑桥头帮”分支，活动区域仍以万华区为主。一般而言，万华地区的黑道角头很少在自己的地头犯案，多是外来黑道分子所引起。这次火并就有两个帮派是外区的，可以说是由于“强龙压地头蛇”所引发的。

北投区是台湾知名的温泉地带，也是早期的红灯区，因此这里有不少地方角头帮派。其中北投“山仔脚”就是一个地方帮派。角头老大温文政凭其壮硕的体格与好斗的性格曾在北投区黑道上叱咤风云。但因他嗜赌成性，让他大起大落，一时是手头有

钱的暴富，一时两手空空，便只有通过暴力等种种犯罪手段达到他的目的。温文政，绰号“库模”，51岁，犯有伪造文书、恐吓、携带枪械、伤害等多项罪名。他在北投一带专门替人或建筑公司处理土地纠纷，从中抽成牟利。1987年初，他向台北市议员陈胜宏勒索3000万元未果，被警方抓获。温文政正是台湾地方黑道角头的典型。

台北县人口多，特别是外地来此打天下的人多，逐渐形成一批中等城市，如三重市、板桥市、永和市、中和市、新店市等，人口集中，商业繁荣，是黑道聚集之地。仅“四海帮”、“竹联帮”、“天道盟”三大帮派在这里就有35个活动据点。

桃园县较知名的帮派有“竹联帮东堂”、“十三铁卫帮”、“大树林帮”、“小南门帮”、“血鹰帮”、“十三少帮”、“许芳沃帮”与“宋家帮”等。这里的“竹联帮”不是本地帮，是经由本地人士引进的，多在中正机场一带投资报关行或航空快递事业，也在桃园、中坜两市从事餐饮业，该帮以张大伟为首，被警方列为流氓。“十三铁卫帮”与“小南门帮”以地方政坛人士居多，“大树林帮”则是以后车站的钟姓人士为首。这些本地帮主要靠勒索、围事、收取保护费等为经济来源。据报道，台湾历史上的第一宗劫囚案与第一宗持枪械斗案就发生在桃园县。

桃园县的帮派组织大致上以桃园及中坜两市来区分。北区以桃园市为主，主要帮派有：“大树林帮”，以桃园市车站为势力范围；“十三铁卫帮”的势力则在桃园市中心，且与地方政治势力有勾结；“小南门帮”是以桃园市南区为主；“血鹰帮”以桃园市北区为主；“十三少帮”则是散兵游子，无固定居所。同时区北还有许多以角头势力为主的聚合组织，它们多以开赌场与电子游戏店、经营酒店等为主。

南区以中坜市为主，著名帮派为“宋家班”（势力范围在中坜市与平镇市）与“谢长斐帮”（以中坜、平镇、杨梅与观音等

为主要势力范围)。在南区活动的大哥级知名人物先后有李盛渊、古永城与俞中兴等，但现已不再过问江湖事。

1996年11月，桃园县长刘邦友公馆发生重大血案，震惊全岛。事实上，刘邦友与桃园黑社会关系十分密切，终于因利益分配不均，惹上杀身之祸。他的一位亲信的胞弟就是黑社会的要角。初期，警方怀疑这次血案的幕后黑手是桃园黑帮分子“张三”张忠德与“水仙”陈鸿仙，但这两人先后现身说法，不是他俩所为，也被警方证实。后警方有怀疑是桃园黑帮“宋家帮”的老大“宋新仔”宋新荣，并发出通缉令，全面动员抓捕宋新荣。宋是一个杀手级黑道大哥，曾被通缉，后来经常活跃于香港、澳门等地。1998年初，台湾警方在“线民”提供线索下，在澳门将宋新荣抓获，但证明他并不是杀害刘邦友的凶手，刘宅血案至今未破。

不过，血案发生后，警方大力扫荡桃园黑社会势力，打乱了这里的江湖生态，也让外界再次关注桃园的黑社会势力。

基隆市的“四海帮”、“竹联帮”分子都是老一辈的成员，他们大多转往商业发展，不再纠众围事。目前在基隆市最兴盛、关系最复杂的帮派就是“天道盟”的“太阳会”、“同心会”、“太阳海运会”等三个会。由于基隆市“天道盟”成员关系复杂，竟出现内讧，发生自家人的枪战。“太阳会”成员温钦煌在基隆地检署门前被人开枪击伤，一度引起“天道盟”的震动。直到1996年8月，警方才破案，把涉嫌教唆和开枪的罪犯抓获，发现竟是“天道盟”“同心会”的成员林清标、林和雄与陈添荣所为。

1995年7、8月间，温钦煌数度率手下到基隆市月眉路废土场进行恐吓勒索保护费，并强迫该市中正路一处工地业主把废土倒到他经营的废土场，试图垄断基隆市的废土利益。同年9月，基隆市根据群众举报，将温的三名手下逮捕到案，同时对温进行起诉。

温钦煌的恐吓勒索做法，引起“天道盟”“同心会”成员林清标等人不满，在得知温钦煌于9月21日下午到基隆地检署探望手下后，便将一把美制点25手枪交给手下陈添荣，并一起到基隆地检署门前事先埋伏。下午5时许，当温钦煌与朋友步出地检署的大门时，陈添荣拔枪就向温的头部开枪，然后迅速逃跑，随后将枪交给同伙林和雄保管。不久陈添荣与林清标一同逃到大陆。1996年8月初，他们又回到台湾，不料没几天，就被基隆市警察全部抓获。

新竹地区帮派也很活跃。“天道盟”在这里已有较大发展。“天道盟”“敏德会”就设在新竹市，会长为林敏德，绰号“敏德仔”，曾被列为十大枪击要犯，是新竹地区知名的黑社会人物。近年来，他领导的“天道盟”在新竹吸收不少帮派分子，且拥枪自重，不断做案，引起警方注意。1997年11月14日，警方在新竹市华南街林敏德的住处将其抓获，查获一支自动步枪与一支白朗宁手枪及400多发子弹。

近年来，“竹联帮”、“四海帮”与“天道盟”等大帮派也纷纷进入中部地区发展，相继成立了不少堂口或分会，成为中部地区新的黑社会势力。它们纷纷南下，以公司方式插手工程承包与特种行业，并在当地吸收成员。不过，中南部地区外省色彩帮派的组织力量还难以与当地角头力量匹敌。这些有庞大事业的“纵贯线”兄弟什么事都做得出来，但警方从来不会找到他们头上。因为他们身边都养着几位随时为他们卖命和顶罪的“虎仔”（兄弟）。如有像排除异己的杀人等凶案发生，警方没有查获也就没事。一旦查出，大哥就会安排“虎仔”出面为其作代罪羔羊，自动投案顶罪。“虎仔”不会向警方透露任何秘密。他的主子则会支付他一切诉讼费、狱中生活费，以至家里的生活，直至出狱为止。如果老大不够意思，对“虎仔”“关心”不够，“虎仔”也可能出卖他的主子。但这种情况很少，只是个案，不是通例。

1996年以来，由于警方的扫黑行动声势浩大，北部一些黑社会分子纷纷前来“自首”，如“松联帮”大哥朱伟立、王国栋及11名帮派分子到台北市警察局“自首”，宣布解散“松联帮”；“竹联帮”虎堂堂主张仁拳、忠堂堂主姚天齐及副堂主李顶立、菊堂堂主谭守台与副堂主朱雹辰等多个堂口到市警察局“自首”；“北联帮”成员王玉峰等10人及“天道盟”“文山会”会长翁明勇等9名成员到文山警察局分局“自首”。另外台北市万华地区的“芳明馆”创帮元老之一的黄纪壮等宣布脱离帮派。然而，这并不意味着这些帮派将来就不存在了，其实这至多只是帮派成员的个人行为或一种逃避被抓或管制的策略。几十年来，台湾已办理过好多次帮派“自首”登记，但过后帮派照样存在与发展，而且日益壮大。

第二章
中部黑社会利益争斗

中部地区黑社会帮派活动范围以台中市为中心，包括了台中县、彰化县、彰化市、南投县、云林县等。中部地区的帮派是以地区性角头为主，传统的角头力量常以街道为名。例如，以大湖街、湖北街为根据地的一帮，称为“大湖仔帮”；福音街、学士路、太平路均各有角头盘据，过去十五个结拜兄弟组成号称“十五神虎帮”的小型帮派。练武路的眷村为外省帮派。除了市中心旧市区以收保护费、包赌、包娼起家的传统式黑道角头形态外，作为中部地区消费中心的台中市，随着各种服务业迅速发展，吸引四周县市的黑道兄弟前来分食利益，台中市成为江湖兄弟的又一集中地。中部地区黑社会帮派有“海线”、“山线”与“在地”三大势力之分。

“海线”黑道活跃于清水、沙鹿、梧栖、大肚、龙井等乡镇，实力和“火力”最强。这里又分为“张家班”、“颜家班”。“张家班”雄居清水，以张清池为核心；“颜家班”独霸沙鹿镇，以颜清标为中心（颜现已漂白，成为中部一个很有实力的政治人物）。“山线”黑道活跃于丰原、东势、草屯等市镇，台面上的黑道人物以“志强”、“凤仪”等为首。遭枪击身亡的谢运通，人称“阿不倒”，也曾是彰化“山线”著名大哥。“在地”帮派则为地方角头，以地缘划分势力范围，如已故的彰化洪清凉在二林地区为王。中部其他“在地”知名帮派角头人物有“憨面”、“大头荣”、

“芭乐”、“飞虎明”等。

台中地区与纵贯线黑道关系密切。五短身材的“菜市仔”是属于省级有头面的黑道人物，走红于“纵贯线”黑道圈。“纵贯线”大哥主要是台北市、新竹市、彰化市、嘉义市、台南市、高雄市等地方上有头面的黑道人物，相互交往与合作，形成一条南北畅通的“黑道链”。“纵贯线”上的黑道人物，几乎个个都有事业，包括期货公司、娱乐公司、贸易公司等。

台中市的黑社会和其他地区不甚相同，帮派与帮派之间没有明显争地盘的情形，也没有因帮派间的仇恨展开帮派火并的事情，而是为了利益展开争斗。

在70年代到80年代初，在台中市，以凶残手狠闻名于黑道的兄弟大哥主要有张忠信（绰号“猪哥吉仔”）、王鸿基（绰号“赤龙”）、李胜煌（绰号“胜煌”）、杨介铭（绰号“介铭”，人称“九命怪猫”）、林博文（绰号“美国博”）、王宝童（绰号“憨虎”）、许涌才（绰号“憨才”）。以计谋闻名于台中黑道者首称廖龙辉，绰号“辉哥”。

台中市的黑道帮派规模不大，较知名者有“小九条龙帮”、“大湖帮”、“十五神虎帮”、“第一市场帮”、“公馆十三湾帮”、“国际帮”、“三十神帮”等。

“小九条龙帮”活动范围在台中市中山路、平等路、市府路等台中市市中心一带，成员均以凶狠闻名黑道圈。“九命怪猫”杨介铭就是其中的代表。

杨介铭好斗，经常与他帮兄弟发生冲突，在道上结怨甚多，找他复仇的兄弟不少，他多次死里逃生，而被兄弟称为“九命怪猫”。像他这样经常行凶闹事的兄弟，自然成为破坏社会治安的捣乱分子，受到警察的注意，也成为监狱的常客。但像他这样动不动就用武力解决事情的人，不但道上兄弟、风月场所畏惧他三分，连看守所、监狱也对他头痛。在一次被监禁在看守所期间，

他竟将多名管理员杀伤。

有一次，杨介铭与好友王振辉（绰号“太空辉仔”）因喝酒发生口角，两人竟反目成仇。“太空辉仔”也是凶狠之辈，在离开酒店时，乘杨介铭不备捅了几刀，但伤势不重。杨介铭伤好后，伺机报仇，“太空辉仔”吓得逃到台南，躲了好几个月不敢露面，也想如何解脱困境，也许唯一的办法就是制服对方。

后来，王振辉因台中朋友之母过世，回台中协助办丧事。一天，他与几个兄弟在中山路一条巷子发现杨介铭带着儿子散步，便乘其不备，挥刀乱砍，杨当场死亡，多次死里逃生的“九命怪猫”还是没有逃过最后一劫。王振辉也因此亡命天涯。

在过去台中市帮派中，势力与影响较大者为“大湖帮”。它的势力范围在台中市中湖街、福音街、中华路、公园路的大湖区，这一带俗称“大湖仔”，龙蛇混杂，赌场多，色情场所多。在“大湖帮”中地位相当高、且在台中市有绝对影响力的是林金明和李照雄（绰号“憨面仔”），他们属“教父”级的人物，主要经营赌场，同时从事建筑生意。

“大湖帮”另一位兄弟廖龙辉，绰号“辉哥”。他与其他道上兄弟有很多不一样。他大学毕业，是一位下棋高手，还写得一手好毛笔字，曾被一位市议员称为“神童”。

他在江湖的做法自然与其他兄弟有很大不同。他像个文人，不能和别人玩枪动刀，但却善于动脑筋，是黑道上的“文将”。因此他对“大湖帮”的发展起了重大作用。1961 年，由廖龙辉出面，邀请了当地数十名重要帮派成员聚会，达成“不相侵犯、共抗外人”的“大湖帮”发展原则。在“辉哥”的领导下，“大湖帮”不断扩充势力，成为台中市傲视群雄的大帮，也与其他帮派不时发生冲突。在一次与“十三鹰帮”的械斗中，“大湖帮”的兄弟十分凶狠，竟剁了“十三鹰帮”老大吴坤华的手脚，打出

了威风。

由于他颇具文才，“辉哥”结交了不少当地政界的高层人士，前任的一位台中市长便是他的结拜兄弟。和他有交情的市议员不在少数。他在黑白两道的关系使他的身价不一般，不少道上纠纷由他出面协调，从中获利不在话下。可是，他得利后，只对小兄弟意思意思，请他们喝酒吃饭而已，却不能对那些为他跑脚的小兄弟施些恩惠，逐渐引起这些小兄弟心中的不满，留下后患。

70年代，台中市这个文化古城，到处是“飞花”、“春色”，带有色情的餐厅、卡拉OK店、酒廊、沙龙等处处皆是，爱吃爱喝爱色的“辉哥”常带一批兄弟出入这些场所。他们的到来，却没有给这些经营者带来利润，相反他还要这些店主付他的“保护费”。他手下的一些小兄弟不仅白吃白喝，白玩女人，收取保护费，稍不如意、不高兴，就砸桌子，亮刀子，不可一世。据说，由于“辉哥”这些兄弟这般吃喝闹场，不少店难以再经营下去，不得不关门。

台中市的兄弟们都以此过日子，不满“辉哥”的做法，希望与他谈判。可“辉哥”自傲，总是推说这事与他无关，也得罪了不少兄弟。结果，“辉哥”也逃脱不了被枪杀的命运。1983年，因黑道恩怨，他遭狙击暗算，在乱枪中被射杀死亡。但不像别的老大死了有兄弟报仇，他的兄弟却没有为他报仇行动，据说这与他对手下兄弟苛薄有关。

后来，“大湖帮”另一元老“淡水”也野心勃勃，挑选了20多名好斗的不良青少年组成“五虎十九龙帮”，在东海大学集训，以壮大力量。警方闻讯后，迅速出击，将其一网打尽，“大湖帮”力量一度受挫。

“十五神虎帮”的势力范围在台中市西屯路一带，力量较弱，与“大湖帮”有较密切关系。其老大王鸿基和李胜煌常和“大湖

帮”的林金明、李照雄在一起，还将林、李称为“老大”，对其非常尊敬。

王鸿基有了这一层关系，名气也逐渐在道上响亮起来，也成为有实力的道上兄弟。他血气方刚，仗势欺人。但他的目中无人却得罪了林金明的手下侯贵生（绰号“歪头生”，“大湖帮”兄弟），惹来复仇之祸。

一次，侯贵生利用王鸿基疏忽之际，率众兄弟一阵乱砍，将王鸿基砍倒在血泊之中。不过未伤到要害，捡回了一条命，这却使他在道上的名字更加叫得响。他开的赌场更加红火，生意越来越好。

这两位道上兄弟在“大湖帮”老大林金明的协调下恩怨化解，并未发生进一步的复仇行动，不然总会拼个你死我活。

一场恩怨刚了结，新的江湖恩怨又起。

话说“十五神虎帮”的张忠信曾因杀人罪被判刑，他却乘机逃脱，回到台中市，东藏西躲，最后在好友王鸿基家中藏了好一阵子。王鸿基对兄弟照顾有加。没想到一场赌债，竟使好友反目成仇。原来，张忠信到王鸿基的赌场中赌钱，结果输得很惨，欠下一大笔债务，迟迟不能偿还。双方就此进行谈判，但未能谈妥。

事后，王鸿基扬言，若不还债，就要张忠信的命，并派杀手四处寻找。

张忠信听到此风声，也不甘示弱，自恃拥有“掌心雷”与白郎宁手枪，也扬言要杀死王鸿基。

一天清早，王鸿基在自己开设的赌场附近，被埋伏等候多时的张忠信开枪当场击毙。王鸿基在道上威风不足两年，便结束了他的黑道生涯。张忠信却再次大逃亡。

据知，张忠信并没有逃离台中市，而是藏在该市的精诚三街，不外出走动，以免风声走漏，被警方或王鸿基的手下抓到。

在台湾，黑道火并，兄弟间杀伤之事甚多，但只要不出人命，警方不一定深究；一旦出了人命，警方就要查个水落石出。

经过多方侦察，警方知道了张忠信的下落，就在台中市精诚三街，迅速展开围捕行动。警方先礼后兵，不断向张忠信喊话，让其放下武器投诚，但张拒不缴枪，还向警方开枪，随即在街头展开警匪枪战。

最后，这位“至死不屈”的黑道兄弟在无法逃脱的情况下，对准自己的的太阳穴就是一枪，结束了自己的黑道血腥生涯。

不几年，“十五神虎帮”在两位重量级兄弟自相残杀与他杀之下势力大减，只剩下另一位较有势力的兄弟李胜煌。

李胜煌也是大陆籍的第二代，在眷村长大，曾练过武术，加上人高马大，力气过人，也是道上一位以打出名的兄弟。

他也是在林金明的提携下力量得到壮大，自己也搞起了赌场。可是多事的“大湖帮”侯贵生对此不满，双方的矛盾也就难免。

有一次，这些道上兄弟到台中市中正路的皇后酒家饮酒，侯贵生以身边兄弟多，对李胜煌很不客气，指槐骂狗，让李胜煌下不了台。

事后，李胜煌表示决心要为自己与兄弟讨回公道，并放出风声，要杀掉侯贵生。

侯贵生却是一位狡猾的黑道兄弟。他知道与李胜煌硬拼，自己是占不了便宜的，而李正是四肢发达头脑简单的人，因此不可力敌，要以智取。

“歪头生”侯贵生故意放出风声，表示自己只带一位弟兄某日要到五权路的赌场里赌一把，并交待手下兄弟千万不要让“胜煌仔”李胜煌知道，否则就没命了。

李胜煌听到消息，不加思考，便认为这是个报仇的好机会，又自恃自己有一身好功夫，只身来到赌场。李胜煌还没弄清楚怎

么一回事，就被早有准备的侯贵生等人一阵乱枪当场打死。

“十五神虎帮”再损一条大将，力量更衰。

在黑道，谁能打能杀，名气自然响亮。侯贵生也是如此，从一个道上的无名小子变成道上闻人。但人命关天，他又不能不“跑路”（逃亡）。这也是道上命案在身者的宿命。

在逃亡期间，用钱并不担心，因为每到一个赌场自会得到“路费”，这是道上的铁律。但风声鹤唳的生活，却不怎么好过，时刻担心警方追捕与李胜煌兄弟的追杀，于是他便企图弄到更多的武器，以增强防卫力量。

这时，李胜煌昔日的一位好友“哈之”耳闻朋友被杀后，也准备报仇雪恨。

这也是一个工于心计的兄弟，他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通过道上兄弟转告侯贵生，他那边有一批新型火力强大的武器，问侯贵生要不要买。

侯贵生为慎重起见，通过关系对“哈之”进行调查，但未发现有可疑之处，便只身前往联系地点。但为防意外，拿了自己的左轮手枪。

双方约好在台中市大坑的一间房子内交易。侯贵生到了约定地点后，先看看四周地形与情况，未发现意外，这时才与房屋主人一同来到室内。

刚走进房间，身后窜出两名大汉，随即将侯贵生挟住，一帮人将其五花大绑，然后在他的腿上连砍数刀，然后迅速离开现场。

半小时之后，“警政署”刑事警察局的刑警赶到现场，将侯贵生逮捕。

原来，“哈之”早就设计好了圈套，根据事先的安排，向警方报案，讲侯贵生何时在何地出现。这样，杀人犯侯贵生就难逃法网，也为朋友李胜煌报了仇。

侯贵生的被捕，在道上又引起一波不大不小的震动。而策划这场连环计的“哈之”却在事后销声匿迹。

侯贵生被捕后，先被判无期徒刑，经家人活动后又改判11年有期徒刑，从此开始了他的牢狱生涯。

弟弟入狱，他的姐姐“阿贵姊仔”步上黑道后尘，借弟弟之荫，在台中市设赌场，搞色情，成为台中黑道上一位“巾帼豪杰”。

“十五神虎帮”力量虽不大，但帮中敢拼敢杀的兄弟却不少。几位帮中老大丧命黄泉之后，又出现一位年轻气盛、声望更高的少壮派“美国博仔”林博文。

林博文金发碧眼，高鼻梁，从小就被同伴视为异类，原来他是个混血儿。他的父亲是乔治·高菲柏尔，他却不曾见过，从小就在祖母的细心照护下长大，没有父母的亲情温暖，使他步入了黑道歧途。

林博文在道上的出名不是因为他有什么资历，而是因为他在台中市自由路绑架一名商人、勒索金钱、又开枪拒捕而“一绑天下知”。

从此之后，他也开始了不知明天、没有未来的逃亡生活。

逃亡期间，他以收取保护费、开赌场为生。他出面收费，从不在一个地方待上十分钟，使得警方无法将他抓获。

他生性猜忌，聪明谨慎，从不相信任何人，因此逃亡期间，没有人知道他在什么地方，警方几次得到消息，前去围捕，均落空而回。

他却常开着一辆宝马轿车去收保护费。

一次他去赌场收保护费，但“十五兄弟帮”的“吉米仔”林瑞君不肯，这自然不合道上规则，“美国博仔”开枪砸场，双方结仇，“吉米仔”心中不平，也想报一恨之仇。

为此，林瑞君把他身边的杀手“憨虎”王宝童找来，要找

“美国博仔”算账报仇。

“憨虎”便率先在台中市西屯路开枪击伤林博文的手下林青。这更增添了“美国博仔”的不满，四处寻找林瑞君的下落，曾先后在三民路、中华路、民生路开枪狙击林瑞君，均未成功，自己却再度成为通缉的枪击要犯与媒体不断报道的新闻人物。

但这并不能阻止他要杀林瑞君的计划。“美国博仔”为此收买了“十五兄弟帮”的一位兄弟“铁牛仔”赖志诚为自己的心腹，用他引诱“憨虎”王宝童到台中市北屯昌平路一家古厝前约会。

一天，王宝童和绰号“尼龙”的蓝姓兄弟，架着林瑞君的雪铁龙轿车，来到和“铁牛”约好的地点。车刚停下，林博文等人冲出，用散弹枪扫射，打得“憨虎”与“尼龙”无还手之力，险些丧命。

随后，“美国博仔”离开台中市，来到台中县清水、沙鹿镇的海岸线一带，试图在这里自立门户。

于是，他找了多名枪击要犯，像“十五神虎帮”的“石头”石忠信、“憨才”许涌才、丰原“十三鹰帮”的“小黑”戴胜裕、海岸线的“大胖子”林永钦等黑道杀手，成为中部地区黑道上的一霸。

林博文首先向沙鹿、清水的角头“冬瓜标仔”颜清标挑战，向其开设的赌场收取保护费。作为这里地头蛇的颜清标认为一个外地兄弟到自己的地盘上索钱太离谱，拒绝给钱。林博文则毫不客气地开枪砸场。

林博文还不罢休，多次将颜清标的坐车砸烂，还跑到颜家开枪示威，逼得颜清标不得不离开自己的老地盘，逃往南部落脚。

但颜清标心有不服，也伺机报复。他找来了一位自己的小兄弟陈建鹏，在台中市北屯路一家酒廊将林博文的左右手许涌才开枪击毙。

林博文闻讯，怒气难消，展开疯狂的报复行动，率领林永钦、石忠信、戴胜祫等杀手追击颜清标。颜清标迅速跑到台南藏起来。

林博文不肯罢休，他令“小黑”戴胜祫前往台南市追查颜清标，如果发现，就地处决。

不料，“小黑”和台南市的兄弟在银河酒廊喝酒时，遇到刑警临检，发生了警匪枪战。一名刑警被杀身亡，戴胜祫等人被捕。

没多久，“大胖子”林永钦也在台中县被警方捕获。

到台中县发展没几天，三位兄弟相继被杀或被捕，林博文将全部过错归咎到颜清标身上，因此大量购买火药、手榴弹等武器，准备继续追杀。

这时，林博文因报仇心切，放松警惕，他的藏身之处被仇敌知道，告知警方。警方随即展开围捕，双方发生炮火猛烈的枪战，台中县的刑警队长洪旭被林博文开枪打死，台中市刑警队机动组长陈坤湖被石忠信击瞎左眼，另外台中市三名刑警也被打伤。

林博文、石忠信等也被警方击伤逮捕。报仇不成，却粉碎了林博文试图在台中县重整旗鼓的美梦，也结束了他的黑道生涯。

台中县“海线”的道上人物首推张清池和人称“冬瓜标”的颜清标。1960年生的颜清标，早已做了阿公，是海线后起之秀。他后来进行漂白，脱离黑道，进入政坛发展，但在黑道圈仍具影响力。1995年，他由县议员当选省议员。1998年台湾“冻省”后，省议会不存在，他便重回台中县，当选县议员及议会议长，是台湾地方政坛的大红人。

张清池被黑道人士称为“中部黑道教父”。少年时代，他就在中部地区道上闯出名号。他恩怨分明，很讲义气，对身边的小兄弟特别照顾，也因此不少道上兄弟愿意跟他闯荡江湖。但他的声望引起警方注意，1989年间就因涉及枪击、恐吓勒索案而遭通缉，但一直未能抓获。警方称，张清池躲避电子监控的技术一

流，多次监控到他的行踪，但每次前往抓他，均无功而返。张清池与嘉义县东石乡农会理事长林水树及吴庆男、詹龙栏曾并列当时台湾四大枪击要犯。

张清池之弟张清堂为台中县议员，两兄弟经营码头货运业起家，经常承揽台电公司等大公司的大宗物资运输，是海线的一霸。

1996年5月15日，台中市刑事局侦一队接获线报：张清池和他的陈姓女友驾车出现在台中市，随即展开追捕，并在三民路市议会前双方展开枪战，数十枪后，张清池终不敌警方强大的火力而投降。警员在他身上当即搜出冲锋枪、手枪7把，子弹127发。这位黑道大哥终于落网。另外，四大枪击要犯中，绰号“狗男仔”的吴庆男因拒捕被警方击毙，林水树也已落入法网，但绰号“穿山甲”的詹龙栏仍在逃。

台中市黑道接连不断的火并与相互枪杀，使各帮派力量大受损失。但80年代后期始，南北道上几个有实力的帮派将势力延伸到台中地区，并逐渐得到发展与壮大。据说，传统帮会洪门的势力在台中已扎下根，人员众多，渗入各个阶层，但非法活动不多，至多是开设赌场而已。

黑道与地方政治派系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在台中县政坛地方派系中，黑红两派各有黑道上的朋友护盘，必要时代为出面解决争端。如黑道角头“豆花”林耀辉和地方黑派关系极佳；而黑道出身的“茂松”曾义诚是丰原市代表会主席，与红派县长廖某某私交密切。目前在狱中服刑的黑道角头陈秋火也是红派人马，是台中县前议长、红派林敏霖的好朋友。

近年来，“竹联帮”、“四海帮”与“天道盟”三大帮派也纷纷进入中部地区发展，相继成立了不少堂口或分会，成为中部地区新的黑社会势力。

第三章

南部黑社会恩怨情仇

台湾三大黑社会组织“竹联帮”、“四海帮”与“天道盟”均发源于台湾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的台北市，但台湾土生土长的黑社会帮派则以嘉义与高雄为代表的南部地区最具盛名。

嘉义以盛出黑道流氓而闻名于台湾。

嘉义没有整洁宽敞的街道，也没有太多的高楼大厦，但却有闻名全省的“新港饴”、“理发小姐”、形形色色的“江湖人物”，有人戏称嘉义有“三怪”或三多（新港饴多，剃头婆仔多，流氓多）。

嘉义县、市地处台湾中西部，从中部的偏远高山延伸到西部海岸，地形独特。著名的风景区阿里山就在这里。也许是地瘠民贫，谋生不易，到外面闯天下的嘉义人就特别多，几乎在全省各地，到处可以见到嘉义人的影子。

影响台湾当代社会深远的“2·28事件”就发生在嘉义。这里也是战斗最惨烈、伤亡最多的地方，显示了嘉义人的斗争性格。

嘉义人性格倔强、豪爽。

这一切似乎在嘉义的黑社会中也得到充分反映。

嘉义的黑道分子在台湾赫赫有名，外县市的道上朋友也对嘉义兄弟十分佩服与热情。

南台湾的黑道与北台湾的黑道有很大的不同。一位闯南走北

的黑道人物深有体会地说，北部兄弟较善于斗智，而南部兄弟较重于斗力。

嘉义帮派与黑道人物多如过江之鲫。在只有30多万人口的嘉义市，就有“小澎湖帮”、“东门帮”、“夜市仔帮”、“北港车头帮”、“罗山帮”、“北门口帮”、“菜园仔帮”、“番社帮”、“番仔沟帮”、“新店尾帮”、“北站帮”、“车头帮”、“国际帮”、“凤梨会社帮”、“下路头帮”、“台斗坑帮”、“后湖帮”、“门町帮”、“白川町帮”、“暗街仔帮”、“文化路帮”、“过沟仔帮”、“南门帮”、“南门田仔帮”、“鱼市帮”、“东市帮”、“三角窗帮”、“埤仔头帮”等大小100多个角头（地头）帮派。其中历史较久、势力较大者有“番社帮”、“北港车头帮”、“凤梨会社帮”、“东门帮”、“夜市仔帮”、“罗山帮”与“过沟仔帮”等帮派。据台湾“警政署”1996年6月公布的资料，嘉义县与嘉义市在警察机关备案的黑社会分子就有333人。

“番社帮”占据嘉义市民权路与林森路，也就是北兴路桥一带。其代表人物就是绰号“红头”的洪瑞钟，他因涉及多件杀人案，而有“杀人魔王”的外号。

早年的“番社帮”成员并非贫民人家，大多是富家子弟。“红头”也不例外。他的父亲原籍云林县水林乡，从事木材生意，家境不错，没想到他却走上了一条黑道不归路。

他之所以被人称为“杀人魔王”，是因为他所涉及的杀人案件达18件之多。有一次，他与朋友在一起喝酒，席间他出去了一会。不久，他回来，朋友问他上厕所怎么这么久，他没说什么，只是平静地喝酒。原来就这一会功夫，他将绰号“坤祫”的一个木材商“干掉”了。可见其杀人不眨眼真是名不虚传。他曾两次被判死刑，却能通过种种关系不断上诉而逃过一死。监狱成为他几进几出的老地方，先后坐牢达16年之久，其中有两次越狱逃跑。

他犯下如此多的杀人罪，却没有死，现在已出狱经商，让人不可思议。据说，他家为了他活命，所花的钱不计其数，叠起来达一人之高，实在吓人。

就是这个“番社帮”却培养出了一个政治人物，出了一个省议员廖枝源。廖枝源也出生在嘉义一个政治世家。早在学生时代，他就进入“番社帮”，从当跑腿做起，竟混到了角头老大。后来力争上游，转而在商界发展，赚了不少钱。于是他又开始企图进入政界发展。没想到，凭他父亲在政界的老关系，他一炮而红，当选为嘉义县籍的省议员，这也使“番社帮”声望大增。

在台湾社会就是存在这种怪现象：黑道人物是被警方列管的对象，但不影响他当选县议员、省议员等民意代表。当上民意代表后，他们又可翻过来在县议会、省议会质询警察局长，让他们回答所提出的问题。

“北港车头帮”是嘉义地区最老的帮派之一，盘据在嘉义市博爱路与北兴街一带，其家族性甚强。外号“五猴”的蔡家7个子女，全是“北港车头帮”的成员，连女孩子也不例外。

这个帮派的重要头目王天成有案在身，他的姐夫李坤玉则成为举足轻重的人物。李坤玉的儿子“阿发”与女婿“水娃”也都是该帮成员。没想到，内部因赌场红利而发生相互残杀，“阿发”与“水娃”与该帮的“阔咀宗”发生冲突，将对方连砍43刀致死，自己也因此身陷囹圄。

占据嘉义市火车站前仁爱路一带的是“凤梨会社帮”，这是嘉义市一支实力强大的帮派。其重要头目有绰号“青暝”的“进丰”，王信福、陈宝全、“大尾仔”郭茂发等。

位于东门喷水的“东门帮”，也是嘉义一大帮派，公认“阿仁”陈泽仁是其“教父”。因为早期，陈泽仁哥仨都是“东门帮”的重要成员，履历久，地位逐升，成为老大。如今，他的两个儿子，也已接手父亲与叔叔的权力，成为“东门帮”的新生代老

大。

陈泽仁的弟弟陈世钟绰号“双刀流”，也称“阿钟”，经常身挎双刀，在火并中勇猛无比，屡战屡胜。可惜，30几岁时因病不治而亡。鸟之将死，其鸣也悲。他临终前，写下两句遗言：这辈子双手沾满血腥，下辈子要吃素，愿来世再赎罪。

“夜市仔帮”的势力范围是在嘉义市民族路与延平街一带。这里不仅赌风盛行，而且娼寮（妓院）多，使得“夜市仔帮”财力雄厚。

“罗山街帮”的势力在成仁街一带，历史较久。这里曾是嘉义特产的集散地，早年活跃在此的都是来自“山线”黑道（台湾黑道有“山线”与“海线”之分）的一帮人，于是在当地形成一外地帮派。这个帮的洪文财、王连芳、“矮仔沈”等都是嘉义知名的黑道兄弟。随着老一辈帮兄相继离开黑道圈势力不再，逐渐被新兴的“联义帮”所取代。

这些帮派各自拥有自己的地盘，其他帮派不得随意侵占，否则刀枪相见。

在这个小小的嘉义城，有如此多的帮派与角头流氓，竞争激烈，生存不易，因而嘉义黑道分子便不断向外县市发展。所以在今天，全省各地几乎都有来自嘉义的黑道人物与流氓。尤其台北市、三重市、高雄市，均有嘉义市黑社会组织。

台湾黑道上许多有名的黑道人物，像“阿狮”、“阿明”、“斗仔”、“飞山”、“阿城”、“土牛”、“小王”等等，多不胜数，他们均是来自嘉义。

1969年，在嘉义火车站一角，一群不良青少年成立了“天桥帮”，帮员50余人，并拥立在嘉义黑道上赫赫有名的“大头成”吴进成为领袖，而他当时年仅16岁，为“天桥帮”中年龄最小者，可见他的才干与能耐。

不过“天桥帮”成立才一个月，就告解散。原来成员“小

王”在他的领地火车站打伤了一位学生，该学生父亲向警方报案，警方展开搜捕活动，将大批“天桥帮”成员抓获，关进监狱，只有少数逃跑，这一黑社会组织也便宣告解散。不过这些黑道人物后来又相继成为黑道上叱咤风云的人物。

这些黑道分子经常为女人、为地盘杀得头破血流，不断上演一幕又一幕的战斗场面。那位“大头成”在一次到嘉义民生路“可香牛肉炉餐厅”吃饭时，认识了店里一位如花似玉、美丽动人的姑娘“玉萍”，在他的强烈“进攻”下，俩人开始了交往。

不久，“大头成”知晓玉萍过去曾和“夜市仔帮”“阿坤”有过交往。“阿坤”也是嘉义市道上有名的人物，“大头成”虽没见过此人，也早已耳有所闻，他打架斗殴、持刀“押女孩子”已为人皆知。

为了保护他这个可爱的女朋友，“大头成”不得不天天接送她上下班。

有一天晚上，“大头成”接玉萍姑娘下班走到餐厅帝，突然间，“阿坤”率领6个兄弟拦住去路，两位还手持武士刀。“阿坤”走到“大头成”面前，搭着他的肩膀说：“你是不是就叫大头成?”

“大头成”在女友面前也不示弱，便说：“是又怎样，不是又怎样?”

话音刚落，“阿坤”便率“夜市仔帮”兄弟一拥而上，猛打乱砍一阵后，扬长而去。

不过，他们只是想教训教训“大头成”，没有用刀刃砍，而是用刀背砍，使得“大头成”虽伤痕累累，疼痛难忍，开始吐血，但未伤筋骨。被吓坏了的玉萍赶快叫了一辆三轮车将“大头成”送回家，不免遭父亲一顿训斥。

在道上，“血债要用血来还”是不变的规律。“大头成”怎会

咽下这口气？发誓要找“阿坤”报复。但在当时，“夜市仔帮”是嘉义市一大帮派，市中心一带都是他们的势力范围，人又多，想要复仇谈何容易。

“大头成”十分聪明，深知想要斗“阿坤”，必须先培养自己本身的实力，便四处结交道上朋友，不久便同“车头帮”的“阿明”、“番社帮”的“肩斗”、“番仔沟帮”的“阿堂”等结为死党，并借“阿堂”家开铁工厂的机会，晚上加班偷偷打造凶器，最得意的就是样子并不美观却实用的“武士刀”。

“大头成”以为有了实力，便开始寻机报复，常进入“夜市仔帮”的势力范围。不料一次在嘉义远东戏院门口，他与“阿明”被“阿坤”一帮人围困，还未开打，“阿明”却率先冲出重围逃跑，而“大头成”却被挟持，带回“夜市仔帮”的“万善君庙堂”，痛打三小时，值到深夜，才放了“大头成”。

第二天晚上，“阿明”又在兰井街被“夜市仔帮”分子追打得满街跑，再次逃脱。这却增加了“阿明”的复仇心理。回到家里，他拿出武士刀，要“大头成”一同去找对方算账。

但“大头成”很冷静，不同意，因为人家人多势众，是打不过人家的。他建议要弄到枪，才能对付他们的刀。

“大头成”便两上台中，找“小九帮”的“海堂”借枪，但“海堂”担心开枪杀人受牵连，不敢借枪。“大头成”空手而归。

一天，艺霞歌舞团前来嘉义华南戏院公演，为嘉义市带来一阵狂热。“大头成”与“阿明”、“阿堂”也想一睹艺霞歌舞团的表演。就在前往戏院途中，发现“阿坤”在“阿源茶室”与一女郎调情闲聊。他们迅速回去拿来三把武士刀，找“阿坤”报仇。

当“阿坤”看见“大头成”、“阿明”等走进茶室时，顿感气氛不对，转身就跑，但为时已晚，“大头成”急步赶上，就是一刀，砍得“阿坤”人仰马翻，茶室乱成一团，茶女吓得大喊大叫，“阿坤”乘机夺门而逃，大喊救命。

“大头成”三人也紧追不舍，刚到蝴蝶茶室旁的巷子，闯出一批“夜市仔帮”分子。“阿明”见状，灵机一动，摇旗呐喊，向上冲，“大头成”、“阿堂”提刀猛冲猛砍，对方招架不住，纷纷逃离，“阿坤”也乘机逃跑。

这次，“大头成”大获全胜。

在警方接到茶室人员的报案后，战斗已结束，各帮人马已不见踪影。事后，警方找到“夜市仔帮”的“阿坤”了解情况，但不愿警方插手的“阿坤”并不配合，这事也就不了了之，但“大头成”在黑道上的声望却更加响亮。

1972年初，嘉义市凶杀案频传。春节刚过，嘉义县立中学太宝学生“唔弄”在文化路闹市区被误杀，在送往医院途中不治死亡。几天之后，“夜市仔帮”成员“成仔”、“阿六仔”、“水娃”因争风吃醋，在天子大饭店前持刀杀死“环球货运公司”的一位“小开”与一名搬运工。这件事尚未平息，“夜市仔帮”分子“龟仔宗”，为呈一时血气之勇，在火车站前杀死了刚从管训队获释不久的“北港车头帮”的成员。

接连不断的凶杀案，搞得嘉义市人心惶惶，警察不得不加强治安，刑警开始搜捕抓人。

就在这时，嘉义市又窜起两大帮派。

一是以素有“拼命三娘”之称的“飞燕”为首的“十三鹰帮”，全是由女性组成。

二是由“阿文仔”为首的“东门帮”。这位“阿文仔”不仅长得一表人才，且有过人的胆识，不逊于道上闯荡多年的黑道大哥，因此他成为嘉义黑道圈窜起最快的一位。他拥有“杜财”、“钟仔”等数十位英勇善战、下手狠毒的勇将，威震八方，连势力最广、历史较久的“夜市仔帮”也畏惧“阿文仔”三分。

“大头成”虽在道上打出声望，但在“天桥帮”解散之后，

已无组织，而是一个人独打独行，于是想找“阿文仔”，试图加入“东门帮”，以扩大自己的势力。但未能接上头，后来，“阿文仔”远赴高雄打天下。

加入“东门帮”不成，“大头成”又找“十三鹰帮”，并搭上了线，成了“飞燕”手下的大将。

这里姑娘多，“大头成”就让帮主“飞燕”为自己介绍朋友。不料，大他好几岁的“飞燕”自我推荐，成了“大头成”的女友，他们便开始了一场没有婚姻的爱情生活。“飞燕”原来也是床上高手，让“大头成”兴奋不已，专心为“飞燕”奋斗。

一天，“飞燕”与“大头成”等到嘉义市文化路海园海酒店喝酒，恰巧遇上“埤仔头”“阿仁”、“阿会”等，便一同把酒共饮。谁知席间，“飞燕”与“阿仁”因罚酒起了冲突，继而大打出手。“飞燕”虽是女中豪杰，身手不凡，但“阿仁”却有一身空手道功夫，“飞燕”当然不是对手。为了“护花”，“大头成”拿起酒瓶向“阿仁”头上击去，酒瓶破碎了，“阿仁”的头却安然无恙。幸亏几位朋友劝架，才免得两败俱伤。不久，“飞燕”离开嘉义，到台中当舞女。

嘉义市又传出消息：“黑点仔”准备和“东门帮”火并。身在高雄的“东门帮”老大“阿文仔”获悉后，火速赶回嘉义“东门帮”坐阵。这位自不量力的“黑点仔”脚踢到铁板上，在火并中，被“东门帮”兄弟杀得走投无路，狼狈不堪，只好投靠嘉义最大的帮派“北港车头帮”。“北港车头帮”老大“阿成”为人义气，要为“黑点仔”找回公道，要同“东门帮”进行较量。

这两个有势力的帮派谁也在嘉义输不起面子，所以各自摩拳擦掌，以决雌雄。

人数上，“北港车头帮”兄弟比“东门帮”足足多出4倍以上，但武器却远逊于“东门帮”。在约定的时辰，双方展开厮杀，正在杀得天灰地暗、不分胜负之时，突然响起枪声。动枪的就是

“阿文仔”。

这一枪，不仅打得“北港车头帮”兄弟抱头乱窜，撤出阵地，也震撼了嘉义黑道圈，因为这是嘉义黑道火并中首次动枪。

“阿文仔”的这一枪横扫“北港车头帮”后，一鸣惊人，进一步稳固了他在黑道上的地位，也同时提高了“北港车头帮”老大“阿成”的知名度。如今的嘉义，黑道帮派势力仍很大，并逐渐与地方政治势力结合在一起，这更加巩固了黑道在嘉义的势力。

位于西南部的高雄市是台湾的第二大城市，也是南台湾黑社会势力的重镇。

高雄市著名帮派有“新高帮”、“七贤帮”、“西北帮”、“万隆帮”、“甘蔗园帮”、“左营帮”、“砂仔地帮”、“夜市场帮”、“体育场帮”、“十四鹰帮”、“锦田帮”、“正义十三鹰帮”、“猛龙帮”、“北沙帮”、“六国帮”、“弯弓门派”、“爱河派”、“南沙帮”、“好汉队帮”、“大舞台帮”、“地下街派”、“中兴帮”、“关帝庙帮”、“谊友会帮”、“意诚堂帮”、“十字庙帮”、“公平朋友帮”、“联宏帮”、“店仔顶帮”、“十二煞星帮”、“城隍庙帮”、“五凤帮”、“中央市场帮”、“新庄帮”、“新城隍庙帮”、“三山国王庙帮”、“高雄戏院帮”、“自强新生市场帮”、“二十四鹰帮”、“廿结拜兄弟帮”、“时代囝仔帮”、“廿一浪子帮”、“狮头帮”、“第七票帮”、“第六票帮”、“天王帮”、“西甲庙帮”、“草衙帮”、“宪德帮”、“十八罗汉帮”、“皇帝帮”、“寿山五凤帮”、“十二生肖帮”、“十三太保帮”、“五旗帮”、“六壮士帮”、“黑砂帮”、“十三牛帮”等60多个帮派。不过时间久、势力较大的帮并不多，只有10多个。

50年代，高雄市七贤桥头附近曾有一座新高戏院，是当时最豪华的戏院，加上这里是热闹的商业区，一些经常来此闲逛的青少年逐渐结伙成帮，创立“新高帮”，开始在高雄市区称霸为

王，称得上高雄第一大帮。

这个帮的成员随着年龄的增长，开始以经商、跑船、设私娼寮、开赌场为业。随着新市区的兴起，新高戏院一带逐渐衰落，“新高帮”不再有昔日风光。

取代“新高帮”而起的是“西北帮”，进而与“七贤帮”齐名。“西北帮”的前身是“猪灶帮”与“斧头帮”。当初，这两帮的活动地区以高雄运河为界。为争夺利益，双方经常发生冲突，展开格斗。为避免进一步两败俱伤，70年代末，“猪灶帮”老大吴守雄主动言和，同“斧头帮”老大龚书清合伙经营游览车生意，从此两帮合二为一，改名“西北帮”。

“西北帮”当年活跃于西北戏院和蓝宝石歌厅一带，曾以包档包秀（色情表演）和收保护费为最大收入来源。开帮祖师为“阿雄哥”吴守雄。吴后来因处理一件债务纠纷，于1982年间在中山大厦的一次债权人会议中，被“时钟”龚书清的小弟开枪射杀。龚书清坐牢期间，“西北帮”进一步拓展地盘，逐渐垄断了火车站前的“野鸡车”生意（指无照经营的旅游黑车）和色情应召站，当时由龚的女友兼大姊头“霞姊”代为主导操盘。如今，“西北帮”的生意还包括赌场、讨债、土地中介和工程承包等，是南部地区较具规模的帮派。龚书清已出狱，又活跃于黑道。

目前，“西北帮”台面上的人物是蔡姓老大。他也是地方民意代表，且已连任数届高雄市议员，也算“漂白”（指由黑社会人物通过担任公职等而成为表面上的非黑社会人物）。蔡原出身“夜市场帮”，后介入蓝宝石歌厅的包档生意而变为“西北帮”的角头，并协助“阿雄哥”整合了“斧头帮”和“十三飞鹰帮”。他如今成为身跨黑白两道的“大哥大”（黑社会组织内最高层的“老大”），是高雄市政坛颇具影响的人物。

“西北帮”另一位老大“邱郎”早年也是喜相逢舞厅包档出身，后因经营“大家乐”、“六合彩”而大赚。1994年，他还一

度想出马竞选议员，后因未被提名、且债务负担重而放弃。

“七贤帮”则是高雄市一个根深蒂固的帮派，历史悠久，在台湾光复前就已存在，曾活跃于高雄市的七贤三路与五福四路一带。台湾光复后，该帮继续吸收不良青少年入帮，以七贤桥旁的小公园为活动地盘，主要以经营酒吧、当保镖、开赌场及拉皮条等为经济来源。70年代，在“跛脚炳煌”的率领下，“七贤帮”势力得到迅速扩展。后来，重要老大有陈瑞寅与张省吾。张省吾在1982年被“沙地仔帮”一兄弟枪击后，迁往台北发展。

港都（高雄别称）黑道曾有两位雄霸黑道圈的人物，就是出身“万龙帮”的杨双五和“联宏帮”的陈耀国。“万龙帮”和“联宏帮”原本都是在戏院附近活动的聚众分子，没有严密组织与固定收入，常靠个人胆识打天下。杨双五后来因与歌星高凌风的包档纠纷枪击案而逃亡日本。陈耀国则因青年路世界舞厅疯狂枪战而声名大噪。这两个帮在电影业没落后转入歌厅、舞厅的“围事”保护业。在歌厅与舞厅也开始没落后，又转向赌场发展。

其中，“联宏帮”老大“秋旗仔”经营天九牌局十分内行，组织化程度相当高，从赌场内作手、保镖、招练，到赌场外接送、放风甚至警界打点，都有详细账册，实行企业化的管理与经营。目前，他又从海外引进“百家乐”赌法，来此玩这种新赌的人有医生、律师、议员、检察官等各界知名人士。

“甘蔗园帮”以中正路、光华路附近为地盘，由“阿沙哥”主事。“沙仔地帮”居于哈玛星一带，老大魏开城退隐后，鱼市与走私收入大不如昔。“圣公妈庙帮”，以赌与毒起家，在1995年遭扫黑后瘫痪。另外高雄还出现了“篱仔内帮”、“五块厝帮”、左营眷村的“血盟帮”和“新血盟帮”等新帮派。

高雄也有青帮与洪门组织，但大多是隐藏在军队中的外省子弟。本地的洪门组织则以外号“吉哥”的杨姓老大最活跃。他不

但当过议员、“国大代表”，并曾在民进党人士抗议时期，带着“白布鞋部队”进入国民党高雄市党部二楼埋伏反制，并以此向国民党表功。

70年代到80年代初，在高雄黑道能呼风唤雨的黑道人物以“妈注仔”最著名。

蔡姓“妈注仔”，1944年生于高雄市。他生活在一个较为富裕的家庭。父亲曾从事废铁生意，后来也经营拆船和船货、舶来品等生意。这正反映出高雄经济的时代特征。

他是家中的独子，备受家人宠爱，自然管教不严，而且对孩子十分放任，对其成长有着不可忽视的影响。上中学时，蔡松雄就成为学校的太保学生，常与高雄的“七贤帮”、“夜市场帮”的黑道兄弟出出进进，形影不离。

高中毕业后，应征服役。但从小养成的自由散漫与道上兄弟的厮混习惯，当兵不久就经常外出开小差，发展到最后逃跑，结果遭到通缉。

通缉案尚未了结，1970年，“妈注仔”又因杀人未遂而被判刑入狱。在狱中两年，不但未受到教育，相反在这里结识了不少五湖四海的道上兄弟。父母因思独子心切，花钱消灾，经多方活动，儿子提前保释出来。但他的真正黑道生涯也从此开始。

出狱后的“妈注仔”靠着家中的财富，及和“夜市场帮”兄弟的良好关系，并在该帮当时的老大“跛脚炳煌”、“长庚”和“长庚”太太“阿宝”等人帮助下，搞起了当时高雄地区最大的麻将赌场，接着又设十三张“罗宋”赌场与“一天下”九牌场。

话说“跛脚炳煌”，原生在台南市，家境贫寒，从小就当小工、学徒，一直到有天全家迁往高雄市，才改行当小贩。后来加入高雄市府北地区的“红毛帮”，并因年纪最大而成为其老大之一。

不过“红毛帮”势力不大，不几年就因兄弟纷纷投奔他帮而

解散。“跛脚炳煌”便加入“夜市场帮”，进而因与其“长庚”、“庆江”等老大厮混，也成为“夜市场帮”的元老之一。别看他脚跛，人瘦，他却是吃、喝、嫖、赌样样行。

由于他曾四次被移送管训，在这里结识不少各地黑道老大，建立了交情，奠定了他在黑道上的特殊地位，被誉为“高雄黑道最后仲裁者”。高雄地区许多黑道恩怨都由他出面排解，角头纷争也由他出面摆平。他曾经阻止了杨双五对一位黑道老大的寻仇，阻止了“联宏帮”和“沙仔地帮”的冲突，化解了“苓雅寮”“水印”与“七贤帮”“铁牛”之间的火并，阻挡了“沙仔地帮”与“七贤帮”之间的拼杀，等等，此类事件数不胜数。

论资历、经验、实力与各方面的关系，“妈注仔”远不及这些道上的老大，所以他保持低姿态，花言巧语进行巴结，颇受这些老大的好感，就将他当自己的兄弟。

按黑道赌场惯例，赌场虽然由“妈注仔”出面搞，但出资的老板和抽头的场主除他本人外，还包括“夜市场帮”的几位老大等。

当时的高雄市建设了一些新社区，随之而起的“今日”、“蓝宝石”等歌厅也相继出现。“妈注仔”也在这些场合搞一些表演节目为兄弟谋生计。新区黑道帮派较少，只有“大港埔帮”是一个独一无二的大帮，其老大就是“旺仔”。“妈注仔”自然忘不了巴结，否则，生意不好做。

“旺仔”是典型的江湖上老一辈人物，为人是非分明，特别讲义气，重信诺。但对后起之秀“妈注仔”没什么印象，只是看在“七贤帮”老大“省吾”（张省吾）的面子，才对“妈注仔”格外关照。

据知，“旺仔”曾经为了“妈注仔”的赌场恩怨，将一批经常在“妈注仔”赌场滋事的新兴小帮“红毛帮”兄弟杀得落花流水。

在当时那个年代，帮派之间的厮杀，所用武器大多是大刀、武士刀、长刀等，还没有后来黑社会使用的各种枪支，所以尽管每次杀得天灰地暗，但伤多死少，人多的一派获胜机会就多。“红毛帮”当然不是“大港埔帮”的对手。

没想到，这个“妈注仔”在羽毛丰满以后，恩将仇报，为了一位好友的被殴事件，不惜得罪曾有恩于他的“大港埔帮”老大“旺仔”。

台湾的黑社会，大多虽以本地区为活动范围，但也出现了全省性的黑道南北大串连的事情。

1979年台北“芳明馆”的角头纷争引发了南北黑道的江湖恩怨。

“芳明馆”是以台北万华宝斗里风化区（色情业集中地区）为主要地盘，与在万华、龙山两地的“龙山寺口帮”并驾齐驱。不论财力、成员人数、黑道实力，这两个帮在台北的本省人帮派中不分上下。

台北宝斗里（台湾的里，相当于大陆城市中的街道）和高雄府北里，都是红灯区，妓院众多，贩卖少女成为有利可图的生意。于是南北两地的黑道人物为了赢利，经常“互通有无”（贩卖少女）。

台北的宝斗里控制在“芳明馆”手中，高雄的府北里则控制在“夜市场帮”手里，双方为了生意上的需要和利益，进行南北妓女买卖与交换，双方兄弟也因此经常往来，关系密切，形成南北交情最特殊的两个黑社会帮派。

“夜市场帮”的“跛脚炳煌”、“长庚”等老大和“芳明馆”的老大“大江”、“庆江”、“水泥桶”廖胜美、“库玛”林春发、“红胖”黄忠义、“流氓”连明彦等人，相互之间如结盟兄弟，关系甚佳。一方一旦遇到棘手的麻烦事，如果不能由自己角头兄弟出面解决，往往就动用“盟友”的兄弟去摆平。

“芳明馆”的财源除了宝斗里的风化场所外，就是由当地角头老大搞的“公场”（即赌场），包括“西八拉”（掷骰子）、天九牌、麻将牌等，其中在1970年初，其所开设的“西八拉”场子是全省有名的大场子。这里以夜市闻名，摊贩多，小贩多，人员复杂，是典型的黑道温床。

帮内的“库玛”和“流氓”二人则一直想独占这块利润丰厚的地盘，便与其他帮内老大发生矛盾，特别是为了赌场的抽头和赌账，“库玛”、“流氓”和以“大江”为首的“庆江”、“水泥桶”、“木头”等老大不时发生冲突。

1977年底，“库玛”找兄弟，烧了“大江”家的房子，矛盾激化。“大江”与其他老大如“庆江”、“水泥桶”等联合，派手下的小兄弟狙击，结果“库玛”被打瞎了左眼，“流氓”连明彦被“水泥桶”廖胜美及手下李添来等人乱枪打死。这两位手下兄弟声言要为老大报仇。“大江”等老大南下高雄藏匿，暂避风头。

高雄的“妈注仔”得知“芳明馆”内部的纷争后，尽管他还没有雄厚的实力对台北黑道恩怨进行协调，但还是凭着财力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一方面安排“大江”等兄弟的藏身处所，另一方面则设法摆平南部地区受“库玛”之托南下复仇的兄弟。

“库玛”出院后，立即展开疯狂的追杀报复行动，几次与对手发生枪战，结果他被警方逮捕，移送管训。这时，“大江”等老大才重返“芳明馆”地盘。

警方当然也不会放过“大江”的罪行。但黑道自有黑道的办法。“妈注仔”从台南找来一名外号“添来仔”的小兄弟，由他顶下打瞎“库玛”左眼的刑责，替“大江”坐牢。从此，“大江”一伙兄弟与“妈注仔”交情加深，关系非同一般，也成为“妈注仔”在北部地区可随时调到人手的最佳合作伙伴。

但江湖恩怨难解。1983年底，“库玛”管训结束后，怨恨未消，又积极招兵买马，欲重振雄风。

“大江”等一帮老大得知这一消息，也不手软，花了一大笔钱，雇了曾因枪杀万华“龙山寺口帮”老大“阿肥”林复雄而成名的“珍珠呆”对付“库玛”。

“珍珠呆”原名梁国恺，山东阳谷县人，自小成长在台北万华，有着一副武大郎的身材，身高只有一米五一，15岁时就加入了“芳明馆”，是绰号“流氓”连明彦手下的兄弟。“流氓”连明彦因派系纷争而遭杀害后，“珍珠呆”还只是个18岁的小混混，道上根本不将他放在眼里。后来为了“阿肥”事件被捕入狱，经“大江”、“庆江”等兄弟多方帮忙，才以肝病为由，获准保外就医，从此在台北万华、龙山地区成为杀手级的黑道兄弟。他也因此成为当时十大通缉要犯之一。

“珍珠呆”在北部难以匿藏，不敢露面，只好南下高雄、台南等地，找当地与“芳明馆”有交情的兄弟掩护，也因此抬高了南台湾地区像“妈注仔”这样的道上兄弟的地位和势力。

在台湾，通缉要犯在黑道上有着特殊的地位，一则是他的凶狠，已是亡命之徒，一般黑道兄弟自然不愿惹麻烦，对他礼让三分；二则有“同是天涯沦落人”之感，对其逃亡期间的生活颇能关照，只要通缉要犯进入赌场，都会得到丰厚的一笔逃亡费。

“珍珠呆”拿钱受命后，乃于1985年元月7日凌晨，突袭“库玛”开的赌场，当场将“库玛”击毙。

“妈注仔”在黑道上的地位也如日中天，且与当地的不法刑警建立了密切的关系，使他纵横黑白两道。这样，他设的赌场不但没人敢来滋扰，还将赌场搬到自己所开餐厅的楼上，来赌的人也就更多，为他赚了不少票子。于是他成为高雄地区财大气粗的道上老大。不仅在黑道方面有不少老大听从于他；就连在白道方面，与“中央”民意代表与政府官员都有很深的交情。

赌场无情，黑道也无情。

高雄市蓝宝石歌厅老板因赌债高筑，不得不将餐厅抵押给“妈注仔”经营。没想到，“妈注仔”因经营这家歌舞厅而步入与黑道关系密切的演艺界。

其实，在此之前，“妈注仔”在他开的赌场中，就同演艺界不少星级人物相识。他租下这家歌厅后，像猪哥亮、费大妈、高凌风、许不了、费玉清、林光宁等著名艺人都是这里的常客。

猪哥亮因在赌场输得很惨，不得不留在蓝宝石歌厅当节目主持人，以此抵债。

不过人多事杂，问题就变复杂了。一些艺人不满赌场搞诈，乃向警方与“调查局”检举，告“妈注仔”强迫艺人到他的场子赌博，还找“郎中”坑人，引起警方对“妈注仔”的高度注意。

为了自己的利益与为朋友讨回公道，“妈注仔”不顾道上的道义，不惜与交情非浅的“大港埔帮”老大“旺仔”交恶，派手下兄弟追杀其手下兄弟，就连“旺仔”也被开枪打伤左脚脚筋，“旺仔”从此变成跛子，而被兄弟们称为“跛脚旺仔”。

“妈注仔”的这一狠毒做法在高雄黑道上永远成为一件为人所不耻的事情。

“旺仔”的独子“奂仔”在得知父亲是被当年受过父亲恩惠的“妈注仔”所伤之后，心中的不平与愤怒可想而知。父为人伤，子为父报仇，天经地义。

于是，“奂仔”率领兄弟准备与“妈注仔”的人马决一死战，以替父报仇，但对方也早已有所准备，结果在双方火并中，“奂仔”兄弟们寡不敌众，败下阵来，“奂仔”也被对方杀伤。

“妈注仔”并不以此住手，还通过关系，将“奂仔”移交警方予以逮捕，移送管训，其手段之狠毒可见一斑。

儿子受伤又被捕，“妈注仔”忘恩负义，“旺仔”心如刀绞，大叹黑道义气荡然无存，又不得不为营救独子四处奔走。终因身心不支，两年不到，便死于病魔，结束了他一生可悲的黑道生

涯。

“妈注仔”却未受到任何不利影响，相反，他的声望更高，关系更广。

不久，“妈注仔”又在高雄一家茶馆内，搞起高雄市最大的赌场，不但没警方查禁，还有不少市刑警大队的刑警经常来此“喝茶”。后来竟传出高雄市刑警总队的一位头头按月从“妈注仔”的赌场分红60万元的丑闻。

“妈注仔”在高雄的势力无人可与其匹敌，也使他目中无人，目无法律，说打就打，要杀就杀，不可一世。最恶劣的是，他不把记者放在眼里，与刑警联手殴打一群采访记者，打得记者伤的伤，逃的逃，在社会上引起强烈的不满与反响。后来，一些意外的事件使“妈注仔”锒铛入狱。

绰号“青蛙王子”的歌星高凌风因保镖随身带着手枪保护他而双双被捕入狱。在扣押侦讯期间，他道出了不少有关“妈注仔”、“登魁仔”、“长脚仔”、“黑松”等老大黑道秘闻。

原来，逃亡日本的枪击要犯杨双五曾向“青蛙王子”勒索敲诈，由“妈注仔”出面与杨双五谈判，由他将钱交给杨双五。“青蛙王子”在狱中透露的黑道内幕对“妈注仔”十分不利，引起警方与“调查局”的关注。

不久，“妈注仔”又因“西北帮”内的恩怨最终葬送了自己。

“西北帮”也是高雄市一大帮派。“妈注仔”也曾是这个帮的头面人物，尽管后来自己另打天下，但“西北帮”仍对他十分尊敬。由于“西北帮”内部内讧不断，在一次冲突中，“守雄仔”不敌“时钟”而被杀害。不久，“时钟”被警方逮捕入狱。

最后，“妈注仔”暗中扶持了一位名为“丘郎”的兄弟维持“西北帮”的局面。不料，“西北帮”的另一位兄弟李慧昌搅了“妈注仔”的局。

李慧昌外号“昌仔”，曾是“七贤帮”老大“省吾”身边的

兄弟，“省吾”退出江湖改行经商以后，“昌仔”就转到“西北帮”“守雄仔”的身边。

“昌仔”在为“守雄仔”和“时钟”争夺高雄火车站前旅游车拉客的地盘中，曾经两度杀伤另一家旅游车公司的拉客“黄牛”而被警方通缉。

“昌仔”在离高雄不远的凤山市一次黑道冲突中被警方抓获，被移送管训。结果在这里，又发生殴斗，他被打成重伤，后因保外就医逃出牢狱。

当他得知好兄弟“守雄仔”遇害之事后，心中不平，加上“西北帮”大权被“丘郎”、“阿心”郑传心等小人把持，更是不满。

这时，“西北帮”内又因赌债金钱纠纷争执不断，“守雄仔”的遗孀李梦霞找“昌仔”帮忙，要讨回公道。

“昌仔”此时正需钱用，又想趁帮内混乱时机登上老大的地位，便答应李梦霞。

1983年5月3号，“昌仔”带人冲进“阿心”的赌场，逼“阿心”还钱。

“阿心”手下的兄弟见到“昌仔”一帮人如此气势汹汹，当着这么多赌客的面，一点面子也不给，实在让人下不了台，便准备行动。早有准备的“昌仔”迅速拔出点22口径手枪，就向对方一位兄弟射击。对方一看有枪，纷纷投降，“昌仔”拿钱后便迅速离开。

事后，“阿心”下令兄弟分头找“昌仔”算账，并尽最大努力将其干掉，以免留下后患。

这一消息很快在高雄黑道圈中传开，一场血腥的拼杀即将爆发，“大港埔帮”、“甘蔗园帮”、“夜市场帮”等几个大帮的兄弟都坚守自己的地盘阵地，免得与“西北帮”惹上麻烦。

很快，接二连三的帮派火并事件终于爆发，数人死于黑枪之

下。

这惊动了台湾“警政署”，迅速指示高雄市刑警局进行彻底侦察，尽快捉拿凶手。

然而，与“妈注仔”等黑道有关的高雄市刑警局一要员接管案子，便决定逮捕“昌仔”，将其作为凶杀案的替罪羊以了结案子。“妈注仔”、“阿心”等暗自高兴，落井下石。

1984年11月，警方在接到密报后，出动了大批全副武装的人马，迅速赶往台北板桥，将“昌仔”抓获。

对手被抓，“妈注仔”喜上眉梢，大松一口气。

可是他没有想到，一场厄运已经来临。

因“江南命案”引发的扫黑“一清专案”已经展开，“妈注仔”也成为警方扫黑的重点人物。

1985年4月17日上午9时许，高雄市刑警局“少年警察队”、“雷霆队”紧急集合，采取行动，围捕“妈注仔”。10时一刻，一列列的警车迅速出动，向中华三路驶去，10分钟之后，赶到中华三路宪德戏院门前，刑警随即包围戏院，展开搜索，“妈注仔”在楼上的一间卧室中束手就擒。这位纵横高雄地区黑白两道达十年之久、不可一世的“妈注仔”被带上无情的手铐，送进了牢狱。高雄黑道的恩恩怨怨与拼杀也告一段落。

数年后，“妈注仔”出狱。他改邪归正，脱离黑道，步入政坛，成为当今高雄市政坛颇具影响的人物。

不过随着社会的发展，高雄地区黑道有了新的发展。原来以台北为中心的“竹联帮”、“四海帮”近年来纷纷进军高雄，在凤山、左营、大寮、冈山等眷区均设有堂口，也有不少兄弟以堂口为名经营事业，力量逐渐壮大。“天道盟”也在高雄地区有了发展。不过实力仍以本地的“西北帮”、“七贤帮”、“新兴帮”、“沙地仔帮”、“夜市场帮”、“甘蔗园帮”与“左营帮”等在地帮势力为大。

第四章

第一大帮“竹联帮”内幕窥探

50年代中期，台北县兴起的“竹联帮”，由小到大，几起几落，几散几合，征战南北，不知有多少兄弟为之送命，也不知有多少人死在他们的枪刀之下，演出了一幕悲壮凄惨的黑道兴衰剧。

在台北县中和、永和镇一带，居住着国民党军公教人员。这些人大多是跟随国民党在1949年前后迁来的。由于“2·28事件”的历史悲剧，这些大陆籍公职人员的子女在台湾受到某种程度的歧视，一些青少年在特殊的环境下成为父辈的叛逆者，经常与一些不良青少年结伙打群架，以发泄心中的不满，逐渐形成轰动一时的“十三太保”的青少年帮派组织，同时刺激了其他一些血气方刚的青少年纷纷建立自己的帮派组织。

1953年，一名叫孙德培的青少年，结合一群中学生在台北中和镇拉起一支小太保，组成“中和帮”。在永和镇，也有一群青少年组成“永和帮”。

孙德培个子不高，小时候常受同学欺侮。他父亲不忍心，便请了龙虎武师教他练武术，几年下来，孙德培练就了一套身手不凡的功夫，这在早期黑道靠拳头打天下的时代，是最好的武器，他自然成为帮中的老大。他常率手下的“五虎将”（陈启礼、潘世明、湛州吾、周榕、周德新），在中和与永和交界的萤桥、秀

郎一带，与其他青少年帮派争夺地盘，收取保护费，成为当地一霸。

“中和帮”在与其他帮派的一次火并中，孙德培与手下兄弟不慎闹出人命，打死了一名叫周天送的少年，便锒铛入狱。于是“中和帮”群龙无首，他手下的“五虎将”互不服气，各立门户。其中，“五虎将”之一的潘世明率先于1955年组成“万字帮”，在水源地一带打天下。次年2月，湛洲吾率领另一伙人组成“三环帮”，在台湾大学、师范大学与泰顺街一带活动。还有一批青少年建立了“万国帮”。孙德培手下的大部分兄弟仍奉“中和帮”为正宗，他们常到永和镇竹林路旁的竹林聚会，但因无有力的首领，常常发生内讧、殴斗。由于这些青少年帮派大都是中学生，因此属于强恕中学的学生与属于励行中学的学生经常打得不可开交。

以赵宁为首的几位兄弟，痛感“中和帮”的内争与中落，为了壮大声势、加强团结，于1956年6月发出倡导：凡愿意参加他们组织与活动的青少年，于6月17日到中和镇竹林（现台北市中信百货公司一带）召开“第三次大会”。于是一大批四面八方的青少年按时来到竹林，举行类似“桃园三结义”的聚会，为首的几位兄弟拿出事先准备好的匕首，一边插入地中，一边口中念念有词：

“第一刀插中央，叛帮出卖兄弟者，千刀万剐无人埋！

“第二、第三刀，刀口向外，齐心协力对外帮！”

三把刀插毕，赵宁把预先准备好的酒倒进碗里，众人依次沥血入酒，分头饮下这“同心酒”，谓之“饮下同心酒，血往一处流；有难同当，有福同享！”

这次“中和帮”的竹林结拜联盟称为“竹林联盟”，简称“竹联帮”。大会还规定“竹联帮”帮意为：“竹叶飘飘片片生，狂沙万里皆竹联，傲笑八方唯竹尊。”

“竹联帮”正式诞生。此时，帮会成员达200余人，大多为在校中学生。因溪州地方的成员占了一半，所以又称“溪州联盟”。不过外省人多称为“竹联帮”。后来，“竹联帮”仿效洪门组织，建立严密组织体系，采用联络代号。为表示对“中和帮”创立者孙德培的尊重，还规定了“竹联帮”暂不设帮主，而分设香堂，各立堂主，各堂有“掌法”一人，主管堂中事务。帮中大事则由各堂掌法会商决定。当初“竹联帮”只设立了狮、虎、豹、凤、鸭五个堂口。

“竹联帮”也是台湾早期唯一正规的黑社会组织，有入帮仪式、有堂规、有完整的组织体系。

“竹联帮”有三个权力层次：总堂主——堂主（与总堂主要职能人员平行）——帮员。整个组织较为合理地分为职能部门和直线部门（各堂口），这两大部门为平行级别，只存在业务上的关系，没有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其关系主要靠堂主协调。帮中每个组织部分职责清楚，每个成员的地位与角色明确。

“竹联帮”入帮仪式：成员围成一团，中间插三把刀，两把刀刀口向外，意即对外一致杀敌，扩充地盘；刀口向内的那把刀则表示剪除叛帮者。仪式结束后分配职务。隆重时，同饮血酒，宣誓入帮。不过如今已没如此隆重，已大大简化。

“竹联帮”的堂规是：（一）不可事二主，不可脚踏两条船，若经查实必严惩；（二）装备为第二生命，不可遗失，严禁事毕有所遗弃；（三）在勤务时，严禁临阵脱逃；（四）严禁吸食毒品与迷幻药品；（五）要做到兄友弟恭，不可在背后毁谤兄弟；（六）严禁兄弟涉及偷、抢事件；（七）开会时严禁无故不到；（八）各堂之间不发生横的联系，各自为政，各有地盘。

活动费用的五大规定：（一）在任何情况下，不得动用基金之母金；（二）因公伤、战伤或特殊情况的补贴，一律由各堂负责人从子金内提付，任何人不得有异议；（三）任何人不得向营

业项目及场所赊欠，由基金内提供保障；（四）为公家（帮内）盈（营）利者，净利三分之一归私人所有；（五）遗失任何公款，不论情况，一律赔偿。

帮员守则：（一）帮员绝对服从帮会老大；（二）帮内分子依职位大小、入帮时间编号，平时以号码称呼；（三）叛帮者受断手断足处罚。

这些堂规随着时间的推移与变化，常常得不到严格遵守。但在现代台湾黑社会发展史上，“竹联帮”是组织最完善、帮规最完整的黑社会组织。

不过“竹联帮”刚成立时，在黑道上并不是最强大的，其活动仍以打群架、向摊贩和三轮车夫收保护费为主。

“竹联帮”成立后，便不断与其他帮派因争夺地盘或利益发生冲突，其中最大的对手是“四海帮”。

长期以来，“竹联帮”核心人物是入帮甚早的陈启礼，号称“旱鸭子”。“竹联帮”成立不久，陈曾因与同伙发生冲突，一气之下离开“竹联帮”，自组“南强联盟”，削弱了“竹联帮”的力量。1957年，“竹联帮”与另一大帮“四海帮”发生冲突，杀得天昏地暗，但“竹联帮”不敌“四海帮”。同年9月，“竹联帮”召开大会，重新确立了四条帮规：

一、专门对付“四海帮”；

二、不得叛帮，否则加以严惩；

三、自己兄弟要团结；

四、每人每周奉献帮费五元。

这一帮规足以表明当时，“竹联帮”的头号敌人是“四海帮”。

1959年春，“四海帮”与“竹联帮”在台北市西门町展开又一回合的厮杀。“竹联帮”不敌，很快就败下阵来。“竹联帮”不服输，不断组织力量反击。

为壮大“竹联帮”的势力，林国栋等重要兄弟出面力邀陈启礼重返“竹联帮”。陈启礼出面后，多次与“四海帮”展开争斗，他屡建战功。特别是1960年春，“竹联帮”绑架了一名“四海帮”兄弟绰号“加贝”，带到中和镇郊外施以酷刑，“竹联帮”名声顿时大噪。他们乘胜追击，将势力扩展到“四海帮”势力范围的天地新公园一带，进而又赶走古亭车站的“宇宙帮”，真是不可一世。同年底，“竹联帮”的陈启礼率众携械来到闹市区，准备与“四海帮”再次搏杀，结果被警方得知，进行围捕，双方人马随即逃跑。

但过了没两年，“四海帮”四处出击争斗，被警方查获。加上“竹联帮”陈启礼的报复行动，一度风光十足、威风凛凛的“四海帮”遭到致命创伤。

1962年3月6日，“四海帮”因发生大案而一度宣布解散。“竹联帮”乘虚而起，占据了“四海帮”的大部分地盘。陈启礼也脱颖而出，正式接掌“竹联帮”，并坐上第一把交椅。从此“竹联帮”日益强盛，实力超过其他所有黑帮而成为台湾第一大帮。台北的地下酒家、酒廊等大多是受“竹联帮”保护的。不少餐厅与歌舞厅月月向“竹联帮”“进贡”，否则，就会受到惩罚，轻则歌星被殴，餐厅酒廊被砸；重则让你无法在此地立足、生存。

1963年11月，“竹联帮”一名姓梁的小头目将一名与他结仇的年轻人绑架，进行毒打，并将其四肢捆绑丢入淡水河沟达一个多小时，差点丧命。事件被披露后，在警方的打击与舆论的压力下，“竹联帮”嚣张气焰受挫。

1964年，绰号“杨站长”的杨剑平重整“竹联帮”，并开始吸收女性成员加入。他率领“竹联远征军”四处出击，横扫台北各地大小帮派，威镇黑道社会，并打下西门町这块黄金地段。同时，在“南海路帮”担任“护法”绰号“白狼”的张安乐加入

“竹联帮”，因其聪明、点子多而成为“竹联帮”的“狗头军师”。不久，“鬼见愁”吴敦也加入“竹联帮”。

到1965年，“竹联帮”已拥有五六百兄弟，声势浩大，号称“天下第一大帮”。他们还跨出台北市，远征台中、嘉义、台南、高雄等中部南部，并促成轰动黑社会的“南北大联盟”。

树大招风。一路杀声不断的“竹联帮”震动了台北市刑警大队。警方针对“竹联帮”分子展开了全面扫荡，杨剑平等头目落网，但并未能影响“竹联帮”的发展。“竹联帮”在“旱鸭子”陈启礼、“灰鸭”柳茂川、“白狼”张安乐、元老周榕等人的率领下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柳茂川出身官宦之家，父亲曾担任过国民党空军司令周至柔的军需官，利用这块肥差捞了不少钱财。母亲也曾为中上层社交界名人，在台北办了一所“中央孤儿院”，当过台北市第六届市议员，并靠炒地皮赚取了大量钱财。柳茂川在这种衣食无忧的环境中长大，成为一个纨绔之弟，并混迹黑社会。

他开始加入的帮派是新店镇罗福助率领的“文山帮”，一心想爬上帮主宝座，但却因势力不够而未能如愿。后来，他便投入最有实力的“竹联帮”，成为“竹联帮”有影响的元老之一。加入不久，他就为争夺台北市中山区一带的酒吧、餐厅的“保护”而与“牛埔帮”展开拼斗，功绩超群。

1967年，柳茂川服役退伍后，靠着家中的万贯家产，从永和镇选了几十名“竹联帮”兄弟，在新生北路“中兴妇孺教养院”集训。每日跑步、打球、练剑道，灌输帮派思想，传授经验。柳茂川组织的这个“战斗堂”，实际上具有一定的武装性质，后来为“竹联帮”突击队的建立打下了基础。

就在此时，陈启礼在赌场结识赌博“郎中”陈仁，将其拉到自己旗下。俩人密切合作，由陈仁充当“郎中”，在赌场诈赌赚

黑钱。就连演艺圈中赌博高手陈鸿烈、张帝等人也被他俩欺诈。

1968年，在绰号“白狼”张安乐的倡导下，“竹联帮”在台北市郊旅游胜地阳明山召开重要会议，重组“竹联帮”。模仿满清八旗旧制，采用红、白、黑、黄、蓝、灰六色与虎、豹、龙、狮、狼、熊、凤、鸟等动物名称为名立堂，建立新的堂口制度，每堂有堂主、副堂主、护法等职，而仍尊奉入道甚早的陈启礼为“大哥”（总堂主），他自任“总护法”。他还提出“竹联帮”发展的两项重大政策：一是广设赌场，专找“凯子”（指容易被欺的有钱青少年）入局；二是大量吸收“新血”，扩大基层组织。他还教小兄弟待人接物的礼节，要他们把布鞋换成皮鞋，让他们脱下牛仔裤、T恤衫，穿上西装，极大地改变了传统黑道帮派的形象。

1970年，陈仁为顾及家中老小，不想再混下去，便私吞了“竹联帮”“母金”（各堂口赌场收益所缴的公益金）60万元后，想脱离帮派，向市刑警局请求“保护”，正式叛帮。

这是黑社会帮派的大忌。对于这一叛逆行为，“竹联帮”兄弟怎能容忍！陈启礼不得不动用帮规，亲自携带利斧化装成油漆工，前往汉中街华美整形医院找陈仁算账，但均未能有机会下手。最后，他派张如虹等三位兄弟在台北西门闹市区找到陈仁，在光天化日之下将其连砍三刀，震动台北，成为当时一大轰动性新闻。

对于“竹联帮”的这种猖獗活动，警方再次展开扫黑行动，将幕后策划人陈启礼等人抓获归案，送往绿岛管制6年，成为台湾最具影响的作家、评论家李敖的狱中“同窗”。

陈启礼入狱后，周榕成了名誉老大。周榕早在“中和帮”成立之初就是“五虎将”之一，排名“老幺”。竹林结盟后，他是老大之一，足见其资历甚老，就是后来的总堂主陈启礼也对他礼让三分。周榕也曾在国民党军队中干过几年，混到少尉军衔后退

役。退伍后，与“竹联帮”兄弟开赌场、办公司、插手演艺界，是“竹联帮”走向企业化发展的主要推动者之一。

周榕在从事期货生意时，结识了日本黑社会组织“山口组”的重要成员永野一郎、末户千秋等人，促成了台湾黑社会与日本黑社会的国际大联合，双方在台北敦化北路国泰金融中心买下两层楼面，办起了“香港恒升国际有限公司台湾分公司”。这个跨国公司的建立，标志着“竹联帮”国际化发展的新趋势。

这一时期，整个台湾黑道与“竹联帮”情况一样，均发生重大变化。黑道组织不仅迈向企业化，而且在武器装备上发生了质的变化，是否拥有现代化的枪支成为其武装力量是否强大的标志。

1976年，陈启礼出狱后，“竹联帮”与昔日的仇故、重新复出的“四海帮”又展开厮杀。同年5月，与“竹联帮”关系密切的香港武打明星王羽与一帮“竹联帮”兄弟，在台北民生路的杏花阁酒家，因为一位小姐“贵妃”与“四海帮”人马大打出手，还掏枪射击，闯下大祸，一人被刀刺，一人被枪伤，这就是所谓的“杏花阁酒家喋血案”。

1981年元月，王羽又因赌场恩怨被“四海帮”头目刘伟民手下兄弟枪击成伤，造成“天厨餐厅血案”。不久之后，台北法庭开庭审理此案，王羽竟派“竹联帮”兄弟在法庭走廊当众砍杀为刘伟民说情的刘台生，又制造了轰动港台的“法庭大血案”。

在此前后，“竹联帮”的一批骨干分子如“白狼”张安乐、“黄鸟”陈志一、“青蛇”邓国洋纷纷到了美国，或留学或经商，“竹联帮”迅速向海外扩张，除在美国打下坚实基础外，还在日本设有堂口，在香港等地设有联络站点组织，海外“竹联帮”势力大增。

1979年岛内反对派人士利用了大量的南部黑社会角头充当

先头兵，制造了警民大冲突的“美丽岛案”，对国民党统治产生重大影响。为了“以黑制黑”，台湾情报局便开始与“竹联帮”建立联系，试图利用“竹联帮”的力量来打压南部黑社会，“竹联帮”的实力得到进一步壮大。

“竹联帮”在出狱后的陈启礼领导下，迅速扩大势力。到80年代初，“竹联帮”共设有25个堂口（包括一个由特种职业即色情业女性组成的花堂），以忠、孝、仁、爱、信、义、和、平、天、地、尊、万、古、长、青、东、西、南、北、金、木、水、火、土为堂口。各堂下设四坛，即龙坛、虎坛、豹坛、鹤坛。各个堂口内设堂主、副堂主、左护法、右护法、十大太保、十大护旗、凤旗（为女性成员设立）、龙旗、天门、地门、玄门、武门。每个堂口编制人数从100人到800人不等，帮员总计近4万人。

1984年，“竹联帮”各主要堂口及头目如下：

总堂主：“旱鸭子”陈启礼

总护法：“鬼见愁”吴敦

执　法：陈功

总巡查：“么么”黄少岑

巡　查：汪沛雷、“船长”林庆增、“小蔷薇”张启民

忠　堂：堂主董桂森

孝　堂：堂主“花枝”花继忠

仁　堂：堂主项美华，副堂主冯在政

爱　堂：堂主刘振南，副堂主张恕隆、汪裕弘

信　堂：堂主“蕃薯”邱文钦

义　堂：堂主“大锤”杨榕顺

和　堂：堂主周士弘

平　堂：堂主“小鬼”黄云龙

天　堂：堂主“狗仔”王国庆

地　堂：堂主李宗奎，副堂主张北华

至　堂：堂主“小佛”张伟华

尊　堂：堂主彭荣沪

万　堂：堂主阿斌

古　堂：堂主“阿南”陈永南、副堂主郑文斌

长　堂：堂主郅长老

青　堂：堂主“老鼠”何根成

总堂主陈启礼负责确定帮会的大政方针，协调各堂口之间的行动或调解其矛盾纠纷，处理各职能部门与直线部门之间的关系，代表本帮与外帮打交道。

各职能部门负责协助总堂主的工作。张安乐、陈志一等少数总堂人员虽没担任具体职务，但在帮中地位极高，实际上充当军师的角色。他们或为总堂主出谋划策，或代表总堂主对各堂口工作提出建议。

总护法吴敦负责对各堂口的违纪现象进行调查。执法陈功根据总护法提供的违纪情况，依照帮规对违纪者予以惩罚。

总巡查黄少岑及其手下对堂口的事务进行监督，充当总堂与各堂口之间的联络任务。

突击队又称“竹联帮捍卫队”，负责在与其他黑帮发生冲突时冲锋陷阵。

为了维持“竹联帮”强大的力量，“竹联帮”为各堂口配备了先进的枪支弹药，还有组织武装“突击队”，有训练专职打手、杀手的训练营。从1982年起，“竹联帮”在石碇山区、鸿鹤溪畔的训练基地，每三个月就有一批职业凶杀手学成毕业。

各堂主有义务执行总堂主的命令，但可自行拟定行动计划，必要时可见机行事。只要不与本帮总目标发生冲突，各堂口可自设本堂目标，建立起本堂的势力范围。例如，“花堂”主要由女性组织，专事色情业；“侨堂”（又称“港堂”）致力于在香港发展势力。各堂口还可拥有护法等职能部门。各堂的普通成员一般

只听从本堂堂主的命令，总堂主要调动某堂成员要经该堂堂主同意。

“竹联帮”在海外也发展十分迅速。目前在美国的纽约、洛杉矶、旧金山、休斯敦、费城等大城市都有分支机构与企业，号称成员达万人。在香港的“侨堂”，成员达150人，其中大多在文艺圈与体育界。另外，日本、新加坡、泰国、菲律宾，甚至南非等地都有“竹联帮”的势力。

要维持这样一个庞大的帮派队伍，必须有充足的经济来源。早期各堂口收取保护费、开赌场、从事色情业等成为其重要经济来源。现在不同，“竹联帮”不仅有上述原始的经济来源，它更像一个庞大的企业王国，有更为广泛的经营事业与资金来源。除控制电影院、戏院、夜总会及其他娱乐场所外，还拥有各种合法商店、公司、从事建筑、水电桥梁、公路、铁路等工程的承包与施工，还代办运输、投资金融事业。此外，“竹联帮”还积极介入文化事业。为了扩大影响，陈启礼曾试图收购朱伯舜在美国发行的《华美日报》，后因价钱未谈妥，于是出版一份《风云报道》的综合性刊物，每半月一期。后来，“竹联帮”还是创办了《美华报道》杂志社，陈启礼任董事长，他因此而成为社会名流。

1984年成为“竹联帮”由盛而衰的一个历史性转折点。

同年6月，一场南北黑道大火并的计划正在秘密进行。“竹联帮”因争夺异帮地盘，引起其他帮派的不满，“四海帮”与南部的“黄埔帮”联合，准备夺回失去的地盘，并计划在6月21日聚集在台北市中山区约两平方公里的地区，展开战斗。一场血腥的厮杀正在酝酿。

“竹联帮”得知情报后，立即下达“动员令”，要各堂口派人聚集在建中北路即将开张的荔舫餐厅，准备迎战。“竹联帮”数百名成员手持武器，三人一组，分布在几个交通要道，守卫着作

为“作战指挥中心”的荔舫餐厅，准备狙击前来复仇的“四海帮”与“黄埔帮”。

不料这一惊人的行动计划风声走漏，被台北警方获悉，迅速组织大批武装警员，分散行动，包围这一区域，并将“竹联帮”与“四海帮”、“黄埔帮”隔离，各帮兄弟见此状况迅速撤离，避免与警方发生冲突，一场即将爆发的火并悲剧得以避免。

这次大火并未成，“竹联帮”的另一个可怕的计划随即展开。

话说台湾著名作家刘宜良（笔名江南）写了一本《蒋经国传》，涉及蒋经国一些鲜为人知的内幕，引起台湾当局的不满，在台情报部门的指使下，由“竹联帮”出面，赴美执行暗杀行动。

同年9月，在美国加州帝利市，“竹联帮”刺客董桂森、吴敦在江南住所将其枪杀，这就是轰动美国与海外华人社会的“江南命案”。美国随即展开追捕行动。在美国的压力下，台湾于同年11月展开历年来规模最大的一次扫黑行动，即所谓的“一清专案”。谋杀江南的主谋陈启礼、吴敦被捕，其他许多帮派分子纷纷被抓，计有3000多人，被送往绿岛、崖湾管训。至此，“竹联帮”受到重挫。

不过，“竹联帮”在台湾已是根深蒂固，不能从根本上铲除。随着黑道分子的刑满出狱，“竹联帮”的活动又死灰复燃，迅速发展，如今仍是台湾黑道界的老大，仍是台湾第一大帮。但“竹联帮”已不是传统意义上的黑道组织，而是一个具有强大经济基础的集团，横跨黑、白两道，既有非法的各种地下活动，又有合法经营的庞大企业。其事业范围甚广，从传统的设赌场、收保护费，到开办合法企业，经营多种产业，无所不有，可以说是一个庞大的跨国企业集团。

据台湾“警政署”于1996年6月公布的资料，黑社会组织人数最多的帮派是“竹联帮”，有600多人。但这只是警方所掌

握的、有案可查的帮员。事实上，“竹联帮”兄弟达数万人，势力十分庞大。

在近两年发生的几起与“竹联帮”有关的大案中，可以发现，“竹联帮”的堂口与体制又有了新的发展。1995年8月，台北刑事警察局在台北市锦州公园查获的一起军火走私案中，主事者就是“竹联帮”风堂副堂主兰震锋及风堂成员张震兴。进而追查出“竹联帮”与马来西亚知名华人陈沛雄联合走私枪支的大案，抓获“竹联帮”战堂分子绰号“A伦”吕维新、雷堂堂主涂让麟、“总堂”顾问陈上善。1996年4月，台北警方经深入调查，在证据可靠后，将围标“中正机场工程”的“竹联帮”重要人物抓获，包括“竹联帮”仁堂堂主、“峻国建设公司”副总经理绰号“二马”冯在政、地堂堂主“钟奎”。5月，“竹联帮”和堂成员林志仁及郑新安在台北内湖区开设“联合国际公司”，经营地下钱庄，并进行勒索活动被警方侦破，并将林、郑抓获归案。经查证，“竹联帮”和堂最初是由前堂主周世宏所开，后由林文典接任，1995年林因车祸死亡，才由现任堂主绰号“孝成”接管。和堂重要成员包括胡志文、林志仁、郑新安等。林志仁，27岁，板桥市人，原是一家专营进出口生意公司的业务经理，后伙同郑新安、李荣富等人在台北市成功路成立“联合国际公司”，作为“竹联帮”和堂的堂口，私下经营地下钱庄，以票贴为主要业务，从绰号“小飞”、“宏生”那里以利息八分至十分借得资金，再以10天为一期、利息十六分借出，从中牟利。

“竹联帮”“中台会”分子黄泰荣的朋友“安郸”洪文全，因与屏东县议员林明顺有过节，为了出气报仇，他两人驾车于1996年1月1日凌晨2时许，来到屏东市林明顺的住宅，下车后，向林宅连开数枪后逃跑。同年8月初，警方抓获涉嫌杀伤民进党“立法委员”的“竹联帮”“捍卫队”队员闻守南，他供称是听命“竹联帮”青堂分子张金城与“捍卫队”大哥郭鸿宾进行

的。在同年4月发生的“中正机场工程”围标案件中，“竹联帮”主要人物张安乐与“仁堂”堂主冯在正等多位“竹联帮”分子涉案。

从上述案件可以看出，“竹联帮”在台湾已重新活跃起来。同时“竹联帮”在组织上也得到发展，不仅建立了新的堂口，如雷堂（堂主涂让麟）、风堂（副堂主兰震锋，堂员有兰震兴、叶富等）、战堂（主要负责人有“A伦”吕维新等）、平堂（堂主黄云堂）、日本堂（堂主王继贤）等，还有地方分会（如“台中会”等）。

“竹联帮”势力已扩张至全岛各地，总计达到45个堂口，除原有的“忠、孝、仁、爱、信、义、和、平、东、南、西、北、天、地、至、尊、风、雷、火、电、青、侨”等堂口外，最近增设了青龙堂、天蝎堂、兰花堂、菊华堂、圣堂等。同时在堂下分设会、组，成员达数万人。决策采行“中央委员会制”，目前计有“中央委员”18位，“白狼”张安乐任“中央委员会”秘书长。这标志着“竹联帮”进入一个新的发展时期。

目前，“竹联帮”的总堂主陈启礼已退居幕后，成为真正的黑道教父。现任总堂主为“么么”黄少岑，陈上善等人为顾问，日常帮务主要由绰号“狗子”、“小鬼”、“宗魁”等人处理。

第五章

第二大帮“四海帮”的沉浮

“四海帮”是台湾仅次于“竹联帮”的第二大帮派，虽几起几落，但仍历经数十年而不衰。

“四海帮”的创立经过，众说不一。

一说是1955年，近30位高中学生带着几瓶红露、几把刀，来到台湾大学校园，在植物学系邻近的一间宿舍里，他们割破手指，将殷红的血液滴进澄黄的酒杯中，依序轮饮，发下血誓，取当年畅销一时的武侠小说《四海英雄传》里的“四海”两字为帮号，成立了在台湾黑社会举足轻重的“四海帮”。

二说是1955年，台北两位青年人在台湾大学校园里，召集了44名青年，以“四海之内皆兄弟”之意成立“四海帮”，成为台北一个知名的青少年帮派，后来更成为声望仅次于“竹联帮”的台湾第二大帮派。

三说是1955年5月，一名姓冯及一名姓王的两位青年人，在台湾大学校园内召集了44名大学生进行聚会，决定成立帮派，并取台大四海篮球队的“四海”之名，组成“四海帮”。

尽管众说不一，但有三点可以肯定：一是“四海帮”成立于1955年；二是地点就在台湾大学校园；三是其主要成员是中学生与大学生。

这个帮派的成员同样是从大陆到台湾的国民党第二代，即大陆籍的黑社会组织，当初多是一些家境不错的军公教人员子弟。

他们的口号是“有难同当，有福同享，打平台北市”，宗旨是“一条心，二不白（不白吃、不白嫖），三结义，四海一家”。

“四海帮”建立之初，发展十分迅速，很快就占据了台北市的西门町、台湾大学、北商公馆一带为其活动地盘，一度成为台北的第一大帮派，称雄一时。但好景不长，随着其他帮派兴起，互相争斗、火并，也是几起几落。

赵大鲁是早期加入“四海帮”的兄弟，也算是开山元老之一。他也不例外，生长在眷村。父亲曾任职情报单位，是海上突击大队的大队长。随着官职的升高，赵家也搬进了台北和平东路附近的建华新村。

那时候，赵大鲁正在东方中学读初二，与后来同入“四海帮”的李正国私交甚好。但两人在学校均是太保学生，不好好读书，还惹是生非，结果触怒了学校附近成功新村眷村子弟组成的“飞虎帮”兄弟。

一天下午放学后，“飞虎帮”兄弟带着木剑等原始武器在东方中学门外拦住了赵大鲁与李正国的去路，试图教训这两个不知天高地厚的小子。没想到还未等“飞虎帮”的老大下令，赵大鲁就抢先一步，一拳将对方老大打得鼻血直流，双方展开混战。赵大鲁与李正国以少胜多，打败对方，虽因此出了名，却被学校记了大过。

赵大鲁特别喜欢自行车。但在50年代的台湾，自行车可算是一件值钱的东西，不是一般家庭所能随便买得起的。但公务员家庭特别是军人家庭条件还不错，父亲还是给儿子买了一辆。赵大鲁显得十分风光，让许多同学十分羡慕，不时借来过过瘾。好友李正国更是三天两头地借用。没多久，自行车就不知去向，赵大鲁因此不敢回家，便在李正国的引荐下，进了“四海帮”。

这时，赵大鲁仅16岁，一米七五的个头在帮里是个大块头，

粗壮的体格与狠劲常在对抗中占尽便宜。特别是早期帮派盛行单挑论输赢的时代，他总能第一个站出来，单挑成功，成为“四海帮”的英雄，为“四海帮”开拓疆土与壮大立下汗马功劳。

冯祖语也是“四海帮”的开山老大之一。在他的领导下，与在当时已有名气的“万字帮”在新生南路与信义路一带、西门町凯旋冰果店、新生戏院附近展开多次较量与厮杀。每次战斗，他手持武士刀，一马当先，杀出威风，“万字帮”元气大伤，“四海帮”名声大振。

就在这时，赵大鲁的结拜兄弟“黄毛”与“南北帮盟”的老大贾正清结下梁子。依照江湖规矩，在“黄毛”亮出字号后，贾正清放下话，相约当晚在师范大学操场一决高下。

贾正清是个聪明人，“四海帮”与“万字帮”火并时的强悍作风他已早有所闻，为了确保“南北帮盟”的名声，他事先邀了自家兄弟在操场四周埋伏，结果“黄毛”率数名兄弟赶到操场时，被对方来了个猝不及防，被打得人仰马翻。待赵大鲁率兄弟赶到时，台北市警察局少年组已闻讯赶到，手持武器的“四海帮”兄弟被逮个正着，无一漏网，赵大鲁等人的名字记入了不良帮派档案。

经过几天的惩罚后，“四海帮”兄弟才被释放，按规定，赵大鲁等兄弟需按时向警察局少年组汇报。

1960年春，“四海帮”与“竹联帮”在西门町展开第一回合的厮杀。“新秀”“竹联帮”不敌，很快就败下阵来。“竹联帮”不服输，不断组织力量反击。

同年底，“竹联帮”的陈启礼率众携械来到古门闹市区，准备与“四海帮”再次搏杀，结果被警方得知，进行围捕，双方人马随即逃跑。

1961年，以赵大鲁为首的一群“四海帮”兄弟中学毕业，都因记过或处分没有考大学，纷纷进入了社会，有的考进了官

校，有的到情报局，赵大鲁进入基隆海军专科学校。

但过了没两年，“四海帮”兄弟四处出击争斗，被警方查处勒令解散，加上“竹联帮”陈启礼的报复行动，一度风光十足、威风凛凛的“四海帮”遭到致命创伤。

“四海帮”并没有消亡。在沉寂九年之后，到70年代初，“四海帮”重现江湖，且实力壮大。

上次“四海帮”受重创后，其成员纷纷寻找各自的谋生之道，其中不少“四海帮”兄弟经商有成。特别是周姓、陈姓两位兄弟在台北市武昌街开了一家船务公司，赚了不少钱，试图重振旗鼓。当年浪迹江湖的兄弟乃在此聚会，以公司为掩护，进行活动。与此同时，一批曾被抓去接受管训的兄弟，以“新四海”面目在赌场和特种营业（指色情业）发展起来。他们一改过去抢地盘、打架的江湖作风，而是以开赌场、收取商家保护费及自办企业开公司等作为活动阵地与经济来源。“四海帮”在台北地区重新活跃起来。

赵大鲁经过11年的海员生活，由实习生干到了轮船大副，长年遨游海外，虽然不时听到一些“四海帮”日渐坐大的消息，昔日的老兄弟如今成了坐镇一方的大哥，在黑道上享有重要地位，但他却醉心于酒精与麻将。

这样的生活久了，也让他觉得没有太大的情趣，又兴起了衣锦还乡的念头。但却囊中羞涩，挣的钱全花在麻将场上与酒杯中。于是他借越战正急之时，走私“黄鱼”，大发战争财，赚了近千两黄金，回到台北。

昔日的兄弟又找上了他。因他的多金与为人重义气而成为兄弟眼中的老大。

他也希望用手上的钱做点生意，便与“四海帮”的“毛子”合开了一家贸易公司。可是他不是经商的料，不赚不说还赔钱。加上常与朋友进赌场，没多久，就感经济不足。

就在这时，他却因好打抱不平惹上不少麻烦事。

一天，他到台北罗斯福路的一家餐厅吃饭。他目睹几位古亭地区的小混混调戏餐厅唱歌的小姐，就前去将小混混狠狠地揍了一顿，打跑了这些捣乱分子。他受到观众的称赞。没想到十分钟后，这些小混混就找了几位帮手，带着武器冲进来，一拥而上，将赵大鲁杀成重伤。

伤愈后不久，时光已到了1981年的除夕，赵大鲁与“四海帮”兄弟在信义路一家钢琴酒吧聚会。不料，发现不远的一个餐桌上有一位昔日冤家，碍于年节将至，以不惹事为好。可是对方也发现仇家在此，摆出一副要复仇的样子。赵大鲁不愿事态扩大，便以“四海帮”大哥的身份想做和事佬，要与对方讲和。还没张口，对方一个兄弟已拔出扁钻，二话没说就插在赵大鲁大腿上。这激怒了在旁的“四海帮”兄弟，纷纷拿出家伙，向对方人马杀去，将对方打得大败，多人受伤，一人还差点要了命。“四海帮”除“鲁哥”受伤之外，其余均没出事。

没想到，后来赵大鲁还是因为朋友解围惹火上身。

曾因“老莫第二个春天”走红影坛的高仕电影公司老板周乃忠，绰号“小花周”，曾在一家车行买了部进口车，结果开的支票没有一张能兑现，车行便找了“华山帮”出面，找“小花周”算账。“华山帮”找到“小花周”，要他如期付款，否则要他好看。“小花周”便通过朋友找了在黑道上有分量的赵大鲁出面解决。“华山帮”兄弟冲着“鲁哥”的面子放了“小花周”一马，而赵大鲁也当场作保，“小花周”不再赖账。

可是“小花周”却依旧玩花样，开的支票依旧不能兑现，赵大鲁身无分文，但还是承担起了这笔债务。

这时他的身体却患上了肝硬化，住进了三军总医院。

赵大鲁深知病情严重，可能不会医好，又不堪病魔折磨，在医院自杀身亡，结束了他闯荡江湖的一生。

1984年11月，“鲁哥”去世的消息在台北各派之间迅速传开，不少黑道兄弟为他掉下了英雄泪。

出殡那天，除“四海帮”大哥级人物全部到齐外，“三重埔大明口帮”、“万华头北厝帮”、“华山帮”、“东门帮”、“文山帮”等帮派的兄弟也纷纷赶来，祭奠这位黑道闻人。

“四海帮”与“竹联帮”是两个死对头，两大帮之间的冲突几乎从没有停止过，积怨越来越深。

1959年时，“四海帮”联合“文山帮”、“三环帮”等帮派对“竹联帮”大围剿，“竹联帮”一度受损惨重。但第二年，“竹联帮”就卷土重来，绑架了一名“四海帮”兄弟到荒野进行毒打、报复，让他转告帮内老大，不要与“竹联帮”作对，否则没有好下场。

随后，“四海帮”几位老大“金盘洗手”，纷纷经商，“四海帮”力量大打折扣。“竹联帮”乘虚直入，直捣“四海帮”老地盘。“四海帮”一蹶不振，活动近乎停止。

到了60年代中期，沉寂多年的“四海帮”已有经济实力的老大出山，又重新崛起。这时的“四海帮”内已有“老四海”与“新四海”两股力量。“老四海”以周、陈（陈永和）二人为首，在台北武昌街开了一家船务公司，聚合当年一道混迹江湖的兄弟展开活动。“新四海”则是一批曾被管训过的青年，他们在舞厅、餐厅当挂名经理、充当保镖，在赌场、特种营业场所活动。

“新四海”一改当年“老四海”抢地盘、打斗的做法，而向企业化发展。经过几年的经营与努力，“四海帮”办起了大批建筑公司、营造厂、煤气公司、运输公司等。特别是在台北市火车站等一些交通要塞开设西餐厅与饭店，生意兴隆。其中蔡冠伦开的餐厅生意最好，手下有一帮兄弟，日后均成为“四海帮”的主要山头，外界便视蔡冠伦为当时“四海帮”老大。另外，刘伟

民、“大宝”陈永和等人在“四海帮”内也是一股颇具实力的人物。

“四海帮”仿效美国黑手党，以企业养兄弟的模式，将帮内组织企业化。在“四海帮”内，不设法定最高首领，而以企业为单位，各自推选头目，但为了对外，由资历深、威望高者充当领袖。各单位推选出的头目即为四海旗下大将，由这些大将共同维系帮派组织。这种组织方式与“竹联帮”相比，“四海帮”显得相当松散，常常各自为政。

不过企业化的发展，重新振兴了“四海帮”。如设在台北市复兴北路的“四海帮”期货公司，假借期货交易之名，以买空卖空的方式进行投机，赚进了大量钱财。

1976年，与“竹联帮”关系密切的武打明星王羽等一帮“竹联帮”兄弟，在台北民生路的杏花阁酒家，为了将一位小姐“贵妃”带走，“四海帮”老大刘伟民手下兄弟路见不平，双方发生冲突，造成一人被刀刺、一人被枪伤，成为“杏花阁酒家喋血案”的大新闻。结果却是，凶手“青蛇”邓国沣逃亡海外，“贵妃”入狱，王羽反而没事。

事后，王羽抱怨刘伟民不够仗义，还要找“四海帮”算账。刘伟民决心教训一下王羽。

1981年1月14日中午12时左右，港台武打明星王羽来到天厨餐厅411号预定房间，准备宴请“竹联帮”朋友，正在与两位兄弟等待客人。

这时五名青年分乘四辆摩托车来到天厨餐厅，留一人在门口把风，四人乘电梯直奔四楼。

“叫王羽出来一下，有人要找他。”一人对服务生说。

“王先生有交待，他已约好朋友在里面相会。如果你们是他约的朋友，可以直接进去。”

四人相互看了看，就大步冲入室内。

“姓王的，今日叫你好看！”说着，四人同时抽出扁钻，直扑王羽。王羽见状，凭着自己的空手道三段功夫，急忙跳起，进行抵抗，但一人难敌八手，王羽左腰先挨了一刀。他飞起一脚，向对手踢去，另一人又在后面来了一刀，扎入他的大腿，顿时鲜血直流，王羽倒在地上，正要拔枪之时，对方又是一脚，将枪踢开，拿起枪迅速离开。这时服务生进来，才发现这里发生了斗殴，叫人将受伤的王羽送进医院。经医院检查，王羽身中四刀，大腿血管被砍断。这就是“天厨餐厅血案”。

原来这四位杀手分别是刘伟民的手下兄弟陈叔宁、王国和、于允中、胡文义。原来刘伟民在获悉王羽要在天厨餐厅宴请时，便召集四位兄弟，面授机宜，要他们对王羽进行惩罚。计划得逞。

这次报复行动，“四海帮”与“竹联帮”又结下新怨。双方剑拔弩张，准备展开血腥火并。

治安部门闻讯后，即请出有“警界大执法，黑道大护法”之称的台北市刑警大队除暴组长鲁俊。鲁俊当即出面，找到“四海帮”与“竹联帮”的几位老大，希望他们不要进行械斗复仇，否则警方不会袖手旁观，对双方均没有好处。

由于刘伟民等“四海帮”兄弟大多都在这位警官主持的励志班少年管教所受过管训，称鲁俊为老师。在鲁老师的协调下，刘伟民等人投案，一场白热化的帮派争端被平息。但“四海帮”与“竹联帮”都在暗中扩展组织，前者建立了“四维”外围组织，后者发展“竹叶青”。

不过，这一案件并没有了结，王羽不愿就此放过刘伟民，并在“竹联帮”兄弟的支持下，告上法院，案件则进入司法程序。

“四海帮”老大请“飞鹰帮”的刘台生出面为刘伟民说情。

刘台生与“四海帮”创始人之一的“大宝”陈永和往来密切

(陈永和与“四海帮”老大蔡冠伦齐名，1982年在台北市再兴中学附近开枪击伤“竹联帮”平堂堂主、突击队训练负责人黄云堂的腿部而闻名)，在陈永和开设的餐厅做事。刘伟民惹上官司后，陈永和便委托刘台生这个帮外人从中说和。

刘台生先后在华园饭店和圆山饭店与王羽谈判，希望王羽撤回上诉，将这件事私了。王羽先是搪塞拖延，后又避而不见，刘台生大失颜面，便四处大骂王羽是一个不讲义气的臭戏子。此话传到王羽耳里，自然如火上浇油，怒气更盛，扬言要给刘台生一点颜色看看，还放风说要以40万元买刘台生一条腿。刘台生闻讯后，专门准备了一把菜刀，时刻准备迎战。

1981年5月8日，台北博爱法庭大厦第十一庭开庭审理刘伟民教唆他人杀伤王羽一案。每次开庭，原告王羽与被告刘伟民均有一帮兄弟前来助阵。

当日开庭前，与王羽合作拍片的周龙分别打电话给“竹联帮”杀手“么么”黄少岑、陈智、董树宝、张照宇等人，要他们出庭助威，每人两万元酬劳。与此同时，刘伟民的朋友刘台生等人也前来助阵。

双方人马大约于上午10时在法庭相遇。王羽看到法警押着刘伟民过来，向后让开道路。后面忽然有人拍了一下他的肩膀，转身一看正是刘台生。

“做人不要太绝，请你记住这句话!”刘台生甩出这么一句。

“你算什么东西，没有资格和我说话!”王羽很不客气地回敬一句，并向身边的陈智等人使了个眼色，意即刚才与他说话的就是今天要教训的刘台生，然后便和律师进入法庭。

刘台生发现情况有异，只见四位大汉向自己走来，拔腿就跑，但为时已晚，刚跑到大厅，已被对方围住。先是一顿拳打脚踢，陈智再拔出短刀向刘台生左胸扎去，然后迅速逃离。

刘台生捂着血流不止的胸口，踉踉跄跄地来到法庭大厦法警

室，大呼“救命”，随即倒地。

十多名法警冲出室外，只见大庭一片混乱。兵分两路，追捕罪犯。陈智在马路上逃窜时，被法警与交警抓获，其余漏网。

这就是引起全社会震动的“法庭血案”。

陈智后来被判五年刑期，出狱后恶习不改。1986 年 8 月在台北帝苑酒店招女郎陪酒时，因不满“服务不周”，掏枪向天花板射击示威，被报警后再次被捕。

刘伟民出狱后，流亡菲律宾，后来又逃到日本。

1987 年，在日本新宿，因赌场恩怨，刘伟民与杨双五等人发生枪战，刘伟民不幸中弹身亡。“四海帮”又失去一位老大。“四海帮”的兄弟随即展开一场国际追捕，悬赏巨资，搜捕追杀杨双五。

刘伟民死后，“四海帮”的势力一度受到影响，另一老大沈长声则成为“四海帮”在黑道商场的风云人物。

80 年代末到 90 年代初，台湾出现了股市狂飙，股价指数从 2000 多点一路上涨到 12000 多点，许多人因此成了暴发户。随后而来的就是各种非法的地下投资公司，专门以高利息吸收民众手上的钱。沈长声成立的鸿源投资公司就是最大的一个，吸收的资金达 950 亿元新台币，投资人达 16 万人。他以月息 4 分至 6 分的超高利息，把所谓投资人的大把大把钞票吸到鸿源旗下。在他的带动下，小小的台湾岛纷纷成立了大大小小的投资公司 400 多家。他们用这些钱再去炒股票，买卖土地，对台湾经济造成相当大的冲击。台湾当局决定于 1990 年初采取行动，由“调查局”出面，全面取缔这些地下投资公司。不到数月，数百家地下投资公司被取消，但成立最早、规模最大的鸿源投资公司却迟迟未查办，在社会引起众多纷议。

原来沈长声这位“四海帮”老大关系复杂，有后台，一般人

不敢随意对他下手。就是“调查局”内，在处理鸿源公司上也有意见分歧与矛盾。副局长高明辉提出详细报告与意见，要求进行迅速查办，但局长吴东明不同意，要求静观其变，辅导鸿源合法化。原来这位吴局长也是受了“上面”的压力，不得不如此，可见沈长声的威力。这“上面”的压力就是有许多黑白两道的人物都在“吃鸿源”，有复杂的官商勾结、黑道渗入关系。

为了将事实弄清楚，“调查局”虽迟迟未办鸿源公司，但仍秘密派了40多人轮流跟踪沈长声，以防他逃出境外。副局长高明辉通过一位有来头的汪先生几次找沈长声了解情况。沈试图以近2亿元的价钱要高明辉放他一马，但高立场坚定。不过，高明辉答应沈长声一个要求，即安排他的太太施思到台湾来看他。施思是香港的电影明星，与沈长声结婚后，一直没有向户政机关登记。鸿源出事后，施思回到香港，一直不敢再来台湾，担心进来再也出不去。高明辉答应这个条件，但要求沈长声配合“调查局”的工作，并不能利用施思转移财产。

1990年8月21日，“调查局”以高明辉约谈的名义将沈长声诱骗到安和路“调查局”秘密招待所，将沈长声拘留，并对鸿源公司在全省的33个据点进行了搜查，但一无所获，他们早已将资金与财产转移，账册被毁。沈长声也因此入狱。但他在狱中关了一段时日后，就被释放，如今仍混迹商场。

“四海帮”内人才济济，还有多位老大是商场名流。近年间崛起的一些少壮派不仅在台湾发展事业，还转往大陆的上海、南京等地发展，经营卡拉OK等娱乐事业。其中少壮派大哥杨光男等人以台湾为基地，经营期货、房地产、投资公司与赌场。享有崇高地位的第一代帮中老大陈永和也仍驰骋商海。

1996年元月15日上午，连日细雨阴沉的台北市终于出现了艳阳天，看到了数日不见的阳光。可是到了傍晚，又突然下起了

绵绵冬雨。这一切却掩盖不住灯红酒绿的台北夜生活。

复兴北路的海珍宝餐厅，像往常一样生意兴隆，客人满座。今晚，这里显得更为热闹。三十多位“四海帮”兄弟来此聚餐。已近60岁、绰号“侠哥”的“四海帮”创办元老兰磊洽，应来自美国陈姓友人之邀，在富宝厅包厢内聚餐。去年在环亚饭店新选出来的“四海帮”“总霸子”（老大）赵京华，也和家人在海龙厅用膳。另一桌是大哥“孙老五”和众兄弟欢送一名小弟入伍（台湾每个适龄青年均须当兵）。

7时刚过，“四海帮”幕后老大及海珍宝餐厅老板绰号“大宝”的陈永和，出来招呼客人与朋友。这个叱咤风云30年的黑道老大有一幅八字眉，一脸微笑。这位五十有一的黑道老大一到餐厅，就看见与自己差不多同龄的“四海帮”老同学翁家隆来此吃饭，便前来打招呼，并寒暄一番。他俩是台北县永和小学及陆军官校的同学，也都是这家餐厅的股东，交情匪浅。今晚，狮子会成员陈姓与欧姓朋友邀翁家隆前来共餐。在包厢内的兰磊洽发现“大宝”与翁家隆，也前来敬酒，进行畅谈。

8时许，两名戴着头套的男子走进餐厅。一位高个子看着在一桌前的“大宝”问同伙“是不是他?”同伙点头后，这位高个子的男子对准“大宝”连开三枪，“大宝”还没来得及反应就倒在地上。在旁的“侠哥”正要上前护卫，也被一枪击中胸部，当场死亡。翁家隆拿起一把椅子准备向歹徒砸去，还未扔出就被击中左胸。另一歹徒担心“大宝”不死，再连补四枪，然后迅速逃门而出，乘同伙备好的轿车迅速逃跑，前后不超过3分钟。

“大宝”被迅速送到台北长庚医院进行急救。一个个穿着黑色服装的“四海帮”大哥陆续开着宝马、奔驰、保时捷等名贵轿车来到医院，来看陈大哥最后一面。

凌晨12时40分，“大宝”因伤势过重不治死亡。

海珍宝餐厅枪杀案震惊了台湾。这一暗杀活动，是台湾黑道

史上一件空前的案例。以“大宝”的影响力与地位，这一案件必涉及政、商、黑道的恩恩怨怨。一时间，对“大宝”的传闻甚多。有人说他运用帮派的势力与财力，帮几名“立法委员”助选成功，因此遭失败者怀恨在心；有人讲，“总统”候选人陈履安急着找他助选；更有人说，李登辉“总统”为了竞选连任，要召见“大宝”。“大宝”一时不知如何是好，曾求助星云法师。这些传说，也正说明了“大宝”的实力与影响非同一般。

“四海帮”内的少壮派迅速调集一批火力强大的长短枪支，准备为大哥“大宝”复仇。这些人大多是陈永和一手带出道的嫡系兄弟。其中一位兄弟曾因案逃亡而受到“大宝”关照，1995年出狱后随“大宝”学做生意，并视“大宝”为恩人，表示决心报仇。这位兄弟还与“牛埔帮”已故的“空斌”、“矮仔摩利”两位兄弟有相当交情，而暗杀这两位兄弟的凶手至今未查出，于是，“四海帮”与“牛埔帮”兄弟联合寻找凶手。

“四海帮”的大哥也通知海外兄弟注意凶手潜逃出境，有情况要随时汇报。

“大宝”陈永和是“四海帮”开山鼻祖之一，与在这次枪击案中死亡的“侠哥”及“奋哥”、“蔡老大”（蔡冠伦）是同一辈分。“大宝”与“侠哥”成名很早，以在台北搞期货起家，同时经营赌场，与在日本被枪杀的刘伟民属帮内同一派系。

刘伟民在日本被杨双五枪杀后，“四海帮”内以“蔡老大”、“大宝”、“侠哥”及“光南”等为首，并分成不同派系，各自有自己的手下与兄弟。“大宝”、“侠哥”与“四海帮”另一老大刘铁球也均参与了沈长声的鸿源投资公司，较具经济实力。

“大宝”的太太是本省人，娘家在台北市延平北路，是有钱人家，在当地有相当的知名度。有一女儿正在读高中。因太太的关系，“大宝”还与本省黑社会角头来往较多，成为黑道上有影响与地位的老大之一。

1984年“一清专案”时，陈永和也被抓去感训。出狱后，淡出江湖，不大管帮内的事务，专营海珍宝餐厅，很少从事黑道赖以生存的赌博生意。

1994年，“四海帮”内举行了一次大哥级的会议，对“四海帮”组织进行了重大改革，选出了新的“总霸子”、“总护法”及20位“中常委”，下设众多堂口。在体制上与“竹联帮”趋于一致。“大宝”则退居幕后，成为“四海帮”的“精神领袖”，有人称为帮内“教父”。帮内所有大小事务由这些新的大哥级人物处理，除非遇到难以摆平的大事，陈永和才会出面。“总霸子”是常居海外的赵京华。

1995年底，“四海帮”在台北市环亚饭店举行了一场盛大的“尾牙宴”，再一次打响“四海帮”的知名度，也宣告了“四海帮”在江湖不可动摇的地位。在这次“尾牙宴”中，到场的“四海帮”各堂兄弟上千人，许多地方帮派角头也派代表参加。警方担心发生意外，进行全程监视、录像。

这两名职业杀手冒险深入虎穴（海珍宝餐厅为“四海帮”台北总联络处），分明就是要给“四海帮”下马威，让这个日益壮大、规模与组织化程度仅次于“竹联帮”的外省籍帮派形象受损。

案发后，警方清查“大宝”生前的财务状况及帮派活动情况，发现他代表“四海帮”出面介入好几件重大土地及工程围标案件，其中以台北县一块总价值10亿元的仁爱路“周氏祭祀公业土地”争夺最为激烈。

据传，某财团一名重要负责人与周氏宗亲一名代表谈好由该财团以8亿元购买，登记在张姓代书名下，并付押金1亿元。但因部分宗亲不同意出售这块土地而发生纠纷。这个财团不想介入土地纠纷而希望讨回押金。这时替周氏宗亲牵线的中间人又找了

另一财团出高价购这块地，造成“一地两卖”的纠纷。

于是两个大财团分别委托“松联帮”老大“志伟”覃世维及“四海帮”的“光南”、“阿秃”出面处理。后来，两帮派因2亿元的佣金谈判破裂，“志伟”曾对“阿秃”开枪，“阿秃”心有不甘，找来“四海帮”一位老大要为他复仇，“志伟”闻风逃到大陆福建避风头。

1995年4月底，“四海帮”与“松联帮”人马在厦门公爵西餐厅二度谈判这笔土地买卖。双方言明不带枪，“志伟”却被意外闯进来的一名杀手所杀。案发后，外传“志伟”吃了“四海帮”的闷亏，“松联帮”不愿忍气吞声，放话要报复，要“血债血还”。于是人们猜测“大宝”之死必与这件事有关。据传，“大宝”陈永和就是被“松联帮”花巨资请来美国“华青帮”分子所杀害。

尽管这仅是传闻，此案尚未侦破，但已反映出黑道的恩怨无情与残酷。

1996年2月11日上午7时，“大宝”陈永和与“侠哥”兰磊洽的灵堂告别式在台北基隆路与八德路口的灵堂隆重举行。

天还未亮，位于灵堂附近的基隆路、松隆路、八德路口，全部穿着黑色西装的“四海帮”兄弟分头集合，然后向灵堂方向移动。

从灵堂向外延伸100多米的牌楼间，百余名穿着绣有“四海”黑色皮夹克、手戴白手套的兄弟分列两侧。“四海帮”更动员了4000多人在现场内外进行接待与维持治安工作。

灵堂内，两个知名乐团，共同演奏由“龙的传人”、“中华民国颂”及“血染的风采”改编的“四海帮”帮歌。四周摆放着来自全省各地政商人士及单位送来的挽联。“总统府”秘书长吴伯雄、“总统”候选人陈履安、台北市长陈水扁3人致赠的挽联挂

在灵堂正中央。“外交部长”钱复、国民党“中央文工会”主任简汉生、高雄市长吴敦义以及包括“立法院”副院长王金平在内的30多名“立法委员”，也都致赠挽联。

“四海机构冠伦企业”负责人蔡冠伦在告别式上讲话。他表示，“四海帮”兄弟对警方努力办案的决心表示肯定，但若警方无法在短期内使案情明朗化，不排除将私下进行了断。

7时许，公祭仪式开始，许多政界名流，商界大亨与各地黑道角头大哥纷纷前来祭奠告别。7时20分，无党籍总统候选人陈履安悄悄来到灵堂前，向两名死者上香后，向其家属致意，然后离去。

“立法委员”朱高正、林明义、施台生、民进党前主席许信良、省议员颜清标、台北市议员康水木、嘉义县议长萧登标、彰化县社头乡长萧景田等人也分别前来上香告别。

最引人注目的是前来祭拜的黑道兄弟多达近万人。他们穿清一色黑色西装，以“公司”或“机构”名义向死者上香。“竹联帮”更来了3000多位帮众，由“么么”黄少岑率领，从集结的东兴街向灵堂上香。“松帮联”则以12匹棕色骏马组成的马阵向死者致意。“北联帮”、“飞鹰帮”、“纵贯线”等帮派代表也率员前来致意，同时，也有来自日本、香港、澳门的黑社会代表前来上香。

11时许，“大宝”和“侠哥”的骨灰在百余辆奔驰及凯迪拉克车队、“四海”旗队及各式民间花车的护送下，由灵堂出发，经基隆路、东兴街、南京东路、敦化北路向松山机场行进，2时许到达机场，然后在百余名“四海帮”兄弟的护送下，搭乘华航包机送往高雄佛光山安葬。

在陈永和遭枪击后，“四海帮”在1996年遇到一次又一次的挫折，可谓流年不利。5月份，台湾警方在破获的一起工程围标

案中，查出“四海帮”“中常委”柳嗣天涉案。柳嗣天绰号“柳云”，是“四海帮”高雄海云堂堂主，以宣武工程公司为总堂口。其胞弟柳秉天，绰号“大熊”，35岁，在“四海帮”“南海协进会”旗下担任海武堂堂主，与海雄堂同为“四海帮”南部地区的两大堂口。柳氏兄弟自三年前肩负重任南下高雄地区打天下，便选择高雄南区电信管理局为目标，组成承包商联谊会的方式围标工程，并对不听话的承包商进行暴力威胁，每件工程抽取8%—15%的“联谊会管理费”，其中“四海帮”占3%，其余则其他成员平均分配。三年来介入大小400多个工程，“四海帮”获取9000多万元的不法利益。

不久在警方破获的另一赌博大案中，查获“四海帮”的海德堂捍卫组组长杨继安与孝堂分子杨国基等人。

也许是祸不单行，就在台湾接连破获“四海帮”中南部堂口涉案的同时，1996年8月底，台湾展开新一波扫黑行动，“四海帮”第一代老大之一蔡冠伦首先被捕，被关进了绿岛监狱。同时在台北、高雄、台中等地接连破获了“四海帮”的活动据点，搜出了“四海帮”的人员名册与入盟誓词，对“四海帮”是一次沉重打击。

其实，在此之前，台湾省刑警大队于1995年12月14日对台中县、市的“四海帮”9个堂口进行了扫荡，一举逮捕张德进等87名“四海帮”成员，并查获成员名册、帮规、帮鞭、帮棍、地下钱庄账册、发展规划与相关枪支武器等。经侦讯，张德进于1995年9月19日在台中县雾峰乡桐林村首府山庄，筹设以犯罪为宗旨的“四海帮”海德堂，张自任堂主，杨尚祈、蔡明德、杨德全、黄建德4人为副堂主。另设8个常务委员，轮流司事，其下设忠、孝、仁、爱、信、义6个分堂，由陈太郎、林鸿文、陈殿奇、陈永卿、陈钰淙、林志忠分任各分堂堂主。廖格富担任捍卫组组长，负责台中市建德路总堂的安全保护工作。同时，各分

堂各选出一位强悍的成员组成行动组，由施国煜担任组长，负责对外执行总堂交付的危险任务，对帮内违反帮规者进行惩罚。如一名“四海帮”分子李铭忠因积欠黑帮公款而被捍卫组组长廖格富押回帮中以帮规处罚。李试图趁机逃跑，结果在被抓回进行一顿毒打后，因失血过多而死亡。

该堂成立后，即在台中县、市招募成员包括未成年的青少年达70多人，进行工程围标、经营地下钱庄、对特种经营活动进行围事及收取保护费。地下钱庄的利息高达日息二点五，即每万元利息250元。对借贷者无法偿还时即进行殴打、恐吓。该堂还以“海德机构”名义向汽车商行进行勒索，要求无偿使用商行汽车，以组成“四海飙车队”。1996年8月底台湾展开扫黑后，这些被抓的“四海帮”分子于9月7日被起诉，成为该年司法单位对单一帮派起诉人数最多的一次。

目前，“四海帮”堂口与人员已分布全省各地，近年间在北、中、南各地成立了一连串的“海”字开头的堂口，堂口总计80多个，帮众近万人。原“总霸子”即最高领导人为常住美国的赵京华。据最新报道，2000年冬在大陆被捕的杨光男已成为“四海帮”的新帮主，目前正面临被遣返台湾的命运。现在“四海帮”也采“中常会”决议制，目前有“中常委”20人。其组织体系与“竹联帮”类似，也是组织化程度最高的黑社会帮派。近年，“四海帮”也在高雄地区设立了多个堂口，如海雄堂、海武堂、海南堂、海云堂与海山堂等。同时在台中市设立了海德堂，以华兴工程顾问公司为中部地区总堂口。据报道，目前“四海帮”内实力最强的是由中青代组成的“促进会”。

今天“四海帮”经营的事业更为庞大，包括了期货、投资公司、房地产、餐饮业、酒店、娱乐业、建筑工程等，从而有着雄厚的经济实力，与“竹联帮”、“天盟道”构成台湾三大帮。

第六章

新兴大帮“天道盟”的崛起

1984年，台湾黑社会“竹联帮”分子在台湾情报局的指使下，前往美国，将华人作家江南暗杀，震动全球。在美国的强大压力下，台湾展开一次规模庞大的扫黑行动即“一清专案”，将大批黑道分子计3000多人抓进监狱。其中在绿岛的监狱中，“竹联帮”的人最多，势力也最大。其他各地入狱的角头为避免势单力薄，便筹划组织一个新的黑道组织，同其对抗。他们还扬言，出狱后还要支持党外人士，以对抗国民党的迫害。

据知，当时的主要策划者为“文山帮”老大罗福助，永和角头李博熙，基隆“田寮港”的吴桐潭、彰化二林绰号“阿不倒”谢通运等。其后又陆续加入三重“济公”、新竹“三光正义组”的“敏德仔”、左营的“鸭霸仔”等人。这些发起人均是黑社会各帮派的要员。他们有感于自己“境遇的不顺”，在怨天尤人之余，兴起以“天道”为代号的意识形态的结合，期待全岛的本省角头能相互支援，以对抗声势最大的外省帮“竹联帮”。

“天道盟”组织活动均在地下秘密进行，外界知之甚少。

1986年，“竹联帮”冷面杀手、台湾十大枪击要犯刘焕荣从台北监狱看守所寄出一封信，指称由罗福助、杨登魁等本省黑道角头正在狱中筹组“天道盟”，目的是对付“竹联帮”与“四海帮”等外省帮派，才引起台湾黑道圈的震动及警方的注意。

不久，“天道盟”主要头领李博熙的枪杀案，在社会上打出

了“天道盟”的威风。

1987年7月14日，台北刑警局紧急通报：枪击要犯李博熙于7月13日脱逃，请各刑警单位查缉。同时指出，李犯身上有枪，查缉时务必注意安全。其所潜藏地点可能在台北县的中和市、永和市以及台北市。

李博熙脱逃消息一传开，不仅震动黑白两道，而且在中和、永和地区引起一阵惊慌，人人自危。

李博熙，人称“双和黑煞”，在狱中参与筹组“天道盟”，是黑道上的狠角色。1953年8月，他出生于台北县，家住永和市。这个出身“黑道世家”的黑道人物，以勒索商家为常业，凶狠狡猾，开枪杀人如麻。

不过，李博熙相当聪明、机警，为人豪爽，讲义气。他有跆拳道三段功夫，爱路见不平，拔刀相助。一次，台北市“鸭仔场帮”的黑道角头黄老大率领四名兄弟，持枪赶到永和市，为讨赌债而挟持双和地区黑道人物“死仔华”。李博熙获悉后，认为对方以人多势众、持枪入双和逞威，乃单枪匹马，只身前来找黄老大等人谈判，并制止了对方的行动。他也因此在黑道上为兄弟所敬仰。

在黑道上的闯荡与争斗，李博熙也因此成为监狱的常客。早在1972年10月，他就因吸食毒品案被警方抓获，判了两年有期徒刑。1983年7月，又因公共危险罪被通缉。随后，他因非法持有枪支弹药爆炸品，被警方再次抓获，被判刑1年。出狱后不久，他又因逃兵役而遭通缉。在通缉期间，他还到处勒索作案。

1985年7月，永和市的一个黑道角头老大杜光辉被人枪杀。警方怀疑是李博熙所为，又一次展开对他的追捕行动。3个月后，警方发现李博熙窝藏在台北市万隆街五十三巷他妹妹的家中，乃派8名干警携带武器前往围捕，可李博熙不将警察放在眼

里，与妻子藏在密室，向警方连开 11 枪，三名警察被击伤。最后在李的父亲苦苦哀求下，经谈判，李博熙才缴枪被擒，避免了更大的伤亡。因其投案，最后被判 11 年徒刑，并押送高雄大寮监狱服刑。

1987 年 7 月间，李博熙因涉及其他案件，被押往台北应讯。

7 月 13 日，台北出庭后，由在两名法警押解返回高雄之际，李博熙趁机逃跑，不知去向。

其实，李博熙早已想越狱逃跑，只是找不到机会。在狱中曾与罗福助等筹组“天道盟”的他，曾结合各地狱中、狱外的黑社会角头，策划、掩护不少兄弟逃脱，他自己也在找寻机会。这次赴台北应讯，正好提供了他逃跑的机会。

于是警方再次发出通缉令，追捕李博熙。

逃脱之后，李博熙便开始了疯狂的勒索枪杀活动。他认为，警方不会放过他，即使逃到海外，也会因人生地不熟而被抓。于是他决定勒索 2 亿元，建立“地下武装”。

他逃脱后的第二天，就向一位民意代表勒索 200 万元，结果未能得逞。

8 月 29 日，他又到旧识的建筑商人张照彦家。还没等这位客人说明来意，这位张姓商人已心领神会，忙取出 10 万元给李，并表歉意。谁知李博熙胃口太大，还要 50 万，并拿出手枪，扬言“不再拿钱，就赏你一枪”。这位老实的商人以为是这位旧识朋友在开玩笑，并没在意，而要送客人出门。 刚出门一步，李给了一个回马枪，商人倒地，李扬长而去。

李博熙活动于台北市、永和市与中和市一带，到处恐吓、勒索，搞得人心惶惶，一些富商、有钱人更是提心吊胆，甚至到外地躲避风声。

10 月 8 日，李博熙带着一名朱姓小兄弟，劫持一辆出租车，开往台北县警察局，掏出手枪，向警察局大门连开 6 枪，然后迅

速逃离。没过一会，他向某报社打电话说，向警察局开枪是李博熙所为。可见李博熙的复仇已到疯狂无比的地步。

警方再次被震怒，便派遣大批警察四处寻找线索，埋伏监视，终于发现了李博熙的行踪。李与小朱兄弟就住在台北市永康街三七七巷十一号三楼，已经养成白天不出门、晚上活动的习惯。

10月21日夜，大批警察分散来此埋伏，并形成一个包围圈。但直到天亮，还未见李博熙行动，而这时大街上已出现上班的人。为避免上班高峰时出现混乱，警方决定采取行动。攻坚人员假冒李博熙的友人按响了门铃。小朱将门刚开一点，发现情况不对，正要关门之际，攻坚人员向室内冲去。小朱快速闪进卧室，李博熙已向大门冲进来的警察射击，一场战斗就此打响。警方利用有利地形向室内开枪，李博熙潜在屋后的阳台，扔出一颗手榴弹，却没爆炸，这让警察松了一口气。李博熙在一阵乱枪之中被击毙。称雄黑道多年的“英雄人物”、“天道盟”创始人之一李博熙就此结束了自己的一生。他的小兄弟小朱受伤被捕。一场警匪之战就此结束。这一战，也打响了“天道盟”在黑道上的字号。

“一清专案”结束后，罗福助、杨登魁等人出狱。他们好像不是犯人出狱，倒像是胜利归来的战士，在台北碧富邑餐厅邀请新闻界，召开记者会，否认有“天道盟”这一组织，也不承认自己是“天道盟”的头头。直到1994年，罗福助才在接受媒体访问时承认他与李博熙等人结盟成立“天道盟”。

罗福助后来讲，他们成立“天道盟”不是为了对抗外省帮派，而是为了反抗“警备总司令部”的霸道和司法的不公。他认为“一清专案”扫黑行动不讲证据，胡乱抓人，侵犯人权。当时抓了3000多名黑道人物，送交“警备总司令部”管训，而黑道

头头即所谓的“大流氓”关在绿岛，罗福助也作为帮派老大关在这里。当时的罗福助在黑道上的地位并不高，名气也不大，是个小头头，只是赌场上的闻人，将他关在这里，他感到有点“名不正，言不顺”。

这些黑社会要员出狱后，重返江湖，在全省各地发展事业，有搞舞厅酒廊的，有炒股票玩期货的，有当“六合彩”（一种新兴赌博）组头的，有从事影艺娱乐事业的，有办报纸与海运的，真是五花八门，样样都来，财源滚滚，“天道盟”的势力迅速壮大。特别是罗福助头脑聪明，手腕灵活，以他过去玩赌博的非凡本领，以“天道盟总会”名义，在“六合彩”风行时，进行全省连线下注设赌，发了大财。罗福助的身价更是水涨船高，成为黑道上的大腕。

罗福助出生于1945年7月2日，是一位农家子弟，老家在彰化田尾，后来移居台北市。早年加入了“文山帮”，成为黑道上的一位小兄弟，也是赌场高手。后来他在台湾北部做起苗圃生意，不久转入房地产投资。由于头脑聪明，做生意精明，发迹很快。不料，因“一清专案”而入狱。没想到，这次入狱，造就了罗福助的另一人生。以他为主导发起成立的“天道盟”竟然在短期内一跃成为台湾三大黑帮之一。不过，他后来弃黑漂白，进入政坛，成为台湾议会颇具影响的人物。

“天道盟”不同传统的“入帮”仪式，没有所谓的“香堂”，而是采“会制”。组织控制也不如“竹联帮”、“四海帮”严密，但较台湾其他黑道帮派更具组织化。

“天道盟”发展迅速，刚成立时只有6个会，目前已增加为23个会，且还在增加之中。主要有“太阳会”、“不倒会”、“仁义会”、“孔雀会”、“雨霄会”、“敏德会”、“天鹰会”、“同心会”、“大安会”等。总盟主仍是罗福助。其中“不倒会”会长为谢通运，绰号“阿不倒”；“太阳会”会长吴桐潭，并兼任“天道盟”

顾问，是组织最大的一个会（副会长庄贤家、庄文隆、刘俊生）。

“太阳会”曾下设“天道盟特攻队”，其宗旨是为了对付“黑牛”黄鸿寓。原来黄鸿寓这位杀手因江湖恩怨扬言要对“天道盟”经营的真善美舞厅进行报复，“天道盟”乃筹划设立“特攻队”与之对抗，旗下共有40多名成员，由“太阳会”会长吴桐潭领军，队长为凌志成（绰号“阿宝”）、副队长徐文贤（绰号“阿硷”），队员有施勇光、廖世志、陈明坤、蔡长希、廖世良、苏志雄、方建贵、陈文龙、廖佑德、沈春龙、余国信、周贤明、徐明德、李世宏、杨登财、陈志祥、王建营、蔡源芳、唐火煌等。

“天道盟”延续本省黑社会“角头平等”的原则，各“会”的力量取决于会长过去在道上的分量与地位，缺乏统合战斗力，所以形成各霸一方的势力，如杨登魁称雄于高雄，李博熙曾雄霸于永和市与中和市，吴桐潭势力在基隆，林敏德势力在新竹，“阿不倒”活跃于中部，可谓是一个全省性松散的黑社会组织。

“天道盟”有多少成员，无法准确统计。有专家估计，“天道盟”成员不下3000人，身居要角者300人。但在1996年6月台“警政署”公布的帮派清查资料中，“天道盟”成员有400多人，但不包括“已被天道盟吸收、尚未曝光者”，是台湾仅次于“竹联帮”与“四海帮”的第三大帮。

“天道盟”尽管势力庞大，但还是有亡命之徒不怕，敢于向它挑战。

1989年9月间，枪击要犯“黑牛”黄鸿寓不满“天道盟”插手他和别人的纠纷，不但公然放话要攻击“天道盟”所开的酒店，还放汽油弹攻击罗福助在台北市光复南路的住宅，并放火烧了台中市的罗浮宫酒店，将罗福助的胞兄罗亨科烧死。

面对“黑牛”与“天道盟”的火并，此时身在海外的罗福助

迅速赶回台湾，举行记者会。他讲他不是要复仇，而是想化解矛盾，避免双方发生更大的冲突。他说，“天道盟”根本不存在，“天道”只是一种争人权的精神意识，绝非有形或存在有正式盟约的黑道组织。他也不是“天道盟”的盟主。他强调，他与“黑牛”并不认识，也无过节，怀疑有人从中挑拨嫁祸，希望紧张情势能尽快平复。他还真有点君子与大将风度，怪不得他日后竟成为台湾政坛的“立法委员”。

其实，罗福助如此做，还有着更长远的考虑。因为像黄鸿寓这样的枪击犯形同流寇，做事根本不考虑后果，也没有明天。黑社会帮派不同，它是一个要长期生存下去的组织，要不断发展、壮大，没有必要同黄鸿寓火并而消耗实力。

这并不是说，罗福助率领的“天道盟”没有实力，随意让他人欺负，必要时仍会对对方进行惩罚。就在儿子罗明旭参选省议员时，“全民出租汽车司机组织”的一些人开车前往罗竞选总部闹事，结果被“天道盟”成员打得落花流水。这次事件之后，再也没有人随便到罗家门前滋事。

次年 10 月，人在大陆的吴桐潭怀疑，该盟顾问杨登魁因“流氓罪”被警方拘留，是白金汉三温暖宫老板以“秘密证人”的身份向警方检举的。为给这位老板一点教训，吴以行动电话隔海下令特攻队代队长“阿硷”徐文贤率成员，用柴油弹攻击台北市白金汉三温暖宫，并与警方发生枪战，轰动台北。警方展开追捕活动，“天道盟”的“特攻队”成员纷纷潜逃，其中多位偷渡大陆。10 日之后，徐文贤在台北延吉街五十巷住处被市刑警局逮捕。

1990 年，台湾又展开一次“迅雷扫黑”行动。警方认定“天道盟”是不法的黑道帮派组织，对罗福助、吴桐潭、杨登魁等“天道盟”重要成员进行全力打击。

然而，“迅雷扫黑”行动风声提前走漏，全省黑道重量级大哥纷纷避走海外。“天道盟”顾问杨登魁没来得及出走，被警方抓获，但后来又放了回来。盟主罗福助却逃离虎口。当时，警方四处打探他的行踪，却不知去向，一时间各种传说不断。有人讲罗福助在美国搞地下赌场；有人说他在澳门合法投资赌场；也有人讲他在香港、澳大利亚、新加坡等地进行投资，却没有一家得到证实。还一度传出罗福助在美国被捕，很快又被否定没这回事。罗福助去向一时成谜。

事实上，罗福助确实在海外多国走动，多数时间住在新加坡。然而他这一去，就在海外漂荡了两年时光。

就在罗福助在新加坡期间，一群流亡海外的黑道大哥聚集在罗的住处商议他们的未来出路，并达成共识：认为“政府”每次扫黑，都会找他们这些有“案底”的人开刀，这样下去，每扫必跑，也不是个办法，认为今后应该积极参加选举，借政治力量来保护自身的安全。

罗福助认为台北县新店市人口多，也是个大地方，许多有可能当选市民代表的人和他都有交情，若儿子能当市代会主席，政治地位不亚于台北县议员，因而希望在美国留学的儿子回台参选新店市民意代表。于是罗福助便打电话到美国，找在美国刚得到华盛顿大学企业管理硕士的长子罗明旭，要他尽快到新加坡，共商大事。

儿子到新加坡后，罗福助晓以大义，说服儿子回台北县新店市参选市民代表。

不久，儿子回台一试。不料，一战成功，罗明旭当选市民代表，随即又全票当选市代会主席。当然在他当选的背后有父亲的强大后盾支持。罗福助人在海外，居然能遥控儿子参选，实在让外人看不懂，却展现了罗福助强大的经济实力、广泛的群众基础与不同一般的政治眼光。

当国民党上层有关人士了解罗福助的能耐与实力之后，认为罗福助可以为其利用，同意为罗福助平反，不久“警备总司令部”也撤销了对他的追捕。得知这个消息后，罗福助回台投案，争取主动。台北警方取消罗的“黑道流氓”指控，仅以“偷渡出境”违反“国安法”判刑4个月。罗福助缴罚金获释，结束流亡生涯。

谁会想到，一个彰化田尾的农家子弟，一个曾在逃的黑帮老大，如今竟是台湾“立法院”“立法委员”，拥有通过法律的投票否决权。

当年罗福助出狱后，正遇上台北开放报禁，他便极力介入媒体事业，申请创办《公论报》，问政之心昭然若揭。在“天道盟”领导层的聚会中，开始讨论问政路线。他们首先推出自己的人马参加公职选举，这样既可漂白身份，从一介黑道变为政治人物，又可利用在政界的影响力取得公共工程承包投标的建筑权，甚至在议会还可拥有监督警察局预算等大权，使得警方不敢随便找你麻烦。

罗福助长子罗明旭在当选新店市民意代表、代表会主席后，1994年底又获国民党提名，在台北县参选省议员，宋楚瑜、邱创焕等党政要员出面公开为他宣传造势，鼓励民众投票给罗明旭。结果，凭着父亲罗福助在地方上的巨大影响力、国民党高层的大力支持，罗明旭得到12万张选票，不仅成为省议员中最年轻的议员，也创下国民党候选人中的最高票。与此同时，罗福助的次子罗明才也在23岁当选“国民代表大会”代表。不久，罗福助又要罗明才竞选国民党中央委员，也一举成功，成为国民党内最年轻的中央委员。

两个儿子在政坛平步青云，让罗福助感到十分安慰。他讲自己年轻时误入江湖，不想儿子再步后尘，也从不强迫儿子走什么

路。但两个儿子努力上进，获民众支持。

在1995年底的“立法委员”选举中，罗福助也亲自出来参选。这位黑道老大在台北县选区竟然击败众多国民党与民进党知名政治人物当选新的“立法委员”，在台湾引起极大的震撼，在社会上也引起许多争议，因为他毕竟是位黑道老大。

罗福助在回答记者采访时讲：“别人凭什么说我们是黑道？你说什么是黑道？是皮肤比较黑，还是坐过牢就是黑道？其实这个世界并没有黑白之分，只有好人跟坏人之分，但黑道并不一定等于坏人。”这就是罗福助对自己的诠释。

如今，罗家一父两子，均成为地方与“中央”的民意代表，成为瞩目的新兴政治家族。现在罗福助住在台北市光复南路的一栋大楼里，身边有人高马大的博士级保镖与助理随时在旁保驾。

罗福助跨入政坛，更使“天道盟”声望倍增，对其他黑社会帮派组织产生强大吸引力。据传，“三环帮”、“松联帮”、“黄埔帮”，甚至“四海帮”与“竹联帮”的部分重要成员加入“天道盟”。“天道盟”已不再是本省角头的结盟，而成为本省与外省帮派的大联合。道上兄弟对罗福助的称呼不再是“盟主”，而是“罗董”。因为罗福助不仅是“立法委员”，而且是多家企业的董事长与大老板。他在台湾有庞大的地产业，也从事贸易生意，更有遍布世界各地的赌场。他的赌场总管家就是冯立罡。冯讲：“在澳门他（指福助）有三个赌场，金域假日酒店内的赌台是他与香港的向氏兄弟合股的；韩国的华克山庄赌场，他也做代理；在越南，大哥拥有一个码头；美国的拉斯韦加斯的大酒店 MIRAGE，也曾派出执行副总裁亲自邀大哥替他们代管赌场。”

现在，罗福助经营的事业很广，包括了房地产、期货、酒店、理容院、航运等，公司也遍及台湾、澳门、新加坡、澳大利亚、美国等地。罗福助也因此于1995年获英国雪乐大学颁授的荣誉商学博士及菲律宾基督教大学颁发的“亚洲杰出企业家奖”。

罗福助在接受一名记者访问时表示："我们不偷、不抢、不搞毒、不做伤天害理的事，为何不能光明正大地站出来？凭天道盟目前在政经界的关系与实力，未来数年绝对可以发展成为跨国大企业。"可见，罗福助雄心壮志不减。

"立法委员"有着法律上的"特权"，未经"立法院会"同意，享有不得"逮捕"与"拘禁权"，投靠他的人更多了，可以得到更多的安全感。特别是在台湾这个黑白两道交织在一起的社会，许多人就是相信黑道的力量。如今，集"黑道"老大与"立法委员"于一身的罗福助，在"立法院"更显得耀眼，在社会上更是势力大增。一般"立法委员"能做的事，他能做；其他"立法委员"摆不平的事，他照样有能力处理，因为他是"天道盟"盟主，在江湖上有不同一般的势力。

1995年12月，台湾地区营造业公会理事长进行改选，两派人马竞争十分激烈，不仅动员政商界要人，还纷纷引入黑道势力。

已掌握营造公会达12年之久的杨天生，是台中地区长亿集团大老板，再次推出台北县的现任常务理事张庆忠出马竞选下届营造业公会理事长。人们以为有杨天生的支持，张庆忠一定稳居宝座。不料，台北市工信工程董事长潘俊荣强势介入，形势变得十分复杂，各自动员黑白两道的力量来为自己加码。杨天生派的候选人张庆忠组织了一个强大的助选阵营，不仅有政界要人，商界闻人，更有黑道名人。其"竞选本部"的顾问名单依次为：罗福助、杨天生、杨登魁、张省吾、李照雄；主任委员是"国大代表"陈川，副主任委员则是现任理事长李有福；执行秘书依序是周承融、吴桐潭、施春成；总干事为梁英凡，另外还有38名委员。在这分名单中，"天道盟"、"竹联帮"的黑社会老大与"纵贯线"、台北、台中等地的黑道人物都有。这不能不令人佩服杨天生这位商界老板的巨大能耐，也反映出台湾黑道力量的强大。

“天道盟”大哥杨登魁已是商界名流。他曾负责经营罗福助自办的《公论报》，后因黑道持枪前来报社闹事而停刊。此后，他进入影视界发展，成立了巨登影视公司与新锋影业公司等，专门经营影视业，被称为“娱乐界教父”。旗下签约的明星包括了李连杰、林青霞、王祖贤、金素梅等人。

在台湾影视界争夺有线电视市场中，杨登魁与张荣华、邱复生等影视业大亨联合对付台湾十大集团之一和信集团，足见其实力小。由于杨登魁的公司进行赌博活动，受到警方的调查，进而被通缉。1999年初，在度过一段流亡岁月后，杨登魁返台自首，随后保释。

罗福助曾是黑道人物，现是无党籍“立法委员”，但与执政的国民党与在野的民进党都有着深厚的关系。当年他在坐牢时，党外“立法委员”、日后的民进党重要领导人物尤清前来对罗表示慰问与对此事关切。在狱中，他还认识了党外人士、后来的民进党中坚分子黄天福、郑楠榕（大陆籍台独分子，后因拒捕自焚身亡）等人。现在，他又以无党籍身份大力支持国民党，成为国民党的一个盟友。在1994年台湾进行的省长大选中，他不支持民进党，也不支持新党，却大力支持国民党候选人宋楚瑜。他在“立法院”发言，也是为国民党讲话，表现得比国民党还国民党。罗投之以桃，国民党报之以李。在国民党的大力支持下，罗福助成为“立法委”许多人梦寐以求的“交通委员会”召集委员。

1996年2月，罗福助在“立法院”因“二月政改”与民进党的矛盾加深。2月28日，民进党中常会发表谴责黑道介入政治的声明时，邱义仁曾以民进党的发言人身份点名少数无党籍“立法委员”是民进党推动“二月改革”失败的阻力，将矛头直指罗福助。次日便有自称“立法院无党籍办公室”主任杨姓男子率四名彪形大汉前来找邱义仁沟通，但双方谈得并不愉快。据

说，当时杨姓男子见到邱义仁后便怒气冲冲地说："我们不是黑道，我们如果是黑道，你们这里早就被放炸弹了。"临走时还表示希望邱义仁能主动澄清前一天的说法："如果不澄清，有人必须负责，你敢负责吗?"

3月2日上午，民进党秘书长邱义仁在前往中央党部上班时，在办公大楼门口的人行道上，遭四名不明身份的人袭击殴打成伤，立即在社会上引起极大反响。

第二天，民进党文宣部主任陈文茜指出："无党籍立法委员罗福助曾利用黑道背景协助国民党阻挠民进党的二月政改，民进党近日将发起反黑大游行，反对的目标将是罗福助及无党籍立委办公室。"民进党主席施明德表示，邱义仁遭攻击毫无疑问是政治问题，是对民进党的挑战，民进党绝不会畏惧黑道力量，绝不坐视黑道如此破坏民主政治，更不会容忍李登辉纵容黑道介入政治。

对于民进党的指责，无党籍"立法委员"罗福助表示，在真相未弄明之前，便有人直指此事是他所为，已损及个人名誉，他保留法律追诉权。罗身边的人也讲，罗董事长绝不会做这样的事。罗福助还讲，如果说他是黑道，他只是小黑道，当年在监狱被关得更久的民进党主席施明德才是大黑道。这就是黑道逻辑!

1996年8月23日，多位在野党"立法委员"与曾遭受黑道暴力威胁的民意代表，成立"反黑金、反暴力联盟"，呼吁罗福助公开宣布退出或解散"天道盟"，与黑道彻底划清界线。这不过是异想天开而已。如果宣布解散"天道盟"，就等于宣告罗福助政治生命的完结，他怎会如此做?于是罗福助办公室人员表示，罗委员也反对暴力，而他自己也从没说过他是"天道盟"盟主，没有资格宣布解散"天道盟"。可以肯定地说，"天道盟"不但不会解散，还会发展、壮大。据1996年8月最新报道，目前"天道盟"有"济公会"、"孔雀会"、"太阳会"、"鸭霸会"、"同

心会”、“太极会”、“文山会”、“大安会”、“松山会”等40多个会，成员复杂，吸收了“竹联帮”、“四海帮”、“松联帮”、“文山帮”、“飞鹰帮”、“三环帮”等外省帮的成员，分支机构已遍布全省。

为吞并外省黑道帮派，“天道盟”曾一度向各地外省帮派发出“加盟邀请”，表示凡是愿加入“天道盟”者，均可获得3000万的“发展基金”，试图“一统江湖”。

第七章

黑道教父陈启礼的江湖人生

台湾黑道帮派成百上千，黑道人物数以万计，在黑道上叱咤风云的黑道老大也不知其数。但40多年来，在台湾黑道上具有崇高地位与影响、持续最久、至今仍在世的唯有“竹联帮”的老大陈启礼。

陈启礼祖籍江苏太仓，出生于四川省广安县。父亲陈钟曾任职于四川省的国民政府机关，是位普通公务员。1949年，只有7岁的陈启礼，跟着父母随国民党的百万大军跨海来到台湾。

到台湾后，父亲在台北法院任职，当一名法院推事，后来转任台湾《联合报》人事室主任。母亲肖玮曾在财务法庭担任书记官。

陈父谨守中国旧文人的礼教规范，希望这唯一的儿子成为光宗耀祖的人上人。陈钟熟读古书，爱好书法绘画，喜欢吹拉弹唱，颇有才气，希望把自己的一身技艺全部传授给儿子，于是从小对爱子启礼教育严格，琴棋书画无所不教，还对其进行意志磨练，让儿子10岁时起每天清晨4时起床，进行晨练。

过度的苛求，效果却常常适得其反。陈启礼把在家中受到的压抑带到学校，常与同学打架。特别是初到台湾，当地话听不懂，外省子弟与本省学生打架、冲突更是常事。陈启礼个子虽不高，却练就了一副好身体，加上他的机智，打架很一有套，每每冲锋在前，却很少吃亏，很快就在学校中出了名，更成为外省子

弟的孩子王。但因常有学生到老师面前告状，陈启礼因此成为“问题学生”，不断遭老师与学校的训斥与批评，久而久之，形成陈启礼的叛逆心理，不爱严父的家，也不爱受老师指责的学校。

14岁那年，陈启礼在强恕中学，遇到了一件改变他整个人生态度的事。一天，他的手表和钢笔在回家的路上让一个大他几岁的街上少年抢走了。他先是找了父亲，后又找到学校的教师与校长，希望把自己的东西要回来，但学校与家庭在解决这一简单的事情上却显得无能为力，竟对抢他东西的人无可奈何，被抢的东西也索之不得。这让陈启礼大失所望，从中得出了一条不是来自家长和老师的一个道理：原来整天教育自己的家庭与学校是如此无能，并不能替他解决什么问题，朋友和拳头才能在困难面前显示出真正的力量。

陈启礼的父亲后来谈及此事，不无感慨地说：“当时，我看到他那失望的眼光就明白了，这孩子以后在外再遇到什么事，都不会来告诉我了。”

陈启礼很快就和结帮拉伙的朋友混得很熟。当时的台北已有以中学生为主体的少年帮派。据统计，1949年，就有“小九龙帮”、“十二把刀帮”等不良少年帮派；1950年初已有了较大发展，如“十三太保帮”、“海盗帮”、“龙凤帮”、“中和帮”等，自订帮规，互拥首领，盘据一方。陈启礼很快就加入“中和帮”，开始混迹江湖。这在当时的台湾并不算什么新鲜事，而是很流行，不少青少年学生还为自己能加入帮派而自豪。

为了逃避家里的管教与监督，他每天虽也背着书包去学校，但报个到，就找一帮朋友聚会弄事。放学后，又背着书包回家。后来被父亲发现了，就与学校商议好，要儿子每天携带一本联络簿，由老师在上面签字，以便了解其上下课时间。可是坚持了没多久，陈启礼还是常与帮派朋友一起混，结果遭到父亲一顿毒打。没想到，他出走了，在街上的一座桥下度过了第一个夜晚，

又一次改变了他的人生态度。他后来回忆说，他最恨人家说他是因为家教不严才误入歧途，相反是因为老子管教太严、要求太高，才使他走上黑道。

由于逃学、打架，陈启礼两度受到退学和开除的处分。

1956年，“中和帮”兄弟在永和镇竹林结盟，成立“竹联帮”，陈启礼也同时加入，并归属“鸭堂”。可见陈是“竹联帮”老大之一。但在当时，他还是个少年，在帮中没有什么地位。

陈启礼在帮中的绰号为“旱鸭子”。其来历有两种说法：一说是当年的兄弟聚会时常到河里戏水，唯独陈启礼不会游泳，只能坐在岸边观看，大家便叫他“旱鸭子”。二说是美国当年军援台湾时有一批两栖坦克，被人们称为“铁鸭子”，而陈启礼一不会水，二属“鸭堂”，打起架来又非常勇猛，而称他为“旱鸭子”。

加入“竹联帮”不久，陈启礼在强恕中学呆不下去了，父亲便把他转入南强中学，企图把他与那些帮派不良少年分开。但为时已晚，陈启礼在帮派中已磨练成长，在南强中学读书时，便与“青蛇”邓国沣等人组织了“南强联帮”，成为“竹联帮”的一个重要分支机构，陈启礼也因此成为帮派中的小头目。父亲对陈启礼的“意志训练”未在“光宗耀祖”上成名，却在帮派争斗中屡屡建功。一次，陈启礼与“三环帮”的一位老大因小事发生争执，进而大打出手，但年轻气盛的陈启礼还不是这位老大的对手，被砍伤左臂。陈启礼心中当然不服，一边吊着纱布绷带养伤，一边心想和同伙们寻仇。陈父深知儿子有仇必报的不服输性格，会闹出人命大事，自己又不敢再给儿子来硬的，只好找到“三环帮”那位老大的家里，向其父亲说明利害，让其带着儿子给陈启礼当面赔个不是，不然事情会闹大的。还好，对方看到这位老父亲的诚意，便来到陈家当面向陈启礼道歉，陈启礼也看在父亲的面子上，表示不再报仇，一场恩怨就此化解。

但这并没有改变陈启礼闯荡江湖的人生路。陈父对儿子已失望到极点，却又无可奈何，只好使出最后一招，把儿子送到台北市警察局“特别保护室”，试图做最后的挽救工作。这对一个曾对儿子充满希望的父亲来说是多么的残酷与不公平。

陈启礼在铁窗独处的日子里，他不能谅解父亲，可父亲每天下班之后便来陪他，教他读《古文观止》，诵《四书五经》，希望儿子从中得到启迪，打开一扇心灵的窗户。但这一切都是徒劳的。已在江湖上混惯了的陈启礼，当然不会把这些腐儒之论放在心上，他自有自己的人生哲学。

1960年，陈启礼大学没考上，却进了当时的淡江文学院五年制专科学校，即现在淡江大学的前身，学习测量专业。在学习上不求上进，整天与黑道兄弟打交道的他居然能考上这个私立专科学校，就足以说明陈启礼天赋不低，是个聪明人。

在这里，陈启礼结识了也在同一学校的张安乐。后来，张安乐也加入了“竹联帮”，与陈启礼成为至交。

这一时期，陈启礼在学习之余，把全部精力投入发展“竹联帮”的事业。1962年，在接收被迫解散的“四海帮”地盘的一场恶战中，他率领一批兄弟击败其他帮派，为“竹联帮”扩充地盘和壮大力量立下汗马功劳，从而奠定了他在帮内的地位和威望，成为“竹联帮”中最重要的头面人物之一。

1967年，陈启礼以其有勇有谋、智勇兼备而成为“竹联帮”的老大。就在这时候，他结识了一位对他后来事业发展很有利的重要人物陈惠文。

陈惠文早年混迹于大上海的十里洋场，当过青帮的小头目，是杜月笙的再传弟子。逃台后，他昔日作风不改，在台北闹市区西门町落脚，广结三教九流，一度拥有三百多名弟子，并想借机恢复青帮组织。他手下控制着西门町一带的碧玉天歌厅、南阳歌厅、丽宫咖啡室等，他还一度出任台北市理发公会会长与红楼剧

场经理，是台湾早期推动帮派组织化、专业化的代表人物。后来，他结识了陈启礼等“竹联帮”的不少头面人物。1966年，他还曾试图吸收“竹联帮”兄弟为青帮弟子，但未成功，而他在黑道的声望与招摇过市，引起警方注意，后来被抓管训。

陈启礼结识陈惠文后，大开眼界，从他那里听到不少杜月笙的黑道轶事，也学到了不少黑道发展、壮大的经验，尤其是用暴力控制娱乐场所的知识，并亲自在“竹联帮”试行，大获成功。他将自己的手下干将以“业务经理”、“场务经理”等身份派到歌舞厅、夜总会、酒店等公共娱乐场所当幕后保镖，从中名正言顺地收取保护费。

当时台北中山区与西门町的酒吧、酒廊、舞厅等具色情业的商业兴隆。“竹联帮”占据了商业黄金地段，以华侨舞厅为活动据点，并控制了大部分舞女，她们便成为“竹联帮”的滚滚财源之一。

这些舞女也不乏品貌姣好的小姐，陈启礼就是在这里结识了一位艺名“曼娜”的舞女，俩人一度相好。“曼娜”不像其他舞女，她曾上过专科学校，具有良好的修养，只是因为父亲早年病逝，为了家里的生活才不得不下海的。陈启礼就是为她的才气与美貌所打动的，从此陷入了一段难舍难分的情恋。但陈启礼毕竟是道上人物，不可能与“曼娜”小姐长相厮守，随着时光的流逝，俩人的恋情也告结束。

陈启礼既不愿做女人的俘虏，也绝不会做“无名英雄”，昔日上海叱咤风云的杜月笙成为他心中的偶像，他抱着出人头地的个人野心，混迹江湖。他曾多次对人讲：“我最崇拜的人就是杜月笙”。能像杜月笙那样“青史留名”，又“报效党国”，是多么的自豪。他的哲学就是“雄心未竟即是野心，野心已达便为雄心”。

要实现这样的人生目标，在黑道上，仅心狠手辣、翻脸无情

不行，还必须有头脑，善于思考。而父亲早年对他的史书熏陶，琴棋书画与“礼仪”的训练，对他帮助不小，加上他的天生聪颖，使他日后成为黑道教父的基础。

人们看到的陈启礼，并非是张狂浮夸之辈，而是谦恭沉默，举止斯文，彬彬有礼。在帮内，他不仅以点子多而闻名，而且对手下出手大方，赏罚明确，深得人心。

到了60年代末，复活了的“四海帮”联合“三环帮”、“文山帮”等帮派起而反抗，企图改变“竹联帮”独霸江湖的局面。“竹联帮”虽然捷报频传，但“杀人一千，自伤八百”，本身也因力量的不断耗损而陷于困境。

为摆脱这种极为不利的局面，陈启礼决定广开财路，壮大经济力量，再谋求优良的武器装备，为振兴“竹联帮”打下坚实基础。他先与一名警界的退休何姓警官联系，通过他认识了在中山区开餐厅的陆先生。陆先生经商多年，却一直受到“牛埔帮”的欺榨，便在陈启礼的力邀下投入“竹联帮”，为“竹联帮”提供经济援助，并购买枪支弹药。

“牛埔帮”对“竹联帮”的所作所为大为不满，双方终于于1970年在七七餐厅爆发械斗，展开厮杀。“竹联帮”亮出四支手枪和一支卡宾枪，“牛埔帮”则以土制炸弹进行还击，成为黑社会帮派进入热兵器交战时代的标志。

陈启礼就是这次战斗中“竹联帮”的总指挥。通过这一战，陈启礼深深体会到，在现代工商业高度发展的台湾，要发展有实力的黑社会帮派组织，必须走全面现代化的道路，原始的黑道手段已不能适应时代的需要，现在不仅要有现代化的武器装备，还必须有现代化的组织分工与管理。他竭力试图把“竹联帮”发展成为一个近似美国小说《教父》中的黑手党。

陈启礼便兵开三路：先是改革帮务，重组“竹联帮”，建立“按理性原则行事”而非用义气行事的帮规；其次是开设赌场，

建立企业，以充实经济实力；三是向昔日冤家伸出和解之手，准备筹组“四海帮”、“文山帮”、“三环帮”、“牛埔帮”与“竹联帮”等五大帮派的“兄弟联盟”，以实现共存共荣。这一举动，在黑道帮派引起强烈反响，一时间，陈启礼重义气、讲道理、主持公道的声名在黑道传开，在黑道地位日渐上升，成了台湾黑道上名副其实的第一人。

就在陈启礼春风得意、踌躇满志、大展身手之时，一件意外的事件使他身陷囹圄。

1970 年 7 月，因“竹联帮”的陈仁携款叛帮，陈启礼动用帮规，派人将其杀成重伤，因抢救及时免于一死。于是陈仁将案发经过与“竹联帮”不少内幕和盘向警方托出，以陈启礼为首的“竹联帮”核心骨干及酒店合股人何姓、陆姓两位老板等先后被警方抓走，“竹联帮”元气大伤。

1970 年 10 月，陈启礼被提起公诉，被判刑 3 年。

也许是祸不单行，就在他刚服刑完毕时，恰逢台湾当局订定“防治青少年参加不良组织方案”，于 1973 年第一次办理“帮会自动解散登记”，于是陈启礼再度被捕，又判 2 年刑期，被送往专门管训政治死囚和甲级流氓的绿岛（即火烧岛）服刑。

绿岛是个风光秀丽的孤岛，是雅美族人的祖居地。绿岛面积只有 15 平方公里，人口不足 5000 人，曾因人谱了一首“绿岛小夜曲”而闻名于世。这里四面环海，交通不便，所以国民党早就在这里修建了一座座监狱。置犯人于此，即使逃出监狱，也难逃岛外。这就使绿岛蒙上一层更神秘的色彩。这里也曾发生过多次犯人的暴动、纵火事件。

陈启礼被囚于此，受尽了人间折磨。每当他酒后谈起这一段往事，仍是唏嘘不已，泪洒衣襟。除了最残酷的各种刑罚外，他还被逼吞吃自己的大便，甚至惨遭剥皮之苦。台湾狱政的黑暗更加扭曲了陈启礼本来就已变形的灵魂，更加坚定了他反社会的决

心。

几年的囚徒生活，也使陈启礼有了一个相对平静的环境。他苦读老父寄来的古文史书，反思黑道生涯的点点滴滴，并与历史人物的成败得失相印证，他也从中琢磨出一套自认为是千锤百炼的人生哲理：无论是在黑社会，还是台湾的现实社会，弱肉强食，成王败寇乃天经地义。

尚在狱中，他就迫不及待地要检验他的这套哲学的真谛。一天，陈启礼利用出庭的机会，把乘同一辆囚车的一位流氓的嘴堵住，狠狠地揍了他一顿。回到狱中后，他又让人大肆造谣，说那家伙如何如何下跪求饶，如何丑态百出。但有人不相信这个平时骄横霸道而又死硬的流氓头子会如此就范。当晚，陈启礼和几个同伙在那家伙两边睡下，乘夜深人静故作抽泣之声，再以耳语向其他囚犯放风说那小子做梦都在哭泣求饶呢！果然，此事第二天就在狱中传开，一个曾在黑社会中颇有影响人物的“英名”就此完结。

陈启礼在犯人中的地位却不断上升，成为监狱犯人的小头头。他也不忘显示他的组织领导能力。他把车间劳动的犯人按各人的体能与工作经验分成不同的小组，采用分工协作、承包形式完成所分配的工作任务，成绩突出。几乎每次监狱评比，陈启礼所带的职训班所做的出口用纸花都超额完成任务，且名列前茅。这就是陈启礼，在黑道是领袖，在狱中也一样是犯人的头头，干什么都希望能出人头地。

5年的牢狱生活，虽然改变了他那锋芒毕露的外观，却没有磨去他那桀傲不驯的棱角。他将锋芒悄悄地敛起，把仇恨和抱负深深藏在心底。

在那漫长的多少个日日夜夜里，陈启礼透过铁窗望着蔚蓝的海水，心中涌起道道波澜：不能就此沉沦，而要东山再起！

时光如流，日历已翻到1976年的春天。

在台北市辛亥路四段的一栋小楼前，出现了一个脸色苍白、头发稀少的男子，但却掩饰不住他那深邃的目光。面对白发染霜的双亲、木然若呆的孩子，他显得十分茫然与内疚。

两个小女儿望着身前这位看上去30多岁的陌生汉子竟不知所措，当她们的母亲哭着扑上去后，方知面前的就是铁窗相隔五年的父亲陈启礼。

陈启礼搂着哭泣的妻子、望着衰老的双亲、听着女儿呼叫“爸爸”的声音，内心的伤感与痛楚非一般人所能理解。

他的妻子名叫齐淮莉，是一个身材匀称、面貌娇好的女子，曾因参加菲律宾选美大赛而名噪一时。

此时的陈启礼似乎下定决心，要脱离那终日寻仇斗殴、凶险丛生的江湖生涯，而要靠自己的双手，开创一条新的生活道路。当昔日的一位竹林兄弟送来开办赌场、希望他改善生活的几百万资金时，他断然地拒绝了，他要去做自己力所能及、靠劳动吃饭的工作。

也许这只是他蛰伏的一个手段，也许这真是他未泯灭人性的一次复苏。为了改变外人对他的不良印象，他跑到一个建筑工地当油漆工，做监工，找人当小广告代理商。他带领一伙兄弟卖苦力、流大汗，吃住在工地。

一段时日的勤劳工作与努力，家里的日子渐渐好过了，他便开始经商，先后经营过小电子工厂、不锈钢管厂及从事重型机械进出口贸易业务等，但都不很成功，虽没亏本，也没赚多少钱。直到他接手一家经营消防及水电设备的安装消防公司后，才从根本上改变了自己的经济状况。

陈启礼不愧是一个有心计的人，想不到一个曾不爱读书、后又混迹黑社会的头面人物，今天为了跟上日新月异的现代工商社会的发展步伐，在辛苦工作之余，他还抽时间自修各种现代科学

知识，短短3年多时间，自修完了他早年半途而废的学业，并获得东吴大学土木工程系的大学学历。

进入商界后，陈启礼还开始自修现代工商管理与财政金融等科目，并努力使所学用到自己的经营实践中去，自己不仅靠资本赚钱，也能用知识增加财富。

加上他多年在黑社会的关系与聪明的头脑，没有几年，他就建立了6家工厂与建筑公司，一跃成为商场大亨。

到了1984年，他已是承安水电工程公司的常务董事、台北市消防公会常务董事，更几乎控制了台北市一半的水电消防工程。他的名字已上了《台湾工商企业名人录》，并获得英国伦敦公布的“世界对社会公益事业卓有贡献者”的称号。

陈启礼也懂得经商离不开官场的权势与支持。逢年过节，他还给一些政府官僚上贡，给警察老爷送礼。不像过去那样，直来来去，不低头；现在他能伸能屈，即使别人欠下公司几百万元的账也不去追讨。

陈启礼真正切身感到白道权势的重要性是在1979年。那年一个偶然的机会，他认识了一个姓杨的朋友。杨先生告诉他，如果肯拿出300万元行贿送礼，就可以承包到公营事业的工程项目，其利润十分优厚。这些工程几乎全为国民党权贵子弟及亲信所垄断。

经过反复思量，陈启礼决定孤注一掷，拿出所有存款，凑够300万元，送给负责工程发包的某高官。他果然从工程承包中大发一笔，他更深深地认识到权势的力量，为他后来与国民党权贵勾结埋下了伏笔。

这时候，腰缠万贯的陈启礼已对仅拥有金钱感到不满足，他还要做一个有“名位”的人。他深知，要提高自己的社会地位和知名度，一个重要手段就是掌握“舆论”，于是他开始向文化圈

进军，办报纸，创刊物。他先是接手日渐亏损的《华美日报》，但未能扭转局面，没能达到预期效果，便与余祥生另辟疆域，共同创办了图文并茂的《华美报道》杂志，由余祥生任社长，他在幕后当老板。

这位余祥生是台湾《民族晚报》董事长王永涛的女婿。王永涛浙江人氏，也是台湾政坛闻人，长期任“立法委员”，直到80年代中期改选前，与蒋经国的关系非同一般。余祥生也靠这层关系与蒋家“孝”字辈交往密切。余祥生后来创办了《华美日报》，自任社长。就在他的这家报纸因亏损经营不下去时，陈启礼伸出援手，两人开始在报刊新闻界合作，而余祥生因此获得“黑道新闻局长”的头衔。

名声固然重要，但也不能做赔钱的买卖，没有钱什么也就没有了，陈启礼当然明白这一点，他是不会干傻事的。只有将这份刊物办得畅销，既能使自己扬名，在文化界占有一席之地，也能赚钱。于是，他向采编人员宣称：“没有耸人听闻、轰动舆论的内容，绝对不允许出刊。”在他的一手策划下，《华美报道》创刊号果然“出手不凡”，红歌星上官明莉的全裸照片赫然出现在封面，里面的内容也十分丰富多彩，有血有肉有色。诸如“青蛙王子”高凌风（歌星）被枪击始末、“竹联帮”“青蛇”邓国沣在杏花阁酒家血案后如何潜逃海外而摇身一变成为华侨领袖人物的传闻，以及杜撰的党外领袖许信良在美国自杀内幕等等。一时间，《华美报道》身价大增，引起轰动，成为当时最畅销的刊物之一。

《华美报道》冲击波在同业界引起极大震动，有官方背景的《时报杂志》的销路大受影响，开始对《华美报道》进行反击，大加挞伐，还指控其与以报道工商财经问题为主的宗旨不符，结果遭到查禁，予以停刊半年的处分。

陈启礼并不以此受挫而气馁，反而以退为进，高招叠出，不仅挽回败局，更一举成名。一方面，他将原杂志“华美”两个字

前后掉换、以《美华报道》之名重新登记出刊，以留住原有读者；另一方面他又以杂志社董事长的身份公开亮相，频频接受记者访问，向社会大肆吹嘘创刊动机和刊登上官明莉全裸照片的始末。这样以来，他的杂志越炒越热，销路更畅。陈启礼自己的照片与权倾一时的国民党将军王升的照片一同出现在《在野者论坛》刊物的封面上。

陈启礼也是有仇必报。《美华报道》出版的第一期就以报复《中国时报》与《时报杂志》老板、国民党中常委余纪忠为目标，集中报道了余氏爱将王笃学兄弟的风流韵事，极尽嬉笑怒骂之能事。余纪忠这位老报人在遇事不服输的黑帮头子陈启礼面前也无可奈何，只好派人请陈启礼到酒店共饮，以和解了事。

陈启礼尝到甜头后，如法炮制，且花样翻新，在《美华报道》上办了个“大亨摘星点将录”专栏，专门刊登商场大亨、娱乐界明星的婚外情，逼得这些有名望地位的人不得不就范，以钱消灾，这就是典型的黑道敲诈勒索手法。

敛财成名之后，陈启礼又向“权势”方面进行试探，利用手中掌握的媒体舆论工具同国民党当局作交易。他黑道白道手段同时使用，左右逢源，从中得到好处。有时候，他的杂志在一些江湖秘闻中插入几篇“忠党爱国”之类的文章，宣扬国民党，讨好一下负责宣传工作的国民党“中央文工会”。但他的杂志也偶尔捧捧国民党方面不喜欢的人，像当时的党外人士江鹏坚、雷渝齐等国民党最头痛的人，他却大吹大捧，搞得国民党“中央文工会”颇为紧张，常常不得不与陈启礼私下沟通一番，让他手下留情，却也不敢对他轻举妄动。

《美华报道》最拿手的还是以报道黑道内幕消息著称。由于“竹联帮”是台湾黑社会最大的组织，帮员众多，与各地各帮黑社会有着复杂的联系，比警方与情报局还了解黑社会，从而可以向《美华报道》提供大量的黑社会内幕新闻，招徕广大读者。即

使警方也大叹不如，甚至将杂志上“江湖外传”的文章内容当作立案的参考。

陈启礼创办杂志，可以说是他人生的又一重大转折点。他给自己的黑道角色披上了一件“文化人”的外衣，并因此结识和控制了不少国民党官员与社会名流，也逐渐与国民党统治者上层挂上了钩。

创办刊物拉近了陈启礼与文化界的距离，也使他与名利双收的演艺圈建立了良好的关系。陈启礼通过“竹联帮”诸多在演艺界的兄弟或朋友而打入演艺圈。“竹联帮”第一代元老周榕曾组建了一家飞龙影业公司，“竹联帮”“大护法”吴敦一直是国民党“爱国导演”刘家昌的助手，在刘的一家影业公司任制片主任之职。陈启礼因此与刘家昌成为好友，还合办了一家欧帝威唱片公司。

陈启礼当年结束管训开始经商后，曾有脱离帮派之念，但似乎也不那么容易。昔日曾一起混过的兄弟朋友常来看他，一同叙旧。有时道上兄弟遇到问题，也常找陈启礼听他的意见。帮内发生冲突，也邀陈启礼出面调解、摆平。一些兄弟手头困难，他也拿钱周济。陈启礼因此赢得帮内、帮外兄弟的信服与尊重，力邀他再度出山，重掌“竹联帮”。

在陈启礼失去自由期间，帮里重要人物陈大伟、周榕等先后担任“竹联帮”的总舵主。陈、周两人资格虽老，但缺乏头领魅力与现代化头脑，“竹联帮”实力不但未能得到进一步发展，而且帮内还弄得四分五裂，所以这两位老大也有意请陈启礼重振“竹联帮”。

就在这时，一位有来头的权贵子弟（曾得到过陈启礼帮忙为他摆平了一起债务纠纷），通过一家营造商老板的儿子顾振家找到陈启礼，也希望他重掌“竹联帮”。

接着另一位权贵子弟也通过一名叫林嘉麒的人出面担任联络人，希望陈启礼利用帮派力量在菲律宾搞一个机构，保护他家在海外的产业。

与此同时，国民党中央党部的要员、情治部门的将军纷纷到陈启礼家中或公司拜访、邀请，向他晓以大义，要他“拿出良知为国家、社会做些有意义的事”，甚至主动提出提供四亿元的活动经费。

为何当局会出面要发展黑社会势力？有点让人不可思议。不过从国民党发展的历史上看，国民党与黑道的结合并不少见，蒋介石就曾拜会青帮头子。台湾国民党积极要陈启礼出面重组“竹联帮”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那就是1979年发生的“美丽岛事件”。

1979年12月10晚，以台湾《美丽岛》杂志社成员为主的一批反国民党的党外人士在高雄市强行组织群众集会，进行大规模的火炬游行，参加群众达2万多人，要求国民党当局取消戒严令，开放党禁、报禁等。“防暴”警察被迫前来镇压，引发大规模冲突，200多人受伤，事后有160多人被捕。这就是震惊中外的台湾“美丽岛事件”，影响深远，对国民党的专制统治造成极大冲击。

事后，台湾情报与警察部门发现，在这一事件中，在前冲锋陷阵的竟是南部地方黑社会流氓角头，他们已开始渗入地方选举与政治活动，成为南部地区不可忽视的一股社会势力。要控制、对付这股势力，最好的办法就是“以黑制黑”，在台湾全省最具影响力、能够制服的黑社会组织非“竹联帮”莫属，而有黑社会教父之称的陈启礼则是第一人选，国民党看准了这一点。

台湾黑社会组织或帮派成百上千，但最具组织性与全省性的要算“竹联帮”。特别是“竹联帮”成员大多是外省子弟，不乏高官显贵之子，均有“忠党爱国”思想。陈启礼有大学文凭，

在党、政、军、特和文化圈内均有同学、朋友和自家兄弟，更具“忠党爱国”思想，在黑社会的威望与能力无人能相比。这就是国民党内高层要陈启礼出山重振“竹联帮”、抑制地方帮派、做一些当局不适合公开做的事情的原由。

在兄弟们的要求与官方的利诱下，陈启礼终于复出，重掌“竹联帮”。陈启礼像许多黑道兄弟或老大一样，都曾有“金盆洗手”的努力，但最终还是脱离不了黑道圈，反而越陷越深。

1980年的一个晚上，在紧靠前台湾“总统”严家淦官邸的台北“自由之家”（国民党要员曾活动的地方），灯红酒绿，宾客如云。但这些宾客并非国民党高官，而是“竹联帮”的大小头目，总计400余人，正在召开帮务会议，举行陈启礼再度出任“竹联帮”总堂堂主的仪式。陈启礼在众望所归、无可推卸的情况下，正式复出。

陈启礼复出后，当即宣布“竹联帮”改革五条措施：（一）重订帮规，严明纪律；（二）重组堂口，大力吸收社会下层有意参加帮派的青少年，特别是中南部北上谋职“闯天下”的青少年；（三）成立“竹联帮突击队”，加强战斗力；（四）“竹联帮”的活动要逐步“公开化”，以合法掩盖非法；（五）加强与有官方背景人士的联系。同时陈启礼还采取了“化解其他势力，壮大自己力量，控制底层社会”的发展策略。

陈启礼重建“竹联帮”的消息在黑道传开后，引起不小的震动，不少黑道人物纷纷投靠“竹联帮”门下，象“三重天台帮”、“三环西门帮”及中坜、新竹一带小帮派陆续加盟“竹联帮”，特别是连许多不会讲国语的中南部地方角头也加入“竹联帮”。入帮的不良青少年猛增，在台北市招摇过市的“竹叶青”（少年“竹联帮”兄弟），一时间如过江之鲫。

陈启礼对其他帮派头领以礼相待，尽可能化干戈为玉帛，甚至不惜和有血仇的“四海帮”和解，以求共存共荣。他经营的

《美华报道》杂志社，社务委员就有“四海帮”老大蔡冠伦、“万华帮”老大关镇丰、“狮管巷帮”老大陈俊杰等人。黑道上的兄弟对陈启礼深不可测的城府与善于应变的手腕又敬又畏，遇到大的纠纷与赌场恩怨，都请陈启礼出面协调、摆平，又进一步树立了陈启礼在黑道的教父地位。

陈启礼不亏为黑道高手，利用自己建立的企业，把许多退役军人、情报人员聘请安插到“竹联帮”控制的企事业机构中，与官方、企业建立起共存共荣、相互利用的关系。陈启礼在商界、军界、政界的影响力日增。陈启礼与原在香港从事情报工作、后从台湾“警备总司令部”（简称“警总”）保安处上校组长一职退休的朱国良共同投资兴建了一家“名商俱乐部”，这就是“竹联帮”日后的总部（总堂）。“竹联帮”中不少兄弟是退伍军人或国民党党员。

《华美报道》杂志开业时，高官、富商、名人云集，仪式盛大隆重。当时的台湾“警备总司令部”副司令刘戈仓、台北市警察局长颜世锡等人前往祝贺，与陈启礼举杯交盏，祝酒庆贺，可见“竹联帮”地位已非昔日可比。

在陈启礼的领导下，“竹联帮”队伍迅速壮大，帮员从数千人扩增为数万人，堂口增至20多个，势力范围不仅扩展到全省，还实现了国际化，从香港、东南亚、日本到沙特阿拉伯、美国、南非等，都有“竹联帮”活动的足迹。

台北市的地下酒家、酒廊等行业一大半被“竹联帮”控制，一些拥有明星的歌厅、酒吧月月向“竹联帮”上贡。其旗下的几家期货公司，特别是专搞地下黄金期货卖买的公司更是生意兴隆，财源滚滚，为“竹联帮”提供了雄厚的资金。

陈启礼在黑白两道的地位更加巩固。他曾十分狂妄地讲：“竹联帮”的“名商俱乐部”就是“警总”的大本营。他常在自己豪华的办公室内，主持入帮仪式，处罚违纪叛帮分子，讨论企

业经营大事。他还专门主持了“天”、“尊”两堂的开堂仪式，将帮中元老级人物安置在这两个堂口，以示与其他堂口地位的不同。

陈启礼在黑道步步高升，在白道也是有名望的文化人、商人，可以说是个日理万机的大忙人，已很难有精力照顾妻子与子女。他的妻子齐淮莉也曾是个有文化的名人，受不了陈启礼终日忙于帮务，外又有小姐相陪，终于与陈离婚，带着两个女儿到美国定居，给陈启礼留下一个小男孩在身边。如今这两个女儿已长大成人。

婚姻的破裂，并未给陈启礼造成太大的打击。很快他就结识了一位名叫陈怡帆的小姐，比陈启礼小 8 岁，是个性格外向的女人。但陈小姐家父母并不十分满意这个未婚女婿。可陈启礼很有耐心，每天上班前都要到她家为其烧牛奶；下班后，不管刮风下雨，都要到她家检查门窗，还经常送厚礼给未来的岳父岳母。陈启礼不仅获得姑娘的青睐，也得到陈家父母的好感，夸他是个“有责任心的人”，不久便与陈怡帆小姐走上红地毯。

陈怡帆对陈启礼非常体贴，对陈前妻所生小男孩视若己出。

陈怡帆小姐对丈夫在“事业”上的蒸蒸日上很感满意。她曾得意地对一位朋友讲：在没有结婚以前，有一个算命先生坚持说她将来会嫁给一个“王”。当时她想，现在都什么时代了，哪里还有什么“王”。婚后有时想想那个算命先生的话也算灵验，在台湾的黑社会中，陈启礼还果真有点“王”的风范。

就在陈启礼这个“地下王”如日中天之时，在台湾情报局的策划下，开始了一场震惊中外的谋杀行动。

陈启礼在台湾情报局的指使下，于 1984 年策划谋杀了美国知名华人作家江南，因此被捕入狱。入狱后，陈怡帆常来探监。陈怡帆还担任了《美华报道》的财务经理，不久又升为副社长，不断在刊物上发表文章，为陈启礼坐牢叫屈。直至今日，陈怡帆

仍在《美华报道》杂志社担任要职。

在度过了六年半的牢狱生涯后，陈启礼于1990年出狱。

1991年2月，好友董桂森在美国狱中被人暗杀之后不久，陈启礼皈依佛门。

近两年，陈启礼逐渐将帮务交给“么么”黄少岑等大哥处理，专心从事自己的经营事业。

他的承安公司虽不出名，却是一个了不起的企业，专做消防器材生意，客户相当多，连公营的台湾电力公司也是他的客户。台湾许多大型公共工程如台北市捷运系统、台南市地下街商店、高速公路等，都有陈氏参与承包或转包。台湾势力庞大的国泰集团的蔡辰男、台湾电视公司的前董事长陈重光也是他的生意伙伴与好友。他的事业触角也延伸到海峡对岸的大陆，在湖南长沙投资兴建月亮岛休闲事业。他曾说：“我希望我的事业成为台湾独一无二的事业体。”足见其雄心壮志未老。

陈启礼深居简出，过着较为简单的生活，较少过问帮务，但他的影响力无远弗届，仍是“竹联帮”的幕后教父。

1996年9月，在社会各界反黑浪潮下，台湾当局展开历史上第二次大规模扫黑行动，抓获不少黑道大哥，而陈启礼则像其他黑道老大一样又远走天涯。1997年11月，为平息因白晓燕绑架撕票案而引起的社会动荡与压力，有力打击黑社会犯罪，台湾当局再次发出通缉包括陈启礼在内的一批黑社会老大的通缉令。陈启礼从此出走柬埔寨，又过起了他的流亡生活。

2000年7月初，与柬埔寨上层关系极为密切、友好的陈启礼，被柬警方以非法拥有枪械逮捕，再度引起岛内外关注。陈启礼被捕的直接原因是他在日前接受台湾电视记者采访时公开展示其拥有的枪械，并公开指责柬埔寨治安不好，引起柬官方不满。而其背后的原因更为复杂，据说可能与台湾其他黑道及华人势力的利益纠葛有关。陈启礼可能因此而面临新的牢狱之灾。

第八章

“硕士级”黑道大哥“白狼”张安乐

“白狼”张安乐因在“江南命案”中大力营救陈启礼而声名大噪。但他在美国的活动却因此引起美国警方的注意。

1985年6月3日下午5时半。

美国洛杉矶蒙特利公园市。街上的行人渐渐稀少。

一辆福特轿车停在距昌黎贸易公司不到20米处。

3名男子走出车，来到这家公司。一位颇有姿色的女子带个小孩坐在屋内。

“张天翔在不在?”一位大汉问。

“不在。”这位女人回答。

“什么时候回来?”

“不知道。”

“这家人头公司是不是你与他合伙搞的？请看这就是你公司欠下的账单，若不讲出张老板在哪里，老大就要你好看!”一位男子将一大堆账单让妇人看。

这位女子看情况不对，大喊“救命”。3名男子迅速把这位夫人带上车抓走，拉到洛杉矶一家旅馆，进行盘问。

这位女子急中生智，突问：“你们认不认识‘白狼’?”

这句话让三位大汉大吃一惊，同时发问：“你认识‘白狼’?”

这个女人点了点头。

为首的大汉拿起桌上的电话，拨通了“白狼”张安乐：“‘白狼’，你认不认识一个叫王菊涛的女人？”

“认识，有什么事吗？”

这位大汉讲明情况后，“白狼”告诉他：“不管怎样，你们不能伤害她，不能押她，这件事我会给你们一个交待。”

“‘白狼’，你确定王菊涛和张天翔没有任何牵连？”

“我以人格保证，这件事的后果，由我一个人来承担。”

于是这个叫王菊涛的女人在这家旅馆被押近两个小时后，被这几位讨债人释放。

如果是朋友间的一场误会，此事就应到此为止，但王菊涛还是向蒙特利公园市警察局报了案。因涉及“江南命案”而声名大噪的“白狼”，再次震动了美国华人与台湾全岛。

张天翔在美国开了一家人头公司，1994 年 11 月回到台湾，摆出一幅大买主的架势，并以自己是前台湾税务局官员张锦荣的儿子，在台采购大量物品准备外销美国，货款便开他老爸的支票，保证万无一失。结果数月之内，他就采购了大批五金、杂货等，开出台北市银行的远期支票支付。

没想到，张天翔回到美国后，张锦荣的支票没有一张兑现。台北厂商不甘受骗，联络美国黑道友人，找张某要讨回这笔债务。

次日，也就是 6 月 4 日，“白狼”与抓王菊涛的 3 名男子之一的李建兴、另外一位朋友“大卫”在蒙特利公园市的四川饭店会面，

“白狼”当场打电话给张天翔：“张老板，我知道你的背景不错，你应该珍惜，好好做生意，不要玩那些见不得人的鬼把戏。”

“‘白狼’，我久仰你的大名，最近这一阵子你的确很风光，不过我做我的生意，你管得也太多了点吧！”

“张老板，做生意要老老实实，欠债还钱，赶快出面和债权

人把债务解决了，这样才是男子汉大丈夫的风度。”

“你太爱管闲事了!”对方随即挂断电话。

就是这通电话对话，“白狼”又惹来是非。

“白狼”并不知道，自“江南命案”后，他的名字已上了联邦调查局与蒙特利公园市警察局的名单，加上那位王菊涛的报案，“白狼”张安乐的一切行动均在警方的掌握中。他的这次对话已被录音，警方准备采取行动。

6月6日，由美国总统里根主持的犯罪组织调查委员会举行了一场听证会，与会的均是高级官员、各界要人、社会名流，包括越南前总统阮文绍等人，而“白狼”也应邀参加，实在非同一般。

听证会结束后，“白狼”刚要离开会场，美国移民局官员已等在门口，他们以“白狼”“无固定职业”、“无固定居所”为由，逮捕了“白狼”张安乐。

次日，移民局将“白狼”张安乐移交警方。警方指控张安乐涉及6月3日绑架勒索案（指王菊涛案）而予以收押。

但是，当美国警方传讯被绑架勒索的原告人王菊涛时，王一直为“白狼”辩护，只讲“白狼”在此案中只是扮演居中调解的角色，并非涉案人。

美国警方因为握有所谓的“白狼录音带”，因此并未采信王菊涛的证词，反而认为涉嫌绑架案的3人，都是受“白狼”的指使，为此“白狼”被判刑18个月。

美国警方最后提出，若能缴出25万美元的保释金，“白狼”张安乐就能获释。这个要价实在高得离谱，可以说是敲诈!

“白狼”张安乐，1948年生，在家中排行老二，父亲是大学教授，母亲则是台北市第一女子中学教师。在中学时代，张安乐就加入“南海路帮”，担任“护法”。1964年，他正式加入“竹

联帮”。

就在这一年的一个晚上，他与朋友到永和镇一家舞厅跳舞，因口角发生冲突，刺伤了一名便服宪兵，结果换来了一年的牢狱之灾。

就在他服刑期间，“竹联帮”势力迅速扩大，与台北市各帮派之间的火并不断，特别是与隔一条新店溪的“萤桥帮”势同水火。当时，由“竹联帮”杨站长率领的“远征军”，横扫台北各帮派，打杀之声惊动了台北刑警大队，乃针对“竹联帮”展开全面扫荡，许多“竹联帮”兄弟落网。

1965 年仲夏，“白狼”刑满出狱，迎接他的不是重获自由的喜悦，而是无奈与茫然。

在父亲的安排下，“白狼”转到基隆一中继续未完的学业，次年转回台北师大附中。

这段日子，“白狼”专心读书，凭他的聪颖，于 1967 年一举考取了淡江大学历史系。

这是一家私立大学，学校分为大学本科与大专（台称“五专”）两部分。这两者之间的学生泾渭分明，大专学生也许是因为自卑心理，对本科学生有一种不满与仇视情绪，争吵打架之事不断。

“白狼”因个性要强，不吃这一套，向那些大专学生进行挑战，并在打架中打出了威风，一举成名。

据说这引起了淡水本地流氓的不满。一天，他正在宿舍看书，一个由绰号“斧头”率领的十来个流氓在门外叫阵。“白狼”尽管势单力孤，但没有选择余地，便拿起一把土枪和扁钻冲出大门，就向“斧头”扑去，一阵短兵相接，“斧头”挂彩。这时，校保卫队及时赶到，将一群流氓驱散。

但“斧头”一帮人不服，准备报仇。消息传到台北“旱鸭子”陈启礼那里，他立即赶到淡水，与这个帮的老大“烧饼”谈

判，大家和解，才解决了争端。

陈启礼成为“白狼”最爱戴的“大哥”。不久，在陈启礼的支持下，“白狼”组织了“竹联帮”在淡水的分支——“淡竹帮”。

张安乐大学毕业后，考上了淡江大学欧洲研究所。在这期间，他与一位张姓女同学热恋，但未走上红色地毯。

1974年6月的一个夜晚，“竹联帮”几位兄弟在长桥餐厅聚会。酒过三巡，一个绰号叫“老水”的成员向同帮兄弟“老周”敬酒。不料，“老周”转过头去不理会。这让“老水”大丢面子，便趁酒性一把掀翻桌子，掏出扁钻就刺。“白狼”眼疾手快，伸手抓住扁钻，殷红的鲜血从他手指间流出，双方顿时冷静了下来。可是这一刀让“白狼”心寒：难道江湖义气就是这样薄如纸？所谓兄弟情分就是如此对待？他想金盆洗手。

在与张女分手后，“白狼”认识了一位叫李青的女子，不久结婚，为他生下一子一女。

当时，台湾政局不稳，可谓风雨飘摇。留学、移民成为一代青年的梦想，弄一张美国绿卡是青年人最为荣耀的事情。而有办法的黑道兄弟也不甘落后，东渡扶桑，西赴美加，纷纷到海外开餐馆，做生意。“竹联帮”的“青蛇”邓国沣、“黄鸟”陈志一等先后来美发展，为“竹联帮”在美国发展打下了基础。

1975年，张安乐顺利通过托福考试，便将手下控制的“竹联帮”势力交给一个叫康宁的人，自身赴美求学，先进入内华达大学，一心读书，用3年时间修完了4年的旅馆管理学分。

在美期间，在台的妻子李青一人抚养子女。受“白狼”江湖性格的影响，李青也颇有“大姊头”（指女性黑道领袖）的风范，对来家里的道上兄弟的照顾较“白狼”有过之而无不及。据说，不少道上犯案的兄弟常以李青处为“避难所”。

1979年，“白狼”返台探亲，但因与妻子李青感情不和而分

居，他不住家而住友人处。

此时，新竹“三光帮”的廖进基等人因犯大案，为躲避警方缉捕，藏匿在李青家中。

不料，警方根据线索，在李青家中将这批罪犯抓获，还搜出大批刀枪，也将回台探亲的“白狼”一网打尽。

警方还以“私藏枪支、藏匿人犯、涉嫌叛乱（多指搞“台独”）”等罪，将“白狼”张安乐移送“警总”侦办。

最后，“白狼”在多方努力下，“台独”罪名没有成立，却以“私藏枪支”罪名被判处6个月刑期，后又以缴保释金释放。

当年底，“白狼”返回美国，顺利完成内华达大学拉斯韦加斯分校学业，随后又以优异的成绩考入加州斯坦福大学会计研究所，攻读企业管理。

1981年，张安乐回台与意见不合的妻子李青离婚，留下儿子让亲戚照管。办完这些琐事后，他又回美国继续读书。

1983年初，“白狼”再度返台，见到了陈启礼。在两人相谈中，陈启礼告诉“白狼”，还是要争取搞经营活动，没有经济实力，什么事也办不成。

同年10月，“白狼”回到美国。为了取得居留权，与大学时期的同学珍妮斯·杰克逊结婚。但这种没有爱情的婚姻没有维持多久，两人就分手了。

不久，“白狼”先在朋友开设的台湾鞋类进口贸易公司与电脑公司帮忙，后又与台湾友人合伙经营太阳眼镜、玩具等杂货的进出口生意，但效益不好。

1984年4月，“白狼”与“黄鸟”陈志一在洛杉矶经营一家韩香村火锅店。他们不但自己管理，还亲自买菜，有时还下厨，生意十分兴隆，经济状况大为改善。

这时，台北“竹联帮”总部带来信息：台湾情报部门支持“竹联帮”在海外发展。张安乐与陈志一便积极在旧金山、洛杉

矶、休斯顿、纽约各大城市发展“竹联帮”兄弟，建立据点，扩充财源。

同年9月，以张安乐为社长、陈志一为董事长的《风云报道》杂志在美国创刊出版。仿效陈启礼的《美华报道》风格，大炒黑社会内幕、赌场秘闻、名人外遇等。

没多久，就在一天夜里，正在这里吃饭的美国“越青帮”分子在狂饮酒醉后，进行滋事，“白狼”向天花板开枪警告，才平息了这场捣乱活动。事后才知，有人在背后收买“越青帮”故意来此破坏。这又一次坚定了张安乐在美国发展“竹联帮”的决心。但受此事牵连，生意大受影响，加上美国卫生部门的检查不合格，餐厅终于关门。

为了生存，与朋友商议后，将韩香村改名叙香园，不卖火锅，改卖江浙菜。不久“江南命案”发生，张安乐、陈志一等人均受牵连，生意一落千丈，“白狼”再度被迫“暂停营业”。

“白狼”是美国“竹联帮”的重要人物，事务繁忙，一边求学，一边经营生意，还一边主持“竹联帮”的活动，还不时参与一些政治活动。

在美国期间，他为“竹联帮”在美的拓展起了重要作用，并负责到洛杉矶发展“竹联帮”。“竹联帮”在美设有“侨堂”，“白狼”可堪称“侨堂”的开山鼻祖。

张安乐可以说是美国华人社会年轻一辈中一个十分活跃的人物。也因此，他与大陆在美国的留学生及台湾的党外人士来往密切。在一次蒙特利公园市林肯广场的集会上，“白狼”张安乐大骂台独人物许信良（回台后两度当选民进党主席）：“你说反共，我同意，但你反对台湾，是我最不能接受的!”这也反映了张安乐的政治主张。

在斯坦福大学读书期间，“白狼”张安乐与大陆留学生来往甚多。据知，大陆在美国的民运人士王炳章在美创办了反共杂志

《中国之春》，曾邀“白狼”加入，但因双方理念不同，“白狼”未加入。

“江南命案”发生，“白狼”也卷入了难以自拔的漩涡。

张安乐是当年在美营救陈启礼的主要人物之一。他与“黄鸟”陈志一、向拨京3人，以陈启礼事先录下事件原委的两卷录音带为谈判筹码，在美国四处奔走，努力争取陈启礼、吴敦由军法审判转为司法审判，因此他成为美国及台湾各方面关注的焦点人物。

美国“协胜公会”顾问“七叔”伍桂兆出价100万美元要向张安乐购买陈启礼的录音带，遭到张安乐的拒绝。原来“协胜公会”掌握着美国华裔青少年帮派“飞龙帮”，同时与台湾国民党上层有密切联系。同时，美国警方与联邦调查局曾先后五次与张谈判，要他交出录音带，均未成功。

最后，张安乐在与国民党当局谈判失败后，才与陈志一、向拨京商量，于1985年1月11日将录音带交给美国联邦调查局。张安乐也因此成为“红人”，频频出席各种座谈会，在大众媒体抛头露面，还与刘宜良的遗孀崔蓉芝共同出席“江南命案”听证会。

他仍致力于营救被捕的陈启礼、吴敦与逃亡中的董桂森。他曾计划与绰号“象鼻蚌”的向拨京等人召开记者会，向新闻界公布三大内幕：一是“竹联帮”利用陈启礼录音带与国民党上层交涉的全过程与谈判失败的原因；二是台北指使“竹联帮”在江南命案前杀害另一名华裔作家的姓名；三是与潜逃菲律宾的董桂森电话通讯录音全部内容。后由于台湾方面做出让步，这一计划才取消。

张安乐为防意外，还写好了遗书，交待了后事。

然而，张安乐的一切行动都在美国联邦调查局的监视与控制

之中。后因调解讨债纠纷而遭陷害，被判了18个月徒刑。

“白狼”入狱后，陈志一、向拨京成为美国“竹联帮”的主要首领，并提出推动“竹联帮”在美国十项基本建设计划。

向拨京早年加入台湾“血盟帮”。“血盟帮”是台湾早期黑社会风云一时的帮派，在“竹联帮”首次被警方“清洗”时，有不少“竹联帮”兄弟投靠了“血盟帮”，董桂森也在“血盟帮”混过。后因陈启礼复出重组“竹联帮”及“血盟帮”受挫，不少“血盟帮”兄弟又回到“竹联帮”。

向拨京自小生长在一个条件优越的家庭。18岁时，他进入军校候补军官班。退伍后，他开始经营一家装潢工程公司。1977年，他婚后不到两年，和台北景美区的一个黑道人物发生冲突，被一刀捅断了大腿动脉，从此变成了“独脚双拐走江湖”的人。1984年3月，他来美国发展，在这里遇到了“白狼”张安乐与陈启礼，并成为莫逆之交。

因他曾发誓“生为血盟帮的人，死为血盟帮的鬼”，而一直未正式加入“竹联帮”，但与“竹联帮”的诸位老大关系极佳，也为“竹联帮”做事，而成为“竹联帮”的荣誉帮友，故陈志一讲“他比任何其他竹联帮的人更像一根竹”。

陈启礼、吴敦被捕后，他与“白狼”张安乐、“黄鸟”陈志一是营救落难兄弟的三大主力，还制订了一套完备的“竹联帮”在北美发展计划或称“十项基本建设计划”，主要包括：进军色情事业；发展全美连锁店的中式蔬菜供应系统，并逐渐垄断市场；控制卫生纸出口台湾；开设跆拳道武术馆，吸收警员学生，建立与警方的联系，提供保镖服务；抽取赌场利润；贩毒等。

1985年6月，陈志一取消原定在休斯顿投资餐馆的计划，建立当地最大的“香格里拉”夜总会，聘请150名金发碧眼的纯正美国姑娘表演脱衣舞，提供“无上装”与“带出场”服务，拉开了他色情业发展计划的第一步。同时，陈志一继续扩大吸收

“竹联帮”成员。

1985年7月2日，在休斯顿凯悦大旅馆一间豪华客房里，一张桌子上摆着一张关帝神像和一个“竹联帮”牌位，前面一只碗里插着正在燃烧的柱香。三个不同肤色的人口中念念有词：“一拜天，二拜地，三拜父亲，四拜竹联，五拜关帝……”

叩拜完毕，陈志一拿起一只装好酒的碗，刺破手指，将血滴入。其他三人滴血入酒，大家一饮而尽。

然后，陈志一宣布：“竹联帮美国龙堂正式成立。黄启为龙堂堂主，绰号‘灰龙’；黄大卫为‘白龙’；郑罗伯为‘黑龙’。我们不是同父同母，却你有我的血，我有你的血，我们是兄弟。”

入帮仪式结束。

这一切都在美国联邦调查局的监控之中，并被录像。而入帮的这三位“龙”不过是联邦调查局的线民和卧底。

黄启则是这出戏的关键人物。他身材不高，五官端正，头脑灵活，会讲广东话、福州话、闽南话和潮州话等多种中国南方方言，是年31岁。他出生在香港，15岁时移民美国，混迹华裔黑社会帮派，成为纽约“飞龙帮”的一员大将，跟随绰号“科学家”的“飞龙帮”头目陈麦克。陈麦克是美国“协胜公会”重要首领，任“中华之声”广播电台董事长兼新闻部经理，同时经营餐馆与夜总会，是“协胜公会”第二代领袖人物。他也是“协胜公会”总顾问“七叔”伍桂兆的义子。就是这样一个在华人社会黑白两道具有重要地位的人，于1983年3月13日凌晨4时被人暗杀于“协胜公所”财务机构联邦信用会办公室内。陈麦克就此结束了自己的黑道生涯。

黄启失去靠山，便去开出租车为生。他通过“竹联帮”的林苏结识了“白狼”和“黄鸟”，成为《风云报道》杂志在纽约的发行人。

林苏是福州人，原属纽约“福青帮”成员，后来又加入“竹

联帮”，也成为《风云报道》在纽约的发行人之一。

1985年3月，黄启在东百老汇一家咖啡店遇见纽约市警察局的侦探路易陈。路易陈也是来自香港，通晓广东话与日语，是反毒专家，是一个成功的卧底探员。黄启就是在他的引诱下，于1985年4月13日正式与纽约警察局合作，不久归入联邦调查局，开始打入“竹联帮”当线民，月薪5000美元，奖金另计。

被封为“黑龙”的郑罗伯、“白龙”黄大卫均是美国警方探员。他们通过黄启而认识“白狼”与“黄鸟”，进而拜入“竹联帮”。郑罗伯是韩国裔，于是被陈志一安排处理有关韩国帮派方面的事务。

在黄启的怂恿下，陈志一开始做贩毒生意。

1985年7月25日，在纽约一家韩国人开的莲娜餐馆前，林苏在焦急地等人。不久，黄大卫、黄启到来。他们相互交换了一个小包，并查看一眼后，匆匆分手。原来，他们在此成交了1公斤海洛因。

9月4日，陈志一飞往纽约，洽谈自泰国进口的一批300公斤重的海洛因之事。在纽约维士达豪华大旅馆的客房里，与朋友谈这笔大买卖。这一切都在联邦调查局的监视之中，而他却一点不知。数日之后，他飞往巴西，准备取回给逃亡之中的董桂森办理护照的证件照片。

9月16日凌晨，陈志一从纽约返回休斯顿，在机场被捕（另一说是陈志一自巴西返美时在机场被捕）。与此同时，向拨京、林苏、王守明（林苏手下兄弟）、李传杰（陈志一的保镖）、亚明（大毒枭）、杨天运和绰号“新疆马”的鲁齐（陈志一公司雇员）等人在美国各地也纷纷落网。4天之后，董桂森在巴西被捕，在被关押9个月后引渡美国。

1986年7月28日到9月19日，在纽约南区联邦法院，进行

了美国历史上首次公开审讯亚裔犯罪组织——“竹联帮”大审。

张安乐、董桂森、陈志一、向拨京等11人被控告为“竹联帮”分子，在美国经营犯罪企业、贩毒、偷运枪支、非法赌博、伪造护照、涉及谋杀刘宜良等13项罪名。

在这次马拉松式的大审期间，美国司法部门列举了大量证物。每次法庭辩论，双方唇枪舌剑，轮番对阵，高潮迭起。特别是“白狼”张安乐在1986年9月12日的自辩，更是炮火猛烈。他用熟练的英语猛轰国民党当局、纽约华裔帮派及那些卧底证人。

12月17日，美国法庭对“竹联帮”案进行了最后宣判：张安乐被判刑15年。这时已消瘦了30磅的他，拿着一本佛经，非常失望地发出一阵大笑。而坐在观众席上的女友泪如泉涌。

陈志一被判15年刑期。董桂森以“一级谋杀罪”被判27年徒刑。杨天运被判无罪当即释放。其他被告被判10年至25年有期徒刑。

张安乐因在狱中表现良好后来刑期减为10年。

1995年3月21日，张安乐在美提前释放出狱。

“白狼”整理行囊，离开路易斯安娜州的奥克岱尔联邦监狱，挥别了十年的牢狱生涯，但是站在他面前的不是他的亲友，而是联邦调查局的调查员。

“我们必须把你驱逐出境”，联邦调查员告诉他。张安乐又被押解到移民监狱，等待被遣返出境。

3月29日12时，张安乐在台湾刑警的押解下，乘坐联合航空公司845班机由美国旧金山起飞，飞往台北。

晚上7时50分，飞机准时抵达桃园中正机场。

身穿黑色西装、内着白色教士领衬衫的张安乐，在台湾“法务部调查局”3名警员的监护下，由17号通道穿过入境长廊，

走出机场。

在外等候多时的大批记者蜂拥而上，想从他身上得知江南命案的幕后新闻与董桂森被刺之谜。

当记者问他对当年“江南命案”如何看时，他表示已无任何内情可言，但这是一件足以引起省思的历史事件。

对于同帮兄弟董桂森在狱中遇害一事，“白狼”张安乐感慨良多。他说，对董桂森之死表示非常遗憾与痛心，有如不杀伯仁，但伯仁为我而死。因为当初是想救小董我才安排他回美国的，没想到却会落此下场。如果任其直接回台湾或许不致有如此结局。

当问及美国司法指控他涉毒一案时，张安乐表示出强烈的不满。他说：“整件事都是美国司法当局设计好的，不容我辩解，更不允许我举出对自己有利的证据，即判我 15 年徒刑。我绝对不服气，这不仅涉及我的人格、声誉，也影响国格。”

他接着说，这 10 多年的狱中生活，他无时无刻不在想早日回台湾澄清。对于美国司法的公正、客观与尊重人权等，有太多让人不敢恭维，也不是一般人所能想象的。

很快，在保安人员的保护下，“白狼”张安乐被送上在旁等候的台北市“调查处”侦防车，迅速离去。

“白狼”张安乐回台不久，与他交往多年的红粉知己孙惠珍乘另一华航班机由洛杉矶返台。

这位与“白狼”相交甚久的孙小姐，在 2 月中旬得知张安乐即将获释后，立刻从台北出发，到洛杉矶守候。

由于张安乐解押返台一事提前曝光，以致返台行程一再受阻，孙小姐也在洛杉矶等候近一个月。但还是未能见面，两人擦肩而过，“白狼”先走一步，她再跟着回台。

得知儿子出狱归来，张安乐 87 岁的母亲董镜桂不胜感慨：

“我一直希望他能成为教授，稳稳当当地教书，没想到他却成为‘游侠’，只顾行使自己心中的正义，从不考虑自己。”

董镜桂说，她这个儿子从小就喜欢读书，没事就抱着《史记》猛看，当时她不了解张安乐为什么那么喜欢看《史记》，也不知道他为什么加入帮派。事隔多年回想，才知道《史记·游侠列传》里那些有血有肉的人物深深影响了张安乐，不管认识不认识，路见不平，就要挺身而出。早在学生时代，张安乐就显现出他喜欢打抱不平的个性。有一次，他为了替两个学生解围，毫不犹豫以空手去抓刀，小指末端至今依稀可见当年伤痕。后来，张安乐在大学以第一名考取研究生。就在那年，他因在外打架被带进了“少年组”教育，成为他人生的一个重要转折点。

“他的性格已经耽误了他大半辈子，现在谈期望都太迟了。”董镜桂不无遗憾地讲。

张安乐在接受《亚洲周刊》采访时说：“10年的牢狱之灾，是因我自己不小心才被人陷害，这笔账不能算在江南命案上，我只不过是因江南命案被人当成目标罢了。”

在10年的狱中生涯中，张安乐以读书自娱，前后修完了心理学、社会学两个学士学位。

“白狼”张安乐返台后，因涉及杀人未遂和贩毒案被押。

“我没有贩毒，更没有教唆杀人！”在调查局台北市调查处一个侦讯室中，“白狼”不断重复着这一句话。

“我们不会为难你，这是一个必要的法律程序。但我们也希望，你能够以国家的整体利益为重。”调查员以暗示的口吻告诉他。

调查员暗示的，就是希望“白狼”不要再像10年前一样，不但抖出了陈启礼录音带，还在美国蒙特利公园林肯广场饭店的记者会上公开宣称：“蒋孝武命令陈启礼暗杀了刘宜良，这是蒋

孝武的命令，他认为这是为了他的国家。”

正因为如此，江南命案的扩大、延伸，引起了国民党内部斗争的加剧，也使台湾情报局的地位一落千丈。江南命案被认为提前结束了蒋氏政权的延续。当时已有接班之势的蒋经国次子蒋孝武，被美国《纽约时报》指陈涉及此宗政治谋杀，从此被派出任驻外代表，远离权力中心。不久，蒋经国明确表示，“蒋家的人不能、也不会参选总统。”

1996年4月10日，“白狼”好友陈启礼、吴敦和辩护律师周烂雄上“真相新闻”电视节目，谈“白狼案”的真相。

陈启礼讲，当初是奉情报局指示伙同吴敦、董桂森执行暗杀江南，事后发觉上级单位的态度有异，基于保护吴、董两人，才留下口述录音带作为吴、董两人的保障，没想到最后还是难逃一劫，还间接害了张安乐，让他平白被人设计入狱。

陈继续说，张安乐是个富正义感的血性汉子，以他对“白狼”的了解，“白狼”根本不可能扯上贩毒勾当，况且“竹联帮”是不允许帮内兄弟碰毒的。

吴敦表示，“白狼”从小就是一个够义气的朋友，又会读书，是一个标准的道上“兄弟”。美国以贩毒定“白狼”的罪，绝对是一个冤案，“白狼”根本不沾毒，这是美方设计的莫须有罪名。

如今的“白狼”张安乐已是人到中年，但仍是“竹联帮”中颇具地位的大哥，任“竹联帮”中央委员会的秘书长，也不脱离道上事务。在1996年台湾发生的一件重大工程围标案件中，“白狼”等众多“竹联帮”兄弟涉嫌围标，不过“白狼”因涉案不深而未被起诉。

尽管如此，“白狼”张安乐在台湾社会仍是一个有地位、有影响的人物。这从他儿子的婚礼中可见一斑。

1996年7月23日，“白狼”为他的长子举行了隆重的婚礼。

他的儿子名叫张建和，小名“小胖”，新娘叫刘慕斌，是“半亩园”餐厅老板刘锡九的长女。

张建和的母亲王淑贞与张安乐离婚后，为避免儿子步老子的后尘，乃带儿子移居巴拉圭。但长大成人后的张建和仍不忘怀父亲，还到美国看望狱中的父亲。张安乐出狱返台后，张建和也回台定居，并在父亲的支持下投资慈恩开发公司，并出任副董事长。

婚礼选择在台北一家有名的酒店举行，设宴席128桌，花费1000万元，由“竹联帮”所属五家公司的资深大哥负责宴席的场内外安全、宴席的设置、仪仗队排练等工作。负责安全的“竹联帮”兄弟就达200多人。

这次婚宴，高朋满座，气氛热烈。尽管由于“白狼”身份敏感，许多政界人士不便亲自到场祝贺，但却收到了来自政界许多知名人士与官员的喜帖、礼金，其中送喜帖的名单中，包括了前军情局局长及江南命案的主谋汪希苓、民进党主席许信良、“立法院”院长刘松藩、副院长王金平、台北市长陈水扁、高雄市议长陈田锚、“警政署”主任秘书刘庆睿等高官贵宾。亲自前来道贺的更有与黑道有关的“立法委员”林明义与曾振农、省议员颜清标等民意代表。即使一些在社会上标榜形象的政界知名人士如郁慕明、林志嘉等也到现场道贺。这次婚庆收到的礼金就达3000万元。这再次显示“白狼”张安乐在台湾黑道仍具有特殊地位与影响力。

张安乐在黑道一言九鼎，却不能保护自己的儿子。

1998年4月12日凌晨，张安乐的儿子张建和与朋友一块在台北“涨停板”酒店畅饮之后，因乘电梯与“四海帮”四名兄弟发生冲突，“四海帮”兄弟不敌身高马大的张建和等人忿而离去。不料，这四人出门后冲进对面一家商店强行拿走四把水果刀，迅速返回酒店，直奔正在大厅的张建和等人。一阵乱刀之下，张建

和被刺两刀，一刀直刺心脏；另一同伴曾志杰被刺 11 刀，四名“四海帮”兄弟迅速逃跑。张建和与曾志杰被立即送往医院，但张建和因被刺中要害失血过多而死亡。这一意外事件在黑社会又一次引起极大震动。“竹联帮”放话要讨回公道，要“血债血还”，是否会引发一场“竹联帮”与“四海帮”两大帮派的复仇火并，颇受各界关注，警方更是严加防范。不过，张安乐对失去爱子虽然十分痛苦，但却显得相当平静，在电话中表示“生死的事每个人都会碰到，大家一百年后都会死，本来就看得很开”，不希望复仇。因此，在帮派老大出面协调下，没有发生两大帮派的冲突。

5 月 4 日，张建和正式出殡，场面盛大，贵宾云集。“竹联帮”共动员 2000 多名兄弟到现场祭奠。全岛各重要帮派大哥及元老也亲自到场致祭。高雄市长吴敦义赠送“天不假年”，民进党主席许信良赠“痛失英才”挽联，另有 40 多名“立法委员”及多位县市议长署名致赠花篮与挽联。演艺界的知名人士胡瓜、彭恰恰、杨帆、余天等亲自到场致祭。送葬礼车近 300 辆。然而，张安乐因被通缉而未能到场为儿子出殡，成为他人生的一大憾事，也给世人留下太多的思考。

第九章

黑道小弟“青蛇”邓国洋的传奇经历

“杏花阁酒家喋血案”的凶手邓国洋，在案发后逃亡。

邓国洋，沉稳，机智，大家叫他“青蛇”。

他出生在一个军人家庭。父亲是黄埔军校出身的一位老将军，1949年随国民党当局来台，因中风而常年卧床，失去了往日驰骋沙场的威风，一家重担全落在妻子肩上。这位坚强的女性，靠着自己一双勤劳的手将孩子养大成人。

15岁那年，邓国洋进入南强中学，正赶上“竹联帮”的全盛时期，许多血气方刚的青少年都以能结识“竹联帮”兄弟为荣，对“竹林好汉”十分羡慕。

南强中学就有不少“竹联帮”的兄弟，号称“南联帮”（即“竹联帮”的分支）。邓国洋与一个绰号“南疯”的同学因上课关窗户区区小事而发生矛盾，便约定放学后到操场“单挑”，就像西方的决斗，不要别人插手，两人对打，以比高低。尽管邓国洋个头不高，但脑瓜灵光，用偷袭方法将对方击伤，结果被学校记了一次大过。可他在校园里出了名，被“竹联帮”看中，将他吸收为“竹联帮”的成员，还给他起了绰号“青蛇”。

当时“竹联帮”的势力范围，从中和镇、永和镇地区扩展到萤桥、新店、景美、木栅一带，直逼“四海帮”势力范围西门闹市区，因而与“四海帮”经常冲突，打得不可开交。

邓国沣不仅人聪明，而且口才好，在多次与外帮的械斗中，因他的主意多而获得胜利，颇得“南联帮”头头们的赏识。

这时，另一支派“竹叶青帮”在南海路一带发展了一批青年人，要建“南海路帮”，急需一个人来负责。

“竹联帮”召开大会进行讨论，决定由邓国沣担任“南海路帮”的老大。

在这次“杏花阁酒家喋血案”中，案件主角是王羽，但他是名人，常落脚香港。邓国沣与关壮飞则不同，他们均有前科，若被抓到，肯定要被送监狱管训。另一涉案人小唐（即唐松雄）无前科，问题不大。

邓国沣让王羽离开台湾回香港的同时，自己回家看亲友，并打电话给在旅行社工作的一位朋友，请他帮自己尽快办“出国”护照。原来，邓国沣在当船员时，曾逃到美国，取得了美国的居留权，这是他在台犯案退有后路。

一切准备就绪后，他担心警方查获，没有将自己要远离异乡的计划告诉在杏花阁酒家当服务小姐的女朋友小翠，而是打电话给人已在香港的王羽：“阿权（王羽原名王正权），你帮我给麦可兄说一声，我要到香港避一阵风头，要他招呼一下，你明天回台湾，反正枪不是你开的，人不是你杀伤的，也惹不到你的头上。”

5月11日下午，“青蛇”邓国沣、关壮飞和小唐到松山机场接王羽，然后四人一同到阳明山的王羽别墅商讨对策。

这位头脑聪明的“青蛇”讲：“阿权，对方认出了你，你得吃点亏。我和小关都有前科，不得不回避，小唐没前科，先去自首挡一阵子，如果情况不利，阿唐可以翻供，把责任全推到我头上，过两天我就要走了，小关赶紧办出境签证，我会在香港等你。”

5月13日，唐松雄持一支意大利造的玩具小手枪自动向台北市警察局延平分局投案，承认“四海帮”的兄弟是他杀的，枪

也是他开的。

第二天上午，“青蛇”一反常态，起个大早，向睡在身边的小翠说了一声“我出去办点事”，就带着简单的行李，把车开到济南路的一家当铺，将车当了60万元，然后找了一个旅行社的熟朋友，将现金换成旅行支票，前往松山机场，乘韩国航空公司的飞机，经汉城飞往香港。

在香港的麦可，也是港澳地区有名的黑道大亨，经常出入台湾。每次到台湾，邓国沣就尽地主之谊，一切照顾有加。这次邓国沣有难，逃亡香港，自然要找麦可。麦可便将他安排在一家酒店的豪华套房里。

5月17日，“青蛇”邓国沣接到王羽从台湾打来的电话，得知唐松雄被移送“警备总司令部”，与案件有关人员均被禁止出境，关壮飞已不可能偷渡，并已成为通缉犯。

他想到自己也已是一个流亡者，只是觉得比他们幸运了一点点，事先逃了出来。

他与麦可来到麦可在澳门开的赌场。因他出手大方，很快就结识了不少赌场保镖、打手、赌徒。

不几天，邓国沣手上的钱便不够用了。在外没钱就寸步难行。他便展开了一个接着一个的抢劫行动。

香港有许多中外知名的地方，银楼金店林立便是其一。1976年7月的一天下午1时许，一家闹市区的银楼，正逢警卫轮休，只剩下一个警卫，他刚去用餐，一个蒙面男子突然冲进店内，用枪逼着店主把钱交出来。店主不敢反抗，把保险柜里200多万港币全部放进了歹徒的旅行袋里。歹徒迅速冲出金店，钻进一辆急驰而至的轿车飞奔而去，案发前后不过六分钟。

这就是轰动香港一时的银楼抢劫案，但至今尚未破案。

这起抢劫案就是邓国沣策划、并亲自实施的，在外开车接应

的就是他在香港黑道上的朋友。

他们得手后，回到饭店住处。邓国沣告诉弟兄们："我留 50 万，其余你们大家分。过几天我就要离开香港，如果不幸出事，就将全部责任推到我头上。"

香港的朋友认为这样不妥，邓国沣是出外人，需要钱，且这笔钱主要是他弄来的，说什么也不愿拿大头。最后大家决定对半分成，邓国沣便拿了 100 万元港币离开香港，飞往菲律宾。

菲律宾的黑道朋友将邓国沣安排住进了豪华的碧瑶大饭店。

邓国沣不改昔日习惯，更因手上有了钱，经常出入声色场所与赌场。他每天晚上差不多都要到饭店顶楼的赌场下注。无论输赢，都不在乎，很快就成为赌场服务人员眼中的贵客。

1976 年 8 月 10 日晚，邓国沣打电话到香港："麦可，请你到菲律宾一趟，有事相商，一切见面再谈。"

麦可这位华人黑社会的活跃人物，也是菲律宾碧瑶大饭店的投资者，在当地名气不小，也与菲官员关系良好。

3 日之后，麦可来到菲律宾，晚上当地不少华裔商人为他设宴接风，显得十分风光，而邓国沣与这些商人已打成一片。

大家一场狂欢畅饮，直到深夜两点才结束。

麦可回到别墅，就上床休息。但天还未亮，就被邓国沣打来的电话吵醒："麦可，今天晚上 12 时，请你在碧瑶饭店的停车场等我。请你自己开车来，明天上午我就离开菲律宾，这是最后一次麻烦你。"

碧瑶大饭店灯火明亮，人来人往。赌场内挤满了来此一搏的赌客。就在大家专心下赌之际，突然一名持枪的蒙面歹徒，冲到赌台前，用英语说道："不许动，请把所有的钱装进我的袋子里，否则开枪杀人。"

菲律宾的治安一向混乱，当街抢劫是司空见惯，不足为奇，而华人被绑架、被抢、被杀的案件更多，但从来没有人敢来碧瑶

大饭店抢劫，更没有人敢向其赌场下手，因为这家饭店是菲律宾当权派的下属企业，也与黑道有关。

赌场的人全被这蒙面歹徒惊呆了，有人正要反抗，就被开枪警告，吓得全场的人一动也不敢动。歹徒令服务生赶快将钱装进自己的旅行袋里，服务生哪敢不从，只好迅速将钱向袋里放。

歹徒拿到钱后，说了一声“谢谢”就冲出大门，乘坐麦可在外等候的车，扬长而去。这时，赌场才报警说赌场被劫。但为时已晚，歹徒已不知去向。

邓国沣上车后，告诉麦可：“到你那里借住一晚，明天上午我就直接乘机赴美。”

车子启动后，刚要离开停车场，就被警卫人员在出口处拦住，向车内探望，一看麦可在坐，警卫人员马上来了个立正敬礼，迅速放行。

麦可到达住处不久，就接到电话：“刚才赌场被抢 70 万美元，怎么办?”

“知道了，过后我来处理。”麦可在电话中讲。

麦可早就知道了是怎么回事，当然知道怎么处理。他与邓国沣打开香槟酒，庆祝他们的合作成功。麦可知道这些钱大概是 70 万美元，也没清点钱数，就从口袋里拿出支票本，撕下一张 75 万元的支票交给邓国沣，自己把钱留下。

这是邓国沣策划的又一次抢劫案。这次抢劫价值计 70 多万美元，震动马尼拉。但这个抢劫案也未能侦破，就随着时间的推移不了了之。

邓国沣带着这张支票，来到美国纽约，从此改变了他的人生。

他先找了当年在台北的黑道闻人“牛哥”。

“牛哥”也算是个人物。他当年在黑道上混过，后来却成为

某一知名广告公司的经理。但因他爱好面子，经常请朋友到酒店吃喝，日子久了，欠了公司一大堆债，没有办法偿还，不得已一走了之，偷渡到了美国。

到美后，他吸取了昔日的教训，不再大吃大喝，且凭着他的经商经验，英文又不错，还会两下功夫，很快就同当地华人黑社会打成一片，进而与美国黑手党建立了关系，还建立了自己的成衣厂，赚了不少钱，进而在台湾侨界打响了知名度。

邓国沣带着百万元的美金，来到经济不景气的美国，显得特别有用场，便在“牛哥”的引介下，也买下了一家成衣工厂。这位逃亡的黑道罪犯，竟是个经营能手，工厂办得很火，发了不少财，进而再投资中国人最得手的餐厅，生意一样兴隆。不几年，他已是一位有钱的小富翁，在美国华人商界也是能讲上几句话的人了。

他的餐厅名字叫“彭园”，是当地享有盛名的中国餐馆，许多美国政要也以到“彭园”餐会为荣。

这位从黑道摇身一变的小富商，同台湾许多黑道知名人物一样，“忠诚爱台”。

1978年12月，美国宣布与台湾断交，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交，这是中美关系史上的一件大事，但对国民党而言却是一次沉重打击。

邓国沣闻讯，取消了一个500万美金的合同洽谈会，赶到台湾在美国的侨社，与“牛哥”等人召开紧急会议，商讨对策。于是在美发起抗议活动，还通过各种途径向美国国会与政府抗议。他的这一行动，很快得到台湾情报机关的重视。

1982年底，大陆一个代表团赴美考察，也慕名来到这家餐馆。

他们发现这里的生意很好，餐桌差不多都订满了。就在大家用餐当中，老板邓国沣走了进来，整个餐厅的客人都同时起立向

他招呼。这让大陆代表团十分吃惊，这是哪号人物，气魄这么大。一打听才知，他是从台湾来的一个商人，老家在湖南，已在美国华侨界有相当影响力。

据说，事后湖南省一位前政协副主席曾写信邀请邓国沣回湖南参观访问，还通过邓国沣在香港的朋友做工作。

台湾情报机关得知这个消息后，认为邓国沣在美国侨界地位重要，不能让大陆“统战”过去，也派人到美作邓国沣的工作，不再计较他在台湾过去犯下的大案，还邀请他荣归故里。这不过是海峡两岸在美国侨界斗争的个案而已。

邓国沣不便回大陆，但回台湾也顾虑重重。他自己明白，今天虽混得像个人，在美国有了自己的事业，在华侨中也有了地位，可他仍是台湾的“通缉犯”，自己是因为“杏花阁酒家喋血案”而逃出台湾的，回去会不会被抓，他没有把握。

对美国侨界而言，他们绝不会相信这个“忠党爱国”（指国民党与“中华民国”）、侨界的重要人物是个通缉犯。

尽管“杏花阁酒家喋血案”于1983年3月正式结案，但邓国沣流亡海外7年，仍不会忘记7年前自己的逃亡历程。

不过，在台湾情报机关的认可与保证下，一个通缉犯又成为一个有地位的华侨，邓国沣还是回到了台湾，不仅受到了昔日兄弟的热烈欢迎，也得到了官方的赞誉。他成了一个有地位的人，重新开始了他在台湾的生活。

第十章

所向无敌的黑道杀手刘焕荣

台湾的体育事业并不发达，没有几个项目在亚洲或世界能排上号的，但棒球特别是青少年棒球却是例外。台湾青少年棒球队多次获得世界冠军，1996年再度捧得世界锦标赛冠军。棒球成为台湾青少年最喜欢的运动之一。

1957年出生在台中市北屯区四张梨眷村的刘焕荣，从小就是个棒球迷。自“金龙少棒队”夺得世界冠军后，台湾出现了棒球热，村子里的青少年整天离不开棒球。因父亲是村中的村长，刘焕荣便成为村中棒球队的领队兼教练，经常带着球队南征北讨。

从小崇尚武术的刘焕荣，拜北屯有名的武术师阿善为师，经常到九龙宫练武，在这里结识了不少志同道合的朋友。

这些青少年年轻气盛，经常因比赛而发生吵架、斗殴。

这些生长在眷村的外省子弟与本省子弟不同。整个村子就像一个大家族，大家都来自大陆各地，在这里又成为相同的外省人，父辈差不多全是军人。由于家庭经济状况都不很好，外省子弟每到假期都外出打工赚钱，刘焕荣也在假期到水果批发市场批些水果沿街叫卖。

上高中二年级时，因打抱不平而走上了一条不归路。

一天，村干事的小孩“乖宝宝”与村中的小谢发生争吵，小谢挨了打。小谢是村子里公认的败类，因父母离异，一人在外鬼

混，并参加了“十四条龙帮”。小谢便找来街上的结帮小兄弟，将“乖宝宝”狠狠地修理了一顿，打得头青脸肿。

刘焕荣不满这些人欺负“乖宝宝”，便邀一帮小兄弟到街上找小谢的兄弟论理，让对方赔礼道歉，对方却没说话就跑掉了。刘焕荣以为事情解决了，就没再注意。不料，一天他一人在外面，被七八个小青年围住，并拿出小刀，向他刺来，没几个回合已身中数刀。他带伤冲出重围，直奔家里，拿起家中的木棍又向回冲，要与对方一拼。当他赶到时，他的小兄弟也早已赶来，大家一拥而上，将对方人马打得七零八落，狼狈而逃。

可是，刘焕荣一时还是弄不清楚是谁要打他。直到有一天，在公共汽车上碰到小学时候的几个同学。他们把他叫到一边威胁说：“外省猪（台湾本地人对大陆外省人的仇恨称呼。直到今天这一问题仍存在，民进党与‘台独分子’仍常称台湾大陆籍同胞为‘外省猪’——笔者），你以后再管闲事，小心杀了你。”

刘焕荣这才知道来村子里闹事是街上的“十四条龙帮”兄弟为小谢之事来算账的。

听了这话，年轻气盛的刘焕荣当然不服，便找了北屯练武的大师兄及其他师兄弟，与对方约定在街上文昌庙口谈判。

双方人马准时到场，谈判还未进行，就因一言不和，大打出手。对方哪是对手，刘焕荣一帮人马是有备而来，且个个是练过功的武林高手，打得对方落花流水，狼狈逃散。

这场胜利，让刘焕荣一伙高兴得不得了，便到台中市五权路蓝天使餐厅喝酒庆功。这时，有位朋友告诉他，他们这些大师兄的朋友是市区中兴新村和几个眷村联合起来组织的“小梅花帮”兄弟。刘焕荣十分兴奋，便加入了“小梅花帮”。

他们高兴之余，不幸的事件很快随之发生。

他们一直喝到晚上 12 点餐厅关门之时。就在他与大师兄下楼之际，一个小混混大喊“他就是刘焕荣”，于是一群人蜂拥而

上，便是一阵刀光剑影，刘焕荣与大师兄双双倒在血泊之中。当他们醒来时，已躺在医院里。要不是出租车司机及时将他们送进医院，就会因失血过多而发生生命危险。

他们俩在医院一躺就是 10 多天。刘焕荣因此被学校开除。在家里，他又听不进父母的劝导，一心要复仇，便离家出走。

离家的日子并不好过，公园、火车站成为他经常落脚过夜的地方。有时候去朋友那里混两天，但也常常挨饿，于是他想到了工作。

一天他溜回家，告诉母亲他要到台北去做事，闯天下。台北是台湾最大的都市，是当时青年人最向往的地方，不少人从四面八方跑到台北。今天台北周围的新兴城市里，大多是南部来的外地人。

刘焕荣带着简单的行李，坐上北去的火车，来到人生地不熟的台北。当时正是台湾经济起飞阶段，找工作并不难，他便到一家私人货车运输公司做捆工。就像今天的北京外地打工者一样，1 月 150 元新台币，供吃包住，还不时给家寄点钱。

不久，他的大师兄来台北找到他，问他想不想报仇。刘焕荣哪能抵挡得住这种“报仇”的诱惑，当然不能说“不”，加上台北没有朋友，日子过得挺寂寞的，俩人便一起回到了台中。

他在台中找了一份工作，是在一家汽水公司上班。这时，“小梅花帮”在台中已是有影响的帮派，势力范围主要在台中市五权路一带。这里是最繁华的市区之一，就像台北的中山北路一样，酒吧、餐厅很多。刘焕荣常被兄弟带到这里吃喝玩乐。可是他不懂，这些人不上班，为何有大把大把的钱花？后来朋友告诉他，他们在搞赌场，不然哪里会有钱用。于是刘焕荣辞去了工作，到朋友的赌场帮忙。

一天，大师兄带着刘焕荣、小赖、阿结到一家赌场收保护费，结果与便衣警察发生冲突，一名警察腿部受伤。当天晚上，

刘焕荣在家被抓，进而以恐吓罪判处徒刑 4 个月。1974 年底，刘焕荣第一次走进监狱，次年初获释。

出狱后，刘焕荣想重新做人。不料在一次朋友聚会中，又被警察误抓，说他偷了一辆自行车，后因证据不足及朋友出面证明，他才免了一次冤狱。

这时，刘焕荣还不到 18 岁。他在父母的要求下，考上中学插班，就读台中明道高中。两年后毕业，报考军校落榜。不久奉召入伍，时间为 1977 年 9 月。

在军中，刘焕荣表现不错，还曾获得“见义勇为”奖。但因昔日的劣迹而不能加入国民党，也不能志愿留营，于 1979 年“光荣退伍”。

但是像过去一样，只要曾被当作黑道分子抓获，不管你以后干什么，只要管区发生案件，管区警察就会来找你。特别是每到十月份，为了“双十节”的治安，警方就来一次“清扫”，规定每个管区要抓至少两人送去管训。为完成任务，管区警察就把曾经犯过事的人抓去交差。

刘焕荣不敢回家，害怕被警察抓去，就到外面去混，随之而来的就是一个接着一个的出事。

先是一个叫阿森的小偷邀他去找一个小混混算账，人没找到，却碰上了警察，刘焕荣因持凶器被拘留 7 天。

出来后，北屯的一位朋友“狗熊”到丰原市赌博，输了几十万，怀疑有人设局诈赌而拒绝付钱。但赌场方面逼得很紧，没办法，“狗熊”就找刘焕荣出面，与对方谈判。赌场方面则是丰原市“十七军刀帮”的“鸡母”林隆胜出面，大家达成协议，由刘焕荣负责偿还赌债，分期付款，每个月还 20000 元，分十次还清。谈好之后，对方反悔，“鸡母”认为刘焕荣没有钱还，便带着一帮人持刀带枪到北屯找“狗熊”。结果，被刘焕荣挡了回去，还骂对方不守信用，并打电话要“十七军刀帮”老大处理。

几天之后，北屯夜市场一家海鲜店开业，刘焕荣去道贺，突然看到“鸡母”一帮人走过来，知道来者不善，立刻呼叫四周的兄弟，同对方展开厮杀。一阵下来，刘焕荣头部缝了三针，两位兄弟受伤，对方则数人受伤，一人当场死亡。“鸡母”林隆胜后来因伤势过重在医院不治也告死亡。

警方随即展开追捕，“小梅花帮”的许多兄弟被警方抓获，刘焕荣逃脱，带领几个小兄弟开着一辆小货车，躲到台中县深山养鸡，从此成为一名通缉要犯。

可逃得了今天，躲不了明天。不能永远躲在深山养鸡，况且手里没钱，生存都成问题。刘焕荣像其他要犯一样，四处向赌场、色情场所收取“走路费”（黑道上讲的逃犯索取的生活费）。

警方几次得到“线民”密报，在赌场围捕刘焕荣，但都未成功，还是让刘焕荣逃脱。警方几次知道线索前来围捕，刘焕荣开始对一些朋友起疑，认定有人向警察密告，于是对谁也再不信任。

接着不幸的事情又是一个接着一个的发生。先是同村的好友“大青蛙”在一次喝酒中发生冲突被人杀死；同案逃亡的“老鼠”南下高雄访友因车祸而死。不久，他的父亲因病去世，自己不能奔丧，更让他痛苦，因为父亲戎马生涯，一直是他心中的偶像。从此他脾气变得暴躁，性格更加内向，不爱讲话，也更加仇视社会，好像全世界都同他作对。

一时间，一些道上兄弟对他退避三舍。他只好同小偷来往，这更让道上兄弟看不起，但他却自觉很有收获。因为小偷帮他偷了两把手枪和伪造身份证，为他日后的逃亡创造了条件。他还从中学会了如何打扮自己，黑道上流行穿的布鞋换成皮鞋，便装换成西装，披头变成分头，看上去不再是个小混混，倒像个老板。于是刘焕荣做了一对有钱夫妇的保镖。

刘焕荣在台中地区黑道上的名字很快打响，引起“竹联帮”

的注意。刘焕荣与“竹联帮”忠堂堂主的董桂森同为四川老乡，又同是台中地区黑道人物，因此在董桂森的推荐下，刘焕荣加入了“竹联帮”。

加入“竹联帮”后，刘焕荣一度到台北地区活动，认识了桃园地区黑道人物绰号“细汉”游国麟。因赌场利益，游国麟与桃园“大树林帮”的老大杨柏峰结下仇恨，游便以40万元为报酬要刘焕荣干掉杨柏峰。

1983年6月13日，桃园“大树林帮”骨干分子高顺义为过世的祖母在八德乡水上乐园正在举行一场隆重的葬礼。有桃园“黑道教父”之称的该帮老大杨柏峰也前来参加葬礼。

酒过几巡后，杨柏峰在两名保镖的陪同下先行离席，刚走出大门不远，混在人群中的刘焕荣与游国麟手下段树文迅速冲出，拔出手枪就向杨柏峰连开数枪，保镖还没来得及反应，杨已应声倒地。刘焕荣与段树文迅速冲上在旁等候的一辆汽车飞奔而去。刘焕荣从此走上职业杀手的不归路，被人称为“神经刘”。段树文也被警方列为十大枪击要犯之一。

不久，刘焕荣又跟台中“大湖帮”的“岐头生”手下因赌场恩怨而发生一连串冲突与拼杀。

同年10月，“竹联帮”花堂堂主花继忠与台中“大湖帮”的绰号“九命怪猫”廖龙辉因开餐厅之事发生纠纷，花继忠便要刘焕荣南下找廖龙辉算账。

23日晚，廖龙辉在台中市三民路老爷餐厅喝茶，刘焕荣带着手下在外埋伏。9时许，廖龙辉离开餐厅，刚出门不远，刘焕荣等4人迅速从暗处冲出，举枪就射，结果廖龙辉身中三枪，一命归天，另两位身边兄弟也一死一伤。

多起命案，刘焕荣再次成为逃犯。

刘焕荣经朋友介绍认识了许经旺掌控的偷渡集团与黑道闻人齐瑞生，以筹钱到国外。

赌场来钱最快，刘焕荣便与“竹联帮”和堂堂主合伙搞赌场，没多久，刘焕荣获得200多万元，准备出逃菲律宾。

在一个风平浪静的夜晚，刘焕荣乘一条渔船到小琉球，再换船到菲律宾。

就在接近菲律宾沙巴岛时，船不幸触礁。他们像马来西亚官方求助。这时台湾破获一个重大枪支走私集团，马来西亚政府认为这可能是一只走私船，警察与移民局官员上船搜查，结果未搜到走私品。

两天之后，许经旺从菲律宾乘船赶来会合，然后一同驶向菲律宾。

这时菲律宾一艘炮艇已前来迎接。刘焕荣、许经旺等一行坐上炮艇驶向菲律宾达威城。许经旺是一个旅菲华侨，与“竹联帮”关系密切，在台北开有餐厅，以此为据点进行走私与贩毒。他是因犯案逃到菲律宾而成为华侨的，在马尼拉市中心开了一家绿园餐厅。

达威省省长亲自前来迎接许、刘两人，并设宴招待。刘焕荣向省长等人送上大批从台湾带来的礼物，但因这里是回教省区，带来的猪肉类罐头等食品全偷偷倒进海里。

刘焕荣一行就住在省长家里。省长还派了一个排的兵力保护他们。一次，省长发现刘焕荣把一位中尉的枪迅速拆卸与安装的熟练动作后，十分吃惊，就问许经旺，刘先生是因什么原因从台湾逃出来的。许经旺只讲是个“票据犯”（经济犯），但省长摇头不信，怀疑刘不是政治犯就是恐怖分子，以后也不再让士兵给刘枪玩了，但对刘仍很有兴趣。

省长一次请刘焕荣与许经旺一块吃饭，高兴之余向刘焕荣讲到，若能给他介绍一个中国女人，他可以送一个小岛，听来实在让人吃惊。

半个月之后，省长送刘焕荣到马尼拉，也很快为刘办好了菲

律宾的护照。

江南命案的逃犯董桂森逃亡菲律宾期间，曾得到过刘焕荣的帮忙。要不是刘的通风报信，董桂森就可能被国民党利用的黑道杀手在此暗杀了。

不久，刘焕荣以一个华侨的身份在黑道好友齐瑞生的护送下重返台湾。

当年，刘焕荣帮助游国麟杀死对手杨柏峰，两人成了莫逆之交。回到台湾，“飞沙帮”的郭江南以80万元代价又雇刘、游两人去杀仇敌——“一山帮”老大张德忆。果然在1984年4月30日，刘、游两人将张德忆挟持到竹北湖口公墓，将其杀害。没想到的是游国麟没过多久就被刘焕荣所杀。

原来，游的手下向警方供出张德忆之死与刘焕荣有关，刘认为这一定是游告诉了手下，不然不会有人知道，于是对游表示不满。加上，游国麟勒索桃园赛鸽分会的诈赌奖金，刘焕荣出面调解，可游国麟未给刘面子，还自己独吞利益，进一步引起刘的不满。

1984年6月21日，刘焕荣约游国麟与段树文到台北建国路荔坊卡拉●K餐厅聚会。段树文曾与刘焕荣做案，很了解刘的反复无常与心狠手毒，他便借故未赴鸿门宴。游国麟自认与刘焕荣有交情，欣然前往。刘为游国麟安排房间，提供妓女供其享乐，游很是高兴。可是他不知道这就是他的末日。半夜时分，刘焕荣率手下将游国麟用刀砍伤，然后将其装进睡袋，乘车拉到郊外，将其杀死，置之郊野。

段树文尽管逃了这一劫，但不久因涉及另一案件被警方抓获，并被判刑入狱。监狱生活并没有改变段树文的天性，出狱后，他又接连犯案。他仍在桃园县大溪、八德等地经营赌场，持枪恐吓勒索，白吃白喝及涉及多起枪击案，横行地方，为此警方发布悬赏30万元的公告，将段树文列为“治平专案”扫黑的首

要缉拿对象。

1986年7月30日，段树文因父亲逝世潜回八德市奔丧。警方接获情报后，在台北地检署检察官侯宽仁的指挥下，调集精干警力，冒着12级强台风，直奔八德市。31日凌晨，荷枪实弹的霹雳小组警员冲入段树文住处，将正在打电话的段树文当场逮捕。同时还在段的住处抓获通缉在案的“六合彩”赌博组头简魏珍。

后来，刘焕荣先后到过新加坡、泰国曼谷、汉城与香港等地，最后来到日本发展。他与在日本的台湾黑道兄弟一样，多靠赌场为生，生活过得倒也不错。他最感不足的就是希望有个家，过上正常人的生活。

当然，像他们这些黑道人物，女人多得是，但要找一位能安家立命的却倒不容易。

在台湾的时候，刘焕荣就有一位女友，相交十年。但她却是一个颇有理想的女孩，终因志不同道不合，她到美国求学深造而与刘焕荣结束了一段爱情。

在菲律宾时，刘焕荣认识了一位名叫“阿霞”的台湾姑娘，相聚在一起。可她回台后，因受刘焕荣的连累而被警方侦讯，也因此失去了联络。

到日本东京新宿后，发现这里像个“小台湾”，到处都是从台湾来的老乡，且多是黑道上的兄弟。

刘焕荣是以留学生的名义进入日本的，在一家学校学习日语，也因此取得在日居留签证。

一天，他与朋友到一家酒店吃饭，发现一位漂亮的中国女孩哭得很伤心，起了同情心，经询问在旁的一位小姐后得知，她的丈夫、台湾十大枪击要犯、黑道老大“珍珠呆”梁国恺遭台湾警方围捕时自杀身亡。

这个孤独的刘焕荣终于同这位年轻寡妇“小支”认识了，进而结识了“小支”的姐姐“大支”他们同是黑道中人，因此刘焕荣与“大支”交谈更为投机，很快就好上了。刘焕荣便租了一间房子，与她共同生活在一起。

这才知道，“珍珠呆”要“小支”先来日本，自己计划随后偷渡日本。不料，他被一位道上的小兄弟出卖，被警察围困，无法逃出而被迫自杀身亡。就在这时，刘焕荣的踪迹被台湾记者得知，“刘焕荣”的大名很快就出现在报刊。这对一个在逃犯而言，实在不是一件好事，刘焕荣便想离开日本，又舍不得心爱的“大支”，就留了下来。

这时，台湾的黑道兄弟刘家祥被警方怀疑涉及台湾华侨银行抢劫案与杀害警察案而想偷渡出境，急需一笔钱。刘焕荣便慷慨解囊，将身上仅剩的5000美元拿给家祥兄弟，自己离日计划再次推后。不料，还没来得及离开日本，就被日本警察逮捕。

1986年1月26日上午11时许，刘焕荣与“大支”在东京新宿的公寓内大睡。一阵急促的门铃声响起。“大支”好觉奇怪，星期天，怎么会有人这么叫门？便从“门镜”向外瞭望，顿时大惊失色，冲到床边，告诉刘焕荣：“坏了，一大堆警察围在门口，怎么办？”

刘焕荣倒显得十分冷静，他知道完了，躲是躲不掉的了，便走向前去把门打开。日本刑警迅速进入屋内，一位头目讲：“你被以嫌疑持枪恐吓罪遭控告，我们四谷警视厅持东京法院检察官的拘票前来逮捕你，请跟我们走一趟。”

刘焕荣瞧了瞧拘票，才发现这张拘票是当日上午10时才开出，且是从电话登记住址找到他的住处的，真算是倒霉。

其实，日本警方逮捕刘焕荣，是台湾的黑道朋友因赌场恩怨而出卖了他。

在日本新宿一栋白色七层公寓的三楼里，从台湾来的四男三女喝着日本式的清酒，海空天阔，大谈江湖旧事。这四位大汉不是别人，正是曾经横行台湾黑道江湖的知名人物，也都是因大案在身，被警方通缉，潜逃出境，到日本避风头。

其中一位是这间公寓的主人谢聪富，出道甚早，在新宿一带已是道上名人，是一般人惹不起的人物。刘焕荣与齐惠生均是台湾黑道知名杀手，来日不久。另一位姓王男子略逊他们一筹。

齐惠生是台北“牛埔帮”的老大。“牛埔帮”是当年台北最大的本省籍帮派，不但人手众多，而且火力充足，在多年的势力扩张中，台北市北区大部分都是其势力范围。早期的“牛埔帮”依地缘关系分为“新庄仔”、“上厝庄”、“中厝庄”、“三板桥”与“统一口”等六个角头，早期内部彼此时有纷争，但在齐惠生的整合下逐渐“共襄盛举”，一致对外。

令人意外的是，齐惠生这个外省籍的人能在“牛埔帮”立足，而且能获得老大地位，实属异数。也许同他的土生土长的环境与他不凡的出身相关。

他从小就一直住在台北市民生西路四十五巷三弄一幢四楼的住宅里。这一带俗称“火车路脚”，属于“下厝庄”的势力范围。他不仅能讲流利的台语，还与这一带的兄弟混得很熟。

齐惠生，身材魁梧粗壮，一米八零的个头，在身材普遍较低的台湾更显得鹤立鸡群。

在那个黑道搏斗流行“单挑”的时代，齐惠生凭着自己高大的身材与一般人无以伦比的力气在一次次的打斗中，可以说是屡战屡胜，在很短的时间内就在“火车路脚”一带闯出了字号。

后来在“下厝庄”与“双连夜市场帮”的一场地盘争夺战中，齐惠生表现异常勇敢，为“下厝庄”争得了地盘，从此正式成为“下厝庄”的重要成员，也正式步上江湖路。

被齐惠生带过的“牛埔帮”兄弟不知凡几，但在黑道上一度最享盛名的要算是“飞字辈”的十二生肖了。这十二位兄弟的字号均以动物命名，其中以“飞虎”最狠，称得上是十二生肖中的杀将，结果因结仇太多，在一次厮杀中被连砍十余刀，惨遭废手命运。此后，其他“飞字辈”十一生肖也关的关，收山的收山，但江湖盛名仍在流传。

齐惠生看上去并不像一位草莽英雄，而是显得十分沉默、冷静，思维周密，处事果断，更因他重义气而名满江湖。

齐惠生坐大以后，他的行情高涨，已不需要像早年那样靠自己的力气打斗来吃饭，只要一声令下，为他卖命的“牛埔帮”兄弟一呼百应。对兄弟则是有求必应，因为他有充足的经济来源，可以说是财大气粗。

齐惠生以赌起家，赚进了无数的巨额金钱。台北民生东路的麻将场与太原路的天九场，就可以日入百万。他还与朋友从事钻石表走私生意，更是暴利不断，成为黑道上富人之一。

但黑道是一条不归路，他也未能逃脱。一次，一帮朋友在古树餐厅聚会，这也是齐惠生的一家企业，他交给手下兄弟“茶壶”掌管。这天，齐惠生与弟弟齐瑞生也一起来坐。

齐惠生有两个弟弟瑞生与丽生，可以说是他一手带大的。齐瑞生绰号“阿瑞”，也是“牛埔帮”的一位狠角色。由于为人霸道，“阿瑞”一枪在手，动辄翻脸不认人，使他在外结了不少梁子，但由于惠生的名气大，帮内许多人对他敢怒不敢言，但外帮兄弟可不吃这一套。

“华山帮”的兄弟获悉“阿瑞”在古树餐厅，便迅速赶到。

依齐惠生与“华山帮”的“神经”黄姓兄弟的交情，他自信可以通过谈判交涉，摆平这场江湖恩怨。只是做梦也没想到，对方火气甚大，出言不逊，“阿瑞”不满，就拔枪射击，杀死了“神经”的亲弟弟。这就是古树餐厅枪击案。齐瑞生也因此被警

方通缉在案。

齐惠生痛爱弟弟，在黑道上众人皆知。如今弟弟闯了祸，怎能不想个法子。于是，齐惠生将弟弟送往高雄，再偷渡到菲律宾，自己一人担当这件案子。

这样，他也成为一名在逃犯，也因此毁了他的“大好前程”。在警方网罗遍布下，他东藏西躲，后来在一位王姓友人处藏了一段时间。最后还是步上偷渡之途，投奔菲律宾。

齐惠生抵菲，一时在菲国的台湾黑道圈引起一阵震动，大家都想与他建立关系。因为齐惠生善于生财之道，早已是远近驰名。他与在菲律宾的刘焕荣、一度逃亡菲律宾的董桂森等既是昔日好友，今日又同是天涯沦落人，自然更亲近一些。

在菲律宾发生的陈氏灭门杀人惨案，一时震动全球华人社会。

刘焕荣逃亡到菲律宾后，受到菲律宾华侨陈玉照的关照，就住在陈的饭店。齐瑞生、齐惠生兄弟与董桂森也常来此吃饭或住宿。陈姓华侨对他们都很照顾，相处很好。时日已久，刘焕荣便与在饭店帮工的陈娟茹小姐相好了。陈娟茹是陈玉照的亲侄女，陈玉照知道刘焕荣是道上人，反对陈娟茹与刘相好，多次劝说陈娟茹，但痴情的她已经很难自拔，虽当面表示不再与刘来往，可过后一切照常。于是，陈玉照便找刘焕荣，提出警告，限一周之内离开饭店。

刘焕荣答应一周后离开饭店，背后却与陈娟茹设下一个陷阱，计划偷窃陈玉照的金柜后，再携款逃走。

一天晚上，就在他们得手准备离开时，被陈玉照的妻子发现，大声喊人，没喊两声就被刘焕荣用匕首刺死，但还是被正在另一间房吃夜饭的陈玉照、他的弟弟陈玉耀及长子陈先文听到，迅速赶来，却均被刘焕荣开枪打死。

陈娟茹见自己的伯伯、伯母、哥哥和亲生爸爸被他爱的人亲

手杀死，两腿一软倒在地上，刘焕荣迅速逃跑。

当警方赶到时，4人均已死亡。陈娟茹向警方叙述了事件发生的经过，并说出饭店里住着多名台湾逃犯。警方迅速在登记簿上查出了刘焕荣、董桂森、刘伟民、齐惠生、齐瑞生等等台湾黑道人物大名。

案件发生后，董桂森转道到了巴西，刘伟民、刘焕荣与齐惠生兄弟逃到日本。当时台湾的媒体纷纷报道上述数人都涉及这一震惊世人的杀人灭门惨案。

一天，刘焕荣、齐惠生来到谢聪富住处玩麻将。他们三缺一，正在等人玩赌。

就在他们等得不耐烦之时，门铃响了。进来两位男子。一位简姓“猪脚”是谢聪富的姑丈，与刘焕荣也有数面之交。另一位除姓王的认识外没人见过。

这位朋友姓吴，近50岁，瘦高的个子，带着一副近视眼镜，挺斯文的，不像道上人物，倒像一个学者。

姓王的在旁偷偷告诉刘焕荣：“这位姓吴的，我在台北见过，这杂碎是个‘来人’（赌博郎中，专搞诈赌），麻将、梭哈耍得极棒，看样子今天晚上的牌局是简、吴两人连手，你叫惠生留点神。”

刘焕荣曾主持过赌场，对赌场一切了如指掌，也见过不少赌博郎中，便传话齐惠生要注意他们这一手。

果不其然，这场麻将一开始，刘焕荣与齐惠生就很不顺手，尽管“碰”、“吃”、推牌、砌牌声音不绝于耳，但总是摸不到好牌，也吃不上牌，不到几个回合，刘焕荣面前的30多万日元已换了主人，而吴先生连胡带自摸，捞进了几十万。

再几圈下来，这场麻将，刘焕荣与齐惠生一共输了57万日元。对道上朋友而言，输钱也许是小事，但却不能忍受这股窝囊

气。

这场牌结束后，刘焕荣与齐惠生找上谢聪富，很不客气地告诉他，大家兄弟一场，跟自己人玩“抬轿子”，未免有失和气，让他转告简姓与吴姓男子，若让他们查出问题，就一定要讨回公道。

结果不出3天，刘焕荣在日本的弟兄们就查出吴姓男子与谢聪富的简姓亲戚的诡计。

谢聪富兄弟仨都是台湾黑道出身，其中老大谢聪明是“猪屠口帮”的分子。三人都来到日本经营一家火锅城。吴姓男子，名叫吴新源，绰号“狱子”，是“竹联帮”老一辈大哥。这位姓简的，名叫简瑞明，也是黑道人物。

据知，这俩人玩的花样与台湾的电子遥控法大同小异，即由简姓男子利用观牌之际，将诸家的牌依序由挂在脖子上的遥控器分别打出，传入吴姓男子藏在裤管里的感应器，贴着皮肤打出事先预定的暗号，使吴知彼知己，战无不胜。

谢聪富知道这一情况后，若不给个说法，刘、齐的脾性是不会放过的，便带话给刘、齐，找时间一定会给两位兄弟一个交待。

但谢还未来得及处理，吴新源便一通电话告进了日本四谷警视厅，指控刘焕荣等涉嫌恐吓。

这是日本警方求之不得的。刘焕荣与齐惠生早就列入了日本警方的黑名单，但若无充足的证据是不能逮捕的。这下可有了借口。

1月26日凌晨5时，日本四谷警视厅70多名警员分头行动，分别包围了谢聪富、齐惠生与刘焕荣的住处，结果三人均被捕获。

刘焕荣离开时告诉“大支”，请替他找位律师。然后，他就被带到四谷警视厅。这才发现，有不少朋友已在这里。警方见

况，便将刘焕荣隔离单独审讯。但刘焕荣拒绝回答问题，除非律师在场，结果遭到警察的殴打，可见日本的人权也十分糟糕。

在日本扣押的20多天里，刘焕荣不停地抗辩，声称："我承认杀人，但是在台湾；我承认我是帮派的一分子，但是也在台湾。"

最后，日本警方决定不起诉刘焕荣，而在台湾的极力要求下，将刘移交日本移民局，刘再遭拘留。一个月后，台、日双方达成协议，决定将刘焕荣交给台湾警方处理。

1986年3月6日，日本移民局将刘焕荣押往羽田机场，交给台湾国际刑警科科长丁成城及刑事局卢副局长等人，乘台湾中华航空公司班机返回台北。

在返回台湾前，刘焕荣向日本警视厅提出一项要求，希望与"大支"相见一面，警方答应了他的要求，安排他们相见。他俩相拥而泣，泪流满面，在痛哭中分手告别。

到了台北，警方就展开连夜审讯。尽管母亲为儿子刘焕荣请了李进勇律师为其辩护，但刘焕荣涉及五起杀人大案及其他多项罪名，终不能换回他的死囚命运，被台北地方法院判处死刑，剥夺公权（政治权利）终身。台湾十大枪击首犯刘焕荣从此结束了他的黑道生涯。

第十一章

黑道军火大王许金德

1986年12月23日晚7时，台北国际刑警局接获菲律宾警方发来的情报：被称为台湾“地下国防部长”的军火走私集团头头许金德等数位黑社会分子、通缉犯藏匿在马尼拉市一栋公寓大厦内，望速派人来菲，共同捕捉。

次日下午，台湾刑警局国际科科长丁成城率几名手下强将火速赶到马尼拉，与菲国警方立即制订了围捕方案，于是一场国际性的围捕罪犯活动随即展开。

圣诞节前夕，菲律宾首都马尼拉，一片节日气氛，特别是经过长期斗争，刚刚推翻了独裁的马科斯政权，建立了以科拉松·阿基诺为首的民主政权，人民兴高采烈，尽情欢庆。

晨曦刚刚在哥伦比亚铁塔上映出暗暗的冷光。马尼拉山柏勤仙道街一栋11层公寓大厦附近，一批荷枪实弹的菲律宾警员迅速向这里集结，很快将其包围。同时，200多名保安军人封锁了附近所有通道。

各行动小组按部署进入预定地点，指挥车里发出命令：“开始行动！”各路人马迅速出击。

以台湾刑警局国际科行动组组长丁成城为首的30名台、菲军警人员冲进3楼3105房间。“不许动！双手举起！”他们将五名华人围堵在里面，进行搜查。

丁成城持枪扫视一遍，目光停留在一个身材瘦小的男子身

上。

“许金德！”丁成城大喝一声。

这个男子闻声一惊，迅速从口袋里掏出一粒药片塞进嘴里。他就是许金德。原来他自知终有一天法网难逃，早就在身上随时准备好了毒药，以备在必要时刻就服毒自尽。丁成城这位台湾刑警局的高手一个箭步冲上前去，一只手臂卡住他的脖子，另一手从背后猛拍一掌，许金德“哇”的一声将药丸吐出。

许金德发现计谋被识破，便挣扎着指指卫生间，对丁成城说到：“到里面，我有话单独和你说。”

丁成城将许金德拖到卫生间。“兄弟，放我一马，这些全是你的。”许金德边说，边从口袋里不可思议地掏出两万美金和五万菲律宾比索。早就风闻许金德身边总有几万救命钱随时应急，今天丁成城亲眼所见，果然名不虚传，着实令他震惊。

丁成城却不为巨金所动，拉开卫生间的门，命令手下警员将许金德铐起来。

其他各路行动小组也都在预定地点围捕各自的目标。在5楼5027房间捕捉许金德集团的成员章锦梁时，这个身材粗壮的家伙拒捕，还大打出手，拼命反抗，但寡不敌众，被多名刑警制服，并从他身上搜出两枚手榴弹。

台湾警员何招凡带领菲律宾警察冲进11层，敲响了1108房门。“请开门，我们是移民局的。”

“你们找错人了！”里面的一位男子回答，却不开门。

原来，警方从得到的情报所知，这套房子里住着两家人，分别是台湾军火走私集团的林和顺、王金山两家人。其中绰号“和尚”的林和顺在台湾黑社会是有名的狠角色，他不但不开门，还拿出手枪，准备反抗。

“和尚，不能开枪。”王金山看着身边的孩子与妻子，恳求林和顺。

“不开枪，难道还要在这里等死吗?”

“还是开门让他们进来吧，开枪是没有用的。”林和顺的姘妇方云卿也求他。

“你这个臭婊子，准是你告的密!”林和顺一个巴掌将方云卿打倒在地，发疯似地冲上前去死死卡住她的脖子。

王金山拼命拉开林和顺，让他冷静点。

守候在外面的警员准备破门而入。这时，王金山乘林和顺不注意迅速打开房门，数名警员迅速冲入室内，展开搜查，王金山束手就擒。菲国一位警官发现一男子带枪已爬到10楼阳台，命令他缴枪投降。而这个林和顺不顾一切，抓住水管向下滑落，却在惊慌之中失手摔下楼去，当场气绝身亡。

在这次围捕中，共逮捕了15名来自台湾和香港的黑社会成员，其中除台湾军火走私头头许金德及手下章锦梁与王金山等人外，还有香港“十四K”的重要人物。

许金德出生在一个世代务农的家庭，父亲许水成是一位憨厚老实的乡下种田人，母亲张严也是一位普通的农妇。

1958年，台湾海峡金门炮战最激烈的时候，许金德出生了，这是许家的第五个孩子，家中已有三位姐姐与一位大哥。家里人多劳少，日子紧张是可想而知的。

不久，他家搬到台南县新营市和平路三十二巷四号。这是一栋传统的瓦房。家里种有15亩地，一年三季的收成，使许水成整天忙于农活，而无暇管教子女。特别是许金德是家中老小，全家都宠他，使他从小顽皮，不爱读书。

1965年，许金德进入新国民小学就读，成绩一直平平。这时新营镇的济安宫大庙，香火鼎盛，常常有许多人前来朝奉，更吸引了各种小吃、摊贩、小商等聚集在庙前，形成一个像集市一样的热闹地区。这也成为青少年最喜欢来玩的地方。许金德也不

例外。

小学毕业后，许金德进了南新中学。可他不好好读书，还是常与同学到庙前玩，不时还玩一些带有刺激性的扑克牌、掷骰子的小赌博，不时还与小兄弟欺负小贩。初一还没读完，他已经常逃学、抽烟，与一些不三不四的少年混在一块。

父亲发现儿子这些不良行为后，不是耐心教育，而是罚跪、毒打，这种强制手段不但未能奏效，反而进一步强化了许金德的叛逆性格，他不但很快退了学，还常常不回家，在外与一帮比他年龄还大的青少年混日子。

位于嘉南平原的新营镇以前是台南县的一个农业重镇，是粮食与其他农副产品的交易集散地，民风纯朴，当初除了少数的地痞、流氓之外，不曾有黑社会帮派组织。不过，随着台湾战后工商业社会的迅速发展，情况逐渐发生了变化。60年代，这里相继出现了由青少年组成的“纸厂帮”、“魔鬼帮”、“大庙帮”等黑社会帮派组织。

1966年前后，新营制麻厂因市场变化而停工拆除，制麻厂的员工一部分被裁减失业，一部分被转到新营纸厂工作。而被裁掉的大多是年青的临时工，他们无事可做，便常聚在一起，不时与纸厂的员工混在一起，进而形成纸厂附近的一个角头，并自称“纸厂帮”。

“纸厂帮”的出现，很快对当地青少年发生了影响。一些青少年纷纷找当地的地痞流氓投靠，以壮大声势。其中一名绰号“和尚”陈敬德的大流氓，就成为不少不良青少年的投靠对象。很快，陈敬德手下有了不少小兄弟，便组成“魔鬼帮”，自己当了老大，平时靠经营赌场为生。

济安宫大庙附近的青少年常受到“纸厂帮”与“魔鬼帮”小兄弟的欺侮，便也成立“大庙帮”，以集体力量来对抗。很快，家住这里的许金德就加入了新营地区的角头组织“大庙帮”。同

时，“文星帮”、“王公庙帮”、“小天地帮”也相继成立，新营镇已是帮派林立，从此，帮派之间展开争斗。这些帮派还颇讲江湖规则，事先约定时间、地点，然后拿着武士刀、扫刀、木剑等传统武器进行搏斗。

许金德加入“大庙帮”时只有15岁，整天跟着“大庙帮”的“二齿”刘镦信、“细余”余文秀、“阿草”陈进雄、“阿雄”林三雄、“文山仔”李文山等大哥到处闯天下。在一次手持武士刀的滋事中，许金德被警方抓获，首次在拘留所度过了五天的铁窗生活。

两年后，在一次“大庙帮”与“纸厂帮”相约火并中，只有17岁的许金德与十多位“大庙帮”弟兄前往迎战，不料“纸厂帮”不讲江湖规则，他们手持各种武士刀、扫刀与钢笔手枪预先埋伏等候。许金德的兄弟们赶到后，一看势头不对，撒腿就跑，可他却不慌不忙地慢慢走，结果被“纸厂帮”分子抓走，押到一条河边，让他讲出几位“大庙帮”大哥的住所。他却坚持不说，结果被狠打一顿，还被外号“旺仔”的老大李清风，用一根木剑打断了他的右手手骨。

事后，许金德在道上的名气开始上涨。“旺仔”李清风担心他报告警方，又托人到他家讲和，并送上一大笔医疗费，却被许金德的老爸给骂了回去，返回来，又教训儿子道：“要出去混，就要有本事，给人家打伤了或打死了，你自己负责，否则就不要出去混。”

这句话极大地刺激了许金德，让他铭刻在心，并立下誓言：一定要在道上混出个名堂来。

伤好之后，许金德便向“纸厂帮”下战书，约定“大庙帮”与其在南昌街决斗。

1977年7月12日下午，许金德纠集“大庙帮”数十人与

“纸厂帮”李清风率领的兄弟在街头庙口展开了一场混战。只见棍棒齐飞，刀剑乱舞，双方打得难解难分。混战之中，忽然“砰”的一声，将挥动原始武器的兄弟们震住了。原来，李清风用土制钢笔手枪对着“大庙帮”的兄弟开了一枪。“大庙帮”虽然人多势众，但冷兵器抵不过火力强大的热兵器，许金德一声口哨，“大庙帮”兄弟落荒而逃。

许金德在台湾黑社会本省籍帮派内是一个善于总结经验与把握机会的人。这次决斗，他深深地认识到“火力”的重要性，弄枪装备自己就成为首要选择。

这年11月，许金德从丰原市（现为台中县县政府所在地）一个黑社会组织借得一只散弹猎枪，这枪虽不上档次，却很实用，杀伤面大。他的第一个目标就是3个月前用土造手枪打败了自己的“纸厂帮”老大李清风。

11月2日凌晨1点多钟，坐落于新营市（这时新营镇已从一个镇改为一个县辖市）民权路和三民路交叉口的“王子冰果店”已快打烊，风尘女郎和流氓混混正各自归巢。当李清风醉醺醺地走出冰果店没有几步，早已埋伏在暗处的许金德对准他就是一枪，李清风两条腿被散弹打成了蜂窝状。

这一枪击案发生后，警方发出缉捕许金德的通缉令。许金德四处藏匿。这时，他的老父亲因生气中风而病卧在家，土地变得荒芜，15亩地只好大部分卖出，仅留下一小块而已，家境也更加败落。

在外逃亡期间，报刊、电视不断报道许金德的消息，在台南县、台南市、甚至高雄市与台北市等地都传有人以许金德的名义向公司商家勒索的事情发生，让家人也为他受累。

许金德也曾想自首，可是一想到别人犯的案都算到他的头上，又无人能为他证明，他又不敢前往警察局自首。例如，台中黑道分子绰号“美国博”的林博文在被警方抓获后，供称所有枪

支弹药是向许金德买的。但林博文被执行枪决，他已死无对证。于是他想到了嘉义的黑道老大哥李慧昌的结局：自杀。他将想法告诉了一位道上好友。这位朋友讲，自杀是弱者的表现，一点意义也没有。况且你的女朋友为你生的四岁女儿还在家等着你呢！

还好，许金德听了朋友的话，没有自杀。他回到新营，又投靠了以经营赌场闻名的“大庙帮”老大林三雄。老谋深算的林三雄利用这个机会，要许金德向原“魔鬼帮”的陈敬德寻仇。

此时，当年曾要砍断许金德手脚的陈敬德已收山，退出了黑社会组织，但因其过去老大的地位，仍是新营一霸，并因赌场纠纷与林三雄再次结怨。林三雄深知许金德有仇必报的性格，便出钱出枪，怂恿许金德向这名“金盆洗手”的老大下手。

1979年3月10日零时，陈敬德在武信街与第二市场街十字路口被许金德用白郎宁手枪开枪打死，陈尸街头。许金德再度成为通缉要犯，而他的名字在南部黑社会里更加响亮。

许金德杀死陈敬德后，又开始了“跑路”生涯。

台湾云嘉一带的纵贯线帮派组织，与南北黑道组织的作风不同，颇讲义气，北部的黑道人物犯了案，只要搭上纵贯线，就可一路安全抵达南部避风头；南部的黑道人物出了事，亦可循同一路线由纵贯线到北部藏匿。许金德就是纵贯线黑道上的重要人物之一。

原来，许金德在逃亡期间，曾在云林、嘉义一带躲避，颇受当地黑道兄弟的照顾，令他十分感动。于是他日后对危难中的黑道人物也十分讲义气，只要需要他的帮助，他便毫不犹豫地慷慨相助。而这些得到帮助的黑道人物就会成为他日后的靠山，对他报之以李。

与全省各地黑社会大人物一样，许金德手中的钱也主要是来自赌场，其中也有帮道上兄弟解决纠纷后得到的酬劳。他依靠自

己的经济实力，资助了不少被判重刑或死刑的逃犯、通缉犯，而这些逃犯也成为他的得力助手。

70年代末，许金德与台北、高雄、台中、彰化、云林、嘉义等地的黑道角头盟会结拜，组成了“十二兄弟会”，并通过各种手段勾结在地方上有权势的民意代表、商人等，编织成了一张复杂庞大的黑色关系网。

也从这时开始，黑社会组织也随工商业的迅速发展而现代化。原来的武士刀、扫刀及土制枪等传统武器已经过时，不能适应新的环境与时代要求，纷纷用更先进的各式枪支来装备自己。各帮派之间为展现自己的武器装备实力还展开竞争，更加引起对军火的大量需求，也造就了许金德大规模的武器军火走私。

1981年初的一天晚上，许金德与几位道上朋友在一家酒店聚会。席间，有人谈起了不久前一场黑社会战斗的内幕。

“你们知道竹联帮前些日子翻车的事吗?”一位老大有点神秘地问道，然后自己又娓娓道来。

原来，台湾的军火走私一向被控制在台湾本省籍的角头组织手中。而日益坐大的外省籍帮派“竹联帮”为了给自己的突击队配备武器，决定黑吃黑。据“竹联帮”内部得到的情报：南部黑道控制的走私集团将由花莲偷运一大批枪械进岛。在总堂堂主陈启礼的亲自命令下，“竹联帮”的突击队队员立刻分乘四辆车赴北宜公路拦截。双方在路上展开了一场混战，“竹联帮”突击队虽损失一辆车，但众兄弟截获一辆货车，开回台北大本营。可是打开一看，里面只有一把白郎宁手枪，其他全是走私录像机，让“竹联帮”大失所望。

许金德听后，略有思索，却没有讲话。他心中早已有数：枪的多少与好坏已成为黑社会角头老大权威的象征，帮派组织实力的代表。有枪就是草头王，火力就是实力。特别是在他看来，有枪就能赚大钱，就能获大利。因为黑道上这些有枪的人，不仅要

有军火的不断供应，还要尽量保护这些提供军火的人，不能让其被捕。于是，许金德决定成立一个军火走私组织，专门从事军火生意，这将是一个赚大钱的门路。从此，许金德揭开了台湾大批军火走私的序幕。

到80年代初，由于黑道上对枪支的大量需求，一时出现了四大军火走私集团，还是供不应求。枪还没进来，货已定好；货已到，便迅速完成钱货交易。

1984年2月17日，屏东县警方得到一宗军火走私情报，迅速上报。上面十分重视，台湾“法务部调查局”亲自批示，坚决截获这批枪支，否则流入社会，对社会治安将造成极大威胁。于是台北市与高雄市调查处出动3000多人，配合屏东县警察局，连夜向走私集团的交货地点屏东林边集结。当时因天黑，还发生了警方自己人的短暂枪战。但很快停火，并按总指挥的命令，各路人马及时到达集结地，准备行动。

晚上11时半，当两辆走私军火的车子到林边的郊外交货时，埋伏的警员迅速出击，兵不血刃，就将这个军火走私团伙一举抓获，在车上搜出数百支手枪、冲锋枪和大批子弹、手榴弹，这些武器可以装备两个连的兵力，并逮捕了十多名黑道分子。

屏东林边这次军火走私案的破获，再次震动了台湾社会，人们开始为自己的安全担心。官方不得不加强枪械的管制，重新修订《枪炮弹药刀械管制条例》。但利益所在，这并没有能阻吓军火走私集团的行动。

许金德更加猖狂地走私军火。据警方的资料，许金德集团控制了台湾三分之一的军火走私市场。

据说，许金德在替台湾南部一名身兼黑、白两道的人物处理一件政治上的纠纷时，获得了这位大人物的赏识。此人不仅有很多黑道朋友，还与南部政坛及军界人士关系良好，在当地很有影响力。许金德依靠此人的关系，结识了菲律宾的军火贩子，便共

同合作在台南将军溪、北门、嘉义布袋镇、屏东等数百公里的海岸线一带从菲律宾走私军火。

在军火走私中，许金德采取中盘代理商的方式进行。每次在菲律宾采购到枪支弹药后，通过电话或电报用暗语通知台湾方面的接头人，然后派出雇用的走私船立刻启程，由军火走私集团的人押船取货。当船靠近台湾外海时，由准备好的大塑胶管拼成的筏子接应装货。这种非动力装置，很难被警方的巡逻艇上的雷达发现。装好货的筏子由熟悉当地地形的人驶向安全停靠点。这种偷运方式成功率极高。其中专为许金德军火走私集团偷运枪械的“幸福号”渔船五次偷运接送，均获成功。

许金德还通过多种关系建立了走私专线与专用渔船。在这条专线上，有16名重要成员，仅1985年7月到1986年底，他们控制的“幸福号”渔船就走私军火、偷渡人犯达12次。

这一带海岸线的渔民也从这种偷运中获得不少好处，甚至不少人因此而发财。他们可以说是这批军火走私者的帮手。他们不仅不举报，还当“眼线”，一旦发现警察，便会迅速向走私者通报消息，走私接运船就会躲藏下来。风声一过，暗号传到，货又上路。有时这些军火走私者还声东击西，故意让警方抓些小批量的不重要弹药，以便让警察向上缴差，趁机偷运大批真货。

这些军火走私者的方法无奇不有，变化多端。他们把小型枪支、弹药藏在鱼腹，冰冻成块，或混杂于废五金中，拆散装进进口轿车的保险杠、沙发椅里，或大型集装箱夹层、挖空的原木中，直接泊靠码头闯关。

为确保安全，许金德卖枪交货极为小心严格。他首先要确认对方的身份及购枪用途，如交情不够，需先付定金；一般关系则只卖左轮手枪与白郎宁手枪；威力大的冲锋枪、手榴弹等大火力武器则要留给与自己关系密切的黑道兄弟。交货地点多选择在高速公路的交流道或人员稠密处。货一脱手，迅速驱车离开或混入

人群。为了防止意外或黑吃黑，在交货地点周围都派人持有强大火力事先埋伏进行监督。

许金德从军火走私中获得了巨额暴利，不仅成为黑道闻名的大盘中间商，更成为身缠万贯的地下大富翁。他出入以高级轿车代步，房间里配备了无线电对讲机，晚上睡觉都有保镖站岗。

这位发迹的黑道大亨开始经常出入赌场，更是一副不可一世的派头，一掷千金，赌钱如流水。每逢他邀赌客捧场时，都派专人驾车将对方接到赌场。对方输了，必须当场开出支票付账，待取得现金后再派车送回，决不能赖账；对方赢了，许金德二话不说，立刻付现金。更令人不可思议的是，他身边总有两样必备品：毒药和大把的票子。前者用来赌命，后者用来赌钱。这就是黑道大亨的气魄！

许金德走南闯北，结识了台湾全省各地黑道角头老大。岛内接二连三的黑道枪杀案发生，也无不与他有关，不是他直接参与，就是他提供武器。

许金德常常与“芳明馆”老大绰号“红毛水泥桶”的廖胜美及“珍珠呆”梁国恺混在一起，专门接济各种黑道亡命之徒和死刑犯。1981 年 7 月，黑道分子张忠信用三支手枪打死了仇敌王鸿基。警察在追捕时，张忠信拒捕被打死。他所持用的手枪就是许金德提供的。

1983 年 4 月 30 日上午 10 时，台中看守所吴森山等六名羁押被告（四名为沙鹿镇劫钞案嫌犯，两名涉及一件枪击伤害案），趁会见亲属还押之际，击昏、刺伤两名法警，越过近五米高的围墙，搭乘在外接应的一辆“福特”轿车，越狱成功。一周之后，警方得到消息，前往台北县板桥市翠华街围捕，吴森山持一只 M16 自动步枪拒捕，被警方击伤后抓获。

经警方调查得知，吴森山等人之所以越狱成功，是有预谋

的，在越狱前一周，就先用同狱死刑犯“大头成”给的锯条把脚镣锯断，然后用随时可以打开的铆钉连接起来。这些铆钉是一个名叫“阿安”的黑道朋友探亲时夹带在食品中送进来的。M16步枪也是“阿安”提供的。这个“阿安”其实就是许金德。在道上，一些朋友称他“阿德”，也有朋友叫他“安安”，还有人称他“阿安”。吴森山正是许金德在过去逃亡期间结识的好友。在朋友有难后，许金德便挺身而出，多方营救，提供越狱条件。没想到，他的朋友最后仍是未能逃出法网，还罪加一等。

在开头提到的那个摔死于菲律宾的林和顺，也是许金德的干将之一。林和顺生于一个收购鱼货为生的家庭，从小因母亲离家出走而失去了家庭的温暖，成为街头小太保。后来应征兵役，不到三个月就当了逃兵，从而走上了一条勒索、抢劫，甚至杀人的不归路。1983年7月19日，他和同伙在云林县法院大门口，持枪劫走了一个准备审讯的囚犯，一举震动台湾岛，警方却未能将他抓获归案。不久，他就成为许金德的军火走私的经销人和随身保镖。许金德开始向黑道人物卖军火时，都由林和顺直接出面处理，事成之后，再向许金德汇报。

另一名在菲律宾被捕的的许金德同伙章锦梁，是云林地区黑道闻人，与堂兄章锦树在台西都是有名号的黑道人物。这两兄弟曾追随云林地区颇有影响的政坛人物林明义，并为其竞选县议员效力。

1981年底，林明义为感谢他们的鼎力相助，在西螺镇宴请招待，碰上了林明义的竞选对手丁日清。此人也非等闲之辈，曾以《台西风云》一书闻名全省，也是黑白两道叫得响的人物。对头相遇，分外眼红，章锦树在林明义授意下向丁敬酒。丁日清很傲慢，不给面子，让林下不了台，双方当场翻脸，发生激烈争执，性格暴躁的章锦树拔枪就射，当场将丁日清击毙。

消息传出，丁日清的人马，像胞弟丁云南、结拜兄弟黄正卿等人带着半自动散弹猎枪和左轮手枪四处追杀林明义、章锦树等人。警方得到情报后，也四处出击，化解了一场可能的死亡之战。

林明义，1954 年 6 月出生，台湾云林县人，嘉南工商职业学校毕业，是黑道名人，国民党党员，是个跆拳道爱好者，曾演过电影。1982 年，他出山竞选县议员失败，并因涉及数起案件遭到通缉。1986 年，他再次参选县议员，获得成功；1992 年、1995 年与 1998 年三度当选为“立法委员”，成为黑道进入政坛的风云人物。

后来，章锦梁在黑道纵贯线上结识许金德手下的另一干将陈建鹏，并将其吸收为军火走私集团的重要成员。不久，章锦树被捕。

与许金德关系密切的黑社会风云人物或杀手还有梁国恺、石国梁、曾家瑞、江钦良等人，他们不仅人人手中有走私进口的冲锋枪和手榴弹，共同参与军火走私，而且个个血案累累，作恶多端。一时间，不论是商界老板、地方政坛人士，还是小商贩、妓女户，都成为他们敲诈勒索的对象，若有不从，轻则掏枪威胁，重则押人绑架，搞得西海岸中部地区人心惶惶，不得安宁。1985 年 5 月 26 日，梁国恺等人驾车去餐馆的路上，与一骑摩托车的人因争道发生争吵，对方不服，他就拔枪将对方打死。刚过一月，林和顺、石国梁等人因在街上滋事被一巡警劝阻，结果将巡警打伤，抢走摩托车逃跑。

以强大的黑社会组织与黑道人物为后盾，许金德控制了台湾南部的军火走私，北部的军火走私则被“万华帮”老大庄辉丰控制。两个团伙，一南一北，互相呼应，各有自己的势力范围，不时还相互调借货源。但 1985 年 6 月，庄辉丰走私军火案发，警

方展开追捕，在枪战中庄辉丰被击毙。许金德趁机将庄的保镖廖志宏收为手下，其势力延伸到北部。廖志宏追随许金德后，与章锦梁等人沆瀣一气，为害一方。同年9月，云林县议员林棋栋因经济利益纠纷被廖、章等人开枪打死。在菲律宾的围捕行动中，廖志宏趁乱脱逃，成为漏网之鱼。

一起又一起的枪杀案，在社会上引起极坏的影响。这些案件又大多与许金德有关，引起了台湾“警政署”的重视，要求台南市警察局不惜一切代价破获许金德军火走私犯罪团伙。

台南市警察局接到上级的指示，十分重视，迅速制订“青安专案”，诱捕许金德。事实上，逮捕许金德这已不是第一次。自许金德早年犯案以来，他已连续14次名列每年警方发布的十大通缉要犯之中。当年，台南市警察局还悬赏3万元奖金捉拿许金德，也未能抓到。许金德还曾打电话给警察局：“你们悬赏的奖金太低了，还抵不上一支枪，我要你们好看！”真是狂妄至极。

为了加强南部地区刑侦力量，特别是堵住日益猖獗的军火走私与遏制枪击案的接连发生，台湾“警政署”特地将在1984年“一清专案”扫黑行动中立下赫赫战功的台北市刑警大队长张友文南调，坐镇台南。

张友文一到台南市，第一个目标就是抓获许金德。为此专门制定了详细的捕获方案。首先是搜集与了解有关许金德的所有资料与线索，然后设立“青安专案”，布置眼线卧底，打入犯罪集团内部，很快派遣蔡姓警官打入许金德军火走私集团。其方法是，从已抓到的罪犯口中了解与许金德有接触的黑社会人物，蔡警官以被警察局查出曾参与黑社会组织而被记过、进而开除的名义，投奔许金德。

为取得许金德的信任，蔡姓警官有意向许金德透露警方“青安专案”的行动情报，逐渐获得许的信任，进而被收为保镖，与许金德一起逃亡。蔡也不时利用机会向局里报告许金德的动向。

1986年元旦刚过，蔡警官发来情报说：许金德和他的贴身保镖林和顺、石国梁等人准备于2月10日清晨沿海岸线偷渡出境，许金德可能落脚在北门村附近。台南市警察局迅速出动，派了大批警察在北门到将军溪沿线一带埋伏，“霹雳小组”（镇暴警察）随时准备出动。为了对付有强大火力的许金德一伙，张友文特别从台北市刑警大队借调15个透明防弹盾牌、10件新式防弹衣武装在一线打冲锋的警员。还特别在北门一带设立临时指挥所。2月9日晚，100多名训练有素的警察趁夜色包围了北门村，并在各巷道路口布满了荷枪实弹的警察。

在北门村的一栋公寓房子里，许金德的贴身保镖石国梁、曾家瑞找到房子的主人绰号“大鱼仔”吴吉雄来探路，为许金德的偷渡预作准备。晚上8点多钟，章锦梁和蔡姓警官乘一辆红色轿车驶向这栋公寓，再次观察动向。许金德、林和顺、江钦良、陈建鹏则没进村，在外面一家酒店等候消息。

进入公寓后不久，蔡警官告诉章锦梁要方便方便，借机从厕所逃脱，刚跳出窗外，就被埋伏的一个便衣警察发现。“你是干什么的?”对方喝问。

“赶快报告张局长，许金德10点左右才能到，千万不要打草惊蛇!”蔡警官命令道。

两人的谈话很快就被在厨房的“大鱼仔”妍妇听到，迅速进屋告诉章锦梁、吴吉雄。章锦梁从侧门闪出，对准在外正在讲话的蔡警官连开两枪。蔡警官猛一侧身倒地，也拔枪回射。一场警匪枪战爆发。

布防在正门的警察立即开枪还击，封锁大门。石国梁、曾家瑞也边打边退，退到阳台后，翻墙冲进另一邻居家，随即将一个11岁的小姑娘抓住当作人质。惊慌失措的主人苦苦哀求：“放开她，我们出钱。”

“我们不要钱，你们让外面的警察放条生路。”石国梁一边命令，一边抓住小姑娘不放。

小姑娘家人哪敢怠慢，忙跑出门向警方求情。

这时警察已包围了现场，并不断向石国梁、曾家瑞喊话，要他们缴枪放人。

但这两个亡命之徒怎会轻意缴枪放人，反而命令警察放开一条道，否则将与人质同归于尽。警方只好让开一条道：石国梁挟持人质向外撤，曾家瑞拿着枪跟在后面，随时开枪自卫。

两个歹徒一直退到100米开外的一辆轿车旁，正在开门上车之际，小姑娘看到警察的手势，猛地趴倒在地。警方迅速向歹徒射击。曾家瑞还没来得及钻进车，就被击中倒地。石国梁则已转动了方向盘，加大油门，不顾一切地向前驶去，冲出不到200米，后轮胎被子弹击中，车子猛地一晃，冲进巷道旁的水沟，警察一拥而上，将已满身血迹的石国梁拉出车子，送往附近医院。

一场激烈的战斗结束，歹徒一死一伤，而许金德等其他罪犯却在听到枪声后逃之夭夭。章锦梁也趁乱冲出包围，保住一命。人质被救，警方也无一人伤亡。但“青安专案”功亏一篑，功败垂成。

北门村围捕失败后，警方又于4月6日在彰化市郊的牛埔里包围了许金德走私枪械集团的两名重要成员江钦良、陈建鹏。

陈、江二人也是台湾中部黑社会要角，曾伙同章锦梁、林和顺持枪恐吓勒索商家，获取大量不义之财。北门村枪战后，许金德与陈建鹏、江钦良等人分头活动，有事电话秘密联系，再进行碰头。

警方一面通缉罪犯，一面搜集情报，到处布线。根据所得情报，陈、江两人常在江的姘妇吴丽茹住所活动，便派便衣在附近观察、盯梢。

一天下午两时许，便衣发现陈、江两人又来吴处落脚，便迅速通报上级。警方紧急出动，迅速包围了陈、江的住处。“嘟嘟”，一名警察敲门。

陈、江觉得奇怪，没有人知道这个地方，怎会有人敲门？是不是警察发现了什么，便让吴丽茹在阳台探望。“不好，警察包围我们了！”当吴发现外面停有几辆警车后惊叫道。

陈建鹏迅速拿起身边的冲锋枪，一把将大门拉开，举枪向外扫射。江钦良也抓起手榴弹向外扔去。在门外的两名警察应声卧倒，但已双双受伤。江钦良趁机持枪冲出，企图越墙而逃。刚翻身上墙，埋伏在旁的警察迅速拔枪射击，江钦良肩部中弹，摔下墙来，连滚带爬又回到房里。

警方随即向屋内发射了两枚催泪弹，顿时屋内白烟弥漫，气味刺鼻闷胸。陈建鹏见势，自觉难逃法网，举枪自杀。身负重伤的江钦良、吴丽茹被活捉。

一个月之后，黑道兄弟为陈建鹏在他的家乡沙鹿镇举行了隆重的葬礼，出动236辆花车组成浩浩荡荡的主车队，有美女表演的18辆电子琴花车在前，8辆南北管乐车队在后，由50至80人组成的大型乐队分为五个方阵跟随其后，出殡队伍绵延数公里。场面之宏大，黑社会势力之猖獗，确实让人感到台湾黑道的不一般。

许金德手下几名大将不是死在枪下就是被捕，对其黑道走私集团打击不小。按理其走私活动本应有所收敛，以防全军覆没。但他没有，一方面加强对警方的防备，经常变化藏匿地点，行无定踪；另一方面继续进行军火走私，不仅通过各种关系在蔚蓝公司套汇260万元资金购买枪支，还在菲律宾金丰银楼驻台北办事处经营非法金融业务。许的手下人员用大批资金在菲律宾购枪，由台湾的走私渔船从菲律宾的一个号称“小台湾”的岛屿源源不

断地偷运进来，再贩卖给黑社会或其他犯罪分子。

为了不被警方抓获，又能离开台湾，许金德不能通过正途乘飞机离开，便与林和顺、章锦梁等人乘走私船偷渡到了菲律宾，在这里不必担心警方时刻搜捕。许金德甚至还狂妄地打国际长途电话给台南市警察局："告诉张友文，他不是要抓我吗？我会给他好看的！"同时他还指使在台湾的小兄弟，不时给张局长邮寄"冥纸"与恐吓信。张友文局长对此并不十分在意，因为他经历的此类事情太多了。但他绝不能让罪犯逍遥法外，表示"不论许金德跑到天涯海角，也要将他捉拿到案。"

许金德、林和顺等人偷渡菲律宾后，将走私军火贩卖工作交给一个绰号叫"疯琴"的人负责。此人真名卢照琴，人称"萧琴"，是台湾黑社会闻名的"赌博郎中"，是诈赌高手。在一次赌场大对决中，他遇到了"竹联帮"的宋大凯，诈赌计谋被宋当场揭穿，不仅钱财赔光，还落得个"赌博相公"，大失颜面。卢怒气难消，便找来了两名打手，携带四支手枪，将宋大凯打死在赌场，一枪而名，成为黑道上的狠角色，黑道兄弟不再叫他"萧琴"，而称他"疯琴"。他因人命案而逃亡，结识了许金德，并成为其走私集团下的一位军火外务员。

许金德逃到菲律宾后，卢就负责在台的军火走私联络。因其在北台湾关系广大，枪支销路极好，从而造成社会上枪支泛滥，枪击案不断发生。

为打击枪械走私与犯罪，进而破获许金德军火走私集团，警方全面出击，大力扫荡与军火走私有关的黑道分子。

1986年12月22日晚，台北市新加坡舞厅，舞曲回响，灯光闪烁，舞客翩翩起舞。这里正是黑社会分子经常出入的地方。今晚，10多名打扮为舞客的"霹雳小组"成员也进入舞场，伺机行动。

9时左右，训练有素的“霹雳”警察的刘队长一声令下，10多名队员同时分头行动，一举抓获六名黑社会分子。其中在一名歹徒身上当场搜出一枚手榴弹，从另外两名分子身上搜出两把白郎宁手枪。警员在一个名叫金明生罪犯的箱子里查出一只微型乌兹冲锋枪和一百多发子弹。

被捕的这几位均是横行台湾中、北部地区与走私枪支有关的黑社会重要成员。为首的金明生则是许金德、卢照琴的售枪中介人。就在被捕前的三个月前，金明生在高速公路中清交流道以40万元与卢照琴成交购得一批枪支弹药。这些年轻的黑道兄弟便四处寻仇滋事，动辄在餐馆舞厅亮枪耍威风。就在一个星期前，金明生在台北绿洲饭店因小事与另一派的黑道兄弟发生争吵，便拔出枪，将三重市的黑道分子李双木及饭店女经理打伤，造成轰动一时的“绿洲饭店血案”。

根据金明生的招供，警方获知了以“幸福号”渔船为走私运送军火工具的重大线索。每次军火运到台湾，都是由一名绰号“二齿”的人接货，然后交给“疯琴”出售。许金德则在菲律宾专门采购枪支弹药。至此，警方基本掌握了许金德军火走私集团的活动情况，便通过国际刑警局与菲律宾警方取得联系，准备采取联合行动，抓获许金德。

与台湾同处太平洋西部的菲律宾，长期以来，政局动荡，社会治安混乱，而台湾却加强了打击黑社会分子的行动，菲律宾的马尼拉便成为台湾黑道人物藏匿的最佳选择。一时间，台湾许多知名的黑社会分子或通缉犯先后来到马尼拉，像“竹联帮”天堂堂主王国庆、信堂堂主邱文钦、执法汪沛雷、总堂杀手黄少岑，“四海帮”老大刘伟民，毒品犯施玉笔，通缉要犯刘焕荣、齐瑞生等等。许金德如今也来到菲律宾藏匿。

台湾这些黑道人物在马尼拉均相互认识或有来往，多以赌博为生，也有不少人从事不法生意。

自齐瑞生、刘焕荣在菲律宾犯下天门血案（杀害陈氏华侨一家）后，菲国警方对来自台湾的黑道与犯罪分子采取防范措施，但因无切实证据无法抓捕而收效不大。

这次，台湾警方与菲国采取联合行动，便得到菲国警方的有力配合。

据台湾警方得到的情报，许金德有一名叫“阿英”的情妇，挂名“育圣有限公司”业务副主任。许金德因案在身无法办理正式结婚手续，两人只能是“地下夫妻”，并育有一男一女。“阿英”自许金德偷渡到菲律宾后，经常以考察业务为名到菲律宾“探亲”。许金德手下大将林和顺的女友方云卿也于1986年6月后不知去向。方云卿原是个私生女，17岁被母亲卖到台中妓女户，花名“甜甜”。许金德的同伙曾家瑞在风月场所认识了“甜甜”后，两人便开始了同居生活。曾被警方打死后，“甜甜”又与曾的朋友林和顺混居一起。

台湾警方根据这两条线索经过几个月的监控跟踪，终于发现“阿英”、“甜甜”及另两名女子（一个是章锦梁的女友，一个是王金山的妻子）在台湾与菲律宾马尼拉出入居住的地点。

1986年12月8日，台湾刑警局局长卢金波以去中南美洲访问为名，悄悄飞往马尼拉。马尼拉西区警察局长林亚斐洛准将接待了卢金波一行4人。于是演出了24日的围捕行动，将许金德一伙缉拿归案。

12月27日，许金德、章锦梁、王金山等人在菲国警察和武装人员的押解下，由两辆军车开道，分乘4辆防弹轿车被押上华航812次航班，飞往台北。

4小时后，飞机抵达台北中正机场。为防意外，航警局在机场把守站岗，15辆警车在“霹雳小组”的戒护下，浩浩荡荡驶出机场，将许金德等人押往台北土城看守所。许金德就此结束了他十四载的坎坷江湖路。

1995年3月27日，许金德假释出狱后不久，因拒绝通缉要犯詹龙桦、吴庆男的勒索，结果他本人连带司机被对方押走，随即在新营市郊被杀害，时年37岁。一个曾纵横台湾南北的黑道人物就此结束了生命。

第十二章

黑道大哥在东瀛的峥嵘岁月

日本是一个法制化程度高的国家，但黑社会组织之庞大、人员之多，也居世界前列。二战结束后不久，日本的黑社会曾达到一个高潮，黑道人物高达 18 万人，比当时的军队人数还多。目前，日本全国的黑道人数达 10 万人，相当于美国黑手党的 20 倍，即使意大利黑手党组织也望尘莫及。

由于地缘与历史的关系，台湾黑社会与日本黑社会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在日本，有不少台湾黑社会组织，更有不少老大级的黑道人物。

台湾光复后，许多曾经依靠日本人逞凶作威的台籍流氓纷纷逃到日本谋生，靠日本黑社会重新发迹。像“十二生肖帮”、“芳明馆”、“会社尾”、“蜘蛛党”、“牛埔帮”等帮派的一些元老都是通过这种方式在日本致富，然后“衣锦还乡”。

台湾彰化人陈三郎，早年跑到日本混迹神户码头，以猛、狠闯天下，成为山口组首脑的心腹。后来，他更跃居山口组“舍弟系”中的“九三组”组长，手下有 6 家大旅馆。他也是日本“山口组”第一个到台湾投资饭店的人。

1977 年，为了招待台湾黑道老前辈“蚊哥”（姓许，是台湾最早的黑道元老之一，在道上地位甚高）来日，陈三郎动员了神户、东京、大阪、九州的“山口组”隆重接待，轰动了台、日两地黑社会。

30多年前，台湾的何茂汜浪迹日本神户，面对生活压力，他在码头上讨生活，赤手空拳在异国打天下，建立了台湾的黑社会组织。30多年后，他成为日本黑社会的知名人物，虽然已是退居幕后，是一位商场巨贾，但在黑道界仍有一言九鼎的威力，常出面为黑道帮派协调纠纷，化解矛盾。

台湾光复后不久，经济萧条，社会动荡。黑社会帮派也处在一个重新调整时期。

离台北市不远的台北县土城、三峡一带曾是偏僻的农村，就成为黑道分子与罪犯躲藏的地方。在土城长大的何茂汜便结交了不少社会上各形各色的罪犯、黑道兄弟、小混混等人物。日子一久，他也成了不良分子，成为警方通缉的要犯，四处逃避。

1948年6月，何茂汜与一帮兄弟在台北县三峡镇的一个山林聚会，寻求出路。经一番商议，决定偷渡出境，到日本打天下。

他回到土城的家里，把自己的打算告诉新婚不久、已有身孕的妻子，确实让妻子大吃一惊。尽管不愿意，但她不可能阻止，只是希望他保重，不要忘了她，期待有朝一日再相会。何茂汜含泪告别妻子，头也不回地走出家门，在一个浮云掩月的夜晚，同一群20岁左右的青年人乘一艘木制机动渔船从台北淡水港出海，向东北方向驶去。

他们来到日本神户，开始寻找一份能糊口的工作。

神户是日本的一大城市，也是一个世界级的大港口，经常有大批轮船进出港口。战后的日本，也是百废待兴，找一份工作并不十分困难。

他们来到码头，很快就找到了工作。不过世界各地都一样，码头是龙蛇混杂、帮派云集、环境十分复杂的地方。神户更是如

此，码头由日本黑社会所控制。

神户码头最大的势力就是日本黑社会的龙头老大“山口组”。这是一个组织严密、人员众多、势力庞大的黑社会帮派。由于日本对台湾长达50年的统治，台湾与日本有着纵横交错的复杂关系。黑社会系统也是一样。在日本的“山口组”，长期以来就有不少台湾兄弟，有些还是颇具影响的重量级人物。

80年代初才病逝的陈三郎就是典型的一位。陈三郎是台湾彰化人，铁匠出身，练有一身好功夫，还是一个神枪手。在日据时代，为谋生活，他从高雄乘渔船来到日本，混迹码头。在那个时代，功夫的高低，常成为实力的象征。他的功夫被“山口组”所看重，吸收他为成员。由于他的骠悍善战，在多次黑道争斗中，为“山口组”立下汗马功劳，其地位也扶摇直上，曾被“山口组”已故的首脑田冈当作左右手，从而在日本黑社会享有很高的知名度。

后来，他进入商界发展，在生意上也大有所获，但仍是“山口组”的巨头之一。据说若不是他在大阪病故，有可能接管“山口组”的首脑位置。

“山口组”在神户码头的一个重要生财之道就是走私。战后初期，日本药品缺乏，经营药品利润很高。黑道分子便与不法商家勾结，从事药品走私。其方法与现在走私没有什么两样。最常见的就是：商船在神户的外海海边，把用防水布包装好的私货，一包包丢到海里，然后，岸上接应的人就用小木船出海到指定海域打捞，再将这些货交给私枭，领取应得的报酬。

当时来日本、在码头打工的台湾青年在装卸货物的同时，就利用晚上的时间替控制走私的黑社会到海上捞私货，赚一些外快。也不时做一些手脚，私自留一点私货。

日子一久，这些浪迹日本打天下的台湾青年发现要在日本立

足，仅此不足以壮大自己的力量，便组织起“台湾帮”，何茂汜被推为老大，并开始拥有自己的刀枪等武器，以对抗日本黑社会的欺负。

一天，一位兄弟匆匆跑到码头仓库的一角，告诉何老大：“我们在捞包时动了手脚，被三口组的人知道了，很可能找我们算账，我们怎么办?”

在黑道上，只讲实力，别的无话可说。何老大认为，要在这里混下去，只能硬碰硬，与他们决一雌雄，否则就难以长期立足。在黑道上，实力强弱的重要一点，就是是否拥有枪支，而不是刀器。于是何老大指示：“我们要多寻找几把枪，加强火力，要出乎日本鬼子的估计，这一仗，我们一定要赢，才能将他们的气焰压下去。现在就行动，把枪弄来。”

他们很快从朋友那里买来十多支枪，准备迎战。

果不其然，两日之后，日本神户“山口组”的人，邀码头上的“台湾帮”谈判，地点在离海边不远的一座小山坡上。

午夜，四辆车子先后抵达谈判地点，“山口组”成员纷纷走出汽车，一位头头毫不客气地要“台湾帮”的人把“吃”下的私货全部交出来，否则就不要怪不客气。其他成员迅速四散，准备采取行动。就在这时，只听到“台湾帮”何老大一声令下“干”，与“山口组”谈判的四位“台湾帮”成员随即来了一个地滚翻，全部躲到汽车下面，拔枪射击。埋伏在四周岩石后与山坡上的“台湾帮”兄弟用十多只枪向“山口组”射击，打得“山口组”人马手忙脚乱，无法还击，很快就投降缴械。

以后双方也经过多次较量，“山口组”均未能占到便宜，于是提出协商，邀请“台湾帮”加入神户“山口组”，结成统一战线，以免两败俱伤，这也预示着台湾兄弟开始在日本神户有了一席之地。

从此，不少“台湾帮”兄弟加入了日本最大的黑社会组织

“山口组”，并成为其得力干将。前面提到的陈三郎就是这时加盟“山口组”的。

一位台湾来的李先生后来成为“山口组”一个分区的头目，名义是担任当地“环境保护工会”理事长，实际上他全权负责当地的清洁工作，从中掌控“政府清洁预算”与收费，这是日本黑社会获利的方法之一。

一位台湾的蔡姓男子在日本经营一家制冰厂，供应当地商店。实际上这也是幌子，其实他从事的的任务是从每家商店收取“保护费”。你从账目上看到的是冰块的收费，是一种合法经营，其中的内幕只有他们“山口组”的人知道。

“山口组”较强调黑道伦理，非常讲究辈分，而且执法严格。成员相互见面时，用暗语手势招呼，以表明身分。每人身上的刺青，往往是表示其辈分的，不能随便乱刺。

据传，一次一辆大卡车与马路上另一辆小轿车迎面顶住，尽管大卡车的车道不对，但司机坐在驾驶室，盛气凌人，就是不肯让道。年轻的小车司机一声不响地下车，一件一件将上衣脱去，露出一身美丽的“纹身”图案。看到此，卡车司机吓得魂不附体，赶紧下车趴在地上向年轻人叩头，然后将车开走。原来，他从对方身上的黑道标志已知道自己犯了道上的规矩，只能向对方赔不是。

日本黑社会经营的事业十分广泛，但在当时仍以传统的娱乐、赌博为主。由于“台湾帮”成员的增加，其活动也延伸到台湾。据台警方调查，确有“山口组”成员在台湾投资餐饮业。

到日本发展的台湾兄弟相当多，因不是一个山头或帮派，而经常互相斗争火并。

50年代初，台湾黑道名人绰号“大头贵”的李进贵到日本讨生活，也成为日本黑道上的一个小头目。他在日本的生意做得也有起色，赚了不少钱。但脾气不好，性格暴躁，对兄弟们也不

够意思，本应属兄弟的部分，他“通吃”不论，得罪了不少人，引起兄弟们的不满。

兄弟们将此事告诉在日本黑社会已有影响的何茂汜，何便找他算账。

一天，何老大在码头上见到了“大头贵”，向他谈及兄弟们的意见时说：“阿贵哥，弟兄们认为你做得太过分了，我们是好兄弟，所以才劝你。”

没想到，“大头贵”却生硬地来了一句：“我爱怎么着就怎么着，那些小角色，想要插一手，是不自量力！”

“阿贵哥，话不能这么说，大家都是从台湾来讨生活的，都不容易，我们当大哥的，总要照顾那些小兄弟一点。”

“大头贵”顽固地说：“要照顾你去照顾，我可管不了那么多。”

“阿贵哥，你真的不肯听小弟劝告，一定要固执下去?”何老大耐心地讲。

“大头贵”有点不耐烦地说：“我就是这样子，我警告你，以后少管我的事，我不吃这一套，否则别怪我跟你翻脸。”

他们俩开始争吵起来，有一触即打之势，在旁的兄弟们将他俩拉开，但俩人从此结下梁子。

何老大忍无可忍，下决心要把“大头贵”干掉。

就在临近神户港口码头不远的地方，“大头贵”开了一家酒馆，由于这里是船员与驻日美军士兵的常来之地，生意颇为红火。“大头贵”每天晚上在打烊前都会来店看一遍。

何茂汜早已掌握了“大头贵”的生活规律。

在一个下着小雨的周末晚上，何茂汜带着装有7发子弹的白郎宁手枪来到酒馆附近徘徊，伺机下手。

10时许，一辆黑色的轿车急速从远方驶来，然后又慢慢地进入小巷，停在酒馆门口。车子刚停下来，车门还未来得及打

开，何茂汜就拔出手枪，一个箭步冲到车前，对准坐在右侧的“大头贵”连开6枪，“大头贵”当即倒在血泊之中。

当坐在后座上的两名保镖清醒过来冲出车子时，已找不到何茂汜的身影。

此举震动了神户市，也惊动了这里的黑道兄弟。而何茂汜的名字却更响亮了，成了道上兄弟眼中的英雄。

经过数日躲藏之后，何茂汜经过一番考虑，将自己的一些私人事务处理好后，决定向警方投案自首。结果，他被判处7年徒刑。

在坐牢期间，不少道上朋友经常去看望他。其中已在“山口组”任要职的陈三郎也多次前来关照。

出狱后，在陈三郎的协助下，何茂汜开始经营一些小事业，在经济上颇有斩获，并常向台湾的妻子寄钱。

令人惊奇的一点是，何茂汜不像其他黑道人物有三妻四妾，女人一大堆，他没有。他在日本长达30年，却没有抛弃妻儿，与妻子有着极深的感情。

就在台湾不少兄弟加入日本的“山口组”的时候，这位在黑道上混迹多年的何老大，始终没有加入“山口组”，却在日本黑社会有着非同一般的地位，他甚至能出面调解日本黑道之间的纠纷。

在神户一带，黑社会帮派不少，除了最有影响的“山口组”外，还有“松田派”等小帮派。这两个帮各有自己的地盘，较少发生冲突。但日子久了之后，两帮兄弟多少会发生摩擦，引起双方的争斗与冲突。

一次，“山口组”在神户的一名地区组长，在一家俱乐部里面与“松田帮”的人发生冲突，遭对方枪杀，“三口组”难以容忍。“松田帮”因实力弱，为避免事端，将开枪的人交给警方处理，但“三口组”仍不罢休，还是将幕后策划者找到，将其押到

海边的一处悬崖上，枪杀之后扔进大海。

从此，这两个帮派的仇恨越来越深，双方都不肯让步，经常进行火并厮杀，日本警方却坐山观虎斗，让其自相残杀。老一辈的黑道人物试图出面调解，不希望双方再斗下去。于是，他们想起了黑道上的“独行侠”何茂汜。何虽然在黑道中发迹，与黑道上的人打交道，但却没有参加任何一个日本帮派，而是独来独往。结果，经他出面协调，“山口组”与“松田帮”握手言和，结束了双方的血腥厮杀。

何茂汜在协调达成这一黑道上深具影响的和解之后，在日本黑社会中的声望达到巅峰，人缘广增，他经营的青果生意也越做越大，成为道上的巨贾。有了经济基础，他在日本的台湾籍华侨界的地位也与日俱增，为台侨解决纠纷，也排解一些黑道麻烦。

1970年，日本举行世界博览会期间，台湾派“副总统”严家淦参加。为了安全，台湾方面特别找到在日本黑道上有影响的何茂汜与陈三郎等协助，保卫“副总统”的安全。结果，何、陈指挥出动了近700名黑道兄弟在东京到大阪的各路道上暗中保护。

这些在日本的台湾黑社会老大回到台湾，好似荣归故里，受到台湾官方的热情款待与欢迎。

前几年，何茂汜的妻子离开人世，其葬礼之隆重令人意外，台湾各地的黑道兄弟纷纷前来祭悼，足见日本黑道上的这位何老大影响力之大，在台湾与日本黑道上的地位之高。

在今天日本的许多大都市，台湾黑社会分子仍十分活跃，主要以做生意与开赌场为生存手段。这里也是在台湾犯案的黑社会分子常来躲避的去处，东京的新宿地区就是日本台湾黑社会的大本营。

第十三章
黑道兄弟杨双五大逃亡

1987年12月7日晚7时40分许，日本东京新宿，久保大厦702室，猝然响起一阵枪声，划破寂静的夜空。

日本警方接获报案后，迅速奔赴现场，惊异地发现公寓大厦门前躺着一名血淋淋的壮汉；702室门旁，倒着一具被乱枪击毙的尸体；另一名男子被枪击中眉心，横死在地。

日本警视厅立即成立专案小组，连夜展开调查取证。经初步证实，两名死者是来自台湾的黑道帮派分子，分别是“四海帮”老大刘伟民与其朋友王镇华。

王镇华年仅25岁，曾是台湾“疯狂暴雨帮”的成员，专门在深夜打家劫舍。1975年，这个帮派被警方破获，王镇华被判刑12年。出狱后，他离开江湖，决心重新做人，干起贸易生意。1987年，新婚不久的他来到日本谈生意，不料横祸发生，死于乱枪之下。

倒卧在大厦门口身受重伤的是高雄地区黑道分子萧清风，他是这次枪击要犯杨双五（日本名加藤祥康）的贴身保镖。

消息传到台湾，引起的轰动不亚于日本。除台湾警方展开调查、追捕逃犯外，“四海帮”成员更是怒气冲天，迅速从全省各地连夜赶回台北，积极策划，准备展开追杀凶手，为其老大刘伟民报仇。

刘伟民是年38岁，是“四海帮”的龙头老大之一。1981年

1月，港台武打明星王羽因赌债欠63万元，引起赌场恩怨。在刘伟民的指使下，王羽被其手下兄弟连砍7刀，并进一步演变为“四海帮”与“竹联帮”之间的“法庭血案”。刘伟民因此被判刑入狱，但不久又获释放。从此刘伟民在黑、白两道的名字更为响亮。

1984年，台湾历史上规模最大的扫黑行动“一清专案”开始，刘伟民又被列为首批要犯。特警出身的刘伟民之母试图凭在警界的关系为儿子办理自首，以求减免刑责。但这次不同，“一清专案”扫黑是最高当局盛怒之下展开的，刘伟民仍被列为抓获对象。

迫于无奈，刘伟民整装远行，潜往菲律宾。不料，仇人路窄，在菲律宾遇上曾在台湾结仇的“竹联帮”“么么”黄少岑与潜逃菲律宾的另一仇人刘焕荣。刘焕荣是一个杀人不眨眼的杀手，不知有多少台湾道上兄弟与无辜者死在他的刀枪下。他还放话，要杀掉刘伟民。面对这一局势，刘伟民告别菲律宾，转往香港发展。

在香港期间，刘伟民曾度过一段最暗淡的时光。他昔日的仇人王羽在香港可是有势力的人，也无法在香港站稳脚根，事事不顺，处处受挫，只能靠台湾兄弟的接济度日。

不久，他持有的菲律宾护照过期，无法在香港停留，又潜往广州，住在朋友付绍良处。

在生活无着之际，刘伟民又回到香港，策划绑架港星“阿伦”，索价4000万元新台币，但未能得逞。1987年，他被香港警察驱逐出境。刘伟民转往澳门。

正在刘伟民处境维艰之时，从警方手下逃跑的台湾“电子游戏机大王”李求铭也潜往香港，找到重新潜回香港的旧识刘伟民。这位逃犯与刘伟民不同，是有“活银行”之称的一个富翁，据说拥有5亿元的资产，希望两位难友合作，在香港开创一片新

天地。

闯荡天下已久的刘伟民认为1997年香港要被中国政府收回，加上王羽在港势力，这里不易发展，应到台湾兄弟比较多的日本打天下。于是两人启程，奔赴日本。

1987年10月5日，刘伟民乘坐的日本班机飞抵日本成田机场，在日本的“四海帮”成员亲自前来迎接，接着这里的黑道兄弟为刘伟民举行了一连串的接风宴会。在宴席上，新旧朋友畅所欲言，无所不谈，但谈得最多的是他们帮派的势力与生意问题。“四海帮”成员看到老大到来，便向他诉说杨双五的霸道行径。性格火爆的刘伟民便向朋友们拍胸保证，要收拾杨双五。但道上是非多，人员复杂，不知谁竟将这些谈话告诉了杨双五，埋下了一场血战的祸根。

在台湾黑道人物聚集的日本新宿，刘伟民遇到了交情深厚的台湾“华山帮”朋友林重南（日本名“华山一郎”）。

林重南于1985年在台湾宜兰县罗东镇金舞台歌厅，因安排表演猥亵煽情的歌舞，遭到警方取缔。他与同伙吴坤泉等人不满，阻拦警方执行公务，并抢夺警员收集证据用的照相机，而遭警方通缉。

1986年6月，因索讨赌债，林重南与台中地区的黑道兄弟杨隆丰等人在台北北投热海饭店发生冲突，互相开枪射击，林打死一名对方成员，又开始逃亡。

次年4月，林重南来到日本新宿，开起麻将赌场。这里已成为台湾黑道在日本的大本营，也是日本黑道分子云集的地方，双方因利益经常发生冲突。

从台湾来此发展的台湾枪击要犯杨双五，在日本籍母亲的帮助下，加入日本籍，改名加藤祥康，与日本黑社会组织“山口组”关系密切，在此雄霸一方。林重南见到刘伟民来此发展，认为这里道上是非多，日本黑道势力强大，杨双五也已建立了相当

基础，不希望刘伟民在此插足，而是另谋出路。但性格倔强的刘伟民不愿屈服杨双五，况且也无处可去，没有退路，还是决定就留在这里发展，并加入林重南的麻将赌场。

林重南为免介入是非，种下杀身之祸，安排好刘伟民后，自己于1987年10月前往菲律宾，在马尼拉市希尔顿饭店后面租了一间房子，建成椰子城卡拉OK餐厅，专做中国人的生意。

12月6日晚，杨双五带了一帮日本与台湾道上兄弟，来到刘伟民与“华山一郎”林重南合开的麻将场，进行赌博。玩了几圈后，杨双五拿出200万日元，丢在台面上，希望入股麻将场，共同经营，共享利益。而粗暴刚烈性子的刘伟民毫不给面子，竟将钱摔在地上，刘的兄弟立即准备，伺机行动。精明狡猾的杨双五虽然非常不满，但不敢发作，这里是刘、林的天下，他们兄弟多，动起手来，绝不是对手，便一言不发，捡起地上的钱扬长而去。

杨双五走后，刘伟民也自感处事轻率，认为对方一定不会罢休，便连夜打电话到台湾，召集原先就计划来日本新宿的“四海帮”兄弟们紧急动身，立即飞往日本。但远水不解近渴。朋友还没赶到，就在次日晚上，刘伟民的兄弟们正在702室打牌谈天，杨双五带着保镖萧清风及一群日本兄弟突然闯进房间。刘伟民一看苗头不对，便迎上前去责问对方，双方顿时争吵起来，从欺负兄弟、争赌场到昔日恩怨都数落了出来，越吵越激烈。刘伟民前后已被日本人围着，更为生气，就出手给了一个日本人一个巴掌。杨双五随即拔枪，刘伟民更是动作神速，先抽出手枪向杨双五射击。谁知早有预谋的杨双五身穿防弹背心，未能击中要害。在一阵乱枪中，刘伟民与前来捧场的王镇华中弹倒地身亡，萧清风也被击伤在地。杨双五随即逃离现场。

日本东京新宿是台湾黑道聚集之地。台湾许多黑道要角经常来此躲案或发展。在这里，除了杨双五、刘伟民等台湾黑道老大外，台湾的黑道杀手刘焕荣、齐瑞生、齐惠生等人也曾来此发展。杨双五在投靠日本“山口组”后，横行华人社区。也有不少在台湾混不下去的黑道分子投靠他，像“联宏帮”的陈耀国等人就拜在杨的旗下。杨双五等人继承早年混进日本的黑道人物衣钵，积极为日本黑社会组织提供在台湾南部地区的活动联络据点，搜罗旧部为日本黑社会经营赴日本卖春、毒品贩卖等不法勾当效力。对不顺从他的人，杨双五就进行欺压。刘伟民被杀，就是不顺从杨的结果。1984 年因“一清专案”亡命日本的“猪屠口帮”分子郑俭辉，也是因赌场利益与杨双五结怨，受到杨的威胁。

刘焕荣和齐瑞生在菲律宾杀人后，也逃到这里，住在齐瑞生的哥哥齐惠生那里。齐惠生是台湾“牛埔帮”的一员老将，也因杀人案逃到菲律宾，后来到日本发展，在大久保开设赌场，几年下来也赚了不少钱，引起杨双五的不满。

刘焕荣在日本不久就被抓获遣送回台。齐瑞生在日本加入齐惠生的赌场生意，也受到杨双五的敲诈勒索，双方结怨。

1987 年 2 月 22 日，一名骑自行车的日本少年在经过琦玉县东松山市的一条山路时，猛然发现路边草堆一个血迹斑斑的尸体，迅速报警。

经初步调查，这位死者死亡时间在 20 小时以上，身上中了三枪，经确认他就是台湾、菲律宾与日本共同通缉的来自台湾的黑帮分子齐瑞生。有人怀疑齐瑞生之死与杨双五有关。但不久真相大白。台湾警方于 1987 年 3 月 4 日宣布，杀害齐瑞生的凶手之一谢聪智落网，案情急转直下。

谢聪智是台北“猪屠口帮”分子，父亲经营旅社生意 30 多年，是个日本通。1986 年，谢氏一家在东京都新宿开了一家东

方饭店。刘焕荣、齐瑞生曾因赌博与谢家结下怨仇。齐瑞生多次扬言要报复谢家，并不断对其饭店进行骚扰、闹事，其生意大受影响。

正在东京国际日语学院读书的谢聪智，找到了齐瑞生当年的仇人郑俭辉，要找齐算账。身高一米八零的郑俭辉，也是台湾黑道角头的狠角色。1987 年 2 月 21 日晚，谢、郑持枪来到齐瑞生住处，不由分说，就是两枪，将齐当场击毙。然后，谢、郑两人将尸体弃置荒野，分头逃跑躲藏。谢聪智回到台湾没几天，准备前往泰国躲藏，不料出发前被台湾警方抓获。齐瑞生命案至此真相大白，也使杨双五免了一场冤案。

不过没多久，杨双五却因杀死刘伟民成为逃犯。

杨双五在日本犯下杀人罪行后，台湾与日本警方同时发出紧急通缉令，追捕逃犯杨双五。

台湾的“四海帮”也立即举行紧急会议，迅速作出决定，全面出击追杀杨双五。很快，一批“四海帮”成员分别从台湾与韩国进入日本，寻找杨双五。为早日找到杨双五，1988 年 3 月，“四海帮”还散发“黑帖”，发出布告，悬赏 500 万元捉拿杨双五。

为了防止帮派之间再次发生火并，日本与台湾警方采取防范措施。日本警方还迅速将日本黑社会组织“岛田组”3 名成员逮捕到案。

台湾刑事局国际刑警科将有关资料提供给日本警视厅，进行合作，协助追捕。但杨双五却销声匿迹，不知去向。一时传说不断，有人讲他在台湾、菲律宾、新加坡，也有人说他在巴拉圭、夏威夷、广州，甚至传言杨双五已不在人世。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杨双五一时生死成谜，成为疑案。但台湾警方并没有放弃希望，仍在追捕。

台湾刑事局不断派刑警跨海出击，在追捕其他逃亡海外的要犯过程中，得到不少有关杨双五的情报资料，确认杨双五没死。

事实上，杨双五在朋友的协助下离开日本后，亡命天涯7年，一直游走日本、香港、澳门、新加坡、泰国及中国大陆等，行踪飘忽不定。

台湾刑事局局长庄亨岱提出了一项“引君入彀”缉捕计划。首先确认杨双五的身份。刑事局人员收集了杨双五的户籍资料、档案相片、指纹等，认定他是“中华民国”的国籍，并通过国际刑警组织，将资料复印件寄给新加坡、菲律宾与中国大陆等地的刑警部门，请求协助追捕。

1989年6月，庄亨岱亲自率领国际科科长张忠道、警员杨岱谚与黄国盛等到东南亚各国以考察名义，加强与有关国家警方的合作，了解杨双五的行踪。

东南亚国家的一些高级警官大多曾在台湾“中央警官学校”受训，与台湾警方关系良好，合作进展顺利。台警方将泰国作为重点国家，因为台湾相继在泰国抓获杀人通缉犯辜茂桢、林正兴与毒枭林政宗等。

台湾警方最拿手的就是派人打入黑社会组织内部，即所谓的“卧底布线”，寻找线索。经过一段时间后，“卧底”人员发现了杨双五，并开始进行接触。

据侦查，杨双五虽亡命海外多年，但一直同台湾高雄黑道人物有联系。

获得上级指示后，“卧底”便有意纵容杨双五购买“中华民国”假护照以掩护身份，包括他大陆女友的护照。

这两本伪造护照原申请人分别为：第一张名为卢明堂，高雄市人，1956年生，护照号码为M38944480；第二张是杨凤淑，1959年生，高雄市人，护照号码为M4344088。

不久，杨双五花了3000美元在澳门购得台湾的假护照。“刑事局”警员收到“卧底”“目标上钩”情报后，立即派员展开追捕。但因与澳门警方合作不顺利，不易在澳门拘捕。但得知杨双五与女友计划回到泰国度假，改在泰国拘捕。

台湾警员通过“卧底”诱骗杨双五，讲台湾、日本、大陆警方现均已知道他人在澳门，已派人前来拘捕。加上澳门赌场近年来多为台湾黑道插手，可能对他不利，应尽快离开澳门到泰国暂避时日。

台湾警方原计划在杨双五离开泰国机场时行动，一举抓获，但杨双五行前更换班机，台湾警员扑空。

1990年7月16日，台警方接获“卧底”消息，已查出杨双五住在泰国曼谷市一栋三层楼里。屋主是曼谷金由酒吧老板“万财”之兄。

情报还说，杨双五与女友计划在贴身保镖“阿宏”陪同下到泰国清迈、普吉岛观光旅游。

台湾刑事局乃决定采取行动，派遣国际科干员杨岱谚与何招凡于7月17日赴泰国，会同泰国“中央局”人员进行协调，讨论逮捕程序，准备联合展开行动。

7月26日，杨双五在泰国住处被捕。27日晚，杨双五被押送回台北。“总统”李登辉随即致电台湾“警政署长”，对刑事局在拘捕行动中表现的毅力与智慧表示欣慰，并对有功人员予以嘉奖。

这位江湖黑道枪击要犯杨双五，身高不足一米七零，看上去不显眼的他，却曾是台湾黑道上的风云人物，没有人敢冒犯他。

杨双五出生在一个高级警官家庭。父亲杨木水于50年代曾先后任高雄市警察局第一、第五分局的局长。由于职务与工作的关系，杨木水与商界交往较多，也因此常出入舞厅、酒店等风花

雪月场所，并在一家酒廊结识了一位日本籍女子加藤艳子，谱出一段异国情缘。

加藤艳子早在台湾光复前就来到台湾，后在高雄“招风阁”酒家当艺妓。

令人意外的是，杨木水55岁时竟老来得子，加藤艳子为他生了个儿子，为了纪念，特别取名“双五”（后来则常写为“双伍”，他自己讲两者皆正确）。

然而，幼年的双五命运多舛，相继失去父亲与母亲。1959年，杨木水退休后不久因病去世。事隔3年，加藤艳子改嫁日本商人加藤次郎，返回日本定居，将年仅10岁的双五留在高雄，跟着年迈的祖母生活，日子之艰辛，可想而知。

小学毕业后，杨双五考上了市五中（现在的苓雅中学），但因缺乏父爱与母爱，进入中学后就经常打架斗殴，成为学校有名的“问题学生”。

中学毕业后，他又考入国际商业职业学校，但只读了一年的书，就退学，在外浪迹，成为一个小混混。不久就被“万营宫帮”的老大“阿力仔”看上，收为贴身小弟。

可是这个“阿力仔”是一个吸毒者，常打吗啡，受到警方打击，“万营宫帮”一落千丈，杨双五另谋出路。这时他已17岁。

这时，绰号“五板”的台南黑道兄弟正好前来高雄打天下，急需网罗一批得力助手，于是杨双五成了“五板”的干将，专门负责赌场债务纠纷，不几年他也在江湖上有了点小名气。

当“五板”因赌被警方抓走后，已在江湖有多年磨练的杨双五便自立门户，成为“万兴帮”的角头老大。

1978年，台湾又进行全省性的大扫黑，杨双五未能逃出法网，被列为“恶性流氓”，送往小琉球管训了两年零八个月。

刑满释放不久，杨双五又因身怀枪械，1980年2月再度被警方逮捕，裁定送往绿岛管训7年。同年10月，他趁押送台北

保外就医的机会，从医院逃脱，成了一名通缉要犯。

1982年10月9日，杨双五前往高雄市三民区一家铁工厂，准备取回订购的枪械时，遭警方围捕。杨不仅拒捕，还开枪打瞎刑警梁郁文的眼睛，并从警方眼皮底下逃脱。

在日本母亲的帮助下，杨双五于同年12月来到日本，并以“加藤康祥”之名入了日本籍。但为了讨回在台湾的一笔700多万元的债务，又于1983年元月回到台湾。9月2日，演艺圈“青蛙王子”高凌风为了登台作秀，得罪了杨双五，他便在高雄市八德路美王饭店前开枪狙击高凌风，子弹射入高凌风的大腿。

杨双五接连不断的枪击事件，震惊台湾朝野，警方再次展开全面追捕。杨双五又逃回日本。他离开时留下1000万元给在台湾的妻女。后来，太太章彩凤还是向法院提出诉讼，请求离婚，并获核准。为了生计，她与朋友一起经营一家酒店。

杨双五被押回台湾后，刑事警察局侦察二队随即展开侦讯，杨双五坦承犯下5起刑事案件，但矢口否认涉及军火走私。这5起刑事案件为：

一是1981年1月20日，伙同刘文车、李富雄持枪在高雄市挟持林登财父子讨赌债。

二是1982年10月11日，在高雄市中华二路附近拒捕时，持枪击伤刑警梁郁文，致使其右眼失明。

三是1982年12月4日，伙同张春宝、张赐良、陈宗仁、张文雄4人，在高雄市楠梓区因赌债恩怨，以电话下令张春宝开枪击毙王仙楠。

四是1983年4月2日，在高雄市因不满歌星高凌风毁约，伙同张文雄、陈春长枪击高凌风成伤。

五是1987年12月7日，在日本东京新宿久保大厦702室，因赌场纠纷，在与“四海帮”老大刘伟民谈判时发生冲突，互相

展开枪击，刘伟民被杀。

然而，根据台湾警方掌握的资料，杨双五罪行累累，远不止他承认的上述五件。警方公布了杨双五一生犯案罪状与追捕过程：

1、1969年5月23日，因杀伤庄国滨被高雄市地方法院判刑7个月。

2、1969年7月，因杀人未遂被判刑8个月。

3、1970年4月，犯伤害案，未起诉。

4、1974年11月11日，因妨害自由案被拘役50天。

5、1975年4月，因枪击案被判刑8个月。

6、1977年11月11日，因妨害兵役案被判刑4个月，剥夺政治权利1年。

7、1978年10月，因公共危险罪（枪击）判刑2年。

8、1979年9月，因公共危险罪被判刑2年。

9、1980年2月，在台北市落网，送绿岛管训；11月利用保外就医机会逃脱。

10、1982年10月11日，在高雄市三民区一家铁工厂因开枪拒捕，打瞎刑警梁郁文右眼。

11、1982年10月31日，在高雄市与警方发生警匪枪战，在200多名全副武装刑警包围下逃脱。

12、1982年12月4日，伙同男子张春宝、张宪文等人向商人王仙楠勒索20万元，遭王拒绝，便将王枪杀。

13、1983年4月2日，在高雄枪击歌星高凌风。

14、1983年6月11日，偷渡出境，藏身于日本仙台市改名“加藤祥康”，并取得日本国籍。

15、1983年7月21日，日本警视厅应台湾方面要求进行通缉。

16、1983年7月23日，接受日本电视台“读卖新闻”采访，

否认在台湾所犯罪行。

17、1983 年 9 月 10 日，贴身保镖张文雄被警方抓获，查出杨双五拥有大批枪支。

18、1987 年 2 月，外界盛传杨双五加入日本黑社会组织“三口组”，从事包娼包赌活动。

19、1987 年 2 月 22 日，枪杀台湾警方通缉要犯齐瑞生。

20、1987 年 12 月 8 日，在日本新宿枪杀“四海帮”刘伟民、王镇华等人。

21、1987 年 12 月 15 日，日本警视厅发出通缉令，全面追捕杨双五。

22、1988 年 1 月，传闻杨双五潜返台湾取款，停留一周之后离去。

23、1988 年 3 月至 10 月，杨双五逃往东南亚，不久辗转进入大陆潜伏。

24、1989 年 1 月 26 日，杨双五在日本的贴身保镖张凌云在台北士林落网。

25、1989 年 12 月 12 日，传出杨双五在大陆深圳落网；不久又传出释放出狱。

26、1990 年 7 月 26 日，在泰国落网，被押送回台。

在泰国被捕时，杨双五像是一个富商，手上戴着价值百万元的金表。同居女友万进培也戴有价值不下 40 万元的钻石手表。在被押回台湾时，杨双五又交给万进培 3 万元美金、200 万日元、4 万多泰币作为女友的安家费，十足的一个“黑道大款”。

一个逃亡多年的要犯，靠什么支撑他的生活？他说，他在日本第一劝业银行拥有 4 亿日元的存款，都是他做生意、炒地皮赚来的。但外界怀疑是他贩毒、枪支走私获取的暴利，不然哪会有那么多钱。可他自己否认参与枪支走私与毒品制造。

杨双五称，他在日本炒地皮赚了不少钱，枪杀刘伟民案发后，四处逃避追击。后来，在澳门投资建了一家艺术品商店，同时在广州、厦门投资五金，还以介绍台湾商人做生意获取佣金。

杨双五在广州期间，结识了万进培。万进培广州市人，1960年生，高中毕业，曾在广东迎宾馆工作。1988年，她在广州市一家唱片公司买唱片时，与杨双五认识。她经不起杨双五的金钱诱惑，成为他的情人。

警方在泰国逮捕杨双五时，也以伪造“护照罪”，将万进培一同押回台湾。但如何处理万进培，却给警方带来麻烦。当晚只好让其住在机场“航警局”。次日台刑事警察局派专车接到刑事局，安排她住在女警办公室。结果在这里一住就是近2个月，警方不仅要供其吃、住，还必须时刻看护，防止被人“劫持”。直到9月19日，万进培才在台湾刑事警察局两名警员护送下，飞往香港，并转乘港龙航班机飞回大陆。不久，杨双五被送上法庭，被判无期徒刑，关进牢狱。

第十四章

“萤桥帮”老大张真大陆起伏记

1992年2月15日晚，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台湾黑社会组织“萤桥帮”老大张真被我公安机关抓获，并将于近日遣送台湾。

“萤桥帮”老大张真曾是台湾的通缉犯。偷渡大陆后，张真被称为海峡两岸走私的鼻祖，也被封为“黑枪皇帝”。他曾是北京市的“模范市民”，是上海复旦大学的大学生，儿子是北京大学的学生。他与著名画家范×、从台湾驾机回大陆的李先生是结拜兄弟，如今他被公安机关以罪犯之名即将遣返，从此结束了他在大陆叱咤风云的一段历程。

1989年之春，一场政治风暴席卷全国。各地大学生走上街头，进行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并从四面八方向北京城进军。

天安门广场绝食学生人数不断增加，问题变得日益复杂。然而，在福建厦门，虽有学生游行，但声势、规模却小得多，相当平静。与鼓浪屿隔海相望的厦门东海饭店，生意照样红火。夜总会夜夜笙歌，一天夜里却发生了一场惊人的摔杯、掀桌的砸场事件。事件主角就是台湾曾下令通缉的台湾黑社会“萤桥帮”老大张真。

这位台湾黑社会老大摇身一变成为一名大陆台商，在厦门发迹。

一天夜里，张真和一些台湾朋友来到东海夜总会。这里已有许多台湾观光客，也有大陆的公司老板、富起来的个体户。

总经理一见老顾客张真进场，亲自迎接，热情打招呼。张真就座后，便掏出100美元给主持人，要正在唱歌的漂亮女歌手为他唱一首“信天游”。他还侃侃谈到：信天游是大陆的一首地方民歌，豪迈凄凉，颇能唱出游子的心境，他非常喜欢这首歌，希望在座的朋友听一听。

这位歌手唱完一首歌后，张真与朋友们都在等着她为大家唱一首“信天游”，不料，却是另一首歌，有点令人失望，只好等下一首了。没想到下一首又不是他的“信天游”，张真有点不高兴了，找来经理问他是否已将百元美金与点歌单交给歌手。经理回答说全办了，张真只好再忍一下。

令张真不能接受的是，再接连两首歌都不是他点的“信天游”，他非常生气，脸色变得铁青，怒视着歌手与这里的经理。他在台湾是一位黑道老大，在大陆也是一个关系极广、有来头的人，手中更是多金，怎会接受如此待遇？他压抑着心中的不满。

这时，女歌手终于站出来报幕：“下一首歌是‘信天游’。”话音刚落，张真却猛站起身来，将桌上的杯子砸向舞台，接着将桌子推翻，并大喊：“不准唱！再唱就会有事！”

张真这一行动，全场震惊。乐队为了缓和气氛，奏起了“信天游”的音乐。结果是火上加油，张真更火了，冲到舞台，一路砸杯子，掀桌子，夜总会大乱。他的身边小兄弟紧随其后，没人敢上去阻拦。

随后，饭店保安人员即时赶到，将张真等人团团围住。张真却毫不示弱地说道：“刚才让她唱歌她不唱，现在她想唱，我不想听了！”饭店经理忙叫小姐将100元美钞拿来还给客人。张真接过这张美钞，拿出打火机，当场将其烧成灰烬。然后，他手一挥，带着众兄弟与朋友，推开保安人员，扬长而去。

张真在厦门的名气更大了。他来到厦门做生意赚了钱，财大气粗，就成为东海夜总会的贵客，没有人敢动他。他到厦门不久，来这里听歌，为了显示不同一般，捧一名喜欢的歌手，点一首歌，不只是100美金，而是大把大把的人民币，一晚下来，花了15万元，吓坏了当时所有听众，也一夜之间，轰动厦门城。

张真之所以这样做，也有他的考虑。他说："我要摆场面给那些大陆人看，他们才会信任我，会和我做生意。"

当然，张真的作为并非为人们所赞美，也不利台湾同胞的形象。张真对此却有自己的一套逻辑。他对砸场的解释是："我给礼在先，他们不给我面子，欺负人，我不弄一下，在社会上还怎么混?"他未脱在台湾江湖的一套做法。

张真从台湾偷渡大陆后，在福州遇到一位曾同是台湾黑道、狱中难友的绰号"杨仔"的朋友，真是感慨良多，两人畅谈一番。"杨仔"告诉张真，大陆生意很好做，他在大陆古董生意做得不错，赚了不少钱，在福建购了一笔土地，还在铜盘路五风新村买了两栋房子，希望张真能留下来，与他一起做生意。

这时，台湾岛内正在"扫黑"，打击黑社会分子，媒体也不断报道张真偷渡的消息，张真更担心一旦回台湾就会被捕，不但吃官司，还要以流氓罪（台湾将黑社会分子称为"流氓"）进行管训。

经过思考，张真决定留下来，与"杨仔"一块做生意，并派人回台湾拿来近百万美元，以台商的身份在厦门中山路开设了一家中山贸易公司，成为在此地台湾兄弟的聚会场所，来这里做生意、谈天的人潮不断。

这时，两岸还没有正式通商，一些贸易生意在台湾被定位"走私"，大陆将海上的民间贸易称为"小额贸易"，则属合法。其实，张真做的生意也不是"小额贸易"，是实实在在的走私。

台湾一些人来这边做生意都愿意找这位红人张真。他还雇用了不少厦门当地人为公司职员。他的生意也越做越大，大陆各地的商人、走私者将古董、字画，甚至文物拿来与张真做生意。不过，没多久，张真的朋友“杨仔”因走私古董、文物被大陆当地公安局拘留。

张真还在福州一带开设獒犬训练场，向台湾出售这种名贵的犬。据知，这种珍贵的獒犬是张真派人到西藏以每只5万元收购后，由军用飞机专程运至福州或厦门，经过训练高价出售台湾。据说，台湾90%的獒犬是张真提供的。

后来，张真又想在大陆干他的老本行，开设卡拉OK店。他在台北就开过好莱坞地下舞厅，赚了不少钱，于是他准备将自己在台湾开店的经验带到大陆，便在厦门购房装潢，希望开一家卡拉OK店，还专门到上海找了三位年轻美貌的姑娘，支撑门面。

为了让这三位小姐实地了解台湾酒店小妹是如何敬茶、送毛巾、递烟等服务，张真便派三位姑娘到台湾实习。他通过朋友，让三位小姐乘坐一艘大陆渔船偷渡出海，再安排台湾那边的渔船在预定沿岸接船到台湾，送到朋友开的酒廊实习。一个月后，三位经历宝岛游的小姐又偷渡返回大陆，张真的儿子张立岱也应父召随同三位小姐一同潜往大陆。

一切准备就绪，可惜卡拉OK店营业执照未能拿到手而告吹。

这次打击之后，张真领略到要在大陆做生意还要有较广的关系。加上他的好大喜功，向新来的台湾同胞夸耀他在大陆的关系，说自己与市长、省长都一起吃过饭。他还向台湾朋友讲，“什么叫大陆关系？谁的关系真正有多好？我的看法是在大陆有钱就有关系。”

但他发现又不全是。他进一步认识到如何用钱打开关系更重要，不然自己花了不少钱卡拉OK店也吹了。于是，他要闯荡北

京，希望能攀附更高的权贵，为自己的生意开绿灯。加上台湾当局加强海防巡逻，打击台湾海峡的走私活动，这对张真的生意很不利，特别是台湾常常把海峡的犯罪活动与他相联系，他在福建难以再有更大的发展。

张真来到北京，通过朋友先结识了曾驾机从台湾飞回大陆的李先生。他认为李先生在大陆有良好的上层关系，对他在北京的事业会有很大帮助。

两人在北京见面时，张真还送了李先生一只珍贵的劳力士金表，作为见面礼。很快，他们就建立了密切的关系。到1990年前后，他俩已几乎是“焦不离孟，孟不离焦”。

在李先生的介绍下，张真认识了著名画家范×。李先生与范×交往非同一般，已到了无话不讲、无事不谈的地步，甚至范连自己与前妻不和的事也谈。范×告诉李先生，他的原配曾以假眼药水让他用，企图毒害他的眼睛，以便使他不能作画，使他与情人断绝关系。

原来，范×早已与情人楠莉在北京同床共居，与原配已无任何感情，但为了形象，仍维持一个已不存在感情的婚姻。

说来也巧，范×和台湾高雄名人画廊因“真假画案”弄得满城风雨（范×的画在台湾颇受欢迎，不少画廊经营他的画，可范×却说他的画在台湾只有一幅是真的，其他的都是假的，这害惨了经营范×画的商人，引起双方的极大矛盾与争执）。

张真得知后，自告奋勇，愿意托台湾朋友替范×出气，讨回“公道”。

张真的热心与表现打动了范×。不过范×与张真自然是不同道上的人，一个是有知识的文化名人，另一个则是黑道闻人，所以范×希望张真能浪子回头，重新做人，并送了张真一幅“文质彬彬然后君子”的题字。

范×要张真熟背唐诗三百首，以提高文化素养。

张真也很高兴，愿意接受范×的指点。果真，张真努力学习熟记唐诗。据说，后来张真对“长恨歌”、“琵琶行”、“丽人行”等长篇唐诗也能背得朗朗上口。同时俩人开始了友好交往。范×常带张真参加北京一些公开的社交活动，给张真介绍更多的大陆朋友，也让张真多露脸，为张日后在北京的生意打开渠道。范×还把自己的画卖断给张真，希望张真在这方面赚一笔钱。

张真也给范×以回报，常参加范×主持的捐款活动。

一次，范×主编的《中华文化撷华丛书》要出版，张真便捐助15万元人民币予以支持。

在李先生与范×的帮助下，张真逐渐结识了北京不少上层人士，为张真的活动开绿灯。张真摇身一变从台湾的黑社会头头、通缉犯而成为北京市的“市民”，还配给他在海淀区一套房子。

有了北京市民的身份证，张真很是得意，以为只要在大陆不违法，台湾当局奈何不了他，昔日台湾黑道上的是是非非也就用不着劳神了。

张真的交往越来越广，应酬越来越多，经常要请客吃饭。

一次，张真与范×、楠莉、台湾来的李先生及特异功能大师张宝胜等相约在香格里拉吃饭，张宝胜进行了精彩表演，张真又结识了这位奇人。不过在结账时，李先生认识隔壁一桌某领导人办公室的人员，便让张真将账一块结了，一下子花去了张真近2000美元。

关系的增多，开销也在增加。没多久，张真在经济上有点支撑不住了，便开始筹划如何利用大陆朋友赚钱的问题。他很聪明，想到了一条好主意，就是希望以范×的画结合大陆制壶高手顾景洲的紫砂壶来赚台湾人的钱。

经过筹划，张真邀范×、李先生一同南下宜兴，拜访顾景洲。经过协商，最后达成如下协议：由顾景洲制造印有范×亲笔

绘图的紫砂壶，由张真负责经营，向台湾出售，利益分成。

这一合作果然奏效，紫砂壶轰动台湾收藏界，纷纷通过关系向张真订购。张真大发，赚了不少钱。

有钱生是非，一点不假。张真与李先生的关系开始出现裂痕。据说，李先生常以“上头”要办张真，需要用钱打通关节，向张真要钱。没想到，张真还真一度被公安机关审讯，后又很快释放。但后来形势的变化与结局，他们谁也没想到。

1989年之春北京事件后，范×就很少露面。次年11月，范×和情人楠莉由香港飞往巴黎，“投奔自由”，张真靠山不在，顿时失去依靠，形势逆转。

张真已无法再卖紫砂壶，无生意可做，他便来到上海，在茂名南路瑞金宾馆租了房子，开始读书。

张真这位黑道浪子还真想变好，通过关系进了上海复旦大学攻读工商管理。他还将自己的儿子送进北京大学外语系读书。

但他的心情依旧不好。他说，范×走后，他多次想自杀，只是为儿子才没去死。他告诉身边的兄弟说，“什么都是假的，女人是假的，金钱是假的，关系也是假的，只有真正的好兄弟才是真的。”他又相信黑道上兄弟间的真诚。

不过，张真与在法国的范×仍保持关系。范到法国一年之后，伸出援手，希望帮助张真摆脱困境，答应张真到他台湾办画展，展后将部分画留给张真经营。

张真甚是感动，积极联络台北的友人招待范×，并派太太专程回台接待。

然而，范×不曾想到的是，他一下飞机刚步出机场，就挨了台湾名人画廊老板胡雪鹏的一记拳头。而张真派的台湾兄弟也以铁拳回敬胡老板，多少为范×换回点面子。但范×在机场遭殴仍成为当时的一大社会新闻。

范×对张真的相助也表示感谢。范×后来谈到与张真的认识

时讲，他是在1987年底经李先生介绍认识张真的。据传，两人初见时，张真气色不佳，精神迷离，他随口说了一句：“你正在生死界、奈何桥徘徊”。张真闻言大惊，立即脱去上衣，露出纹身图案，背纹上有一小鬼手拿“生死界”的牌子，走在奈何桥上。

范×后来对一位记者说，他认识张真时，张真在大陆已有相当广泛的关系，他只是给了张真在大陆定居的权利，给了他合法的公民权。张真在大陆经商失败后，复杂的朋友关系对他不仅无利，而且有害。

张真是吉林人，1950年出生在台湾，家住桃园正光路，是“萤桥帮”黑社会组织的老大。在台湾犯有票据、杀人未遂、伪造文书、盗窃等案。

张真先后有4个太太，育有5个子女。其中一位太太是他在台南监狱时认识的。这位太太原是监狱的高级女职员，却下嫁了一位服刑的枪击犯张真，让许多人不可思议。

全身纹身，是张真这位黑道兄弟的标记。由于为人四海，对跨海投靠的台湾黑道人物关照颇多，而被黑社会分子称为“黑道皇帝”。

台刑警大队以他是“萤桥帮”老大及担任酒店保镖而提报为流氓。在警方的档案中，张真至少涉及以下几起重大案件：

一是1989年5月，台北市发生的永安钟表店抢劫案。抓获的嫌犯金起龙向警方供称，是张真在幕后策划及提供地点，并带走大部分赃物。

二是1989年11月，台北市刑警大队破获徐明来、林圣华贩枪走私集团，查获走私的大陆黑星手枪。徐、林等供称他们是张真的小弟，枪是由张真与杨玉斌由大陆走私而来，交给他们贩售的。

三是同年张真因案潜伏大陆期间，居中介绍私枭黄瑞明与宜兰“三泰六号”渔船船主从事两岸间的走私。

四是在1989年10月查获的“鸿渔号”载运54支大陆黑星手枪及1300多发子弹，被捕嫌疑犯王文供称，是向福州男子“张伟”所购。警方接获情报判断，张伟就是张真。

于是，台湾警方再次发出拘捕张真的通缉令。

台湾刑事局多次通过国际刑警组织及“海基会”向大陆发出通报，指陈张真为黑道老大，涉及走私枪械，要求协助逮捕遣返，并将张真的指纹卡、犯罪前科、通缉文书等资料传真给大陆。

大陆公安机关随即展开调查，发现张真不仅走私文物、古董字画，进行贩毒，而且涉嫌接运1989年的“民运人士”逃离大陆。于是，在掌握大量确凿证据后，大陆公安机关于1992年初将张真抓获，连同在北京大学读书的儿子一同遣送回台。

儿子张岱立是张真最疼爱的人，被他称为“小牛”。儿子外貌颇佳，还有一副好嗓子，所以他希望儿子有一天成为演艺明星，但未能如愿。人常说，有其父必有其子。儿子却很喜欢摆拳弄腿，爱上了跆拳道，17岁时已具两段水平，能以一根拇指伏地挺身，张真也很是自得。儿子到了大陆后，张真还为儿子请武林高手训练儿子，并送儿子先读长春市二中，后来进入北京大学外语系。

没想到儿子为他所累，也被遣送回台湾。张真十分内疚，他说：“该枪毙我就让我死算了，我儿子犯了什么大罪，要受这种待遇？他年纪小，在台湾没亲人，是我安排他偷渡大陆的。父命不可违，他能不听我的吗？不要处罚我儿子，一切都让我承担好了。”

儿子面对父亲手铐在身，心中感觉十分复杂。他说，从小我

与父亲就聚少离多，在大陆与父亲朝夕相处四年，我珍惜这段父子情。“在台湾时，父亲一直在台北，我跟爷爷、姐姐在基隆，我不知父亲是蛰桥帮老大，但爸爸回家洗澡，暴露出的纹身令我害怕。”

张岱立回忆着他的人生经历：

爸爸坐牢时，爷爷哄我说爸爸出国了！

父亲从不准我过问他的事，也不准我涉足任何“特种行业”，即使是他经营的酒店。也许是血缘的关系，我个性也很强，有人欺侮我，我就出拳头。

为了我打架之事，父亲对我拳脚相加，不时吼叫：“家里已出了一个流氓，难道还要出一个吗？”

小学六年级，父亲送我学跆拳道时对我说，练武，只是要你强身，如果练得有进步，希望你为国增光。

直到基隆铭传中学毕业，我与父亲相处的时间都是以“天”计算的。当 1988 年底父亲捎来口信，要我到大陆与他会合时，我毫不犹豫地答应了。13 个小时的船程，我因晕船呕吐，一路吃够了苦头。到了厦门见到父亲，所有的苦痛都抛到脑后。

不久，父亲要我和其他兄弟一样，在码头帮忙，照管獒犬训练场。晚上，大家去卡拉 OK 唱歌时，父亲却把我关在屋里让我读书，可见父亲的用心良苦。

为此，父亲在福州为我单独准备了一间房子，视听音响俱全，任何人不准进入此房。因为父亲经常往来于厦门、福州、上海与北京，担心他不在时我会被人带坏。

为了让我能很好地念书，父亲安排我到长春老家就读市二中高中二年级。这里很冷，我这个生长在台湾的人极不习惯。父亲还要我在冰天雪地练功。放假时，父亲带我去上海，请家教给我补习。三个寒暑假，爸爸完全是在陪我读书。爸爸自己还吃力地背唐诗。

一个叱咤江湖的人，能闭门苦读古诗，实在令人难以想象。

前年，我考上了北京大学外语系，父亲十分高兴。他与好友到一家酒店庆贺。从来滴酒不沾的父亲也喝了不少酒，还高唱一曲他最喜欢的“信天游”。他唱着唱着，流出了不知是心酸还是激动的泪水，这首歌道出了他的漂泊生涯，似乎就是父亲现实生活的写照。

本来父亲计划我在大学毕业后送我到美国留学，现在计划因父亲的被捕而中断了。他必须面对法律，我也同样。但对父亲的安排，我无怨无悔，虽然他是黑道人物，但对我而言，他永远是我的父亲。

1992年2月28日清晨，台湾海峡风平浪静，海阔天空。台湾军警人员身着便服，与台湾“海基会”官员在“成功级”军舰护送下搭乘一艘“忠诚号”运输船，从小金门九宫码头出发，向厦门方向驶去。

9时50时许，船只抵达厦门岛附近的大胆、浯屿岛中介海域。10时左右，大陆押送罪犯张真的船只也抵达预定海域。按事前协商，台湾“海基会”旅行服务处副处长蔡金美与专员苏祥铨、法律服务处官员黄国瑞及刑事局一行人登上大陆船泊，办理交换罪犯手续，大陆方面将罪犯张真父子交给台湾刑事局，依“海基会”与“海协会”事先约定，“忠诚号”船换上黄旗，驶向金门水头码头。随后，张真父子被送到金门金宁乡公所的拘留室，暂作停留。

张真一时成为两岸间的“名人”，各大报社追踪报道。台湾《中国时报》记者抢先一步，在金门对张真进行了独家专访：

问：你何时离开台湾？是通过什么管道？

张：我年轻时在台湾确实要能逞强，走上了黑道这条不归路，但我确实想改。1988年因我外甥在大陆结婚，我姐姐希望

我能去参加，但因我有案在身，还在假释中，所以我就在同年4月1日从基隆乘船偷渡出境，当时本来想回来，不料台湾一家杂志大篇报道我的行踪，我就不敢再回去了。

问：在大陆的生活情况如何？

张：我在台湾没有任何亲戚，在大陆却有四五十位亲人，所以决定留在大陆发展。而且我真的想重新做人，我在大陆读了两三年书，唐诗三百首我全部会背。英文念了3册，但是好人难当，想做好事，谁知道还是落得这种下场。

问：你何时取得北京市民身份证？

答：我是1989年11月7日，经中共统战部同意后，我缴出台湾身份证，取得北京市民身份证，大概我是“爱国台胞”。北京海淀区还配给我一栋房子。

问：听说你在大陆做了不少的善事？

张：我想重新做人，所以捐给北京教育经费15万元人民币，给长春也捐教育经费10万元人民币，他们还说我是“模范市民”，没想到我被捕遣送回台。

问：外界又封你一个“黑枪皇帝”的绰号，对此你有什么意见？

张：那是无聊的绰号，真的“皇帝”是那些有办法的人。你看我的下场，算是有办法的人吗？称呼我是“紫砂皇帝”、“獒犬皇帝”还恰当些，“黑枪皇帝”太难听了，也不合实际。

问：谈谈你和大陆画家范×的关系如何？

张：范×对我实在有恩，他也很疼我，把我当他的亲弟弟一样照顾，我对他也很敬重，所以我们之间一直处得很好。

问：范×出走与你有没有关系？

张：他为了理想出走，那是他个人的意思，跟我扯不上关系。

问：范×出走对你有何影响？

张：确实有，我觉得很没有安全感，以前一直是他在关照我，突然失去依靠，让我顿时好像没有了根。

问：外面传说你很有办法，台海间来去自如，你能否证实一下？

张：那是言过其实，不过我确实曾经回过台湾。那就是1989年春节期间，我带了三位大陆女子坐船回台，带她们在全岛玩了一个多月，又把她们一块送回来。

问：台湾警方指控你涉及永安钟表店两千万元抢劫案，究竟是不是你干的？

张：不可能，我没有做过。

问：警方又指控你走私黑枪来台？

张：我年轻时确实做过一些不该做的事，但是我已经浪子回头了，我不可能会去走私黑枪来危害台湾社会。而且根据报道，警方是根据落网嫌犯称一名叫“张伟”的男子在幕后操纵而怀疑是我。但是我张真。“行不改名，坐不改姓”，我在大陆都用张真这个名子，我绝不用化名。

问：为什么这么多兄弟给你栽赃？

答：他们知道我绝不可能再回台湾，所以什么事都栽在我头上，死无对证。而我在大陆的名气，推给我又比较有人相信。

问：外传你走私不少砂壶、獒犬来台，情况如何？

张：这一点我承认。台湾最有名气、最贵重的紫砂壶都是由我提供的，而獒犬我在厦门、福州都有训练场。

问：“紫砂泰斗”顾景洲大师的壶与范×的画“结合”，真的是出自你的主意与从中拉线吗？

张：我是一个小人物，我也想留给这个世界一点什么，没办法做大事，便想到促成两位大师作品的结合，觉得很值得，以后大家想到这些艺术的完美结合应归于我的功劳。

问：台湾对这种紫砂壶的数量众说纷纭，到底有多少？

张：一共有77把。前阵子范×来台时，我也找人去保护他，替他做了不少事，他答应再给画30把。不过这次我被遣送回台，这一切也就完了。

问：外传你和范×结识是从台湾架机回大陆的李先生介绍的？

张：李先生真不是东西，我刚到大陆时，他真的帮了我不少忙，但是后来他开始贪得无厌，以各种借口索求无度，实际都放到自己的口袋里，他真的是骗子。

问：你儿子张岱立何以也偷渡到大陆？

张：我到大陆以后，由于他在台湾已没有亲人，只剩下他孤零零一人，而当时他也快当兵服役了，我想让他到大陆好好念书，过两年再送他到美国，我父母都入了美国籍，可以照顾他，又省下两年兵役时间不致浪费。没想到我的想法是错了，害得他今天跟我一样带着脚镣手铐回来。

问：你还有什么话要说吗？

张：我觉得回来也好，可以澄清很多事情，不是我做的就不要栽赃到我头上，我重申我愿意回来接受法律公平的审判。我在大陆做了很多善事，没有做错事，却被五花大绑押回，难道“浪子回头金不换”这句话是错的吗？我想重新做人也不可以？

最后，张真告诉记者，台湾与大陆都是中国人的地方，两个地方都是他的家，等事情完了后，他还可以再做一点有益的事情。

在金门吃过午饭，张真又被带上脚镣手铐，押送到金门尚义机场。

3时20分，张真父子两名罪犯被押上台湾一架军用飞机，飞向台北。

张真被遣送回台后，他再次接受记者采访，吐露来去秘辛，

感叹滚滚红尘不归路。

原想弃旧从新、剃掉黑道标记——“小胡子”的张真面对一拥而来的记者与闪光灯，发出“一切又回到了原点，难道流氓的标签永远跟着我吗?”的长叹，开始了他的人生自白：

在江湖上翻滚了近30年，多少次徘徊在生死门，我已疲倦了！原想在大陆另创一番天地，但没想到流氓的标签仍是我的致命伤。

13岁时，在台北县中和中学毕业，15岁加入“萤桥帮”，17岁因替人扛下赃物罪，从此注定我脱离不了江湖恩怨。

身上30多处刀疤，两个弹痕，换来的却是10多年的牢狱。我常自问，这划得来吗？背上纹身的生死门，就是我30多年黑道的最佳诠释。

“一清专案”、“迅雷扫黑”，在“萤桥帮”老大的招牌下，我永远是“黑道”。我不怕牢狱的苦闷，也忍受了“管训”（台湾对黑社会分子在牢中的教育）的劳苦，但每次我重见天日，并不因为我自己受了处分而“漂白”，反而成了“大哥大”（“大哥大”就是黑社会帮派的大头目），只要扫黑，我一定是榜上有名。

是留在台湾做老大，还是到大陆，我曾深入地思考。在一次与道上兄弟的聚会上，有人提及台湾现在是强盗当道，大哥在江湖义气荡然无存下，不仅难逃扫黑，也很难躲过强盗的子弹，于是我决定到大陆打拼。

万事起步难。初到大陆，这里的什么都看不惯，特别是官僚作风最让人反感。但为了稳住据点，我花了数百万元培养大陆的人脉关系，而“赚钱”是我的目标，以在台湾道上的关系，走私成为我事业开创的起点。

1990年台湾又进行“迅雷扫黑”，昔日黑道兄弟都出走到大陆避难。我既是大哥，就不能不照顾，安插工作，介绍生意。我对昔日兄弟只有付出，而在知道台湾黑道兄弟出事都扯上我时，

我还拍胸说，没关系，反正我是不回去了，就让我来担当吧！

但后来发现事态严重，我已完全被抹黑了。我心急如焚。

在北京的李先生介绍下，认识了大陆画家范×，而在我最需要人帮助时，范×救了我，他使我进入另一境界。李先生是典型的骗子，在我被抹黑时，他对我索求无度。但回想起来，究竟是因为他我才与范×结缘，所以那些钱财就算当作“介绍费”了。

我将中国两大奇才作品——范×的画与顾景洲的壶融为一体，使我的生意拓展一帆风顺。

台湾的环境随着大陆的开放而改变，范×的作品在两岸炙手可热，台湾道上兄弟也看好此一发财时机，与我建立关系。

范×大哥的不辞而别，使我困守愁城，人脉尽失，但我不怪他，还祝福他。

这次被捕遣返回台，在心理上感觉是复杂的，数年的奋斗，四家公司财产被查封，一切归于乌有。

江湖路，江湖行，我真难逃出此圈吗？

张真的一番自白道出了黑道人物的无奈与最后的结局。

随后，张真在台伏法。

范×在法国“水土不服”，也早已回国，只是很少露面。

“紫砂泰斗”顾景洲大师两年前病逝。

那位李先生现仍任职北京西郊某学院。

第十五章

“竹联帮”与情报局的暗杀行动

1984年7月10日，台湾电影《金大班的最后一夜》的导演白景瑞为庆贺乔迁之喜，在台北民生东路新居请客，影星荟萃，名人云集。国民党高层蒋纬国将军、情报局长汪希苓夫妇、“竹联帮”老大陈启礼等也应邀出席。

各界贵宾能云集一堂，全靠“竹联帮”成员、又是《金大班的最后一夜》制片人帅岳峰从中牵线。

帅岳峰出身于国民党一个军人之家，海军士官学校毕业。1972年7月退伍后即从事电影工作。由于他曾混迹青帮，与黑道关系渊源颇深，交友甚广。他更因担任入选台湾电影界最高奖——“金马奖”的电影《金大班的最后一夜》制片人而名利双收。

同年4月初，在从美国返台的“竹联帮”元老柳茂川主持下，帅岳峰在台北德惠街金猫酒店正式加入“竹联帮”，这时他已40出头。同时一块加入“竹联帮”的还有“三环西门帮”项允力等15人。

一个月后，帅岳峰的锦华公司被“竹联帮”控制的昌江公司人马砸毁。帅便通过朋友请陈启礼出面解决公司纠纷而与陈启礼建立了关系。

陈启礼绰号“老鸭”，也称“旱鸭子”，是“竹联帮”的总堂堂主。5年前，在外岛管训回来后，一度洗心革面，改正从良。

他还找到了一份像样的工作，推销消防器材，生意做得有声有色。旧时帮里的兄弟对他还是尊重如昔。

在他失去自由期间，“竹联帮”仍很活跃，帮里的主要人物如陈大伟、周榕等先后出任总堂主，领导“竹联帮”。但陈、周两人没有陈启礼那股“领袖魅力”，帮内不能团结，影响士气，加上外有“四海帮”的实力迅速壮大，于是一些兄弟一再要求陈启礼重新出山，主持大局。

最后，陈启礼复出，不到两年，在他的领导下，“竹联帮”就成为“天下第一大帮”了。他在道上的地位更加高涨，经常往来于香港、日本、美国与台湾之间。每到一处，都会受到狂热的拥戴与欢迎。

事不凑巧，帅岳峰刚加入“竹联帮”没多久，便从情报局秘密管道得知当局又要实施“帮派分子办理自首登记”，让他感到失望与矛盾：好不容易才混进这个深具影响的“竹联帮”，却又遇上了这个麻烦。如自首无异于自取灭亡，让他这个电影名导演如何见人？不自首，查出来，还要坐牢，更是难堪。于是他找同行的好朋友白景瑞商量。

白景瑞听了帅岳峰的诉苦，大笑一声说：“这好办，情报局长汪希苓是我的肝胆好朋友，我向他说一说，别担心。”

“如果汪局长给我机会，我可以把竹联帮的内幕告诉他，还可以为党国做些事。”

一周之后，白景瑞果然拿了汪希苓的帖子请帅岳峰在老爷酒店吃饭。

当晚7时许，汪希苓夫妇及几名空军将领出席了这次晚餐，还有几位歌星在座。大家一顿酒醉饭饱之后，客人纷纷离去，汪希苓与帅岳峰、白景瑞则留下继续谈论。

“你的情况，景瑞弟已告诉我了。‘竹联帮’力量很大，我也

知道，有些事情今天不便谈，改日我们再谈，我还有一个重要的计划要你们去完成。现在还不能讲，过些日子再谈。”说完，汪希苓就起身告别。

白景瑞与帅岳峰送走贵宾，两人会心地笑了。

3日之后，情报局的一辆高级轿车将帅岳峰、白景瑞接到敦化南路情报局招待所。汪希苓局长已在里面等候。

“上次我讲的一个计划就是想利用竹联帮的海外势力，渗透到大陆。这个工作难度很大，看来非竹联帮老大莫属。你是竹联帮的重要成员，如果能与陈启礼搞好关系，做好这项工作，就是对党国的最大贡献，也就不必自首登记。”

帅岳峰点头称是，表示自己决不辜负汪局长的厚爱，争取陈启礼做件事。不久，帅岳峰就被吸收为情报局的情报员，化名“谢振业”。

1984年5月4日，陈启礼以观光名义到海外视察、组建“竹联帮”海外分支机构回来，在台北香根餐厅宴请帮内上层成员。帅岳峰尽管是新近加入，但因关系特殊而成为座上客。饭后，帅岳峰私下向陈启礼汇报：

“在好朋友白景瑞的牵线下，我和情报局汪局长见过面，他希望我们为党国做些事，他希望有机会和你见面，你看……”

“很好，这是个好机会，这对我们组织的发展一定有帮助，我们不能放过，你可以与他联系，约个时间见面。”

“竹联帮”、情报局各有各的打算，就这样一拍即合。

正好7月份白景瑞乔迁新居，陈启礼、汪希苓等人便在帅岳峰的建议下，借此宴会共同出席，陈、汪两人因此相识，为他们的日后合作打下了基础。

不久，汪希苓由手下安排，陈启礼、帅岳峰被请到情报局永康街的招待所聚餐。在座的还有情报局副局长胡仪敏、第三处处

长陈虎门等人。

胡仪敏首先说：“汪局长请大家来，是有重大事情要安排。就是希望竹联帮到海外发展，包括在大陆建立据点，并搜集情报，为党国做事，政府是不会亏待大家的。”

陈启礼则向汪、胡两人汇报了他4月份赴美考察“竹联帮”在美国的发展情况。

然后，汪希苓才放下手中的筷子慢慢地说：“在美国有个刘宜良，笔名就是江南。你们知道吗？此人当年在蒋总统经国先生开办的政工干校学习，跑到美国后写了本《蒋经国传》，对领袖诬蔑丑化，还秘密到大陆与共匪勾结！这是我们不能容忍的！”

刘宜良，1932年生于江苏省靖江县的乡下。解放前夕，年轻的刘宜良只身随国民党大军来到台湾。次年年底，他参加了台湾“国防部”政治干部训练班，班主任就是蒋经国。政工干校毕业后，刘宜良被派到空军服役两年，后又被选送回政工干校受训。

1954年1月，刘宜良脱离了政工干校，就读于台北师范大学英语系，后应聘于《台湾日报》记者。1956年与刘冠伦小姐结婚，婚后三年便告分手，留下一子名家穰。

60年代中期，美国与越南打得难解难分，刘宜良被派往香港、菲律宾和东南亚采访，曾写成《香港纪行》和《动乱的东南亚》两本书。1967年，刘宜良被《台湾日报》派为驻华盛顿记者，在美国与崔蓉芝小姐结婚，婚后生有一子，名家禾。

在美国工作之余，刘宜良申请进入美国国际关系学院，1972年修完课程，就设法搜集材料，准备以《蒋经国生平及其政治思想》为题撰写博士论文。可是由于经费没有着落，论文也就暂时搁置。后来，他辞去《台湾日报》记者职务，申请加入美国籍，便在帝利市落了户，并在渔人码头开了一个瓷器礼品店，虽赚不

了大钱，收入还是可以的。工作之余，他又开始收集资料，并写成《蒋经国传》一书，以“丁农”笔名在香港的《南北极》杂志上连载，1975年出了单行本。

岂料此书出版后，台湾政坛却正在发生重大变化：蒋介石“得道升天”，严家淦继位，实权则在蒋经国之手。不久，“总统”大权移位，蒋经国正式成为台湾的头号人物。身在美国的刘宜良，曾知蒋氏不少内幕，又想再重新修订《蒋经国传》，便又多方收集资料，在原书基础上，写成新的《蒋经国传》，在美国加利福尼亚《论坛报》连载，并正式将笔名改为“江南”。

“刘宜良这样做有损我们领袖的形象，对党国也极为不利，政府对此十分头痛。”汪希苓接着继续说。

“那我们为什么不制裁他?”陈启礼焦急地问。

“是呀，应该教训他了，只是政府不便……”

陈启礼已经明白汪局长的意思，就是要他率领的“竹联帮”来执行“教训”一事。陈启礼便站起来说：“好，这个任务就交给我去执行。”

“很好，政府是不会亏待你们的。具体事情就由陈虎门处长联系处理，以后我就不便多出面。希望大家保重。”

这次会谈至此结束。

7月29日晚，一辆黑色轿车来到陈启礼下榻处，这是情报局接他前往某基地受训的。

车上除了胡仪敏副局长外，还有一位中年人，他就是帅岳峰，是一同去受训的。

经过几个小时的颠簸，车子来到了台北郊区一个神秘的地方——台湾情报局天母训练基地“松竹山庄”。这个基地专门培训外派特工人员。全程训练项目达27个，学程两年。但陈启礼、

帅岳峰二人因时间紧，只有半个月时间，故只进行短枪及脱离现场训练。

8月14日，陈启礼、帅岳峰在阳明山情报局招待所参加特别会议，正式接受实施制裁刘宜良方案。情报局也正式吸收陈启礼为情报员，代号“郑泰成”，编号“基6217－730063”。

经过紧张的密集训练，他们整装待发。

1984年9月14日上午9时，陈启礼、帅岳峰等人带着重任，乘华航公司班机从台北桃园机场起飞，飞向美国。

“老鸭”一行数人在洛杉矶机场下了飞机，这里已有一大批“竹联帮”兄弟前来接机欢迎。董桂森也从旧金山赶来一同接机。

董桂森是年33周岁，老家在四川，身材短小，黑发浓密，一身刺青。他从小生长在台中的眷村，初中毕业后，继承父业进入士官学校，曾先后在金门等地服役近10年，并加入了国民党。

自士官学校出来后，因无一技之长，好久一段时间找不到工作。后用一万元的退伍金买了一辆摩托车（另一万元送给寡母），做一些送货员的工作。同时因朋友的关系，也开始在台中黑道上厮混。

1977年春，董桂森经朋友介绍到台北闯天下，并通过从军中的一位老长官认识了“竹联帮”的“执法”陈功，并在陈功的兰沁咖啡店当“小弟”，进而认识了“竹联帮”的老大陈启礼，便入伙成为“竹联帮”的一员，后来还当上了“竹联帮”忠堂堂主。

忠堂以台北大安区的公子爷餐厅为活动基地。这里有10多位兄弟随时待命。他吸收了一批颇有战斗力的兄弟。台中黑道“冷面杀手”刘焕荣是他在台中时的道上好友，现在也被董桂森吸收到“竹联帮”。

董桂森还开了一家传播公司，专门包秀（表演）、排秀，还为电视台制作节目。他还和“四海帮”老大蔡冠伦合作成立了

“四联公会”，管理台北市所有的期货公司

1980年4月26日，因与“四海帮”争夺一个酒吧舞女在梅园春酒家发生械斗，董桂森被警方逮捕，判刑3年。服刑期间，妻子梅君在家抚养幼子，孝敬公婆，情真意切，赤心等待，使他对妻子有着一种特别的感情。在此期间，陈启礼对董桂森的家属颇为照顾，不时送些生活费，这使董桂森十分佩服陈启礼大哥。

1984年，台湾警方展开不良帮派自首登记活动，管区警员不断上门催董桂森前往自首登记。董桂森心里非常矛盾，几次来到派处所门前，却没勇气进去自首。

同年8月，董桂森以公司业务为名出国考察，来到美国避风头，也希望在这里能有所作为，干一番事业，不再有警察经常上门打扰。

他住在旧金山好友“白狼”张安乐的家里。

“白狼”张安乐是“竹联帮”的领袖之一。一次，张安乐在台中华安娱乐场所失手，在械斗中误杀了人。陈启礼知道后，随即为张安乐买好去美国的飞机票，让他离开台湾飞往美国。临走时，陈启礼又给了他两万美元，这让张安乐感激不尽，愿为他赴汤蹈火。

张安乐来到美国，一边继续上大学，一边做生意，发展“竹联帮”在美国的势力。张安乐经几年的苦心经营，已形成了自己的势力，也为“竹联帮”在美国打江山立下汗马功劳。

陈启礼到美国后不久，台湾警方突然包围了“竹联帮”“总护法”吴敦在台北经营的南昌茶庄，并搜出一把手枪。

吴敦，绰号“鬼见愁”，1965年加入“竹联帮”，也算是元老之一。性格粗暴，好斗敢打，在“竹联帮”的多次战斗中屡建战功，颇受陈启礼喜欢。在陈启礼被送绿岛管训后，吴敦曾考进政工干校，但因无心就学半途而废。后来专心经营企业，先后从事印刷业、养殖业、贸易业，但均不成功。一个偶然的机会进入

电影界，成为刘家昌的昌江影业公司的制片人，从此时来运转，在电影界逐渐有了一席之地。也因他的关系，陈启礼与刘家昌还合开了欧帝威传播公司。

这次因人陷害，南昌茶庄被查封。后由“竹联帮”投资控制的《美华报道》社长余祥生出面，吴敦才得以“交保候传”。为躲过此劫，吴敦将原定于9月16日举行的婚礼取消，于9月21日以安排台湾歌星赴美参加世华电视公司“龙之夜”演唱会为名，跟刘家昌到了美国。

陈启礼到美国后，就开始策划谋杀行动。经过一番策划，陈启礼、董桂森、吴敦等一同来到帝利市刘宜良的住处附近察看地形，跟踪目标。在几天之内，他们已把刘宜良的住所、渔人码头、刘氏瓷器礼品店及他的活动规律摸透，可以说是了如指掌。

在陈启礼的安排下，他们开始研究行动计划，并提出三套行动方案：一是“青龙行动计划”。两人持枪进入，两人外面接应，狙击江南于家中。二是“黑虎行动计划”。在前一个计划落空后，执行这一计划，即由在外接应的两个人在江南从家到礼品店的路上截住他，迅速行动，得手后迅速离开现场。三是“猎豹行动计划”。如果前两个计划都没有成功，那就跟随江南到渔人码头，在江南开的瓷器礼品店动手。

计划拟定后，陈启礼随即用密码向台北的陈虎门汇报。台北指示：按计划行动，动作要迅速，有情况随时汇报，一旦顺利完成任务，速返台北。

1984年10月15日凌晨，一辆旅行车在旧金山通往帝利市的高速公路上飞驰。车上坐着的正是从台北来的董桂森与吴敦，车上还放了逃离现场用的两辆自行车。另有一辆黑色轿车紧随其后。

车子很快到了帝利市江南家的附近。董桂森和吴敦将自行车

搬下来，旅行车司机泰端将车调头，停在路边。轿车司机皮建鑫也将车停放在不远的一家超级市场停车场旁。

他们伺机潜入江南家做案。他们潜入院子，随即躲进楼下的车库，伺机动手。

8时10分许，楼梯上传来脚步声。吴敦向楼梯方向望去，下楼的正是江南。他迅速拔出枪来，瞄准江南的胸口，扣动了扳机。

车房里传出“砰！砰！”两声低沉的声响。

董桂森走向前去，想确认一下是否就是江南，免得搞错，耽误大事。他站起来发现江南已中枪后，担心不会致命，又向其腹部再补了一枪，不愧是一个经过训练的杀手。

吴敦与董桂森迅速离开现场，登上自行车，向停车场奔去。

由于心情过于紧张，没来得及将自行车搬上旅行车，就弃于路边，乘车飞奔而去。

过了一会，崔蓉芝下楼，却不见丈夫开车出来，便走进车房。她惊呆了，丈夫江南倒卧在车旁，胸部血如泉涌……

此时，正是美国西部时间8时15分。

崔蓉芝赶紧冲进屋里，用颤抖的手，先拨通救护车的电话，再向帝利市警察局报案。

救护车迅速赶来，医护人员急忙将血淋淋的江南抱上救护车，送进医院。

急救室，医护人员展开紧急抢救。可是一切都是徒劳的，江南的伤势太重，医生回天无术。

10时40分，江南终于停止了呼吸，护士轻轻地拉上了蒙在江南身上的白布。一位知名的华籍作家就这样走了，没有留下一句遗言。

崔蓉芝痛不欲生，发出令人心碎的哭声。

警车风驰电掣般地开到现场。警笛打破了小城的平静，惊动了一早上班的人们。

警车上走出帝利市警察局的3名侦探：唐纳德·麦卡尔、迈克·史考特和约翰·华伦。他们迅速封锁现场，并展开侦察。

下午6时，美国联邦调查局的警官与侦探也赶到，继续侦察现场，了解案情，却没重大进展。不过，联邦调查局取消封锁消息的规定，决定对外透露。

联邦调查局与帝利市警方迅速成立“特别行动小组”，由3人组成：联帮调查局亚洲司副司长约翰·杰鲁斯（全面负责），帝利市侦探史密斯·雷卡和美国中央情报局负责东南亚情报的情报官罗安·考比。然后将“关于江南案的报告”提交国务院，同时将这一谋杀案的部分内容有意透露给报界，并扬言这一谋杀案与台湾“竹联帮”有关。结果“江南命案”在美国引起巨大震动。

美国国务院照会台湾当局，请求台湾警方协助，捉拿凶手。同时指示美国中央情报局在台湾的工作人员密切注意，及时与“特别行动小组”联系。

很快“特别行动小组”获悉：据台北来的情报，蒋经国的儿子蒋孝武很有可能插手此事。蒋孝武主持“国家安全会议”党务工作，权力很大。他是不能容忍他父亲的形象受损的。他曾当着台湾情报局局长汪希苓的面说：“这要是在戴笠时代，有100个刘宜良也见阎王爷了。”这句话对汪局长刺激很大，曾表示要采取措施。

江南命案发生的第二天，美国各大报刊均以头版报道这一惊人的消息。警方封锁了旧金山、洛杉矶机场，清查所有飞往东南亚、台湾方向的旅客名单，并已布下天罗地网。

陈启礼在洛杉矶及时向台北汇报，表示“任务”已经完成。陈虎门指示：请你及董桂森、吴敦3人一同迅速赶回台北。同时

将有关江南命案的华文报纸一同带回。

董桂森、吴敦均因有案在身或因黑道身份不便回台北，特别是董桂森想在美国留下来，与“白狼”张安乐一块干点事业。但陈虎门却下令要他们一块回去，这让陈启礼为难。

在江湖上驰骋多年的陈启礼为了将来两位兄弟不受牵连，多了个心眼，想留下这次做案的证据，以防不测。

于是，10月18日深夜，在洛杉矶市住处的地下室，陈启礼通过自述方式将他千里越洋谋杀刘宜良的前因后果、“竹联帮”与台湾情报局联系的经过等全部录了音。

陈启礼将录音带复制了两盒，一盒交给在美从事电影事业的皮建鑫，一盒交给“白狼”张安乐，还特别叮咛：“这就是‘救命符’，必要时它可救几位兄弟的命，因此一定要妥善保存。”

一切布置妥当后，陈启礼、董桂森、吴敦一行到了休斯顿“竹联帮”兄弟“黄鸟”陈志一家里。

1984年10月21日早10时许，他们乘坐休斯顿到东京班机绕道达拉斯，飞往日本。

晚8时30分，由东京飞抵台湾的班机已经飞临台湾桃园机场上空。陈启礼、董桂森、吴敦正在乘坐着这次航班返台请功。

10分钟后，飞机在台北桃园机场着陆。他没有看到欢迎的人群，没有送来的鲜花，而有一种特别的气氛，周围到处是军警，三步一岗五步一哨。

原来这一天，菲律宾反对党领袖阿基诺先生由美国经台北返菲，因此机场军警密布，如临大敌。也因此，前来接机的“竹联帮”兄弟帅岳峰、小项、“大锤”及陈启礼妻子陈怡帆未能进入机场。

机智的陈启礼判断情况有异，先让吴敦出港，试探反应，果不其然，被军警拦住，便对董桂森说道：“看来这是对着我们来

的，我们可能被出卖了，咱们分开走，谁能逃出去都行，然后，再设法营救。我在美国有两盘录音带，万不得已时拿出来会对我们有用。”

这时，陈虎门和一名机场保安人员进来，与军警讲了几句话后，军警将护照还给吴敦，然后3人跟着陈虎门从侧门离开机场。尽管有特别通行证，还不时遭到值勤军警的盘问，这令陈启礼十分不悦。

他们乘车来到大大影业公司。原来帅岳峰因不能进入机场，说好在此等候汇合。陈启礼在帅岳峰的办公室向陈虎门汇报了赴美执行任务的情况。

“你们为党国立了一件大功，过两天老板会当面听取你们的详细汇报，并给予嘉奖。”陈虎门精神振奋地讲。

然后，陈虎门举杯祝贺3位英雄顺利归来，并转告汪希苓局长的问候。接着，陈虎门向诸位解释，现在如此戒备森严，是因为美国那边压力太大，不得不让步，你们先隐蔽些日子为好，过两天在此见面。随即告辞，表示有事随时联系。

10月22日中午，陈启礼与帅岳峰被陈虎门接到天母情报局招待所。局长汪希苓、副局长胡仪敏设宴为归来的“英雄”接风。

11月12日，是孙中山的生日。台湾各机关单位正好放假，庆贺“国父诞辰”。大街小巷张灯结彩，处处酒店设宴，酒绿灯红。就在此时，台北警方却在酝酿着一个重大行动。

晚上7时许，台北刑警大队一分队由庄春荣率领，迅速出动，包围了台北景美区圆花山庄陈启礼的住宅，闯入室内，不由分说，将陈启礼拘捕。另外几名警察从家中搜出白郎宁手枪1支，子弹5发。

同时，警方也突然袭击了台北新生南路一段一〇三巷的“竹联帮”总部名商俱乐部、南京东路的《美华报道》杂志社，逮捕了“竹联帮”“大执法”陈功、周榕、向子平、《美华报道》社长余祥生、名商俱乐部董事长朱国良等人。

随后，警察局长颜世锡下达第二波行动命令，搜捕其他黑社会帮派头目。

晚11时20时许，“内政部长”吴伯雄召开记者会，宣布将采取重大行动，在全岛进行扫黑，于是各警察局纷纷出动，展开大规模搜捕行动。这就是命名为“一清专案”的扫黑行动。

不过这次扫黑有点不同以往，先是抓“竹联帮”老大陈启礼，再抓“竹联帮”其他重要人物，然后才宣布扫黑。

11月21日，台湾各报刊都在头版重要位置报道了这一声势浩大的扫黑行动。各路黑道好汉纷纷就擒，大街小巷处处有警察出入巡逻，不时听到警车的鸣笛声，岛内一片恐怖、紧张气氛。

董桂森知道情况严重，便给吴敦打电话，商议如何营救大哥。

11月25日，吴敦赶到台北，先在杏花阁酒家聚会，召集了“竹联帮”义堂堂主杨榕顺、至堂堂主张伟华、尊堂堂主彭荣沪等骨干分子商议，研究目前“竹联帮”的处境与对策。

次日，吴敦被两名便衣警察生擒。与此同时，上述聚会的几位“竹联帮”老大也在同日被捕。

1984年11月27日，美国联邦调查局和帝利市侦探在加利福尼亚逮捕了一位台湾籍青年留学生泰瑞，罪名是曾开车送凶手到帝利市暗杀江南。

两日之后，联邦调查局特工组负责人罗伯特和帝利市警察局局长理查德西姆斯联合发表声明，宣布侦破江南命案，指出凶手

就是台湾的“竹联帮”老大陈启礼、“总护法”吴敦和忠堂堂主董桂森，他们均已潜逃台北。

就在同一天，台湾方面也宣布，从“一清专案”的侦讯口供里得知陈启礼、吴敦、董桂森即为杀害江南的凶手。还特别指出美国联邦调查局是得到台湾方面的帮助才破的案。

美国帝利市警方随即召开记者会，否认台湾的说法，表示他们从没有与台湾的警方联系。

江南案再度成为台湾的头号大新闻，大谈“竹联帮”暗杀江南一事。可细心的人们却在思考，“竹联帮”为何要杀江南？杀一个书生文人？美国“竹联帮”兄弟那么多，为何要老大陈启礼出面？背后一定有原因。

美国新闻界同样关心这一重大谋杀案。

记者在采访江南遗孀崔蓉芝时，她讲：“江南与竹联帮没有任何关系，竹联帮没有任何理由杀江南。希望美国警方深入调查，查出真正的凶手，为死者伸冤。”

1985年1月9日，香港《文汇报》独家报道：陈启礼在美国作案后，曾录有两卷录音带，里面详细叙述了他们的作案过程，并说有人派他们到美国去杀江南。陈启礼将其中一卷交给了美国的“竹联帮”分子“白狼”张安乐，嘱托他万一自己遭到麻烦事情，就将录音带公开，可以救他的命。美国联邦调查局正在追查这盘录音带的下落。

消息一出，台湾舆论哗然。台湾当局更是沉不住气了，立即于1月15日宣布：“国防部”情报局长汪希苓中将因故停职，副局长胡仪敏和第三处处长陈虎门上校因参与谋杀江南，已被拘捕。

江南案的黑幕被揭，台湾情报局参与谋杀江南，引起全世界的震动，舆论一致认为这是不可容忍的恐怖行为，要求揪出幕后的真正指使人。

次日，国民党中央召开“中常会”，蒋经国大发雷霆：“你们上当了。你们中了人家的圈套，我对此感到痛心。”但结局已无法挽回，台湾在世人眼中的形象顿时黯然失色。

得知吴敦被捕的消息，董桂森对台湾情报局恨得咬牙切齿，决心逃离台湾，要到美国转告“竹联帮”兄弟，让他们用那两盘录音带营救“老鸭”。

他打电话给家里，想作最后一次告别。妻子告诉他不要回家，周围到处都有警察走动。她还在电话中讲，一位姓冯的男子来过家，留下两万美元。她将冯先生的电话告诉了桂森。

董桂森接通了冯先生的电话，才知道是冯秋野。在军中服役时，他们两个曾在一个班。离开军队后，他们各奔东西，一个做了“竹联帮”的堂主，一个到了美国贩毒。没想到“江南命案”又让他们重新走到一起。

他们在电话中约定，来到一家小咖啡店见面。冯秋野表示董大哥处境危险，要帮助他逃离台湾。他给董桂森一个电话，让他去找一个叫卓碧如的大姐联系，说她有办法送他出境，但不要在乎她要多少钱。

卓碧如大姐，董桂森早有所闻，但没见过面。她是一位神通广大、有办法能弄到各种证件将人偷运出境的人。这几年台湾黑道上有不少因枪击案在身的人，都是托她的关系逃到国外的。她当然因此获得巨额金钱，搞“偷渡”就是她的职业。

董桂森挂通了卓大姐的电话。卓大姐表示一切没问题，但需要40万元来打通各种关节，包括买机票。董桂森听了不久能逃出境，心中踏实了许多。

1984年12月30日，卓大姐终于办好了手续，约董桂森前往桃园中正机场。卓大姐交给他一张“立法委员”的通行证，让他别在胸前。于是，这个“在逃犯”摇身一变成了“立法委员”，可享受特别待遇。

他们大大方方地向机场走去，顺利通过各种关卡。

在台湾，无论是桃园中正机场、松山机场，还是高雄机场，机场内都设有协调中心。类似“国大代表”或“立法委员”这样的特权人物，可以到所属单位索取公函，表示要前往机场迎、送贵宾，然后再持此公函向协调中心申请公务通行证，有许多特别待遇（笔者曾去台湾，在一位特别人士的帮助下，我们在飞机起飞前几分钟才买到头等舱最前排的机票，他还说这是留给“立法委员”的特别座位，可见在台湾的关系多重要）。通行证分为两种：一种是个人使用，就是卓大姐送董桂森的这一种；另一种是车旗，插在座车上就可长驱直入。

卓碧如就是利用这个“空子”，通过一位孟姓“立法委员”太太的关系，找到了这么一个发财的捷径。名列台湾10大杀手的枪击犯刘焕荣也是在卓碧如的协助下离境的，仅这一次她就得到5万美元。

卓碧如与董桂森进入机场。登机前，卓大姐将一个人的登机证交给董桂森，董桂森把胸前的公务通行证又交给了那个人，董桂森凭这张登机证登上了飞机，那个人把公务通行证别在胸前，大摇大摆地离开机场。

上了飞机，董桂森如释重负，大大地松了一口气。

经过几个小时的飞行，飞机抵达马尼拉国际机场，董桂森刚走下飞机，就被卓大姐安排的当地移民官员与陈姓华侨接走。

这位陈姓华侨开有一家饭店，是个富商，把董桂森接到自己家里住下，以免发生意外，待卓大姐来菲后再说（在此要补上一句的是，台湾“调查局”经过多年的努力，终于于1996年破获了专门从事空路偷运的犯罪集团，幕后策划人就是卓碧如，本名曹碧珠）。

就在这时，台湾警方通告美国联邦调查局：江南确系“竹联

帮”所杀，凶手陈启礼、吴敦、董桂森都已被捕，待全部犯罪事实查清后，交法院判决。

约翰·杰鲁斯看了这份报告后认为，这是台北给华盛顿的一个“烟幕弹”。杰鲁斯决定将董桂森逃亡菲律宾的事情透露给报界，揭穿台北的骗局，让台湾警方不要再和华府“演戏”了。

这样，董桂森逃亡菲律宾的消息通过电波很快传遍全世界。次日，全球有300多家报刊、电台、电视台对这一消息进行了报道。

这让台北大为尴尬。台湾警方便采取断然措施，派人到菲律宾密告十大杀手、通缉犯刘焕荣：干掉董桂森，警方就不再找他的麻烦。

国民党利用黑道人物“以黑制黑”是常事。杀了董桂森，江南命案的真相将永远石沉大海。

董桂森后来在狱中的自述中写到：

有一天，我与卓大姐一道在餐厅吃饭，正好巧遇刘焕荣和齐瑞生等人，大伙就聚在一桌共餐。事实上，我早就知道刘焕荣在菲律宾，但是却一直不想和他联络，主要是我一心想早点到美国，与大家商量如何营救“老鸭”陈启礼大哥，因此不想在菲律宾恋栈。然而既然遇到了，而且过去也有交情，当然也不好回避。

当时，小刘（刘焕荣）就对我说台湾“四海帮”老大刘伟民马上要来这里，要我最好回避一下。我本来想问他究竟是什么原因，但是还没有来得及开口，刘伟民就进来了，还带着两个朋友，一个叫小赵，另一个则为明煌，于是一行人就在一桌聚餐，大家谈笑风生。

原来，刘伟民此次前来菲律宾乃负有任务，准备把我杀掉灭

口，而且计划把杀人的任务交给齐瑞生，但是他却没有想到齐瑞生和小刘交情深厚，偷偷把这件事透露给小刘，而小刘从前在台湾时跟过我，一向尊我为“大哥”，自然不肯让齐瑞生做这件事。

此外，刘伟民所犯的另一个错误是他过于健忘，因为他从前曾与齐瑞生一道被关在管训队，当时刘伟民任班长，曾经欺负过齐瑞生，虽然他自己忘记了，可是齐瑞生却还记得很清楚。于是，齐瑞生就将刘伟民的计谋告诉小刘。据他表示，刘伟民乃负国民党当局之命前来菲律宾，负责在当地找人把我“做掉”，而齐瑞生有案在身，不方便回台湾，就成了最佳的争取对象，刘伟民也向他保证，一旦任务完成之后，他就可以放心大胆地回台湾。

这又是“江南命案”的模式，政府利用黑社会人物做事，事情秘密不暴露的话固然天下太平，一旦事情败露，只要推给帮派恩怨就可以了，政府的一双手永远干干净净。真是可怕！

幸亏小刘与我颇有交情，才免除了我枉死异乡的命运，我也就在当晚离开住处，前往小刘与齐瑞生处栖身。

我想，当时很可能是因为“白狼”等人正在美国四处奔走，准备安排我到美国来投案，台湾方面唯恐我到美国后大抖真情，才不惜派杀手越洋追杀。

政府方面最阴毒的一招，就是预先放出空气，说我已被小刘枪杀，以便在真正将我解决之后，把杀人的责任推给身背数案的小刘。

1985年1月21日，台湾《自立晚报》登出一惊人新闻：菲律宾发生一起重大谋杀案，一华侨之家四人被杀，凶手是警方正在追捕的刘焕荣、刘伟民与杀害江南的逃犯董桂森。

这则消息让台湾情报局大为紧张。陈虎门迅速赶到“行政院”向汪希苓汇报。汪局长听后，脸色苍白，指示陈虎门派人速

赴菲律宾，要不惜一切代价，干掉董桂森。

次日，陈虎门就带两名手下飞赴马尼拉。

“黄鸟”陈志一也从美国来到马尼拉会见董桂森，并告诉他说：“台北警方还在派人追杀你，一定要小心。张大哥被收容了，正在审理中，他要我多关照你。只要你在，他们暂且不敢对‘老鸭’和吴敦下毒手，听说他们享受高级政治犯待遇，和张学良将军差不多。这次来就是想和你商谈你如何到美国这件事。”

陈志一的父亲曾任职国民党中央党部，母亲是个虔诚的基督徒。他的哥哥陈志强自幼喜好拳术，曾夺得台湾轻量级拳击冠军。受兄影响，陈志一也练就了一身好拳脚功夫。15 岁那年，他在强恕中学读初中，便与住永和镇的同伴一起加入了“竹联帮”，成为“鸟”字辈的一员。他年轻气盛，经常斗殴，与别的帮派对抗。在一次与“溪州帮”的成员交战中，他一刀砍伤了一名绰号“清水”的背部，致对方成重伤。事后，陈志一被捕。在他父亲的广泛关系活动下，不久就获保释。

这次打击后，陈志一投奔了在美国休斯顿太空中心工作的哥哥，另闯天下。初到美国，不懂外语，乃进了一家英语补习学校学英语。后来，他经商有成。

他还曾担任了陈启礼办的《美华报道》杂志社驻休斯顿代理经销商。在陈启礼、董桂森、吴敦出事后，他不仅将几位大哥从洛杉矶接到休斯顿自己的家，还共商“竹联帮”在美发展计划。陈启礼、吴敦在台北被捕及董桂森逃亡后，他与张安乐、向拨京等四处奔走，营救这几位落难大哥。

不久，董桂森等人到了巴西。但因办理美国签证，露出了马脚，被美国情报人员掌握了董桂森等人的动向。

1985 年 9 月 20 日中午，董桂森在巴西被捕，从此结束了长达 10 个月的逃亡生涯。

1986年4月6日，巴西法庭开始审判董桂森案。

4月16日，巴西法庭作出判决，将董桂森引渡美国。

4月30日，董桂森在巴西两名警方人员的押送下，乘飞机飞往美国。

到美国后，董桂森被送到纽约联邦调查局的看守所。

不久，美国对董桂森进行起诉，最后以杀人、贩毒罪判处27年徒刑，随后关进宾州路易斯堡联邦监狱。

1991年2月21日晚，董桂森在这家监狱的牢房遭人暗杀，一刀刺中心脏，住进医院。

4月3日晚，董桂森终因伤势过重，在医院去世。

是谁要刺杀董桂森？谁能在美国监狱刺杀董桂森？至今没有破案，又成一历史疑案。

陈启礼与吴敦被捕后，被关押在台北土城看守所，接受审查。

1985年3月，台北春意正浓。但台北戒备森严的街头却给春天增添了几丝不协调的气氛。3月20日，受世人注目的江南命案就要在今天公开审理。

9时许，陈启礼和吴敦身穿防弹背心，在大批警察的护送下来到法庭。陈启礼外穿黑白相间无领T恤衫及灰色运动裤。

陈启礼的太太陈怡帆刚被释放不久，也来到旁听席。刘宜良的遗孀也委托美国著名律师、前哈佛大学法学院副院长孔杰以“观察员”身份列席旁听。

台北地方检查处检查官在起诉书中指陈：

一、陈启礼于1956年间参加以结伙寻仇、聚众殴斗等犯罪为宗旨之竹林联盟（也称“竹联帮”），其后为该帮首谋之一（自称“老大”）。自1967年开始掌握该帮大部分势力。1970年因犯

杀人未遂罪，经台北高等法院判处有期徒刑2年6个月，于1974年5月29日执行完毕。1980年复出而主持“竹联帮”，广收众徒，扩充堂口，计有忠、孝、仁、爱、信、义、和、平、天、地、至、尊、万、古、长、青、东等十个堂口，各堂口分别为聚赌抽头，强索商家保护费等犯罪为宗旨，以非法所得为经济来源。吴敦系1965年间加入该帮，董桂森是该帮忠堂堂主。三人关系极为密切。

二、陈启礼为巩固“竹联帮”日益强大的势力，于1984年7月间通过帅岳峰安排，由白景瑞邀宴而结识汪希苓。同年8月2日与汪希苓等人（现由军法机关另案侦查中）会商后，于同年9月14日搭机赴美，先至洛杉矶会见当地“竹联帮”分子，再转往旧金山，并通知吴敦、董桂森。陈启礼托俞大钧预先备妥淡色运动衣、鞋、假发、假胡须、手套、尼龙绳等作案用具，另向绰号“阿昌”之不详姓名者购买0.38口径左轮手枪一支及子弹数发，由于子弹不合用，陈启礼即于当地时间10月13日电话通知董桂森准备0.38口径左轮手枪及子弹。三人会合谋定之后，即由吴、董二人下手实施，陈启礼则留守接应。同月15日上午7时许，三人按原定计划，由陈启礼预先结清住处房租，吴敦、董桂森二人则各带左轮手枪一支，着套头运动衣、戴假发、假胡须，分骑脚踏车至帝利市希尔佛街74号刘宜良住宅外，见刘某在家，楼下车库门未关闭，二人迅速潜入守候。吴敦因久候无着，转至楼梯后热水器旁。约9时许，刘宜良下楼，吴敦即朝其头部开枪击中，董桂森见刘某仰面朝上倒下，急问“人对不对”，并朝刘某腹部射击两枪。事毕，二人迅速骑车脱离现场，并将脚踏车弃于附近路口，换乘旅行车，取下假发、假胡须、卸装改着西服。途中将手枪、衣物分二次弃置路旁树丛中，再回住处与陈启礼会合，分批返洛杉矶，并共同于20日上午至达拉斯乘泰国航空公司班机飞抵日本东京，再换乘西北航空公司班机，于台北

时间10月21日下午9时许回台。刘宜良因被击中要害，不治死亡。

二、陈启礼回台后，因未经许可无故持有0.25口径白郎宁手枪1支、弹匣1个、子弹6发、0.38口径子弹5发，经警方于同年11月12日在其台北市辛亥路西段101巷140弄66之6号住处查获。吴敦于11月25日拘获。

四、本案经“法务部调查局”移送侦办。

检查官向法庭展示了犯罪证据，并指出所犯法条。

9时30分，受命推事（法官）赵功恒传讯陈启礼、吴敦和白景瑞。按惯例，在一一审问被告人姓名、年龄、籍贯、职业后，首先对陈启礼进行审问。

法官：“民国七十四年十月十五日，你与吴敦、董桂森联合策划杀害刘宜良？”

陈启礼：“我并没有杀他的意图，只是希望给他一点教训。”

法官：“你为何要杀刘宜良？”

陈启礼：“我和刘宜良没有见过，过去也没有恩怨。因为汪希苓告诉我，刘宜良是背叛国家的人，汪要我杀掉他。”

法官：“你怎么认识汪希苓？”

陈启礼：“在一次宴会上认识的。”

法官：“哪一次宴会？”

陈启礼：“具体日期我记不清了，自白书上有。本来我是不喜欢应酬的，可是听说有情报局长在座，不便不去。”

法官：“当天在座的还有谁？”

陈启礼：“有汪希苓、胡仪敏、陈虎门、白景瑞和我五人。”

陈启礼同时递上早已准备好的申辩书：

我从1970年到1976年因管训不可能参加“竹联帮”，但我在调查局的自白书中，对期间的竹联帮情形仍绘声绘影的编了许多。请法庭看我的自白书，甚至有的堂主姓名都不知道，就很清

楚了。

说我任命堂口，请提出证据来。是在哪里、什么地方、什么堂口是我任命的，或是我成立的。又有哪个堂口是我提供金钱，或者又有哪个堂口提供多少钱给过我。说我是总堂主利用聚赌抽头、收保护费发展竹联帮，根本举不出证据来，又不知谁封我为总堂主，这些传闻，多得不胜枚举，象有人说我威胁胡茵梦、尤雅、张敏、甄珍加入欧帝威公司，但这不对；又指我绑架张小燕夫妇，甚至说张小燕的“综艺一百”停播，也和我有关，但这都是不实的传闻。

我办华美杂志内容很好，也有人说我在美华报道的“大亨摘星录”诈财，又说广告费来源也是勒索来的，但查的结果证明篇篇实在而且清白。

从我被捕，套在我身上的案子，刑案就有56条，政治因素也有14条，但调查员查证后都还我清白。我曾跟一位调查员说，中华民国是想发现一位完人吗？他告诉我，发现我是圣人。

我加入“竹联帮”时，曾付出我的青春，在管训期间我每天看绿岛的海水。从我管训回来后，就开始脱离帮派为家人奋斗。我曾迷失过，也付出我的代价，因局势变化应该为国家贡献，我不否认加入过“竹联帮”，也不否认和“竹联帮”的人来往联系过，那是因为我经历过这些事，想帮人排难解纷……

我每次看到服务社会的社团，象扶轮社总是捐一个路钟或办个清寒奖学金，都没有用，应该要给那些被治安人员送去管训的人，由社团一人辅导一人，让他们改过向善，这样社会才能达到夜不闭户的地步。

从我管训回来，开了5家公司，每天公事忙不完，还要陪太太及小孩，怎么能分身去统率几千、几万人？我哪有时间去经营帮派？我奋斗了8年，今天以清白之身出庭，希望庭上能公正审判，还我“竹联帮”部分的清白。

关于刘宜良案，检查官指控我为巩固“竹联帮”而杀刘宜良，我希望任何人不能以臆测判断，也不能未经审判就先经新闻审判。汪希苓是政府派任的高级官员，又是情报局长，我办《美华报道》对情治单位有相当了解。警总管岛内治安，情报局管海外情报。我们不可能到大陆去，认识汪局长对我有什么帮助？我如果存心要认识汪局长，大可不必经过白景瑞的介绍，太多人可以代为介绍，我不必列举他们的名字，因此我又何以能知道刘宜良是情报局的人？又怎会知道汪局长和帅岳峰二人要我认识的秘密？我进情报局完全是基于“献身报国”情怀的高尚动机，不是为发展“竹联帮”巩固其势力。

我在美国也有事业，本来可以不回来，但我回来不是脱罪反而是加罪，而且做了刘宜良案后，美国也不能留了。

如果我杀刘宜良是邀功，要知道故意杀人在美国是一级谋杀罪，在美国可判死刑，最少也会判个三四十年，我为了邀功，难道到阴间去邀功，或在牢里等上三四十年？

我跟汪局长吃饭，每次都是他们主动选的地点。如果是我主动要请汪局长，应该是我选地点，请庭上调查究竟是汪局长或是何人主动找我。这件事是汪局长有求于我，不是我有求于他。我出钱出力，无负于汪局长，也无所求他们，这个事实不容歪曲。

我不欠汪局长与帅岳峰人情，对刘宜良也没有好恶之感，如说我为求庇护于汪局长而认识他，是不对的。从帅岳峰自白录可以看出，帅岳峰在去年4月为想脱离帮派而向汪局长提出庇护，汪局长都说不行了，我还会再向汪局长讲吗？何况汪局长连自己都不能庇护，还能庇护谁？

汪局长和我见面，是白景瑞、帅岳峰、汪局长3人设计陷害我。帅岳峰笔录中说我找汪局长被晓以大义参加情报工作，他自己有事业不想蹚这个浑水，才想到策动我加入。在汪局长下达杀刘宜良命令后，帅岳峰和我同去美国，难怪他要急着回来。

我和刘宜良往日无仇，近日无怨，没有杀他的必要。汪局长是政府高级官员，又是情报局长，他下令杀刘宜良，应该是深思熟虑才决定的，怎么可能是由我，而且是不熟悉的人所提议杀他的？更何况身为情报局长，怎能随便交给刘宜良资料，说我主动提刘宜良的事，这种一厢情愿的说法，天下人会相信吗？

此外，我在受训时和陈虎门约好以暗语“买卖已成”或“契约已成”谈刘宜良案，帅岳峰回来后又催陈虎门办吴敦、董桂森犯案的事，我又怎会节外生枝扯这些事来？上飞机到美国前，陈虎门告诉我一定要杀刘宜良，否则就完蛋，如果汪局长没下令杀刘，陈虎门又怎会对我说呢？

陈虎门一再催我们赶快回来，如他不知情又怎么要我们急着回来？20000美金我拒收了，但陈虎门在天厨餐厅也拿给吴敦，吴敦也不要，又为什么要给吴敦呢？何况说是补贴旅费，也应该是给我才对，又怎么给吴敦、董桂森呢？到美国机票一张才700美金，一个月在美国的生活费也不过2000美元，汪局长又怎会一给就是20000美金？

我看到军事检查官起诉汪局长等人，何必讲汪局长和刘宜良有“私人恩怨”？杀敌报国是军人的天职，不要因外国有压力，就改变态度，这对于许多爱国青年，会更加混乱他们的思想。我认为汪局长没有罪也不是所谓少数不肖情治人员，如果判汪局长有罪，汪局长应该挺起胸膛走进去。

关于录音带部分，我是从美国派人来的一星期前才知道案件爆发。以前我连录音带提都没提，是美国要派人来问我，才告诉他们。

那两卷录音带，一卷写“吴”、一卷写“董”，上面还有暗号。留录音带原因是汪局长催我们回来，吴、董害怕不肯回来，没办法下只好编了杀刘宜良情节，交给他们作为回来遭人杀害灭口的担保，何况我在永康街招待所及情报局受训，都可以录他

音，但我没录，且在旧金山把刘宜良资料全部烧毁掉，这些都可表示我的光明正大。

帅岳峰在情报局受训时，曾对我说，他录了汪局长谈话，并要我也录，我只是笑笑　我只有一片对“党国”赤胆忠心，哪想到歪心。帅岳峰今天如此，也是他握有录音带的关系。

录音带是担心杀人灭口，当然是讲的严重一点。自白书是以为情报单位考验我，才故意写的夸大。弄到今天，整件事像个闹剧。

我在这里要特别强调，我们是民主法制的社会，一切都要讲法、讲证据，像扫黑时把美华报导社的余祥生、欧帝威公司的马挺耀都抓起来，甚至我太太也被关了4个月。大家都可问一下，余祥生是不是竹联帮的人？他们都遭到拘禁，又是什么道理？

我生长在法律家庭中，知道笔录、录音带、自白书都不能作为唯一证据，请法庭上查明我的事实。

在我的观念里，刘宜良也就是江南，江南是一位好父亲，我也有儿女，我对他的儿女表示歉意；江南是一位好丈夫，我也有妻子，我对他的妻子致歉；江南是一位好朋友，我也有朋友，我对他的朋友表示遗憾。

审讯了陈启礼，法官又审问吴敦。

法官：“你与陈启礼、董桂森共同杀害刘宜良？”

吴敦：“我是在美国做唱片生意时，在拉斯韦加斯遇见陈启礼的。他说要我和小董去教训一个人，我说好哇。”

法官：“以后发展如何？”

吴敦：“我又和小董见了面，大家买了假发、胡子、手套等，小董给我一把枪。我们在13日到渔人码头去看环境，刘宜良正和太太聊天，不好下手。第二天又去，刘宜良和朋友谈话，由于附近警察不时巡逻，不便动手，我们就决定改变方向到他家里。

“15日上午，我们到刘宜良家，躲在车房。刘宜良独自下来，我本想揍他一顿，可是他抱住我的腿，我就开了一枪，后来小董又补了一枪。”

4月2日，法院又进行二审，郑春甲任首席推事。陈启礼与吴敦的每次供词差不多，仍指称汪希苓指派他们去杀江南。提问证人白景瑞和帅岳峰却不愿讲实话，每到关键时候就讲记不清楚了，案情无法取得重大进展。

4月9日，台北市地方法院再次开庭，审判长郑春甲宣布：陈启礼、吴敦共同杀害江南案罪名成立，各判处无期徒刑，剥夺公权终身。但被告均未出庭。

宣判陈启礼与吴敦重刑是台湾当局不得已的做法，不然无法应付美国的压力，也不能面对岛内的舆论压力。这也是一种权宜之计。

3月26日，原情报局局长汪希苓、副局长胡仪敏、处长陈虎门被提起军法公诉。但这一审判是秘密进行的。

4月4日，台湾“国防部军法局”军事法庭公开审判江南案情报局涉案人员。

军事法庭庭长为田毓梅，审判官刘飞龙，检查官王惠然。

涉案人员：情报局局长中将汪希苓，少将副局长胡仪敏，上校处长陈虎门。

他们不像犯人，倒像是参加什么高级会议，个个西装革履，不戴手铐。

法庭指控汪希苓为报私仇，假借职务之便，收买“竹联帮”分子杀人。检查官的起诉书宣读了近15分钟。汪希苓的答辩只有一句话：“我的责任是没有报告。”

法官问：“你是否受谁指使？”

汪希苓：“作为情报局长，我有权对丑化总统的人实施制

裁。”

军事法庭提陈启礼与汪希苓当面对质，陈启礼坚持认为汪希苓让他杀害刘宜良，汪希苓一如既往，照旧否认。

汪希苓于1926年7月18日出生在浙江省杭州市，是年60岁。

当年以现役军官身份转入海军官校的“后补军官队”，经过短期训练后，才正式加入海军行列，担任过扫雷舰长、驱逐舰副舰队长。

他仪表不俗，反应灵敏。因外语学得不错，曾派驻意大利副武官并兼代武官一职；1969年改驻美海军武官，不久便升为海军少将。1983年，调回台湾，出任“国家安全局少将副局长”。1984年初，晋升海军中将后，奉命接替李筱尧继任情报局长。

江南案发生后，汪希苓遭到老军统局人士的指责，认为他是败坏情报局声誉有史以来的最大祸首。

胡仪敏副局长与陈虎门处长也是他亲手提拔的亲信。

4月19日，“国防部军事法庭”再次开庭，以“共同杀人罪”判处汪希苓无期徒刑，以“帮助杀人罪”判处胡仪敏、陈虎门有期徒刑各两年零6个月。

9月12日清晨，一辆警车悄悄从台北看守所驶向桃园龟山监狱。经过10个月的调查审理、判决上诉，陈启礼与吴敦终于被台湾最高法院终审判处无期徒刑，正式移送监狱执行。

然而没过几年，这些因江南命案入狱的人均已纷纷出狱。1991年初，陈启礼与吴敦获释出狱。1992年，董桂森在狱中被人暗杀，陈启礼心中十分悲痛，便于同年4月26日皈依佛门。汪希苓与陈虎门等人则安度晚年，较少在外露面。1996年7月，江南案的另一涉案人“白狼”张安乐儿子结婚时，汪希苓送来了喜帖，才得知他还健在的信息。

第十六章

黑道赌场揭秘

赌场是黑道兄弟的血脉。黑社会分子永远与赌场脱不了关系。黑社会的钱从哪里来？最普遍的与最重要的就是赌场。

职业赌场可以说是黑社会的一个“金饭碗”。只要在赌场投下一笔资金，不过几天，就可获得数倍的“抽头”（利润）。这种钱来得快量又多，还不用缴税，哪个黑道帮派或黑道分子不想搞赌场？

台湾黑道赌场又分为“文场”与“武场”。麻将、十三张、梭哈、四色牌等属“文场”；牌九、时八仔（掷骰子）等属“武场”。

赌的方法一般分为两种。一种是赌现金；一种是无须带钱就可参赌的A仔场（赌筹码）。

A仔场虽无需带现金就可参赌，但可不是随便就能赌的，而是主持人（赌场老板）根据你的实力（行情）能赌多少，就让你赌到哪个行情范围内为止；赢了领现金回去，输了一个星期后收账（一半现金一半支票）。

A仔场是黑社会唯一讲信用的地方。如果输了钱不讲信用或是开空头支票，那赌场就派人去讨债，讨债便成为黑社会一项重要的职业与内容。

嘉义的麻将是台湾黑道赌场最厉害的，诈赌手法也最高明，

这是台湾黑社会里公认的。嘉义黑道人物大多数对于诈赌术都有一手。而随着嘉义黑道全省化特别是向台北地区的发展，这些诈赌郎中（也称“魁仙”）也纷纷北上。

从事诈赌的人，通常都跟圈内的人交往，他们在一起谈论最多的也是不离本行，那就是赌。

在台北市的锦西街，有一家由嘉义黑道人物“大胖谢仔”兴建的理发厅，成为北上的嘉义黑道人物与嘉义“魁仙”的据点。

一天，已从嘉义北上的黑道分子绰号“大头成”的吴进成来此，巧遇好友、台湾全省闻名的麻将大郎中嘉义“空波”，于是在“空波”的精心传授下，“大头成”在短短一个月内学会了番社、支支灵、音仔、哑巴嘘、中厘、斗十等六种“卦门”（牌法）的诈赌术。

这些诈赌术，外人一般不会了解，但圈内人却十分了解。以“斗十”为例，这种诈赌法必须有两个人配合，内行人称为“赌对签”，也就是两家联合杀另外两家的意思。

其玩法如下：若是A与B搭配杀乙丙两家，那A、B两人一定有百分之八十的机会坐在上下家。当A坐在B的下家时，A会不断地向上家（B）讨牌吃，同时B会尽可能地给A吃牌；相反，若A坐在B的上家时，便换A给B吃牌。

讨牌的术语很简单。如A手里有两张很难进的牌八万与九万而想吃七万时，A则会故意问：“海底那张三万是谁打的?”配合的B一听，即晓得A想吃七万，于是B很快就会打出七万喂A。如果遇到海底没有三万的时候，则改口说成：“三万怎么没人打?”这样对方也不会起疑，否则乱问三万是谁打的可能就会坏事。

另外，如A手上有两张四筒与五筒，而想吃三筒与六筒时，A便会问：“四、七筒怎么不见人打?”或是问“海底那张四筒或七筒是谁打的?”B一听便会打出三筒或六筒给A。

其原理在于，你想吃的牌和你口里说的牌，数字之和加起来等于十。如你想吃一万，则叫九万；想吃二万，则叫八万，以此类推。

这是诈赌术中最简单的一种。

若你在赌场上遇到诈赌郎中，赢钱是偶然，输钱是必然。

令你更惊奇的是，郎中偶尔会在牌桌上，对他搭配诈赌的人制造假争执或吵架，不明事理的人，往往帮他们劝解。当劝完架各自结束玩牌后，你不会想到他们正在外面分红。

“支支灵”是另一常用的诈赌术，也是必须两个人对签（搭档），玩的手法如下：手摸上额表示要“万”，摸鼻子表示要“筒”，摸下巴表示要“条”，然后再以门前的十六张牌作为道具，从右算起摸第一张牌（或动第一张牌）即代表“一”，第二张牌代表“二”，以此类推到第九张牌（因为万、筒、条只到九为止）。第十张到第十六张则属大牌，例如动第十张牌，则表示碰东；碰第十一张牌则表示要西；动第十六张牌（最后一张牌，也是从左边算起第一张）则表示想要碰白板。至于想吃小牌的讨牌方法很简单。例如，手中有两张牌，分别是三万与五万，想吃四万时，左手便假装擦上额的汗水或撑着上额（表示要吃万），右手则故意整理门前的第四张牌（表示四），上家（搭档的郎中）一看对方打出这种信号，即明白自己的搭档要“四万”吃，他便很快打出四万给对方。

如果手里有一张八筒和九筒的牌，想吃七筒时，用左手摸鼻子（表示筒），右手则整理门前第七张牌（表示七），搭档看到这种信号，就会马上打七筒。

台湾省麻将都是打十六张牌，从一万至九万到东西红中青发白板，刚好也是十六支，因此手里的十六张牌每支均可做作为诈赌信号的道具，所以这种卦门的诈赌名称就叫“支支灵”。

诈赌不被发现，不会有事，一旦发现，诈赌者就会有麻烦，

不是打得死去活来，就是要赔偿所有对方输掉的钱，弄不好还会丢命。

“大头成”来到家乡嘉义的太保乡后潭村，找好友“阿正”，希望在这里开设一家赌场，不料，这个村的黑道老大“阿利”刚从牢里出来，便在村子里搞起了麻将场，这样只有待“阿利”搞完以后再搞，这是道上规矩。

于是“大头成”与“阿成”一起到“阿利”的赌场捧场，以便日后轮到他接班设赌时，也能请“阿利”来捧场。这是台湾黑社会赌场中一种礼尚往来的规矩。

“阿利”场子的赌法是赌以一万元为底，每台二千元的麻将，赌客分坐两桌。这样，“阿正”上桌去玩，“大头成”有事外出。

等中午“大头成”回来时，“阿正”已莫名其妙地输了34万元，按规矩，“大头成”得担负一半，计17万元。

“大头成”觉得不对头，“阿正”也是麻将高手，怎么会在短短时间内输掉这么多？他便坐在一旁观战，准备待一会他上场一试。还未打完一圈，“大头成”发现坐在“阿正”上方的“阿旭”与“阿正”对面的“阿隆”玩“支支灵”的诈赌法，为之一惊。

正当“阿隆”在桌子下面送牌给“阿旭”时，“大头成”抓个正着，“阿隆”与“阿旭”顿时脸色苍白，两手颤抖，大家纷纷指责这两个家伙，结果将这两人狠狠地痛打一顿，打得直叫爹娘。

但问题还没解决。“大头成”问他们诈赌的详细过程与分赃办法。“阿旭”只好如实相告说：他们以出租汽车司机为幌子，在台北地区以诈赌为生，最近经“阿利”劝说，回嘉义参加“阿利”的诈赌局。“阿利”分四成，他和“阿隆”各分三成。

“大头成”问他们如何处理善后，这两人不能做主，只能等老大“阿利”回来再说。

不久，“阿利”骑着一辆乳白色的摩托车回来，发现赌场乱

成一片，还以为是警察来抓赌，吓了一大跳。当得知诈赌被揭发后，赶紧向大家道歉，然后对“大头成”说：“大头成，你和阿正所输的钱我们一定设法还你，拜托你不要将这些事张扬出去，外面还有100万元的赌账未收回，否则这笔钱就会泡汤。”

然后，“阿利”、“阿旭”、“阿隆”等人请大家一块上酒家请客，以示道歉，钱以后再赔。

抽头红利也是黑道赌场上的一种常见的规矩。

如“大安帮”“黑仔”在台北大安区通化街主持“时八仔场”(掷骰子场)，绰号“大头成”与其都是赌场朋友，并为其设场时捧场，也得到一份固定的抽头红利。这个赌场抽头红利共计分为35股，“黑仔”本人独占20股，“大头成”持有一股，其他十四股则由“大安帮”兄弟平分。“黑仔”赌场每7天分一次抽头红利。这样，一次抽头红利总额若为70万元，则“黑仔”分得40万元，“大头成”分2万元，其余28万元由其他兄弟平分。

由于分红不公，经常引发矛盾与冲突。在“黑仔”主持的“时八仔场”，“大头成”认为自己是“黑仔”的好朋友，为赌场出力不少，也认为分红太少，只因为“和气生财”，才未与“黑仔”发生冲突。“大头成”本身不是属于“大安帮”兄弟，可抽头红利一股，于是引起“大安帮”内部兄弟的不满。

在黑道上，“肥水不流外人田”是黑道分子的共同观念，当然不愿意外人来分羹，便试图排斥“大头成”。

在黑道最讲究的是实力，于是“大头成”找了一帮道上的朋友，在一个晚上浩浩荡荡地来到“黑仔”的赌场，确实让“黑仔”大吃一惊，便自己主动告诉“大头成”：“我不知道你身边有这么多朋友要吃饭，我看这样好不好，你留几位兄弟帮忙，为赌场把风。至于你的抽头（红利），从下期开始给你增加到三分(股)，你看如何?”

这正中“大头成”下怀，便表示同意。但“大安帮”兄弟还是有不满情绪。

就在这时，“大安帮”要“大头成”出面，向在黑道上名噪一时、后来参与谋杀江南的“竹联帮”“白狼”张安乐讨赌债。结果，“大头成”为赌场收回一笔30多万元的呆账，“大安帮”兄弟才表示佩服，“大头成”也因此走红赌场。

不久，“黑仔”因涉案于1977年被捕，“大头成”接管这个赌场。但“大安帮”兄弟又有意见，认为赌场是“大安帮”的，应由他们的三当家的“阿克”主持，或与“大头成”轮流主持。为避免节外生枝，“大头成”灵机一动，向“大安帮”兄弟表示，赌场必须流动才不会走漏风声，不被警方查获。于是在获得“大安帮”兄弟的同意后，“大头成”将赌场迁到台北锦西街的朋友住宅内。

在台湾，有赌场的地方，就必有人来“打猎”（黑道通缉犯索取路费或规费），这在黑社会是天经地义的事。“大头成”的赌场也不例外。他才搬来没几天，就来了一个不速之客，来“打猎”。他就是全省第一号通缉要犯绰号“锥子”的古永城。

不过到赌场“打猎”也是要看身份的，并非任何黑道兄弟或流氓都可随意进赌场索钱。身价不够的，可能会被轰出去的，甚至挨揍。

即使有身价的，也要依他在道上的知名度衡量路费的行情。除非碰上超级通缉犯，否则不是他要多少就给多少。

但“锥子”来索路费（这些通缉要犯要生存，到处躲避，只能到道上的赌场索要生活费或逃亡费，已成为一项不成文的规矩），“大头成”不在场。管账的“大安帮”“三耳仔”看到“锥子”身挎短枪，就给了20万元，将他打发走。

“大头成”听了后，感觉事有蹊跷，他在报纸上看到过有关

“锥子”与“草鱼”（俞中兴）的火并枪战新闻，但自己并不认识他，他怎么会来指名道姓要找我，这分明是有人在搞鬼，想利用“锥子”来整自己。

没多久，赌场又遭警察搜捕，幸亏把风的人发现得早，才未被一网打尽，“大头成”等重量级人物逃走，只有少数赌徒被抓。赌场再难以生存，“大头成”决定将赌场解散。

按惯例，赌场一旦解散，抽头红利就必须进行总分账。“大头成”因对“大安帮”兄弟不满，故他自己的兄弟分到的红利是“大安帮”兄弟的三倍，他自己也捞了一大笔，于是他一下子成为黑道上有钱人之一。

台北“松山帮”老大“车仔栋”在松山区开有一家“时八仔场”（掷骰子赌场），也是这个地区最大的一家，来这里玩的人大多是有钱的生意人。“时八仔”玩法没有固定的庄家，而是一个接一个地轮流做庄。

一天，“大头成”与一家餐厅老板“阿南”来到这里玩牌。可是这个“阿南”做庄输，押庄也输，不一会，身上20多万元很快就输光，还向赌场借了50万元。他看不行，就请“大头成”替他玩两把。

当“大头成”抓起骰子准备掷下大瓷碗时，突然感到这副骰子似乎比一般的骰子要轻。投下后，骰子跳动也有异常，他顿时判断这骰子里头一定有鬼，这又是一个诈赌局！

原来这个“大头成”尽管以前没玩几次这种赌博，但他曾在台北著名的万华龙山寺认识一位专门制造贩售电子遥控骰子的郎中“阿龙”，也看过他现场表演，所以对玩骰子诈赌也知晓不少。

电子遥控的骰子，是在骰子以及赌桌的夹板内装上很精密的电子零件，另外还有一个可操纵三颗骰子的电子遥控器。

这个遥控器上有两个按钮，一个是白色按钮，另一个是红色

按钮。当骰子掷下瓷碗后，只要按一下白色按钮，骰子点数的总和必定在三点、四点、五点、六点这几个数字之内，绝不会超过七点。反之，如果按红色按钮，无论骰子如何跳动，跳到最后，点数的总和必定是九点、十点、十一点或十二点，而十二点是最高点数，闽南语叫“时八仔”（也是这种赌博名称的来历），这个点数即可大小通吃。

可见，白色按钮是“低点”，红色按钮是“高点”，所以操纵遥控器的郎中要你掷低点你就只能掷低点，要你掷高点你就掷高点，绝对不会错。当然长时间玩，“郎中”不会百分之百让自己的人得高点，有时也会给对方几回高点，这样他们就不会起疑。

一般操纵遥控器的郎中，都藏在赌桌周围，绝不能让人挡住视线，否则不灵。只有不挡视线，他才能分辨自家人与外人，以便遥控输赢。

在这种情况下，不知内情的赌徒怎么能赢钱。“阿南”输得两眼发红，再度向场子借了50万元，想扳回输掉的钱。

聪明的“大头成”开始用眼光在四周寻找猎物。很快他就发现了操纵遥控器的郎中，原来是一个30左右的女人，身上穿着一件红色夹克，右手插在夹克的口袋里，站在“大头成”对面的赌桌旁，两只眼睛不停地观察赌桌上的每个人。

当这个女郎中发现“大头成”死盯着她不放时，开始有点紧张，便想借机溜出赌场。

“大头成”迅速起身，拉着“阿南”紧随其后，在赌场门口挡住这位女郎的去路。

女郎本想回去换件衣服，放下遥控器，但“大头成”不让，直问她的遥控器，想看一看。事态已明，女郎忙说，“阿南”今晚输的钱都包在她身上。

这时被蒙在鼓里的“阿南”才明白是怎么一回事，就揿了女人一把掌，要她把遥控器拿出来。这时，她才不得不把遥控器拿

出来，交给“阿南”。

“阿南”顿时大怒，大骂这个女人，并要给他一个交待，否则就要砸场。

由于“阿南”与赌场老板“车仔栋”都是松山地区的黑道老大，属于自己人，就更生气，但这个女人却做不了主，只好等老板“车仔栋”回来后处理。“大头成”则不愿加入这场纷争，扬长而去，由他们自己去解决。

黑道赌场讨债的花样也特别多，最严重的可以剁下欠债人的手脚，割下耳朵，甚至杀掉赖账的人。

在嘉义黑道驰骋多年的“大头成”吴进成讲，他讨债，则是从不杀人，因为杀了人也讨不回债，也不曾剁下欠债人的手脚。他是用甜言蜜语要求对方还债。

那些欠债人的日子确实不好过。那些还不起赌债的人，为了避债，白天不敢待在家里，到处躲藏，有时只能三更半夜地回家住一会。但是你想一走了之不还债，也是很难的。黑道上的讨债者对欠债人的情况了如指掌，比警方要强得多，你跑到哪里，他们会追到那里，甚至外国。

经营职业赌场的黑幕重重，各种欺局、诈赌等多不胜数。不了解内情的人，进了这种赌场，每赌必输。

在嘉义市民生路开铁工厂的“阿朝”，本身是圈外人，也是赌场中的外行人。可是在黑道兄弟“阿成”的游说下，异想天开地到“阿成”开的赌场投资了200万元。不料，场子结束后，竟血本无归，一分钱也没收回，他的铁工厂也被这有去无回的200万元拖垮了。

事后，落得倾家荡产的“阿朝”不甘心道上这种“黑吃黑”，便向警方报案，但没有切实的有效证据，警方也无能为力。这种赌场打一枪换一地，也无处查找。自己只能认倒霉。

话说回来，在台湾，那些长期搞赌场的，与警察则有着复杂的关系，实际上是黑道、白道不分，这已是台湾人人皆知的事情。

在现代社会，你若长期搞赌场，绝不可能避开警方的视线，况且到处都有“线民”（为警方通风报信的人）。

于是这些赌场老大就用钱收买警察，打通关节，不然，他们白天、晚上抓，今天不抓明天抓，就无法长期设赌赚钱。

黑道兄弟孝敬警察的方法一般有两种：一种是按月向负责该地区的警察付规费；另一种是一年三节（春节、端午节、中秋节）送红包。

少数警察向赌场要红包或索规费，在黑道上早已被承认属正常，只要不过分，大家都相安无事。

据知，仅嘉义市区就有不少下注在100万元以上的大赌场，但从未见过警察抓这种大赌场情况的发生。因为他们都是“共犯”，是一个“利益共同体”。

为了向上面交差，警察便不时抓一些消遣性、4人一组的家庭式麻将或一些小打小闹的小赌，以应付上面。

“打点”（收买警察）后就不必担心警察来抓赌，你可尽情地搞赌赚钱。即使有人报密，那些受过“打点”的警察不仅会装糊涂，而且还会向赌场报信或暗示赌场老板另移阵地。

最让人不可思议的是，遇到不良分子（通常都是有案在身的通缉犯）来索规费或捣乱时，那些得到好处的警察还会保护赌场。

台湾黑道经营赌场，有一个长期流传下来的不成文的规矩，凡是开场前、收场后，老板都必须带赌徒到酒家痛饮一番，道上人奉行不渝。

进赌场的当然还是以黑道人物为主，也有许多有钱的商人，一个特别的例外是，台湾演艺界参赌的人特别多，惹祸上身的演

员也多。但开赌场的基本上都是黑道兄弟。

嘉义的黑道闻人“大头成”为了挣钱养女人，也在租来的房子里搞起小赌场来。就有不少演艺界的人士来赌。一位曾有点名气的电视演员江宏就是这里的常客。没想到输得很惨，将自己上电视与在歌厅唱歌赚来的钱全输光了，欠下数十万元的赌债，只好趁天还未亮就跑了。因为他为人豪爽，是一位值得深交的朋友，“大头成”没有追他的赌债，否则即使你跑到天涯海角，也能找到你，这样他才逃过一劫。台湾70年代末的红歌星高凌风也是赌场常客。不料在台中一次赌场上，一次输掉700多万元。但这些挣钱容易的明星不会在乎，下次还会再来。正因为如此，台湾的演艺圈与黑道的关系也十分密切。

尽管当今台湾的黑社会企业化程度相当高，从事各种合法与非法的企业，成为其生存的主要来源，但黑道赌场还是经久不衰，仍然是黑道特别是地方角头帮派的重要经济来源。黑道赌场所引起的江湖恩怨也就没完没了，一切仍在继续。

1985年前后，台湾中部地区出现了一种新型的赌博游戏，大家叫它“大家乐”。这种赌博原本是奖券行用来促销“爱国奖券”（“省政府”发行的一种筹措资金的公益性债券）的一种手段。据说台北万华地区一家奖券行，为了鼓励民众多购奖券，规定凡持有该行出卖的奖券，其最后两个号码与奖券第一特奖号相同者，就可以领取赠品，从而奖券销售大增。

这一赠奖促销活动流传到台中市后，就发生了某种变化。一家“盛泰”奖券行按上述方法，把奖励范围扩大到奖券第八奖号码，赠品包括了小工艺品、录像机、摩托车等，吸引了不少前来购买者。随后，各奖券行纷纷仿效与改进，扩大发行奖券，进而不知不觉演变为一种风靡台湾全省的全民赌博活动，并被称为“大家乐”。

“爱国奖券”的第八奖号码成了赌徒下注的标的，“大家乐”成为变相赌博的代称，奖券行开始在“爱国奖券”开奖日前发行“大家乐”彩券。

“大家乐”彩券以组为单位，每组从“01”、“02”，一直到“99”，共有100个号码供人选买。但凡欲购者须先向奖券行选定一个号码，称为“一支”。下赌注参加的人可以选择加入500元组或300元组。若是500元组的买“三支”，得缴费1500元；若是300元组的买“三支”，缴费900元。

奖券行便在一张划有“00”到“99”100个号码的统计纸张上，画押选号者的姓名或代号，然后再发给一张写明500元或300元的收据，到开奖时，中奖者持收据领取奖金。奖券行就成为“庄家”。“庄家”按赌注多少抽成为自己的收入。如以500元为例，若该组卖出70个号码，收入35000元，“庄家”抽一成，余额按“爱国奖券”八奖开出号码给奖。

这种赌博方法很赚钱，全省不少黑道人物也加入这一行列，做起“庄家”。许多“庄家”还纷纷扩大“大家乐”的组数，有的每期做到250组，一般也有80到150组。后来，有人将“爱国奖券”七个头奖的尾部两个号码也作为赌码下注。

“大家乐”的主持人要生存，就必须身跨黑白两道，否则就无法经营。黑道分子看到“大家乐”的巨额利润滚滚而来，怎会等闲视之，便插手分杯羹。那些得到奖金的赌徒，也成为黑道分子的肥肉，只要黑道要求“吃红”，不论是“庄家”还是赌徒，就不能不给。一些“庄家”为了保住利益，又不得不豢养黑道人物，既能把风，又可兼保镖。一些不法奖券商利用黑道分子专找中奖赌客的麻烦，要求他将赢钱的三分之一或一半再拿出来继续赌下一期奖券。更有甚者，“庄家”独吞赌注后，唆使黑道人物出面恐吓被害人。

“大家乐”的流行，使社会治安恶化，犯罪增多，对社会生

产与生活产生重大影响。台湾当局虽采取措施进行严厉打击与取缔，但收效不大。1987 年底，台湾当局不得不停止发行衍生“大家乐”的“爱国奖券”。“大家乐”开始逐渐走向衰落。但一些赌徒又用统一发票的号码、军人储蓄的摇奖号码签注，接着有人从香港引进“六合彩”（台湾也称“六合乐”）进行赌博，从此“六合彩”再度风靡台湾。

香港“六合彩”每周开奖两次，每月平均开奖八次，比原有的“爱国奖券”每月两次多出六次。香港“六合彩”每期开出的中奖号码，在台湾衍生出的赌博方式，基本上沿袭过去“爱国奖券”引发的“大家乐”模式，但赌的花样更多。“六合彩”每期开出的号码有 6 组，范围从“01”到“42”共有 42 个号码，较“大家乐”每组 100 个号码为少。但台湾赌徒将两者结合起来，形成了“港式”与“台式”两种“六合彩”玩法。

港式玩法：中彩号码以香港开出的六组号码为准，而因签赌者选择下注的号码每组最多只能有 42 个，因此俗称“小号”。

台式玩法：由香港开出的六组中彩号码中，取每组号码中的个位数，组合成另外五组号码，签赌的范围像过去一样可从“00”到“99”共 100 组号码，故又称“大号”。如香港“六合彩”开出的六组中奖号码为“02”、“13”、“29”、“35”、“40”、“42”，台湾“小号”的玩赌法便以此六组号码为准。“大号”赌法则取上述六组号码的个位数码，即“2”、“3”、“9”、“5”、“0”、“2”。然后依序组合为“23”、“39”、“95”、“50”、“02”等五组号码，便为“大号”的中彩号码。

经过近 10 年，“六合彩”的赌法，已发生了很大变化，且“港式”有取代“台式”之势。“港式”赌法有二星、三星、四星、连碰、交叉碰、搭全车、不出牌等种类。“台式”赌法主要有“夫妻乐”、“特尾”两种。具体玩法更多，如“碰碰乐”（也称“两朵花”）、“六朵花”、“火车龙”、“特别号”、“特尾三”、

“直走”等。

玩法不同，中奖的金额也有差异，但大致而言，挑选出来组合对奖的号码越少，中奖的机会越低，中奖的金额则相对较高，奖金一般可达赌金的 50 倍、60 倍、160 倍、500 倍、6000 倍不等。

一般而言，小额赌法多为中下层人士。巨额大赌不是一般老百姓能赌得起的，主要是黑社会角头或老大下赌。更有许多黑社会分子当组头的。因为赌博本身就是黑社会重要生活来源之一。

“六合彩”同样与政治、黑道挂上了钩。组头与黑道则密不可分。有些组头本身就是黑道分子。“六合彩”成为黑社会敛财的重要手段。

起初，经营“六合彩”的组头为躲避警察取缔，常以捐“政治献金”方式帮有政治实力的人助选，以取得护身符。一些地方政治人物深知“六合彩”赚钱，也经营起“六合彩”，有的直接签赌，有的出任组头。

台湾的政治选举与“六合彩”一样，主要靠深入的基层人际关系或“桩脚”。而平时这些“六合彩”的“桩脚”到选举时又变为政治参选人的“桩脚”。据说一名省级民意代表在暗中经营“六合彩”甚久，是一个大组头，周边一些乡镇机关团体的头头也成为其小组头。在 1994 年的县市议员选举中，各地都有组头出身或干过组头的人当选县市议员。

经多年的发展，“六合彩”的组头在地方上已经结成属于自己的社会关系网，对地方政治有相当的影响力。于是，“六合彩”、黑道、地方派系、选举相互融为一体。在政治上，不少组头披上了政客的外衣，当起了民意代表，甚至利用平时服务的赌徒作为“桩脚”，操纵左右地方政治；在经济上，组头拥有巨额资金，成为“地下金主”，可以掌控、影响地方经济活动。而这些组头，或表面上的政治人物，可能就是地方角头或黑社会老

大。

从“大家乐”到“六合彩”，造成一股全岛性的赌博风潮，进而为黑社会帮派介入与操纵，又因巨额经济利益而引发许多黑道之间的恩怨。

1988年7月30日傍晚，以豪赌“大家乐”、“六合彩”而名声大噪的台湾中坜黑道角头绰号“咪咪”邱正宏被人暗杀，弃尸于桃园平镇乡南兴里一座空房内的水塔里。身体裸露，左耳被割，头部被铁器所击，身体大部分被水泥覆盖。身上的一块价值400万元的镶有钻石的劳力士手表、一只价值昂贵的钻石戒指及700多万元的旅行支票均不知去向。

“咪咪”被杀害，且惨遭毁尸、弃尸的消息一传出，惊动了台湾的黑白两道，警方迅速成立专案小组，展开追查行动。同时全省南北黑道角头老大火速赶往中坜邱正宏家，慰问家属，准备丧葬事宜，同时策划寻找凶手方案。“咪咪”的生前手下兄弟，更是摩拳擦掌，决定在警方之前拿到凶手，以雪此奇耻大辱，以祭“咪咪”在天之灵。

邱正宏的死，不仅在已平静多年的中坜黑社会引起震动，还涉及与此案相关的邱于庭、林以真、周筱云三位女明星。其中“中视”当家花旦邱于庭不堪流言所扰，企图自杀，又起风云。

邱正宏是台湾黑道上的传奇人物。他身材瘦小，身高只有一米六零，体重不足50公斤。长有一双奇特的耳朵，右耳大，左耳小，又形似木耳，乃获“咪咪”绰号（客家语中的木耳音同“咪咪”）。他出身在一个赌博之家，也使他从小就与赌博结下不解之缘。

他生性聪明，反应灵敏，却不爱读书。几经努力，考上台北建国中学初中部，但整天玩，不上课，学习成绩跟不上，被迫转回家乡中坜一家中学的分校就读，开始结识街上的小兄弟，进而步入江湖。

毕业后，他跟随在中坜、桃园地区有教父之尊的“天来仔”闯天下，且在众兄弟中出类拔萃，颇得“天来仔”的欢喜。18岁时，“咪咪”已是黑道上的一个小头目，不断率众兄弟与其他角头火并拼杀，夺得中坜市大同路和火车站一带的地盘，闯出了名气。

他耳濡目染深受父亲赌博的影响，嗜赌如命，经常出入赌场，且性格豪爽，因而获得“赌国大亨”的头衔。据说，他曾一夜之间赢过3000多万元与一间店面，可是第二天不但将前晚赢来的钱全输掉，还再赔了1000万元。对此他面不改色，稳如泰山，好像什么事也没发生。

“大家乐”流行后，他也加入了赌“大家乐”的行列，大赌特赌，使他赢得万贯家产，成为暴富的亿万富翁。在1987年第1164期“爱国奖券”开奖后，他得到了2亿元的奖金。一时间，“咪咪”‘的名字在台湾变得更响亮。

其实，邱正宏得此奖金内有关节。在第1163期“爱国奖券”开奖前，他通过关系与卖明牌的人取得联系，获得“25”这个号码的明牌，而且对方一再保证绝对稳中。邱正宏便投入2000万元的资金，将中坜一带所有“大家乐”组头的“25”这个号码全部押上。没想到，开奖后，对奖号码不是“25”，邱正宏大赚的计划破产。邱正宏便传话给贩卖明牌集团的人：若不尽快弥补，后果自行负责。这在黑道上就是最后通牒。

明牌集团自知自己不是“咪咪”的对手，便立即找到“咪咪”，向他道歉，并让“咪咪”签下一期“91”或“19”两个明牌，保证一定中奖，否则一定赔上。这样，“咪咪”又投入2000万元，把宝押在“91”、“19”这两个号码上，同时也让亲朋好友押这两个明牌。第1164期“爱国奖券”开奖后，果然“91”、“19”中奖，“咪咪”一举获得2亿元的奖金。可以说“咪咪”是一夜暴富不为过。

后来，“大家乐”在政府取缔下走向衰落，“六合彩”趁机而起，一样风行。但“咪咪”却不再风光，不再走运，输多赢少，输掉了许多钱。更可怕的是，黑道与赌场恩怨给他埋下了杀机，终于被人暗杀。

轰动一时的“咪咪之死”之谜于1988年9月19日揭开，一切真相大白。

经过一个多月的追踪调查，警方逐渐掌握了案情，并抓获8名嫌疑犯。让人想不到的是案犯主谋竟是“咪咪”的贴身兄弟张正清。这位年纪25岁的张正清曾在中坜一家西餐厅当服务生，因“咪咪”经常光顾，花天酒地，好不气派，令张正清十分羡慕，便对“咪咪”大献殷勤，博得“咪咪”好感，收为小弟。如今，这位小弟眼看大哥大发，却不能多分给自己一份，便起了邪念。

在他的策划下，由他的两个朋友各自请了几个人，说是兄弟受人欺负，要教训一下。这些人不明真相，为了帮朋友的忙，便乘车一块而去。在张正清的指挥下，一帮酒肉朋友于7月28日晚直奔“咪咪”邱正宏的家。他们迅速窜入屋内，正好发现家中只有“咪咪”一人，便一拥而上，将正要休息的邱正宏双手反绑，对其进行勒索，迫使“咪咪”拿出钥匙，打开保险柜，歹徒搜出4万美金、两本旅行支票、80万元新台币及首饰等，进而挟人而去。

这帮人将“咪咪”拉到郊外的一间破屋，并就放不放“咪咪”一条生路意见发生分歧。张正清认为，如果放了，自己一定活不了，便提议杀人灭口。尽管有不同意见，可大家还是担心放了后会遭报复，于是最后决定处死“咪咪”。他们便将“咪咪”押到大溪附近，由张正清下手将其勒死后，泼上硫酸，洒上石灰，再弃尸于一水塔之内，然后扬长而去。

事后，张正清还以“咪咪”亲信小弟的身份参加“咪咪”的

善后处理，并在黑道兄弟的“缉凶日会议”上宣誓报仇。尽管张正清装得很好，机关算尽，还是被“咪咪”的家人怀疑，直到警方获得证据，将其一网打尽，一场黑道上的谋财害命案就此结束。

“咪咪”被杀之后，他的手下黑道兄弟曾立下誓言：“命案不破，誓不出殡”。如今命案已破，“咪咪”的葬礼便于9月18日举行。

灵堂会场。中间放着“咪咪”的遗像，周围摆满了金黄色的大菊花。会场两边整齐地放满了地方绅士要人与亲友的吊唁花篮，上面悬挂着幅幅挽联。灵堂前方，用啤酒堆成一人高的一座座“啤酒山”。会场外，摆放着当地村（里）长、中小企业银行、市议会、帮派组织等送来的巨幅敬联。

当日上午10时许，代表阴神的“八家将”首先登场表演。他们身穿黄、白、紫、黑等四色衣裳，脸上画着吓人的脸谱，左手拿手铐，右手持木剑，狂舞起来。舞后，“联英社”狮鼓队进场继续表演。

10时30分，司仪宣布“咪咪”遗体告别仪式正式开始。先是遗属上香，道士诵经，后是来宾致词。致词人则包括了“国大代表”、省议员、中坜市市长秘书、黑道头面人物、邱姓亲朋好友等。

当司仪唱名“竹联帮”大哥致词时，“哗”的一声，百来个“竹联帮”兄弟从座位上站起来，走进中间夹道，为“咪咪”默哀。接着，民进党代表致词。

随后起棺。出殡车队从“咪咪”家向外延伸成一条长龙。由五辆黑色的凯迪拉克轿车作前导，接着是各地黑道角头、亲友雇来的中西乐队、表演艳舞的花车，中间是灵车，后面是护卫车队，绵延数公里，将灵车开往达平镇宋屋公墓。

第十七章

职业棒球赛背后的黑色大赌

棒球在台湾是一种十分流行与普及的运动。职业棒球比赛也成为台湾流行的赌博活动项目之一，就像西方的拳击比赛、赛马赌博一样。

1996年6月15日，台北市棒球场出现大量传单，其中直指“味全龙队”总教练徐生明是“棒球界的耻辱”，称其和球迷勾结赌博，涉嫌在球赛中放水，故意输球。

6月16日是“味全龙队”对“时报鹰队”之战。双方战至第9局下半场，鹰队还以四比零遥遥领先。眼看比赛就要结束，最后半局轮到龙队上场击打。在前八局之中，鹰队投手凯乐几乎都让龙队球员三上三下，可是在最后这个时候，却连续被击出两支安打。然后凯乐又是误投、触身球连连出手，再加上三垒上的球员一记大误传，转瞬间连丢了3分。之后，鹰队派出了救援投手郭建成上场，试图稳住大局，但仍然被龙队再攻下一城，场上出现了平局。

眼看就要赢到口袋的赌注，此刻又要再掏出来，全场气氛一下子紧张起来。

按规定，比赛出现平局，须加赛到11局。赛至第11局下半场，龙队由陈金茂上场打击。在全场观众屏住呼吸之间，陈金茂猛力一挥，“咚”！竟然是一支全垒打！

至此，原先输了4分的龙队，在打成平手后，倒赢4分，而

且还是“满贯全垒打”。“味全龙队”真的打出了一场“离谱”的比赛，把所有下注的赌客搞得全数“翻过来”——原本喊声振震的人个个目瞪口呆，而刚才还是垂头丧气的人却在高兴地欢呼。

此后，各种“职棒赌博”的新闻在台湾各大媒体频频曝光，在岛内球迷中引起强烈反响，由此也揭开了台湾“职棒赌博”的黑幕。

棒球运动早在日据时期就被引进台湾，经过几十年的发展，现在可以说已是岛内一种全民运动，70年代是其最鼎盛的时期。当时，蒋介石政权被逐出联合国后，全岛笼罩在一片凄风苦雨之中，人们情绪低落。但这段日子正是棒球在岛内最火的时候，台湾接连获得三次世界少年棒球赛冠军。但这种辉煌时光并不长，很快，台湾中华少年棒球队便离冠军宝座愈来愈远，岛内民众的热情渐渐也冷了下来，电视台也不再花大钱搞实况转播。到了90年代，职业棒球在台湾重新兴隆起来，赌博也随之进入了棒球场。

有赌就必有黑道的渗入，这是台湾社会的最大特征。职业棒球一起步，便走上了美国的发展道路，黑道介入、豪赌、故意“放水”等种种在美国已司空见惯的丑闻，在台湾也一样上演。

台湾嘉义南部某县市一个有黑道背景的县议员，每天必看有线电视的职棒转播。他并不是球迷，但是比赛的结果，却关系到他几百万元的输赢。“上星期，我跟某代表对赌，已输了二三百万元，今天的比赛，我事先有打听，一定可以连本带利地讨回来”。这位议员一边眼睛紧盯着电视屏幕，一边充满自信地告诉访客。据了解，光是这位议员所在的城市，投注在职棒场上的赌资就不下1亿元。

某棒球队的明星球员，在外偷情，事发后，被对方索赔300万元。一位赌场组头“热心”地向他无息借贷300万元，条件是少几支全垒打，单场比赛少弄几支安打。后来的比赛中，果然这个“明

星”球员成了“病猫”,不仅全垒打不再出现,原来三成多的打击率,也一下子滑落到只有二成。社会阅历不多的这位明星,事后才了解,300 万元与交换条件,从头到尾就是设计好的“请君入瓮”。

某棒球队王牌投手,近一个月来表现失常,以往那种接替先发投手,轻松投几球就获胜的场景不复重现。没有一个人能够相信,这种种表现是他“正常”的举动。其背后就是黑道控制比赛的结局,这位投手也从中得到应得的好处。

台湾职业棒球组织对赌博可说是又爱又恨,一方面赌博带来了比赛场边拥挤如潮的人群与门票,一方面赌博又会带来职业棒球“黑化”与“赌博化”。有人这样说,如果当初没有人在棒球场边下注赌博,职业棒球在岛内能不能活到现在,都是一个大问题。因此,台湾职业棒球运动能很快发展到今天如此兴盛的局面,缔造出辉煌的场景,场边的众多赌徒可说是“功不可没”。

初期台湾职业棒球的场外赌博还只是几个好赌之徒,在看球时因拥护的球队不同,而进行小小的对赌而已,输赢也不过新台币数百元或几千元之间,赌的对象也只是对某一特定球队的拥护程度而已。随着时间的推移,参赌的人数日渐增多,开始有在场做庄的所谓“组头”,接受下注,金额从 500 元到 5 万元不等,组头大小通吃,来者不拒。经过几年的淘汰整合,棒球赌博活动出现了“企业化的经营”。几年前,岛内组头还寥寥可数,很多还是“六合彩”组头兼做职棒赌博组头。现在,台湾全岛各地的组头,各有其势力范围,在球场附近设有固定签赌站,全岛连线,集中开盘,接受北、中、南各地的资金投入。通常一位中型规模赌盘的组头,其赌盘资金一次都有 100 万元进出。同时,随着职棒赌博的风行,台湾一些议员也当起了组头。

棒球赌博花样繁多,赌徒不畏风雨、不辞劳苦,在全岛南来北往地赶场。这些人的目的当然不是看球赛的精彩,而是要证明

自己的“判断力”，看自己“赌得准不准”！至于赌博的方式，花样虽多却相当简单，万变不离其宗，赌的都是“数字”。譬如，双方胜负几分？比数是单是双？先发投手可以撑几局？某球员几支安打？此外，还有“全垒打数”以及其他凡是能想得到的数字，没有一样不能拿来赌！

除了每场比赛可以赌外，每局也可以设赌，随时可以下注。如某个选手上场，可不可以击出安打？能否将球击出内野区？会不会击出打点等，都可以当场下注，速见输赢。

一般而言，台湾职棒赌局基本有7种类型。

类型一：“对赌”。对赌是最基本，也是最简单易懂的玩法之一。只要赌输赢即可，属于大小赌徒都能接受的零和游戏，也是最早利用职棒进行赌博的形式。

类型二：“输赢赌盘”。赌局组头根据交战双方的近况（目前球队的战绩排名），开出所谓让分的赌盘。例如，上一球季封王在望，战绩一路长红的球队与排名长期垫底的球队交手，组头设定前队需让3分，表示比赛结果必须是前队赢4分以上，押前队的赌徒才算赢，反之，就是押后队的赌徒赢。这种赌法是由组头自订游戏规则，在台湾中南部是下午5时封盘，北部则开放到下午6时封盘。一般组头都会收取赌资的5%，作为手续费。如果遇到因故未赛完9局，由裁判裁定比赛结果，在一般赌盘组头的眼中，则不会予以承认。因为这种赌盘以两队比数相距多寡，或是以赢球得分上限及得分下限为押注对象，当然要以正规比赛的9局为赌局的胜负依据，否则在棒球这种“七分投手，三分打击”的比赛中，致胜及落败的变数太大，没有打完9局就裁定输赢，对输的一方是很不公平的。

类型三：“赌打击”。在野手打击方面的赌法也是五花八门，像是赌单局的安打数，全场比赛的安打数，单一球队的安打数，两队单场安打和及安打差，或是像“全垒打”，“盗垒数”的多

寡，都是这一类的赌法。而像一些特殊的纪录，如某球队即将达到2000支“全垒打”，场外就有球迷下注是某一击打者打出的。

类型四：“赌投手”。投手方面可以赌的名堂更多，像是先发投手会被击出几支安打或全垒打？以及投手个人的成绩与失分多少等。

类型五：“单押型”。如单押和局，以每单位固定金额押注，凡是押中和局者，可以获得较大赔率的金额。在台湾南部地区就曾经流传过赌金200万元的一场“和局”押赌比赛。

类型六：“立即乐”。这是一种以比赛现场球迷临时起意的随机的赌法。特色是金额不大，玩法随赌客高兴，自订规则，其赌博涵盖范围的弹性比较大，可立即见输赢。

类型七：“游戏卡”。以游戏卡为主要玩法的赌博是以公司形式出现的赌盘，采取与岛内媒体合作的方式，广为发售游戏卡，借以招揽球迷。在游戏卡内含有100个点数，买游戏卡的赌客，拨打该赌盘提供的电话号码，依照电话中所提供的项目，选择想要下注的点数。点数赢得越多的人，按照该赌盘的累积办法，可以赢得免费的旅游券。

除此之外，赌博还有内场与外场之分，外场也有对赌与组头两种。目前台湾最流行的赌博方式，是由专业的组头做庄，赌徒自由下注。此种方式赌徒向签注站购买签注点数磁卡，以后逢赛事只需一通电话，即可完成下注的程序，而不需要亲自到球场，下班后回家看电视转播，便可以知道输赢，即使忙得脱不开身，也可以从收音机或报纸中知道比赛结果。组头会在比赛隔天上门收钱。内场也有内野与外野之分，外野赌博是比赛场外观众直接对赌，内野赌博则是专业的庄家主持，组织上明显职业化，方式上专业化。

不论怎么赌，都必须是配对进行对赌，才能有所谓输赢的结果。在这里，最大的赢家，不是参赌的双方，而是组头。只要组

头订好规则和赌法，赌客就各凭所好下注。而组头精心研究出来的赔率，绝对是大有玄机。赔率即赌徒赌某队赢球与输球的机率，组头据此计算“出让分数”。如1996年“统一狮队”对“三商虎队”之战，狮队的赔率是2:3，虎队是3:1，战绩上狮队明显优于虎队，组头为了防止赌徒一窝蜂地押注狮队赢，因此在比赛结果分数上还要加上狮队让虎队2分，狮队才算赢，签注狮队赢的赌徒才算押中。

组头还可以对赢家抽取固定的5%到10%的彩头佣金，因此肯定是稳赚不赔，赌得愈多，组头拿的就愈多。如果以台湾职棒每星期有10场比赛的频率，组头只要能招揽到1000万元的对赌赌注，就可以净拿50万元，职棒例行赛季总共有30周，组头总抽头的利益高达1500万元。这种一场比赛招揽1000万元赌注的组头，在台湾还只能算是个小角色。在赌博盛行的台湾中南部地区，一场比赛的赌资绝不会小于1000万元。这种巨额利益，只要粗通算术的人都会很清楚，职棒赌博在岛内能如此流行，不是没有道理的。

不过，组头要拿纯利，非得是神通广大或交游广泛的人物不可。职棒的赌法，是赌两支球队的其中一支会赢，这就必须找到另一位赌另一支球队会赢的人，撮合双方对赌，而且在赌资上又能相符，这个赌盘才算对上了，组头的作用就在这里。因此组头必须掌握广大的人脉才行。组头的能耐表现在，两方面的人马他都能掌控得住，并使双方拿出钱来进行对赌，他在中间穿针引线，纵使碰到赌金再大的赌客，他也能找到愿意和他对赌的另一人。不过有时候，两边人马的赌资无法凑齐，组头就只好亲自下海，吃下多出来的那一部分，自己出钱来和他们对赌。

职棒赌博通常一次下注最少是5000元，上不封顶。组头都很乐意为下大注的赌客找到对赌的对象，以收取高额的佣金。组头在赌客的眼中个个都是“厉害的角色”，他们头脑清楚，办事

效率高，招揽下注的工夫更是了不得。

台湾的组头已形成集团运作，发挥集体力量的功能，利润更是倍增。在组织上，大组头底下有很多小组头，四处去“兜生意”，假如有人要用1000万元赌甲队输球，大组头一时无法找到1000万元的对赌客时，就会找来小组头，凑成1000万元的赌徒组成为一个对赌的整体，和这位赌客对赌，若是赢了钱，大家一起平分。

这种组头集合的成员有的可以多达二三十位。如果势力遍布全岛，就可以汇集高额的赌金，组头的获利也大为增加。若是熟客，则可以用一通电话下注，不熟者则是现场收款，组头也不怕熟客欠债不还，因为这种全岛性的赌博集团，都是和黑道挂钩，或本身就是黑社会组织，随时可以出动人马要钱。据统计，操纵台湾职棒赌局的全省组头多达300多人。这些人大多是黑道分子或身兼黑白两道的江湖人物。在上亿赌金输赢的背后，诱使黑道以暴力与金钱来影响胜负。

虽然岛内有各种各样的小道消息，但还没有一个人能提出球场黑幕的直接证据。人们只知道，球场上手持大哥大的观众群，不时将成捆钞票输赢不当一回事似地传递，已是台湾赛场外处处可见的事实。随着赌风的日渐炽烈，传闻中每场比赛，赌局流动的资金少则数百万元，多则以亿元计。有人估计，一年下来，高达300亿元的赌金在全岛球场上转手。这块肥肉大饼自然引起了岛内黑道的垂涎，于是就有了外力介入的传闻。随着赌金的不断高涨，不仅吸引了岛内黑道卷入，连香港澳门地区的黑道人物也渡海而来。有人说，今天台湾职棒赌风变得这么复杂，都是黑道惹的祸。由于黑道介入签赌行列之中，职棒比赛赌博复杂化，开始出现有人为了获利或使出不择手段。

据说，台湾“职业棒球联盟”为了想调查事件真相，抓几个球员来“开刀”。起初想聘请“征信社”（台湾私人侦探组织）暗

中查访，但没有一家“征信社”敢接这件案子。“征信社”说，他们可以去查球员的外遇，但无法查球员与赌博的关系。探究原因，因为若招惹黑道人物，什么时候被砍手、砍脚都不知道，任何一家“征信社”都不会自找烦恼，搬石头砸自己的脚。曾经有球员在赛后，出了球场就被数位大汉持枪押走的事件，这当然与赌债有关。传闻中，这位球员输掉了数百万元。

不少球员常常接到威胁恐吓的电话，因为部分黑道“兄弟”输得太多了，就会把这个账算在让他输钱的球员身上，说是他们故意“放水”输球。

1996年5月12日，在台中有“兴农熊队”对“统一狮队”之战，场外赌局开出狮队让3.5分，也就是说屡战屡胜的“统一狮队”必须净赢“兴农熊队”4分以上，押注狮队赢球的赌客，才能赢钱。有这么好的条件，熊队又是占据主场优势，不少台中球迷纷纷押注熊队胜，只是比赛中熊队表现完全走样，两局内连失7分。抓狂的赌徒，以丢垃圾进场宣泄不满。

5月26日，“三商虎队”与“兄弟象队”之战在台南上场，虎队开始以二比一领先，这时虎队球员蒋坤生出现失误，一记关键球出现漏接，结果使虎队反以二比三输了比赛。一名在这场球赛输掉千万元赌资的赌客，事后大为光火，扬言蒋坤生故意放水，要找他的麻烦。在此前举行的另一场比赛，也是赛况出现大逆转，输钱的赌客因此迁怒裁判，当场口出恶言，骂声不断，直嚷嚷“要让裁判好看”！赛后，警方不得不出动大批人马，保护几名裁判，仓皇逃离现场。

诸如此类赌客因为输急了眼而扬言要报复的事情，多如牛毛，数不胜数。小的有恐吓殴打球员，大的群起闹场，干预比赛。1992年在台北市棒球场举行的一场球赛中，就发生过因为赌徒对球员表现不满意，群起叫嚣辱骂，一时间瓶罐垃圾四飞，闹到最后，赌客把看台上四百多张椅子拆下来丢进场中。还有一

次，比赛中途突然天降大雨，场地积水，“职棒联盟”为顾及球员安全，宣布比赛延期。结果场外观众因为赌资已签，拒绝离去，纷纷鼓噪叫骂，聚众包围“职棒联盟”，强逼球员冒雨比赛。台湾“职棒联盟”竟也顶不住压力，更改初衷，下令球员上场淋雨，搏命演出。

同时，球员、裁判及教练也面临着来自外界日益增强的压力。为了控制比赛的结果，黑道及组头不惜以金钱、美色对球员加以引诱收买，再加上暴力、恐吓等手段的交互运用，已使各队球员普遍笼罩在“黑色”的阴影下。

1996年8月3日晚，“兄弟象队”与新改名的“兴农牛队”在台中比赛，场外签赌的总金额达数十亿元。出人意料的是，一向领先的象队竟然以5比7的比分败在长期积弱不振的牛队脚下，象队王牌投手陈义信独失7分，引发场外操控赌局的黑道分子的不满。象队刚回到下榻的饭店，陈义信等5名象队球员便遭以绰号“阿修”为首的黑道分子持枪绑架，迫其承认在比赛中“放水”，要其在今后的几场比赛中一定要全胜，其中1名球员还被打伤。3名球员迫于无奈，只得答应条件，才获释放。消息泄露后，当事人拒绝透露细节，在次日下午象队与牛队又进行补赛，台中市警察局出动了100多位警察到球场警戒，象队在巨大的心理压力下，以2：11的悬殊比分再次告负。

职业棒球赌博的变质，最可怕的还是来自球员自己的介入。一些球员平时就很喜欢聚在一起赌博，在赛场外高额利益诱因下，只要用假名、或借友人的名义，球员就可以向组头们下注，这样就可以实现赚场内奖金与场外彩金的“一箭双雕”。这就出现了有因参赌而赚了数百万元的教练，也有因为参赌而欠了一屁股债的球员，于是在职棒球员高收入的后面，就有不少人靠举债度日。据说，在台湾，球队介入职棒赌博，几乎没有一队幸免。

某一球队上从老板和总教练，下至球员都参与了场外赌博，教练也只起用可以“配合”的球员上场比赛。台湾“职棒联盟”被迫做出新的规定，禁止球员带行动电话，严格实施晚点名，监管球员的私生活及交友情况，球员不得参加陌生人的邀宴等。

1996年8月7日，台中市查获了2名主持职棒赌博的黑道分子。9日，台北市刑警大队也扫荡了3处职棒赌博站，逮捕19名组头，正式掀开了职棒赌博的黑幕。

在台北查获的一处联棒赌博站是以“乐亦科技公司”名义设立，公司董事长是“竹联帮”忠堂“大哥”周榕。该站专门从事职棒赌博活动，印制了大批“职棒储值卡”。另一处赌博站名为“和登企业集团”，其负责人便是在岛内娱乐界颇有声望、曾被通缉的黑社会组织“天道盟”领袖之一的杨登魁。

8月15日，台东地方法院以现代馥宇科技公司利用“强棒乐卡”供人赌博，宣判该公司负责人杨庭鉴有期徒刑4个月，成为台湾第一宗利用职棒赌博被判刑的案例。22日，台中地方检察署检察长宣布，已确定“天道盟”、“四海帮”和“竹联帮”三大黑道帮派经营职棒赌博投注站。

虽然职棒比赛中黑道介入已是人所共知的事实，但要想彻底清除，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因为，按照台湾的法律，职棒对赌的行为，涉及的是刑法赌博罪，属列入轻罪范围，根本就没有人对判刑担心，即使是黑道分子担任组头，也只能算是聚众赌博罪，最重不过被判3年徒刑，与经手的上亿元赌金的输赢相比，算不了什么。退一步说，如果组头或赌客，以暴力胁迫的方式，迫使球员违背自己的意愿而故意输球，触犯了台湾法律的妨害自由和恐吓罪；如果赌徒与球队勾结，由领队教唆特定球员在比赛中“放水”，以操纵比赛结果，那么领队涉及背信行为，球员则触及刑法诈欺罪名，但在赌博行为的具体认定上，“赌具”和

“赌资”为其要件。岛内吃法律饭的人士言称，职棒对赌并未透过具体的赌具，而是以抽象的比数和胜负来决定输赢，因此，即使查获签注的赌单，也难以具体认定其赌博行为。而在“背信”、“诈欺”等罪行方面，更是难以掌握确切实据。

台湾专门侦办重大政经要案的“内政部调查局”，针对岛内职业棒球中的黑幕状况，深知其问题复杂，不愿卷入办案。一位负责人发表讲话，声称：“由于职棒的问题，仅是涉及赌博、恐吓等罪行，并非调查局法定业务，因此由警察局机关侦办较为适当。除非发现公务人员介入诈赌、假球赛情事，或者庞大资金窜流，形成重大金融犯罪，调查局将不会主动侦办”。

在棒球队方面，则是极力撇清与黑道有任何关系。台湾“职棒联盟”前会长陈重光紧急声明：相信所属全体工作人员、教练与球员，绝未与黑道勾结，没有采取不正当手段操纵比赛胜负，以谋取私利。联盟秘书长屠德信亦表示：“从各方面得知，台湾职棒赌风确有愈演愈烈的趋势。不过，联盟为了让职棒保持清新风气，已由会长陈重光出面，向警方寻求协助，一定要找出这些破坏棒球运动的不法之徒”。屠德信还说：“联盟或是球队人士，若是参与‘球赛赌博’，一经查获且罪证确凿者，联盟或球队不仅将对其处以‘开除且永不录用’处分，而且，对涉嫌赌博的公诉罪，主动移送法办，绝不宽恕。”不仅是“职棒联盟”，连职棒球员工会也为澄清“黑色”传闻，出面呼吁“各方的大哥，请大家用双手鼓掌来鼓励我们，而不要用恐怖的枪柄来打我们”，“请还给我们干干净净的棒球”，并发起球员自清运动。

自清的话语言犹在耳，8月30日，“统一狮队”领队郭俊男便因5月与“强棒乐”公司签订协议书，在全岛贩售职棒赌博游戏卡，被警方拘提，最后以8万元交保候传。

看来，在岛内赌风盛行与黑道普遍介入的情况下，台湾棒球比赛中黑色赌潮仍难以遏制。

第十八章
黑道军火走私交易

南部地区一位黑道老大讲，早年台湾黑社会，一定要人高马大，不然也要会功夫，没有三两下子，就根本混不下去。想要当老大，先要看看自己有没有拳头强硬的实力，而且当老大的人凡事要自己打头阵。现在不同了，今日的老大靠枪崛起。只要一枪在手，功夫、体力全不重要，放冷枪或敢亡命乱开枪的，反而可以迅速在黑道上窜起，甚至成为一方老大。黑道军火走私头子许金德正是这一时期代表性角色。他身材一点也不高，只有一米六零，但他有枪，加上身边结合了当年的十大枪击要犯章锦梁、梁国凯、林和顺等人，身价更高，不可一世，但最后还是死在枪下。

枪支成为台湾黑道最抢手的东西，且不断进行升级换代。早期，黑道人物弄枪，不管是土制钢笔手枪、信号枪，还是猎枪、散弹枪，只要是枪就行，一枪在手，就觉实力倍增。现在“拥枪自重”已不能满足黑道人士的要求，他们要的是能显示身分、具有强大杀伤力的各类高级手枪，甚至冲锋枪。目前黑道市场上最流行的是90手枪与乌兹冲锋枪。在黑市交易中，一只乌兹冲锋枪叫价达100万元。

正因为黑道对枪支的需求大增，枪械走私也日益猖獗。近年间，台湾警方先后破获包括巴西、比利时、阿根廷、意大利、德国、捷克等50多个国家、近百种各式走私制式手枪与数十种冲

锋枪，台湾被誉为“私枪联合国”。

1978年，台湾警方在黑道分子手中查出第一支土制钢管枪时，就有人告诫，随社会的发展，未来台湾将出现黑枪泛滥问题。自1981年3月警方查获第一支90制式手枪起，枪支在黑道上逐渐流行起来，枪击案也迅速增加，查获的黑枪也由数十支到数百支，再发展到数千支，增长十分惊人。

在台湾破获的黑枪中，以制式手枪为最多，冲锋枪并不多。1988年以前，在查获的制式手枪中，三分之二是由美国制造的9MM口径自动手枪、点38、点22及点357转轮手枪。1989与1990年，台湾警方分别查获378支与69支冲锋枪，分别是来自菲律宾的汤姆竹笙型冲锋枪与以色列的美制滚筒式冲锋枪。这些枪支主要由黑社会分子通过菲律宾走私到台湾。走私枪的泛滥，也造成枪击刑事案件的迅速增加。仅1989年，因枪击而死亡的人数计94人，受伤人数205人。

在台湾这个独有的社会结构中，黑道、黑枪与政治、经济活动交织在一体，很难阻断枪支走私。因为拥有枪支、拥有强大的火力就是力量的后盾。可以说在台湾，不仅在黑道上枪杆子代表实力，就是在地方从政，也能说明“枪杆子出政权”。一些地方政坛人士特别是民意代表，靠的就是背后的黑社会力量，黑社会靠的就是枪。帮派为了经济利益而用武力威胁插足地方选举，进而跻身政坛，然后用权力保护自己的利益。所以有人讲，只要台湾有选举，枪声就不会断。不少以黑道身份进入政坛的民意代表，时刻身上都装有枪。这以台南县前副议长吴木桐和屏东县议长郑太吉最为典型。台南县前副议长吴木桐于1992年参加新营市市长选举，在一次演讲会上不小心，身上突然掉下一把手枪，吓坏了不少人。屏东县议长郑太吉不仅有枪，还持枪杀人。

1989年开始，小巧、可单手上膛的大陆产的手枪大举进入

台湾。其中，黑色枪身、枪柄带有“星”字标记的“黑星”手枪与红色枪身、带有“星”字标记的“红星”手枪在市场最抢手。在该年警方查获的962支制式手枪中，“黑星”与“红星”手枪就占了649支；1990年查获的1729支制式手枪中，“黑星”、“红星”手枪占了一半，可见这时大陆制手枪成为台湾黑枪的主要来源地。

当时台湾情报部门一度认为这种大陆枪支的流入是中共的阴谋，企图制造台湾社会的混乱，以影响台湾的政治稳定。后来，厦门市公安局查获一起两岸罪犯勾结的黑枪走私集团，查获500多支各式手枪。经调查，原来台湾的大陆黑枪，是台湾的黑社会分子勾结大陆不法商人走私的结果，才真相大白。

1989年，厦门市公安部门发现台湾的吴文信从厦门走私枪支到台湾，然后与上海公安部门联合进行围捕，在上海机场将持新加坡护照的吴文信抓获，进而先后逮捕包括台湾、香港、大陆的犯罪分子共43人。

经审查，吴文信枪械走私集团在1989年4月到9月间从大陆走私“红星”77式手枪3550把，子弹78750发。其中已查明走私入台的手枪1600多把，子弹4万多发。

吴文信也是台湾的通缉要犯，在大陆被捕后，台湾方面希望大陆按“金门协议”将吴文信引渡回台受审，但未得到大陆的同意。经6年多的羁押，吴文信于1996年5月被厦门司法部门判处死刑，执行枪决。

在台湾十大枪击要犯相继伏法及大陆枪支走私日渐减少之后，欧美枪的走私兴起。1992年到1995年，警方查获的制式手枪每年平均为1000支，都是以火力强大的欧美手枪为主。

欧美枪支走私入境，多以集装箱夹藏为主，少部分是随行李携带。走私的贩枪分子在海外购枪的办法也很多。一是零买整付，利用持有外国居留权的黑道帮派分子或生意人在各地枪店或

私人处收购枪支，然后整批走私出境。二是以虚设在第三国的公司名义，向欧美军火公司采购枪支，然后通过转运方式走私入境。

1993年12月23日，台湾航警局在中正机场货运站，发现由美国运抵的一批集装箱里的电视机夹藏美制点38手枪29支，子弹143发。经查证，这批枪支是台湾黑道分子许鸿炎在美国虚设的公司采购后走私出境，再运抵台湾。

1994年8月初，台湾刑事警察局侦一队三组组长陈庆顺接获菲律宾的线民密报：有一枪械走私集团在菲收买枪支，准备运往台湾。

8月10日，台北刑事局侦三组在确定情报属实后，迅速成立专案小组，由副局长王卓钧任召集人，会同“保三总队”对由菲律宾进口的YMLU244073号集装箱船进行监控，并依监控所得情报组成五个行动小组，兵分五路，分别在台北南京东路、内湖、汐止及基隆进行部署，由台北地检署主任检察官陈明堂坐镇指挥。

该集装箱船于8月9日装船起航，14日运抵基隆港，然后转入长春集装箱堆场。19日，嫌犯吴东如委托报关行在海关报关。数日后在货物运往台北内湖时，潜伏在这里的刑事局警员将其货车扣留，进行检查。在其进口的木条集装箱内，查获包括菲制M16自动步枪、美制散弹枪、美制大型乌兹冲锋枪、以色列情报人员用迷你冲锋枪、意大利贝瑞手枪、点22掌心雷手枪等113支及2300多发子弹。警方先后逮捕了货主梁志诚（32岁）、押运的吴东如（57岁）与李仍全（42岁）。梁是一黑道人物，是“盛曜国际中介公司”的负责人，以前犯有侵占、伤害等罪行，曾被管训。吴、李则是梁的同伙，为该公司股东。

1995年初，台湾警方破获了近年来规模最大的魏士原走私军火集团。以魏士原为首的这个枪械走私集团成员计36人，组

织分工明确，合伙作案。黄力郎（绰号“牛顿”）与王玉珍等12人先后驾“永松号”及“喜丰号”渔船及动力胶筏，自菲律宾走私乌兹冲锋枪、自动步枪、散弹长枪及各式手枪共计240余支与子弹12240发。魏士原、郑绵元等人专门负责在海岸接运，然后贩卖给黑道分子图利。屏东地检署于4月8日对魏士源、黄力郎等20人进行起诉，分别判处18年至28年不等徒刑。同时对未抓获、潜逃菲律宾的王玉珍等人发出通缉令，进行追捕。

4月6日，高雄市警方在高雄港口查获夹藏在自美国洛杉矶进口塑胶废料内的90口径子弹3万发及弹匣50个。走私者就是台湾的黑道分子李国栋。经查证，在此之前，他也以同样的手法从美国走私100支美制手枪。为堵住美国枪支的走私，台湾警方多次要求美方军火商或美情报部门协助，但未得到响应。黑枪走私照样不断。

1995年8月3日，台湾刑警局在台北市锦州公园查获“竹联帮”风堂分子兰震锋、张震兴兄弟贩卖枪支案，搜出美制90手枪4支、子弹420颗及8个弹匣。资深侦察员根据枪支号码故意被磨掉及子弹整匣包装完整判断，这批枪支是走私而来，且数量庞大，乃继续进行侦察。根据情报线索，马来西亚“拿督”、沙巴州政府驻台商务代表、兼“中华民国”侨务委员的陈沛雄涉嫌重大，他经常以商务代表考察名义来台，出入境次数频繁，且与“竹联帮”战堂分子绰号“A伦”吕维新交往密切。初步认定他们从事走私枪支不法勾当。由于陈沛雄身份特殊，可利用海关免检通关放行，多次走私枪械得逞。

台湾刑事警察局局长张友文、副局长林国栋对此案极为重视，特别指示侦察队长林昆煌召集也获线报的“海岸巡防司令部”组成专案小组，依照任务编组分工，由队长林昆煌、副队长周幼伟指挥；组长林宏儒、警正侦察员郑鸿志负责侦查重点情报

与运作；侦察员陈敏雄、周铭等人负责跟监；“海岸巡防部”陈建铨、左明等人负责侦监收集“竹联帮”贩枪集团成员与陈沛雄交往情况；女警组队员赖怡文进行情报侦监收集，配合跟监。

警方对上述涉案人员初步侦查后发现，“竹联帮”有一走私枪械的秘密管道，是自机场闯关夹带入境。这个跨国贩枪集团长期与“竹联帮”合作，走私大批黑枪入境贩卖，却未曾曝光。

经全面清查侦察，专案小组认定“竹联帮”战堂分子绰号“A伦”吕维新涉嫌重大，应是这个贩枪集团在台湾的负责人。兰震锋、张震兴兄弟被捕后，吕维新便于8月12日仓促从桃园中正机场出境，潜逃到马来西亚避风头。风声过后，1996年元月11日，吕维新自马来西亚返台。

侦察员同时于元月18日截获陈沛雄从马来西亚给吕维新打来的国际电话，获悉他们谈及购买“外国拐杖”及“代表团”将于近期来台等信息。侦察员判断这个跨国走私贩枪集团将利用台湾首届“总统”选举及警方加强治安之前进行枪支走私。

张友文局长在听了林昆煌队长的报告后指示：（一）主嫌犯陈沛雄拥有马来西亚皇室颁赠“拿督”头衔，又是沙巴政府驻台湾、日本、韩国、香港、中国大陆的商务代表，身份特殊；（二）加强布线侦监，深入了解枪支来源走私管道；（三）遵守侦查不公开原则，注意保密；（四）全面掌控查缉贩枪集团组成人员动态，全力破案。

元月31日，组长林宏儒、警正侦察员郑鸿志获悉陈沛雄伙同香港的朱姓朋友自香港入境抵台，并与吕维新约定当日晚间19时在台北市南京东路二段第一饭店见面，便派陈敏雄、周铭等人在机场跟监。

2月10日，查知陈沛雄在赴日之前数度在吕维新经营的吉祥如意酒店内密谈，计划走私枪械细节，内容包括约定的术语、密码、枪支规格、数量、价钱与时间等。

3月15日，陈沛雄以马来西亚沙巴州驻台商务代表兼工业发展局投资顾问名义，电请台“外交部”驻马来西亚代表，伪称沙巴州工业发展研究局有一套机器及两名工作人员随行来台，请黄代表以公函传真台“外交部”准予“免验礼遇通关”。翌日，陈沛雄与吕维新以暗语商议：“土地买卖”（指枪支）将于24日进行交割（交易），“大块土地”“弯弯的捌杖”（指长枪）每坪（支）新台币60万元，“小块土地”（指手枪）每坪23万元，“大小土地”各有4块，合计8块，“代表团”（指子弹）500个，总价值352万元。买卖交易在香港（指高雄小港）碰面。

3月20日，侦监情报反应，吕维新分别联络陈源、涂让麟、叶富郎、陈上善等人筹资准备买枪。23日，陈沛雄以国际电话联络沙巴州驻台商务代表处女秘书，取消原预定24日从马来西亚亚庇机场到台北的行程，更改为从高雄小港机场入境。

张友文局长指示，对特定对象进行24小时监控，各路人马进入预定地点，掌握时机，务必人赃俱获。同时南、北两地查缉扫荡“竹联帮”购枪分子。

3月25日19时30分，马来西亚航空公司MH－86班机准时飞抵高雄小港机场。刑事警察局副队长周幼伟、警正侦察员郑鸿志伪装成机场工作人员守候在机舱口监控。不久，陈沛雄双手各提一只笨重的大行李箱，偕同女友刘群金缓步走下飞机，拿着行李走向海关入境检验台，在海关课长李进添、股长苏金宝陪同下，未经检验就通关放行，引起侦察员的怀疑。周幼伟随即上报现场指挥官林昆煌，并一路跟监至入境大厅，发现陈沛雄与在机场等候的吕维新短暂交谈后，将行李放入吕维新驾驶的CG－3660号蓝色福特轿车行李箱内，3人乘车向高雄市区方向驶去。

队长林昆煌、副队长周幼伟等10人分乘三辆侦防车交叉掩护、跟踪，当轿车行至高雄市中山四路遇到红灯暂停之际，林昆煌见行动时机已到，下令包围，拦车抓人。

吕维新见状，试图加足油门突出重围，被警正郑鸿志拔枪阻止，强制将吕维新拖出驾驶室，带上手铐，并当场在轿车后面的车箱内搜出大批枪械，计长、短枪8支，子弹500发、购枪赃款80万元。陈沛雄及其女秘书也被带走。

随后，组长林宏儒率侦察员林文生、霹雳小组，会同高雄警察局机动队队长钟明龙等，在高雄市有贤路九十三号三段逮捕携带巨款、准备购枪的台南“东门帮”黑道分子陈源，搜出购枪款280万元。二组组长王金堂率员在台北市内湖区文德路二十八巷六弄二号三楼，逮捕“竹联帮”战堂购枪分子叶富郎、余家淳、刘忆臻，搜出武士刀、三节警棍、拇指扣手铐等。三组组长朱宗泰率员在台北市长安东路附近缉获另一购枪的“竹联帮”雷堂堂主涂让麟。警方随线索于4月11日逮捕出资80万元供吕维新向陈沛雄购枪的结拜兄弟陈上善到案。

为顾及陈沛雄“拿督”及“侨务委员”身份，刑事警察局除派员严密看管监控外，并未铐上手铐。陈一度拒绝警方查证审问枪支来源。但在其他案犯被抓，物证人证俱全的大量事实面前，陈沛雄不得不承认犯案过程与罪行。

陈沛雄称，被查获的枪支是向在马来西亚绰号“阿里”的男子购买。他说，1994年12月，他自马来亚西亚庇市“枪械中心有限公司”向军火商赵淳忠购买6支手枪与420颗子弹；1996年3月21日，以马币12000元购得8支长短枪与500颗子弹，准备经吕维新转手卖给“竹联帮”或其他黑道分子。

吕维新也对走私枪支罪行供认不讳，并承认于1985年8月2日曾贩枪卖给“竹联帮”风堂副堂主兰震锋、范扬铨、张震光6支90手枪、420发子弹。兰震锋再将其中2支手枪转卖给桃园黑道分子“小虎”。警方随即将上述罪犯抓获归案。嫌犯陈源坦承，他曾以82万元向吕维新购买1支美制雷明散弹枪，准备向台北市林森北路“粘巴达”地下舞厅找围势的“牛埔帮”保镖复仇。

“竹联帮”雷堂堂主涂让麟、“总堂”顾问陈上善、风堂分子叶富郎、余家淳均承认向吕维新购买枪支，但矢口否认参与走私枪械。

警方继续追查吕维新所贩枪支的流向，并依线索于4月10日在台北市南京东路三段一五九号吕维新经营的“有问酒店”的大型空调机内搜出“竹联帮”绰号“大条”王大筠生前寄放的90手枪与大陆制黑星手枪各1支。

这一国际枪支走私大案破获后，引起美国、英国、日本、新加坡、香港、马来西亚等世界性关注。特别是消息传到马来西亚后，华人社会震惊不已。陈沛雄原籍广东汕头，是马来西亚闻人，头衔甚多，家族势力庞大。他的母亲谢侠瑜曾创办沙巴华人妇女会，并出任主席，领导沙巴州妇女运动30年。胞兄陈沛武任职警界，曾担任首都吉隆坡总警长。陈沛雄本人曾任沙巴人民团结党署理主席。一家三人荣获马来皇室颁赐的“拿督”头衔。

事实上，陈沛雄早年在台湾大学读书时，就加入了“四海帮”，成为一名黑道分子，后与台湾政界、商界及黑社会头面人物建立了十分密切的关系。

大学毕业后，陈沛雄回到马来西亚发展，从事土地中介买卖，但并不顺利。在一次台商在马来西亚洽购一笔土地时，因订金问题发生纠纷，便请台湾“竹联帮”成员吕维新出面调解与处理，从此建立了两人的私人友谊。后来，陈沛雄在事业上逐渐发达起来，不少前来投资的台商、民意代表等经常找陈氏出面，陈的声望也逐渐高涨。1987年，他出任沙巴州留台同学会会长，次年当选马来西亚留台校友会总会署理会长，1992年再升任总会长及亚太留台校友会总会长，1994年竞选连任失败，被聘为永久顾问。同时，他连续两届被委任为台湾的“侨务委员”。与台湾上层关系密切，在他设在沙巴州台商顾问公司的办公室里，悬挂着他与台湾“总统”李登辉、“行政院院长”连战的合影。

就是这样一位有地位、有影响的人，走上了一条走私军火的道路，葬送了自己的大好前程。这一案件也反映出枪械走私的暴利所在及走私枪械者的复杂性与隐蔽性。

为了与黑道火力抗衡，有力打击犯罪，台湾警察不得不全面更新设备，原使用的点38转轮手枪换为美制90自动手枪，原有的卡宾枪也被乌兹冲锋枪及M1自动步枪取代。但这不能从根本上消除黑道的枪械走私活动。

1996年4月，台北松山警察分局接获情报，“竹联帮”分子方圣宁透过渔船丢包方式，自大陆走私枪支到台湾，并已进口手枪50支以上。

台北松山分局与台湾海岸巡防司令部联合，经过两个多月监听跟踪，查出美籍华裔男子丹尼尔与“竹联帮”分子来往密切，可能受托存放枪支。丹尼尔中文名字谢绍彬，家住中和市秀明路三段一栋二楼洋房内。其他嫌疑犯的落脚处也已查清。

6月25日凌晨4时，松山分局刑事组召回全部刑警，进行分组与动员。5时半，刑警及海防队员配备手枪、乌兹冲锋枪，兵分四路向中和市秀郎三段、北投中央北路四段、汐止东势街、台北市松德路等四处目标出发，展开搜捕行动。

一组警察已在中和市谢绍彬家周围埋伏。原计划通过旁边的建筑工地爬楼进入谢家大院，但两层洋楼均装置铁窗，无法进入。一直等到7时，谢父出门上班，警察随即进入谢家，谢绍彬正要开车外出，还没来得及反抗，就被抓获归案。办案人员向曾任海军“阳字号”驱逐舰舰长的谢父出示监察官对其子的搜捕证。同时在屋内搜出22把打火机手枪，349发子弹。谢绍彬不得不承认，他受方圣宁指示，代为保管手枪，并以每把8万元的价格分别出售4把手枪给王天安、两把手枪卖给“竹联帮”重量级人物陈功的弟弟陈林。同时，另几路警察分别抓获主犯方圣宁

与“竹联帮”义堂堂主陈仲义等六男一女。

一个月后，谢绍彬在缴1000万元保释金后，被台湾驱逐出境。

1996年5月，美国海关、烟酒枪械管理局和联邦检察处于23日在旧金山宣布侦破一个大规模的军火走私集团，已逮捕7名嫌疑犯，其中6人为华裔，为首的是顾汉群、顾为霖姐弟则来自台湾。另有7位嫌疑犯在逃。

据知，这些嫌疑犯是在美国奥克兰港走私2000多支中国制AK－47全自动步枪时被抓的。这批走私枪支总价值400多万美元。而这些枪支是美国海关总署及烟酒枪械管理局与联邦调查局合作，以调查员乔装成军火走私商人及黑社会分子的身份，进行卧底，与走私集团人员接触，并下订单订货，取得信任。这就是美国联邦调查局进行的长达16个月的“火龙行动”。

主犯是台湾的顾汉群，是年55岁，住在北加州的圣荷西，他是美国一个独立的枪支买卖经纪人，有一家汉蒙子弹公司，另外还经营一家餐馆。联邦调查局根据情报得知顾汉群的仓库藏有数百支武器而被盯上。一年多前，一名卧底的联帮调查员假装成旧金山的黑社会人物，表示需要购买大批枪支，要顾汉群代为联系货源。顾汉群不知底细，协助这位卧底调查员非法进口2万个自动步枪的枪管。后来，他还建议卧底从中国大陆走私进口自动步枪。顾汉群还表示他可购买的军火清单包括了60厘米迫击炮、火箭发射器与机枪等。

顾汉群的姐姐顾为霖在旧金山经营天祥旅行社，她也被指控协助其弟携带枪支零件及提供方便。顾为霖是台湾前“侨务委员”黄伟成的妻子，但两人已分居五年有余。这对顾、黄夫妇在1989年大陆“民运分子”逃亡美国时表现积极，给予多方协助，顾为霖在旧金山地区被称为“民运之母”。吾尔开希就曾在她的公司打工，常住她家，并拜她为干妈。她的丈夫黄伟成参与发起

新的“海外兴中会”，是美国客家人的领袖之一，与妻子一同经营天祥旅行社，在美、台、港均有据点。

一位嫌疑犯在出庭时表示，和他们接头的是迈阿密的黑道分子，而向他们订货的也是街头黑帮。这个被美国联邦调查局称之为“火龙行动”的侦破工作，仍在追捕尚未到案的7名嫌疑犯。

有黑道军火库之称的通缉犯绰号“小牛”的何盛松，是桃园地区的黑道要角，曾犯有杀人、绑架勒索等多项前科。1990年间，何盛松持冲锋枪向同为桃园的黑道分子邓天来住处射击，造成邓伤势过重，不治死亡。据知，何是桃园、中坜一带的杀手级人物，他的背后有当地重量级民意代表为他撑腰，加上他与当地本省、外省黑道头目关系均不错，使他成为当地黑道中生代的知名要角。1991年10月间，“小牛”何盛松因持有大批枪支，在台北市松江路一家西餐厅被刑警逮捕，后被判刑入狱。1995年4月，他以坐骨神经病痛保外就医，但不久就弃保逃亡，专门贩卖军火给黑道分子。

1995年3月，台北刑警局侦察二队接获可靠情报，指称何盛松涉嫌贩枪给桃园等地的黑社会分子，便进行跟踪取证，采取了全程24小时的跟踪、监控。7月7日晚，刑警局人员根据可靠线索，前往桃园平镇市四环路一栋民宅五楼埋伏守候。晚上11时许，何盛松带着一个提包准备出门，即被一拥而上的警员制服，从其包内搜出一把以色列制冲锋枪，一把大陆制黑星手枪，一把美制38口径步枪。警员随即进入何的住室搜查，在床头柜内搜出美制滚筒式冲锋枪一把，小型冲锋枪一支，90手枪一把，消音手枪一支，以及各式子弹624发。经审讯，何盛松的军火来源与马来西亚陈沛雄利用机场公务门走私军火及因进行集装箱军火走私而被捕的王荣泉有关。

台湾屏东九如园艺中心负责人郑裕胜因生意需要，常前往菲律宾采购树根用于根雕。他的堂弟、黑道分子郑富展发现有机可

乘，便与堂兄商议以进口树根进行雕刻为名，计划从菲走私枪支。1996年2月28日，郑富展出资70万元，交给前往菲律宾的郑裕胜，委托菲律宾的当地人以每支6万元到8万元的价格购买一支小型冲锋枪与五把短枪及子弹，然后装进进口的树根集装箱内，并通过基隆海关，第一次走私成功。

屏东县警察局接到情报后，开始调查。3月4日，警方发现郑富展又出资180万元，以同样的方法在菲国购买90手枪19支及500多发子弹，预定3月21日返台。但因报关手续不齐未能入关，返回菲律宾。到了4月29日，郑富展再出资80万元，托堂兄在菲购买三把短枪及相应的子弹。当郑的货物再次闯关时，被警方抓获，从集装箱内搜出19支手枪与500多发子弹。接着警方又在屏东市九如园艺中心抓获郑富展，进而在他的住处中山路一间房屋内搜出冲锋枪、90手枪、点38手枪、点25手枪共9支及少量子弹。在大量犯罪事实前面，两名罪犯不得不承认他们进行枪支走私、再贩卖给黑道人物的犯罪活动。

一些黑道分子不仅进行枪支的走私活动，还私自制造枪支。1996年2月，嘉义县民雄警察分局查获一家地下兵工厂，搜出一大批长短枪成品、半成品和制造工具，将林政明、罗振山、候通宝等6人逮捕归案。也有一些购不到黑枪的人竟然抢劫警察局的枪支。1996年1月26日，台中市二分局的两位便衣警察在追捕两名罪犯时，不料被两罪犯打伤，身上带的手枪也被抢走。

黑枪在台湾已十分泛滥，只要是个黑道兄弟，身上就有枪，枪击案也就不断上升。1995年4月25日凌晨4时，庄新长、袁文龙、郑商羽3个黑道分子在高雄新兴区皇后舞厅跳舞，因服务小姐招待不周，便拿出手枪对着天花板疯狂扫射30余枪，虽无人受伤，但却吓坏了舞厅的众客，震惊了高雄市警察局。

对于这样疯狂的黑道分子，警方展开严密侦办。9月10日，

在台中市发现庄新长的行迹，随即进行围捕，庄开枪拒捕，当场被警察击毙。接着郑商羽也被抓获。11月，凤山市周姓商人在皇后舞厅因争小姐之故又引起袁文龙不乐，当晚到周的住处开枪警告。1996年2月9日，警方在掌握了大量情报后在袁的住处将其逮捕，搜出3支手枪。至此，“4·25皇后舞厅枪击案”的3名罪犯全部抓获，一死两坐牢。

1995年11月4日凌晨，林文贵伙同周正茂、温忠宪、郑国华等四人持刀枪抢劫桃园杨梅镇中山北路二段慧江护皮坊，得款后逃跑，后被警方全部抓获。主犯林文贵称有部分赃款在新竹市某当铺，便与两名警察同去取赃，趁机逃跑。此后，警方一直布线追踪。1996年2月8日，杨梅警察局接获线报，林文贵匿藏在台南善化，乃速派4名警察前往侦察捉捕。凌晨1时，发现林文贵骑摩托车路过善化镇中山路二段，迅速出击，四名警员一拥而上，将其扑倒在地，林则掏出点38左轮手枪，向自己乱开6枪企图自杀，但5发未中，一颗子弹卡在颈部，顿时血流如注，被迅速送往临近医院抢救，留住一命，但等待他的将是无情的手铐。

同年2月，台中市警察局三分局破获持枪抢劫集团，涉嫌大案12起，逮捕3名嫌疑犯。主犯为在逃的陈任邦，绰号“阿顺”，因涉及北、中、南多起重大刑事案，包括持枪绑架商人勒索巨款和抢劫财物等，被警方多次追捕，但均未能抓获。

这次行动，陈任邦又一次逃脱，但其手下的杜敏雄、林介庸、施荣杰被抓获，搜出90手枪、转轮手枪与散弹长枪共8支、子弹256发、防弹背心2件等。这个犯罪集团持枪作案多起，包括向南投县埔里镇长、镇代会主席及代表、台中市议员陈清景、忠明南路美食店林姓老板等人开枪恐吓勒索，每次要价500万元至1000万元不等。他们的枪支也是来自黑道枪支走私集团。据他们供称，他们是在1995年4月从黑道分子云阿煌处以800万元购了10把枪，但云只给了五把枪，一气之下将云挟持。最后

经“小黑”从中调解，云答应归还1000万元（其中200万是赔偿金），才将其释放。现在杜、林、施已被逮捕，主犯陈任邦仍在潜逃。

不久，侦办台北光复桥头宪兵张志宏遭狙杀夺枪案的台北市刑警大队专案小组，从林正明的口供及案发时的目击证人指认下，经侦讯证实绰号“小黑”的纵贯线黑道分子陈耀俊是主犯，林正明是共犯。陈耀俊崛起于中部黑道圈，但主要活动于台北县一带，为本省黑道纵贯线上的杀手级人物。1992年间，陈在威擎公司开枪犯案，造成一人死亡，影星刘尚谦因此也被警方逮捕，陈则逃跑。

为了掌握黑道枪支军火走私等犯罪活动，警方与黑道人物建立了秘密关系。这也是近两年来，警方得以连续破获军火走私大案的原因所在。1995年8月，高雄市警方从一位黑道人物口中得知，南北多个黑道帮派组织为了巩固势力，纷纷向一军火走私集团订货，包括手枪、步枪与手榴弹等。于是在“警政署”指示下，由台湾省警务处刑警大队与高雄市刑事警察局联合成立“大成专案”小组，进行侦破。

不久，警方得到的情报说，11月中旬，军火走私的先头船将首先在高雄某港登陆。“专案小组”经上报后，加派“保七总队”的兵力在海上巡逻。直到1996年2月16日，“保七总队”的缉私舰在高屏外海用雷达搜索，终于在高雄市旗津正西方外海二海里发现目标，先后截获“三和泉”号渔船与“晋源隆”号渔船，抓获张山钦等五名军火走私犯，查获大批来自大陆的枪支弹药，包括10把黑星手枪、1把红星手枪、6把AK47步枪、30把散弹枪、手榴弹30个及1014发散弹子弹、2190发AK47步枪子弹、1082发红黑星子弹，成为历年来破获的最大一起军火走私案。

第十九章

黑道与情报员联合跨海大洗钱

“洗钱”是指将各种非法获得的“脏钱”经过在金融机构内的层层转移转换成“合法”的“干净钱”。其中尤其以贩毒洗钱规模最为庞大与猖獗。

1990年，台湾和香港发生有史以来一宗金额最大的“洗钱案”，计有6.4亿元新台币，在一天之内从香港汇到台湾，并且被犯罪集团全部领走。令人意想不到的是，这一洗钱案的成员竟是台湾的情报员、黑社会分子与香港警署前警长。

主犯之一的程其源原是香港华侨，17岁时，被台湾“调查局”吸收，发展成为在香港的“后备情报人员”。

也在“调查局”的安排下，程其源参加了台湾大学联考，结果考进台湾东吴大学，但仍旧与“调查局”保持着秘密联系。大学毕业后，因其学业成绩优异，“调查局”特别优待这位特殊的学生，不经考试进入“调查局”第14期受训，从此成为一名正式的“台湾情报人员”。

调查班结训后，程其源再度被调回香港，专门从事香港人员来台的查核工作。台湾“调查局”十分重视这颗苗子，把他当作“调查局”重点培养的海外工作重要干部储备人选。

程其源在香港，一方面受“调查局”的指挥；另一方面，他却瞒着“调查局”提供资料、情报给台湾“安全局”驻港人员，

这是情报工作者的大忌。

在台湾，与其他国家或地区一样，都有几条情报系统，负责不同方面，也会有交叉。但情报人员多是对上、对下的垂直联系，而不发展横向联系。

程其源的洗钱案发生，就在于他自己的这种“多头”关系，结果是自己出卖了自己。

港台洗钱案的缘起，最早还是程其源自己提供港台黑道走私枪支的情报给“安全局”的。没想到他利欲熏心，在犯罪集团答应分他两成酬劳的诱惑下，他由一个调查犯罪的人变成了罪犯。

1990年1月18日，台湾“安全局”的副局长黄耀羽找“调查局”副局长邱铭辉到办公室谈话，并送上一份情报说：“安全局在香港的情报人员得到一个重要线索，说是香港地区有一个走私枪械的黑社会集团，和台湾的黑道分子已经搭上了线。这个走私枪械集团，已经成功地走私了一批枪支到台湾，后面至少还有50支枪，马上就会运到，希望调查局好好查一查。”

这份情报就是由程其源提供的。

黄副局长接着说：“以前的很多案子交给你们，查到后来，都没有结果。这一次的情报十分可靠，请你们好好地查一查。”

邱副局长表示他们会认真地调查这一案件。

邱铭辉回到“调查局”，发现这份情报上面注明是“A+1”，这在台湾情报的等级划分上，是属于最高级别的，也就是最可靠的。这位有经验的老情报工作人员经再三判断，认为情报真实，事情重大，便找局长吴东明汇报，并建议说：“这个案子应该交给第三处负责，由台北调查站来执行。”

邱副局长的考虑是，这份情报上提到一个名叫杜斯春的人，家住台北县新店市，就应由台北县调查人员从这个人身上下手。

邱铭辉立即指示台北县调查站主任张闽笙派人24小时全天

候盯住杜斯春和他家人的行动，搞清楚他们都在干什么，同时要求每天作详细的侦查纪录。

这些基层工作的“调查局”情报人员每天跟监、窃听，持续3个月，但没有发现重大嫌疑，只了解到杜斯春的老婆外面有情人，有点令人泄气。

不过，到了4月16日，跟踪人员发现，杜春斯到桃园中正机场去接一个名叫钟华的香港客人。陪同杜斯春一块到机场的还有一位香港人，名为程其源。

他们乘车离开机场后，直奔台北市中孝东路的山利多饭店住宿。第二天，又从香港来了名叫钟志能的人，和他们接头。隔日又来了一位香港人黄寿。不断有香港客人接踵而来，引起“调查局”情报人员的注意。

4月17日，跟踪人员回报：钟华、钟志能已退掉山利多饭店，改住忠孝西路的天成饭店。

“调查局”台北县调查站张闽笙主任指示：“继续跟监。”

程其源本身受过“调查局”的严格训练，又在香港工作多年，他的警惕性甚高。一次，台北县调查站情报人员开车跟着程其源，被他发觉，便将车子在路中间一停，下车找跟踪他的情报人员论理，并发生争吵，双方差一点动起手来。

4月26日上午，情报人员回报：“‘目标’买了100多个纸箱，不知要干什么，他们又搬到来来饭店508号房住宿。”

张闽笙指示继续密切跟踪目标。

中午，情报人员迅速回报：“他们开着一辆小货车，先到第一银行大安分行，后又到台湾银行，提取大量现金。”

张闽笙一听，感觉到一定有大事发生，认为不能再拖了，应采取行动，便立即向上级请示，获得答复。

下午3时，“调查局”情报人员紧急出动，10多位特勤人员拿着检察官的搜索证，直奔来来饭店，随即进入508房间，以涉

嫌贩卖枪支罪为由，当场将程其源、钟华、钟志能3人逮捕，并对房间展开搜查。打开纸箱一看，让这些情报人员大为吃惊，一个个纸箱内，全是满满的1000元大钞，他们竟怀疑这些钞票是不是假钞，不然怎么这样多。马上让专家鉴定，全为真钞，这就意味着这是一起特别重大的犯罪案件。

情报人员将这堆钞票运回“调查局”进行清点，总计4.7亿元。这么多的现金，他们还从来未见过。为了安全，将这些钱送到台湾银行的金库中寄放。

抓到3个嫌疑犯，另一嫌疑犯黄寿数日前已回香港，尚未抓到。还有另外3名可疑对象杜斯春、孙福祥与张秀珍发现风声不对后已逃之夭夭。为了深入了解案情，根据跟监所掌握的资料，将与这些人来往密切、行动可疑的人也请到“调查局”约谈。先后找来了庄寿荣（礼荣公司的老板）、李淑琴（杜斯春的太太）、黄德旺（杜斯春以前的同事）、梁璞玉（杜斯春的情人）、张静文（杜斯公司的助理）等5人。

根据“安全局”的情报，这些人是走私枪支犯罪集团的成员，可是“调查局”在杜斯春的家里只搜到两把玩具手枪，几把小刀，不像是走私枪支的。可见这个情报不十分准确。不过这么多的现金在手，也说明这个案件绝对不简单。

“调查局”加强对这些嫌疑犯的审讯，但他们都不肯说实话，案情没有取得重大突破。不过，钟志能透露，他是奉父之命，来台湾洗钱的，其他的事情他不清楚，这一点引起了“调查局”的重视。

随后，“调查局”把这些嫌疑犯全部移送到台北县地方检察署处理。

“调查局”将工作重点放在查找这些现金的来源与用途问题上。他们从银行的资料中了解到，4月26日，香港恒隆银行共向台湾汇出资金6.8亿元，全部被领走。除了“调查局”查到的

4.7亿元外，后来又陆续追出2.1亿元，剩下的1000多万元被杜斯春带走。

据判断，这些钱不可能是走私枪支所用，一是买枪用不了这么多钱；二是香港那边付钱，购枪不成立。故认为可能与贩毒或绑架有关。

“调查局”副局长邱铭辉指示第三处的承办科长吴阴春，要他到刑事警察局外事科查一查香港最近是不是发生什么重大案件，或许从中可以得到一点线索。

吴科长来到刑事局，正巧遇到一位香港皇家警署侦缉组警官袁应林。他是来台希望台湾协助他们调查一件重大绑票案的。

据他介绍，被绑架的人是香港富商——华懋集团老板王德辉。歹徒勒索的赎金高达10亿美金。其中第一笔款6000万美金已经汇来台湾。

程其源被捕后不久，“调查局”就查出他是“调查局”在香港的自己人。“调查局长”吴东明知道后，立即召开内部会议，进行讨论。于是有人讲，“这让调查局太难看了，这种事情不能张杨，以秘密处理为好。”也有人讲，“我们对外不承认程其源是我们自己的正式成员，只是我们可利用的关系而已。”

但邱铭辉不同意这种看法，认为纸包不住火，应主动发布新闻，以说明真相，避免被动。

局长吴东明采纳这一建议，对新闻界发了一份声明，说明了程其源的身份。不过“安全局”系统一直不承认程其源和他们的关系。

邱铭辉得知这一情况后，甚为惊奇，迅速作出判断，案情急转直下。

5月3日，台北县调查站对在看守所的钟志能与程其源再次进行侦审。

这时“调查局”也已查清程其源就是他们在香港的情报人员，故邱铭辉副局长亲自审问程其源。

“你现在讲出事实，可以获得减刑，否则依法律的规定，掳人勒索罪是唯一死刑，你自己考虑。”

这位老情报员却一点不讲。

反而，钟志能却抵抗不住“调查局”的压力，讲了一些重要线索。他讲，他自己并没有参加绑架，只负责洗钱这部分的工作。组织绑架案的是他的父亲——前香港警署的警长钟维政、一个从大陆逃到香港的黑社会“大圈仔”分子黄寿与程其源等人。

钟志能的供词对案情发展有很大帮助。原来坚持抵抗的程其源突然在当天夜里要见邱铭辉副局长。

邱连夜赶到台北县调查站。程其源狡猾地避重就轻地说了一些案情后，要邱局长放他出去。邱当然不可能放他，要他自己考虑，多交待，对他有好处。

于是，程其源陆续向“调查局”人员供述了案情：

1983年4月，香港华懋集团负责人王德辉曾经被绑架过一次，歹徒向他的妻子勒索2亿美元。由于王德辉没有小孩，家里就他夫妇俩相依为命，这笔钱是一要就有。2亿美元中的1100万美元后来以洗钱的手段汇到台湾，被警方查获。绑匪也全部被捕。他的同伙钟维政以前是香港警署的警长，对于王德辉七年前被绑架的事情经过一清二楚。他认为，这件案子的犯罪手法天衣无缝，歹徒之所以会被抓到，是事后的洗钱工作没作好。所以他认为，让他来进行，一定会成功。

这次，他们就以几乎完全相同的手法，再次绑架王德辉，但勒索的金额却高达10亿美元。也许是命中注定，王德辉一生难逃此劫。

自上次遭绑架后，王德辉就十分小心，平时出门，一定有随身保镖在旁保护。他甚至在鞋后跟里面，暗藏着一个小型的无线

电发报器。就是说，不管他走到哪里，安全人员都一定能够掌握他的行踪。所以歹徒要绑架他十分不易。

可人总是有疏忽的时候。

1990年4月10日，王德辉不知为什么在公司回来的路上，要妻子龚如心下车先回家，自己开车去办事。

当他的奔驰轿车行进到一条僻静的道路时，司机突然看到路中间放着一个“道路施工”的牌子，这与7年前王被绑架的情形一模一样。司机下车查看，马上就被埋伏在路边的绑匪制服。歹徒冲进王德辉的车子，把王德辉拉下推入他们自己的车内，派人将王的车子迅速开到港口，然后将这辆价值上百万元的车子推到海里，并把王德辉的鞋子脱掉，扔到海里。这样一来，王德辉的保镖也就无法找到他的下落。歹徒绑架了王德辉后，不但公然打电话给王的妻子龚如心，而且还要龚如心交一只行动电话给他们使用，甚至还在报刊上登出广告，指名要龚如心跟他们联系的方法。

为了救丈夫，龚如心不得不听从指挥，按歹徒的要求，送上筹到的部分现金，可是却得不到丈夫的消息。

程其源继续讲，依照计划，王德辉应该会被藏在一只渔船上。这只船不会停在某一个地方，而是在香港附近的公海上驶来驶去，这样，香港警方就很难查出王德辉的藏匿地点。况且，香港警方也不能随便在公海上拦截渔船检查。

台湾“调查局”迅速将这一情报通知在台北的香港皇家警署警官袁应林，他立即回报香港警方案件小组。但香港警方还是没有找到王德辉的下落。

据程其源交待，香港那边的绑匪，当初计划把勒索的钱汇到台湾，可是他们在台湾没有可靠的人，所以找到他来帮忙，当然承诺给他巨额报酬。

程其源便找杜斯春协助，把杜斯春这个犯罪集团介绍给钟维

政等人，并由杜斯春作为在台湾的接应者，并要他找几个做外汇生意的人在银行开户，以便收取王德辉妻子龚如心汇来的赎款。

至此，这一香港绑架勒索案到港台洗钱案真相大白。这是一件香港退休警长与黑社会分子联合进行的一起重大绑架勒索案，进而将台湾在香港的情报人员拉下马，进行洗钱活动。

这个案子如果不是程其源通知台湾“安全局”有一起枪支走私案，就不会有“调查局”的调查。结果黑枪没查到，却查出了他们的洗钱犯罪，进而引出香港的绑架大案。事后，台湾“调查局”告诉程其源说：“这件案子会破，只能怪你自己。可能你自己已经忘了，当初是你自己提供情报给安全局的。你讲杜斯春贩枪，安全局才叫我们去查枪。因为我们查枪，才查出你们的绑票。这种厄运，是你自己找的，怪不得别人。不过我们还是信守承诺，向检察官求情，保住你的生命，希望你自己好自为之。”

等待程其源的将是无情的法律。他与其他相关罪犯被送进了台北的监狱。然而，被绑架的香港富商王德辉至今下落不明，成为一个悬案。王德辉的妻子龚如心继承丈夫庞大的事业，成为当今香港最富有的女性，是一个资产跃居香港 10 大富翁之内的房地产大王。

第二十章

黑道工程围标

1996年4月1日，台湾《中国时报》以头版刊出了轰动全岛的新闻：台湾通向国际的空中大门——中正机场二期航站装修工程遭到岛内黑道围标，至此，一场涉及甚广的黑道围标工程案爆发。

桃园中正机场是目前岛内唯一的一处大型国际化机场。随着台湾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已日益显得不敷需要。为进一步扩大机场规模，台湾“交通部民航局”开始规划二期航站工程，全部工程包括地上四层，地下两层，共兴建18个可停靠波音747客机的登机门，整个中正机场二期工程总预算新台币221亿元。建成后，台湾中正机场年运输旅客流量可增至1400万人次。

这一重大工程的巨大利益引来黑白两道的暗中争食。1996年3月底，自中正机场二期工程传出黑道围标后，台湾公共工程招标中的重重黑幕逐渐曝光。

4月8日，台北地检署承办主任检察官陈文礼签发搜索传票，与“调查局”联合展开了第一波的搜索、约谈行动，中兴电工等五家厂商负责人被带回侦讯，中兴电工公司副董事长王人达、峻国机构负责人陈帝国及岛内数名黑道人士当天即被限制出境。

11日，王人达到案说明，检察官谕令以50万元交保。

13日，峻国机构负责人陈帝国被约谈，随即遭收押禁见。

15日，检调人员搜索涉案主要人员、“竹联帮”仁堂堂主冯在政住处及韬略集团总部。16日，韬略集团负责人“白狼”张安乐（“竹联帮”成员）到案接受约谈，张否认有恐吓或参与围标事情，检察官予以饬回，惟限制居住。

经过侦查，台湾检调单位认为受委托对中正机场二期主体结构工程估价的中华顾问工程公司有明显超估之嫌。18日，“调查局”又搜索中华顾问工程公司，四名工程师被带回侦讯，其中一人饬回，一人收押，一人10万元交保，一人5万元交保。中华顾问工程公司则由总经理濮大威召开记者会，澄清从未与黑道人士往来，也从不参与黑道围标事情，他也无法接受工程有绑标嫌疑的说法。

4月19日，台湾“调查局长”廖正豪公开承认，中正机场二期航站工程确有黑道涉嫌绑标的事情发生。“调查局”提出的报告指出，从12天来的侦查侦讯结果看，已可确认黑道介入情形严重，且涉案层面广泛。

24日深夜，被视为本案关键人物的“竹联帮”仁堂堂主“二马”冯在政在台北市被逮捕。当天，中兴电工公司工程事业处副处长邱发山也因涉嫌参与围标，被约谈到案，经侦讯后，收押禁见。同日，廖福本、林源山、陈朝容和施台生四位“立法委员”因参加与该工程有关的太平洋建设公司等多家厂商的宴会而被点名，指其涉及工程弊案。

25日，“调查局”搜索“民航局”扩建工程处及5名负责办理招标作业的官员住处，追查其是否“绑标”。4名被点名的“立法委员”当日均提出说明，否认涉案，施台生、陈朝容两人还召开记者会，称宴会是应林源山之请参加的，事前并不知情。

经过两个多月的侦讯，6月6日台北地检署起诉了20人，其中包括王人达、陈帝国、邱发山、冯在政及“民航局”、中华顾问工程公司的多位有关负责人。4位“立委”及其他台湾政界人

士则以查无实据，免于刑责。

中正机场二期航站装修工程招标消息一公布，信兴机电公司负责人“北港蔡”就倡议围标，并找了大陆工程公司合作，想主导竞标。整合其他厂商，两家机构遂邀请以峻国建设公司副总经理为招牌的“竹联帮”成员冯在政出面协调。巧的是，太平洋建设公事也和台安机电公司合作，图谋抢标，也请了冯在政协调。冯在政经过一番协商，决定让太平洋建设这一组得标，其他营造厂“陪标”，但机电工程部分则只给台安机电公司做一半，另一半分给其他参与围标的电机公司。孰料，协商过后，太平洋建设公司与台安机电公司突然反悔，图谋独揽机电工程，只肯让出一点点利益分给其他小承包商，至此整个围标计划被打乱。

就在局面混乱之际，素以“台湾民间第一大厂商”著称的中华工程公司也出来执意竞标。中华工程公司近几年在岛内营造市场上受到孤立，在许多重大公共工程中屡屡因“不符资格”或“联合承揽”等因素被阻在门外，这次则是势在必得。一度传说，中华工程公司请出“竹联帮”绰号“白狼”张安乐，以压倒在黑道上辈分较低的冯在政，但双方均予以否认。张安乐只承认中华工程公司曾找他代为寻找合作的厂商。

当围标作业因各方势力无法摆平之际，中兴电工公司的王人达与峻国机构的陈帝国挟其雄厚的政商关系，也强势介入了围标过程，并主导由达欣工程与开工企业搭配得标，形势变得更为复杂。很快达欣与峻国两家公司取得了优势地位，连中华工程公司也受到极大冲击。

显然，陈帝国与王人达动用了其在岛内的党政关系，包括国民党中央秘书长许水德在内的多位台湾重量级政治人物，都直接或间接地向中华工程公司关说。前台湾刑事警察局长洪鼎元出面与威京集团总裁沈庆京接触，要求沈影响中华工程公司退出竞

标。陈帝国并以几近高出一倍的价格拉拢冯在政，要其“回过头”向太平洋建设反游说，要其放弃参与竞标。

事情演变到这一地步，已非最初涉入厂商所能预料，尤其是曾居于主导地位的太平洋建设公司，最后竟沦为被劝退的对象，心中更是气愤难平。结果整个绑标、围标内幕才由大陆工程公司向外掀开，一发不可收拾。

整个黑道围标有两次最关键的餐会。一次是3月28日晚在台北市敦化南路莲园；一次4月1日在太平洋建设集团崇光百货公司大楼太平洋联谊俱乐部餐厅江南轩。前者是要“协调”参与投标的空调厂商；后者则以劝退太平洋建设公司为目标。

在3月28日宴会中，冯在政等人先“个别拜访”有意参加投标的厂商，表达劝退的意思，随后集体邀约空调厂商到莲园聚餐，而符合资格的7家空调厂商并未到齐，席间除陈帝国、冯在政及空调厂商外，还有几家营造商老板，张安乐也出现在现场。

至于4月1日的宴会，唯一的目标是劝退太平洋建设公司。太平洋建设公司原本与东元、台安三家大型上市公司共同组成投标组合，黑道已使不上劲，于是由台湾“立法委员”林源山邀请廖福本、施台生、陈朝容共同赴会，4位“立法委员”，加上冯在政、陈帝国等5人，和太平洋建设公司的一位总工程师，10个人刚好凑成一桌。

这次宴会的请帖由林源山的朋友、世青建设公司董事长詹德煌具名，地点也特别选在太平洋建设公司自己经营的餐厅，让外界误以为太平洋建设公司是主人，整个餐会前后相当严密。太平洋建设公司原本被邀的是董事长章民强，但当天章民强正好身体不适，几位副总经理也都不在，负责营造的钟荣丰早已避走到加拿大，因此指派一位总工程师代表出席餐会。

两次餐会是这次黑道围标的高潮，也是爆出黑幕的起点。

二期航站风波越演越烈，位于台北市民生东路三段的峻国机构或企业集团，内部成员充满了危机意识。在社会舆论的压力下，4月13日，陈帝国被收押，加上稍后李登辉又告诉“法务部长”马英九必须侦办到底之后，许多人都感到压力沉重。

陈帝国，1949年生，仅有小学程度，曾在建筑业做事。早年加入“厦门帮”，吃过不少黑道欺压的亏，后来却纵横黑白两道，以口头禅“既然无法避开黑道，不如有钱大家赚”，因而在名片上印着“陈进财，别号帝国”。多年来，他曾牵涉多起诈欺案件：1973年5月涉嫌偷窃工地钢筋，1975年5月因伪造文书被判刑4个月，1981年又犯下诈欺与过失伤害案。陈帝国一度曾与“竹联帮”前任“老大”陈启礼合伙经营承安消防器材公司，专营高楼逃生缓降机。适逢当局制定法令，规定二楼以上建筑全部要安装逃生装置，因而大发利市。

陈帝国与台北市高级警官关系也很深。就是靠着与黑白两道的广泛关系，近年来峻国机构频频劝退工程投标的竞争对手，先后拿下“国防医学院”、台糖精糖厂、八里及新竹焚化炉等大型工程，获利丰厚，颇受同行侧目。据透露，仅承包新竹、八里焚化炉的机电工程，获利就高达6亿元。峻国机构下属有KTV咆哮山庄、海事工程、叶记营造、进耀营造、圣堡营造、世纪钢铁、致业营造、峻国建设、峻国贸易等多家企业。

陈帝国多年混迹于黑白两道，如今工程界的人都知道他是个在黑白两道间左右逢源的人，不但黑道有人为他跑腿，白道也有人为他撑腰。峻国集团过去就常与中兴电工公司有生意往来，是中兴电工公司的下游承包厂商。在竞标新竹、八里焚化炉工程时，最后只剩中兴电工与中船公司两家杀价抢标，几度争持不下，在最后关头，是陈帝国出面打电话协调中船公司退出，中兴电工公司才得以稍低于底价89亿元的优厚条件得标。事后，陈帝国也顺利取得了机电工程的承包权。

此次中正机场围标案中，陈帝国被多家厂商指为幕后黑手。3月5日，领取投标单后，陈帝国与王人达、冯在政多次聚会讨论围标事宜。3月28日，陈邀集其他竞标厂商及协力厂商在莲园餐会，与挂名峻国建设业务部副总经理冯在政对不合作的领取标单的厂商进行威胁、恐吓。4月12日，台湾警方搜索峻国营造公司及陈帝国住处，带回账册；13日，陈帝国被约谈，随后遭收押。

冯在政，绰号“二马”，在“竹联帮”中，算得上是近几年来少数比较活跃的大哥级人物之一，同时也是目前“竹联帮”18位中央委员之一。“二马”出身于花莲眷村，早年与其兄“大马”冯在朝一起加入“三环帮”，“三环帮”热闹了一阵后，因内讧而分裂。70年代，“二马”和几名同伙转而投入“竹联帮”，并成立仁堂、至堂等堂口。不久，仁堂堂主“小项”项金平案发入狱，冯在政取而代之，升为堂主。帮内人人皆称其为人豪爽，义气，也非常好勇斗狠。1977年及1983年间，冯在政犯有妨害自由、持枪恐吓勒索等多项前科，两次入狱管教；1993年至1994年7月间又连续以强暴胁迫手段向商家敲诈勒索财物，被判定为情节重大的流氓受押。出狱后，在陈帝国力邀下，冯在政进入工程发包领域发展。

1993年，为围标台湾南部第二条高速公路工程，冯在政于当年6月17日向台北市南京东路五段上大营造工程公司董事长黄政哲恐吓勒索1亿元，被黄拒绝后，于隔天指使3名手下持枪闯入上大公司，将黄政哲打伤。事后，黄惧于冯再找麻烦也不敢报案。1994年7月8日，冯在政又因围标台湾北区电信管理局台北仁爱路新建办公大楼及地下停车场工程，率两名手下向南京东路四段得盛营造工程公司恐吓勒索5800万元。

1994年5月间，冯在政介绍“竹联帮”天堂兄弟张恕中等结识卓越营造公司蔡义龙，合伙围标中正机场二期工程，因东怡

营造公司拒绝合作，便指使“竹联帮”同伙数十人持枪于7月22日下午3时到位于复兴北路的东怡营造公司所在地，连开数枪恐吓。

1996年4月13日陈帝国被收押后，冯在政已有预感，他也很难全身而退。冯在政很清楚整个案子将由他们这些“在警方记录中有案底的人”来扛起所有责任。19日，在“调查局”开始拘提冯在政的同时，有人也找上民进党籍“立法委员”，向他们透露握有录音带，可以证明当局的若干党政要员涉及此案，对当局进行威胁，但大势仍不能挽回，冯在政终于成了阶下囚。

身为“竹联帮”核心人物的张安乐，在岛内媒体多次报道其与围标案有关后，于4月8日出面澄清：目前他在台北市长春路经营韬略集团营建事业机构，由于牌照才发下来，还没有拿到营造公会的会员手册，根本就没有资格围标工程，更没有涉足中正机场航站装修工程围标案。

“我承认我是兄弟（帮派组织成员），但我不认为兄弟就是黑道！”对于近日工程扫黑的事件，绰号“白狼”张安乐不止一次以此做开头白，来申说社会舆论的不公平。他与很多被社会批评为黑道的帮派分子一样，都认为他们曾是蒋家统治时期政治斗争的祭品，他们竭力要摆脱成为又一次模糊焦点的打压运动的牺牲品。

“如果说黑道没有介入工程招标那是欺瞒世人，但本质上，黑道介人所居的层次与扮演的角色，绝对不是主导者，他们无非是在白道长期以来恶性的绑标、抢标之风下，被白道邀请来‘助阵’的次角”。张安乐认为，以台湾帮派的财力与能力而言，根本还谈不上介人绑标的实力。岛内公共工程招标中的弊端是长期就存在的，“所谓的黑道介入，只有三种情况之下才有可能，就是业者在竞标前协商时的允诺与事后不认账所产生的利益损失下的冲突，就是业者所谓的‘脱裤子’。譬如当一个公共工程公开

招标时，如果大家都竞相抢标，只会造成三输的局面，透过竞标前协商则对大家都有利。但如果今天有某家业者说服其他业者放弃了投标，而他自己得以以低于底标的价格取得，事后又不履行该尽的责任与义务，也就是失去了诚信，这个时候业者才有可能透过黑道的力量出面解决。因此基本上，先天制度不良，后天又失去了商场上的诚信原则，才会造成黑道介入的空间”。

张安乐指出，黑道都是一些高官找来的，但最后高官却对外宣称是黑道围标的受害者。他一再强调，如果将所有的责任全部推给黑道，而不从制度上、本质上去探讨改进工程招标，只会更加剧社会的不安与混乱。

对涉嫌卷入围标案，张安乐表现出十分不满，一再强调中正机场二期航站装修工程弊案与他无关，并说以他的辈分，“二马”应该听他的话，替他办事，绝对没有他听“二马”的话，为“二马”办事的道理，当时他根本不可能为了中正机场二期航站的事去莲园。“调查局”找他，主要是因监听了一个中间人找“二马”的电话，通话内容中提到他，所以才把他牵扯进来。

中正机场二期航站弊案初起之时，台湾“法务部调查局长”廖正豪曾对外发下豪语：全面展开工程扫黑，务必揪出所有工程的弊端，涉及围标的黑帮组织一定要通通打尽。但岛内马上就有人指出，如果“调查局”真的有办法扫除掉工程界的黑影，揪出幕后黑手的话，今天就不会发生这次中正机场二期工程围标案，也不会有现在所谓的工程扫黑！如不能切断官商勾结的脐带，而只是依惯例以“扫黑”终了，丝毫不撼动上游的白道绑标，工程弊案必将春风吹又生，唯有等下次利益分不均之时，再来爆一次内幕了。

4月8日，民进党籍“立法委员”郑宝清召开记者会，指责当局只敢拿黑道小人物开刀，幕后真正官商勾结的黑手却不敢

碰，并点了前台湾省长宋楚瑜的大舅子陈千山之名，称其为达欣工程集团旗下长信电机公司副董事长，在中正机场二期航站工程案中扮演了积极的角色。20日，民进党籍“立法委员”沈富雄、郑宝清等又举行记者会，公开点名许水德、王金平、庄亨岱等高官涉嫌“高官绑标”，介入关说，替参与围标的峻国集团及达欣工程劝退中工电机公司等。

台湾熟悉内情的人都在观望，对国民党能否下定整顿违法乱纪的决心普遍持保留的态度，因为整顿得越彻底，对国民党的伤害也会越重。果不其然，到4月24日，“竹联帮”仁堂堂主冯在政落网，台湾一位承办二期航站工程围标弊案的基层人员，脱口说出“GAMEOVER!”（游戏结束了），其中感慨之情，远超过抓到案情关键人物的欣喜。“二马”冯在政落网，这个近年来在台湾工程界大出风头的黑道大哥成了台湾当局堵住社会舆论、掩护参与工程绑标，围标，白道人士的代罪羔羊。此后，公共工程黑幕问题很快便离开了台湾媒体的焦点，中正机场二期航站围标案也进入了司法程序，整个案件还会无限期地拖延下去。

中正机场二期航站弊案引爆后，岛内媒体又报道了屏东海洋生物博物馆、台北松山机场地下穿越道及汉宝至草屯隧道工程等多宗绑标、围标疑案，形成四大公共工程弊案。岛内新竹、云林、高雄等县市也随即展开调查类似案件，连尚在规划阶段的高雄捷运工程也传闻遭到绑标。一时之间，全岛似乎所有的公共工程都与“黑道”、“围标”、“绑标”等联系在一起。

岛内舆论对当局的施政纷纷提出不满，指责近年来黑道势力迅速膨胀，是治安单位的失职，执政当局的纵容亦难脱干系，并认为国民党高层面对黑金势力向党内渗透，却始终不愿壮士断腕，姑息养奸，导致黑道，白道绑标，围标问题日趋严重。尽管有社会舆论的强力责难，台湾有关部门的表现仍是敷衍塞责。4

月8日台湾“行政院副院长”徐立德声称，就他所知，公共工程的弊案并没有外界所传说的那么严重，但提高工程招标的透明度是一定要走的路。4月13日，台湾“交通部”只承认负责航站装修工程招标设计的中华顾问工程公司工作中存在缺失，不过仍强调“尚未发现有具体绑标的证据”。22日，“民航局长”蔡清彦表示，整个事件只能说是审查能力不足，绝无违法乱纪的意图。24日，蔡清彦还信誓旦旦地声称，如果中正机场二期工程招标过程中，确实有“民航局”官员介入绑标或围标，他愿意负该负的刑事责任或行政责任，绝不逃避。

结果，四大工程疑案中，台北松山机场地下道工程4月8日宣布废标；屏东海洋生物博物馆工程三度招标无功而返；汉宝至草屯隧道工程因有黑道介入围标，迟迟不能竞标。只有中正机场二期航站装修工程在当局竭力护航下，有关部门只是对招标细则进行了一点补充，便在岛内舆论高度关注下于4月27日如期开标。计有荣工处、中华工程、太平洋建设和大陆工程等4家公司主导参与，荣工处与开立工程以新台币59亿元共同得标。

从这一弊案的过程可以反映出黑社会组织生财手段的历史性变化。以往台湾黑道生财的方式，总是与赌博、色情脱不了关系。随着时代的进步，道上的兄弟也跟着“升级”，开始涉足台湾的重大工程建设，“分享”台湾经济成长的果实。现在台湾真正的黑道大哥，已不再屑于包娼包赌，反而热中投入公共工程，“协调”厂商投标，哄抬得标价格，从中赚取可观的“管理”费用。

据透露，一般而言，黑道兄弟介入围标，行情是总承揽工程金额的10%，也就是一成。以被外界认为有黑道兄弟介入围标的东西快速道路汉宝至草屯隧道工程标而言，工程总经费为50亿元，如果是一般正常的竞标，得标厂商顶多只能得“五折标”，

即约25亿元。如果透过黑道以围标的方式来竞标，则可以抬高底标，最少能以“八五折”，即约40亿元得标，搞得好可达九折标，约45亿元。两相比较，黑道介入后的“回馈金”，即10%，约4亿元到4.5亿元。对黑道而言，简直比贩售毒品还要来得暴利。

据民进党公布的资料，以台湾当局的二期重大交通工程特别预算为例，决算审定额1684亿元，约有674亿落入了“黑道绑标围标共犯体制之手”，占1995年综合所得税1726亿的37%，以当年台湾平均每人税负占每人所得的20.17%换算，平均每人每年赚100元就须缴出8元给黑道共犯集团。

台湾各级民意代表承包工程或关说工程的陋习由来已久，积弊已深。岛内民众只要提起民意代表，总会把承包工程视为某些人的“当然副业”。民意代表层级有高低，自然也反映到其所包的工程规模也有大小。民意代表层次愈高，所能“处理”的工程预算与规模也愈大，获利也愈多。其锁定的工程对象，以政府或公共工程为主。有些是全包，也就是把整个工程吃下来，然后再分批、分段转包出去图利；也有的是分别包下不同部分，搞“群雄割据”；也有的是“中间插花”，在其他人争夺大包中找空隙插个小包；还有一种是争夺过程中抢包，最后在收取好处费后退出。事实上，台湾各级民意代表根据“对口”公务机关工程的大小，从卫生纸、餐具、座椅、文具、水电、空调等周边装潢，到整个工程的结构规划、施工乃至全岛型大型公共工程的软硬、大小规格，几乎无所不包。

1996年4月23日，“台湾区营造公会”联合多家技师公会共同召开记者会，指称没有白道绑标，“那来黑道围标?”抨击白道绑标的最大关键就是岛内三大工程顾问机构（包括中华顾问工程公司、大陆顾问工程公司、中鼎顾问工程公司），长久以来垄断整个工程设计与规划市场。目前，台湾重大的公共工程都由主管

部门长官指定一家工程顾问公司进行审核与评估。在这里，长官的身分相当于业主，完全掌握批核工程的生杀大权；顾问公司则是受雇者，完全听命于长官或长官指定的人士。因此，公共工程的黑幕总是与长官脱不了干系，如果没有长官的特许，根本不可能发生绑标事件，没有绑标也就没有围标。一位大型营造厂负责人表示，一般长官对得标者，都会要求工程款总额的8% - 10%作为回扣，营造商为求工程预算顺利过关，也乐于在选举期间奉上政治献金，代筹选举经费。

工程顾问公司负责对工程的规格、材料及营造商资格进行评估。营造商为抢得商机，会先透过各种关系与长官建立联系，目的就是为了获得长官的特许，介入指定工程顾问公司的评估作业，进行绑标。工程顾问公司与营造商两者合作，设定有利于该营造商的规格、材料或资格，就是所谓的“绑标资格”或“绑标规格”。

台湾“法务部调查局”为了“吓阻”公共工程的巨额经费成为官商勾结的诱因，早在前任局长吴东明的努力下，特意从花莲调来东部机动组，在青溪山庄成立“重大公共工程弊端查察小组”，希望能从各项公共工程的设计阶段开始，就由这个专责单位负责监督、查察。该小组首度出击，便是掀出中山高速公路“十八标”案，其后便受到来自行政部门的相当大的压力，就连当时的台湾“行政院长”也是听取了台湾“交通部”的“说明”后，在全案尚未侦审终结的情况下，便出面为涉案人员辩护，最后台北地方法院只经过3天的开庭审理，便判决所有被告无罪，归“行政院”管的台北地检署也没有提出上诉，无罪判决因此确定，“十八标案”就此落幕。以后又有“公共电视台案”也被台北地检署检察官处分为不起诉。至此宣告防阻工程弊案的努力失败。

黑道卷入公共工程，可以说是已到了“无标不绑、无标不围”的

地步。就整个流程来看，通常一项重大工程还在酝酿阶段就会引起各界觊觎，在计划执行过程中，从工程研究、工程计划、设计等，有心人早就参与其中，利用规格限制等机会将岛内2000家甲级营造厂绑得只剩下个位数字的厂商符合资格，这一冗长的过程，便是所谓的“白道绑标”。尽管如此，有心人仍没有完全把握可以得标，而且经过激烈竞标，庞大的工程可能会变得无利可图，这时候便是黑道出马的时机。以非法的暴力与少量的金钱，加上黑道威胁利诱的方式迫使其他厂商退出竞争。因此，白道绑标与黑道围标是一件“精密工程”。道上大哥明白单凭武力威胁，竞标厂商不见得就范，于是与民意代表勾结，迫使政府机关配合，先将工程投标规格“绑死”，再将招标期限缩短，使竞争对手的得标机会渺茫，加上参加投标又会得罪大哥，在肯定后患无穷的情况下，就只好接受“协调”，不是“陪标”就是放弃。

所谓的“绑标”，就是透过运作设定各种施工资格的特别限制，表面上是为了严格控制工程质量，其实就是“量身裁衣”，运用施工资格的限制排除不是自己人的投标厂商。“围标”则是指经过前阶段的绑标后，在最后剩下的少数投标厂商中，若是还有“局外”的竞争者不识相参与进来，便透过威胁恐吓的手段予以排除。因此，绑标属于“文攻”，多由白道进行；围标则属于“武吓”，交由黑道执行。另外，民意代表特别是“立法委员”，手握预算审查的生杀大权，再加随时可动用的质询权，两者结合起来向有关部门施压，在岛内很少有行政单位会不俯首听命的。

就台湾营造业界而言，哪家没有来点“黑”是谁也不相信的。就在东西向快速道路汉宝至草屯线的一段工程招标中，中华工程公司原本与日商熊谷组在台的华熊公司商定合作竞标，另一家欲参与投标的厂商竟然透过黑道关系，出动日本黑道组织“山口组”直接向熊谷组施压，同时台湾方面的兄弟也不断放话，逼得华熊公司只能退出。中华工程公司在此情况下，也只能含恨通

知台湾省公路局，宣布退出竞标，导致工程招标不能进行，数度推后。一位台湾大型营造厂商负责人透露，对重大公共工程进行绑标、围标，在业内行之有年，并有一套众人皆知的游戏规则。这位营造业者认为，台湾工程界之所以出现这种畸形文化，主要是现有市场结构及过多的行政束缚所致。

台湾目前有4000多家登记在案的营造厂商，但持有得以承揽重大工程牌照的甲级营造厂商只有300多家，扣除财务不健全、后继无人、缺乏竞争力者，实际在市场上运作的只有200多家，而业绩及规模足以承揽大型建设者还不到40家。这本来是一个寡占的局面，按理根本不必围标与抢标，但就是因为当局规定“每一项工程至少须有5家以上的厂商领标（即参与投标），3家以上竞标，才具备法定条件”，而岛内营造市场需求充足，厂商为获取更大的利益，便衍生出一套市场法则。这就是先内部整合出一家内定得标厂商，或由主导厂商邀请其他4家甲级营造厂“陪标”，充当“人头”，这次得标者下次陪标，大家轮来轮去，利益均沾。

当台面下的利益摆得平时，各营造厂会相安无事，有关单位明知有问题，也只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而已。可是一旦利益出现冲突，你吃肉我没汤喝，就会出现内幕大曝光的效应。基本上，现在台湾每一个重大工程的背后都有黑、白势力有形无形的运作，岛内每一家叫得出名号的营造厂或建设公司，几乎都有黑白两道的关系，吃营造这行饭靠的就是关系，没有关系或关系不够、关系不对，根本就没法混。近年黑道势力大力转进营造界，自己成立公司，从幕后站到幕前，致使绑标、围标、抢标更加错综复杂，恐吓威胁事件层出不穷，公共工程招标过程日益恶质化。

通常业者都会先打通中、下层的执行官员，上层的大官则由“立法委员”负责疏通，必要时更会运用黑道恐吓围标，这就形成了黑白两道联手，官商民意代表勾结，上游浮滥编制预算，中

游关说绑标，下游恐吓围标的共犯结构。长期以来白道特权集团勾结垄断公共工程，有时因利益摆不平而引入黑道。近年来随着各方人马不断引进黑道的变化，已使黑道逐渐从当初下游的“雇佣兵”转而成为上游的“操盘者”，造成整个工程界的剧变。这就成为中正二期航站工程会引发正派工程界的反弹，从而掀起轩然大波的主因。

岛内大型的营造厂，都有被“大哥”“协调”的经验。台湾当局“工程扫黑”喊了多年，可是工程界的“大哥”却是愈来愈嚣张。岛内一度盛传黑道中早已有数名大哥大级的老大在计划成立一个“联合转包中心”，亦即所谓的“地下工程发包部”，以后所有台湾的重大公共工程，都须经由此一类似“基金会”的黑色单位统筹分配。

公共工程经费的利润有限，大哥要赚一手，得标的营造厂也要分一杯羹，小包商承揽的价格可想而知，如果不想赔钱，只能偷工减料，结果造成台湾公共工程品质相当低劣。

在介入公共工程方面，尤其以“四海帮”与“竹联帮”的势力最为庞大。1996 年 4 月落网的“四海帮”分子柳嗣天供认，“四海帮”这几年积极在台湾中南部介入工程围标，他们以成立工程公司名义直接介入或针对高科技施工工程。下游包商进行勒索，从而牟取暴利以发展组织，其中在台中成立海德堂，以华兴工程顾问公司为总堂堂口。柳嗣天则为该帮在高雄成立的海云堂堂主，以宣武工程公司为总堂堂口，已涉及多起工程围标案，包括东西向快速道路汉宝至草屯隧道、海洋生物博物馆、南区电信局、台中港电厂等工程。在总值 3 亿元的高雄楠梓荣民医院工程中，由得标的厂商出资 750 万元，给未得标的 11 家厂商，柳嗣天独得 300 万元。可见，参与公共工程成为黑社会当今最易赚钱的行业，也壮大了黑社会的财力与势力。

第二十一章
黑道与公司经营权之争

在台湾，为争夺企业的经营权或控股权，或为夺取各种行业公会、经济实体的领导权，各方势力纷纷引入黑道人物，以增强自己的力量，并采取恐吓、威胁、甚至暗杀等手段，迫使对方就范，使得台湾的企业经营活动笼罩着一片“黑”色暴力阴影。

上市公司董事会的董事、监事席位之争在台湾长期以来一直存在。一般情况是看谁拥有的股份多，股份多的一方，占有的董事、监事席位相应就多，就可操纵公司的经营大权，影响公司的决策。但公司股票上市后，随着股票的转移出让，公司的持股比例就会不断变化，使得企业的经营者（也就是台湾讲的公司派）与公司主要股票持有者（也就是台湾讲的市场派）地位与角色可能发生变化，也就会在每年的股东会、特别是董事、监事的改选上，市场派与公司派为争夺新的经营权展开斗争。

昔日，在公司股票的上市运作上，如果经营企业的公司派卖出了太多的股权，不及时回补，市场派持股增多，势力增强，就会要求介入企业经营活动，可能夺取经营权。市场派若实力不够，无力介入经营活动，就会被迫退出。不过一般来讲，大家都保持君子之争，在董监事席次上达成协议，是正常的经营活动竞争，不会影响企业的经营与形象。可是这几年来，台湾的社会环境发生重大变化，公司经营权之争白热化，公司派与市场派纷纷

引入黑社会人物加强各自的力量，向对方施加压力，从而引起股东会董监事改选与经营权之争的黑道渗透与暴力频传。1995年以来，尚德实业公司、台凤公司、南港轮胎公司、高雄区中小企业银行与高兴昌钢铁公司等均发生黑道大肆介入公司经营权的事情。

尚德实业公司是台湾一家有威望的知名食品公司。为争夺其经营权，所谓的公司派与市场派两派人马从1995年6月24日的年度股东常会开始，一直战到1996年2月7日的股东临时会，不仅政界人士纷纷出马，黑道兄弟更是为双方挎刀，文攻武吓，权利之争十分紧张。

尚德公司股本10亿元，公司派持股27%，市场派则握有59.7%的股权。市场派实力增强，希望改选董事会，以取代握有公司经营权的公司派，获得企业经营权。公司派则依公司法拖延股东会的召开，同时暗中利用黑道对以海山集团为主的市场派进行恐吓，甚至开枪警告，试图阻止市场派提出的改选董事、监事临时会议的提案。不久，尚德公司在台北市中山北路的总公司办公室遭人连开40多枪，震惊社会。一般认为这与市场派利用黑道的报复有关。

1995年7月，公司派以办公室遭黑道枪击损坏致使部分公司股票资料损坏为由将原定于10月10日召集的股东临时会拖延至1996年2月7日召开。市场派却私下通过“黑的”与“白的”关系找尚德公司董事长陈协同（公司派首领），表示希望与公司派合作。

所谓“白的”关系，指的是找嘉义县选出来的“立法委员”曾振农、省议员陈明文等人（均与黑道关系密切）。这两人都曾受海山集团掌门人刘炳伟以及主导介入尚德经营权的台北县议员徐秀廷所托。他们找陈协同进行沟通，但未能如愿。

所谓“黑的”关系，是指海山集团找到省议员、黑道重量级

人物绰号“冬瓜标”的颜清标出面。但这位在黑白两道有影响的人物南下台南佳里登门造访陈协同时，却吃了闭门羹。就连遭枪击身亡的“四海帮”老大陈永和也曾约两方人马在香港进行协商，也没有结果。

市场派在遭受挫折后，一改过去的低姿态，变得强硬起来。市场派的代表人物徐秀廷召开记者会表示，大半年来我们保持低姿态，采取合作态度，但对方太过分，连一些支持市场派的股东都被恐吓，因此自己决定拼了这条命，也要与对方斗争到底，否则对不起朋友。同时，他表示要在股东大会上，拿下尚德公司经营权。他告诉记者，不要怕，如果有黑道敢动记者一根毫毛，他绝对要跟对方拼了，并写好遗书，以防万一。

在2月7日改选董监事的临时股东会上，海山集团旗下的“金主们”几乎全到齐，包括徐秀廷在县议会的同事吴沧富、海山证券公司的大股东、板桥信用合作社的理事等。刘炳伟委托嘉义的陈明仁（省农会常务理事，尚德股东临时会司仪）、陈明文兄弟出任市场派的总指挥，而陈明文在省议会的好友颜清标则被请出来保护所有出席会议者的安全。

就在股东临时会的前一天，250名被动员来的黑道兄弟在嘉义县某地集结，在完成签名后，也备好出席股东会的委托书。

取得委托书是黑道介入公司经营权的一个重要手段。依现行公司法，任何人要进入上市公司，并不需要实际的股权，只要收集委托书达到一定数量就可达成。这就为黑道介入上市公司提供了可乘之机。

第二天一大早，这帮兄弟乘车前往尚德公司所在地台南佳里，与陈明文、颜清标、徐秀廷等人会合，并分成两队。一部分进入股东会会场，担当投票表决部队；一部分在公司外待命，充分展示了市场派拿下公司大权的决心。

公司派的头号人物陈协同，早年与合信兴企业的大股东“蔡

老五”——蔡克宽家族，曾一同介入大能化工公司的经营权，可以说是股票市场上的老手。他手下还有一位精通公司法、了解股票上市公司运作的“财务大臣”陈溪圳。两人密切配合，利用公司法给予经营者的许多保护，使得公司派股权虽少，却能运用拖延办法，企图消耗市场派背后的资金支援。

股东会当天，公司派利用调虎离山之计，将市场派大队人马在股东会开始报到之前，吸引到股东会会场内，而在报到准时开始时把报到处设在公司大门口，结果先进入会场的市场派却未能办理报到手续。公司派便在股东会召开时以出席人数不足法定人数为由宣布流会。

市场派则自行召开股东会，选出陈明文为新任董事长，颜清标为名誉副董事长，同时决议由与颜清标关系密切的中兴保安公司负责尚德工厂的进出管制，但因无法取得公司派掌握的公司文件等无法真正运作。双方的矛盾仍没解决，斗争仍在继续。

历史悠久的台凤公司经营权之争掀起的风波更大。这是一起由自家兄弟为争夺公司经营权展开的斗争，结果，也引入黑道人物。

1996 年 6 月 24 日，以台凤公司总经理黄宗宏之弟黄宗德为首的市场派，不承认公司派拖延股东会之举，按时出席股东会，并在台凤公司南投厂大门前的马路上自行集会，召开一场前所未有的“马路股东会”。

股东会后，传出台湾省议员林进春胞兄林银洲被枪击事件，引起各界震惊。因为林进春支持市场派，于是外界传言纷纷，直指这宗枪击案与台凤公司经营权之争有关。

林进春曾协助台凤公司变更 3 万多平方米的一块土地，与台凤公司的黄氏兄弟建立了良好关系。在这次台凤公司经营权之争中，曾任“省议会亲政会会长”的林进春被认为是支持市场派的

大将。而同为“亲政会”成员的无党籍省议员许登宫却在省议会财政质询中，公开点名批评台湾人寿、台开信托两家公司介入台凤公司经营权之争，并出示这两家公司购买台凤股票的资料。与此同时，省议会内传闻省议员代市场派高价收购股东委托书。市场派人士又指许登宫是为公司派护盘的主力。

公司派当天就通过律师对外声明，枪击事件与台凤公司无关。公司主要负责人讲，台凤是正派经营的老公司，不会做出涉及枪击案的事。最后，警方破案也证实枪击案与台凤公司无关，纯是林银洲个人事件。但却无法否认黑道也卷入台凤公司经营权的争夺。

股东会前，曾有数十名支持公司派的“不名人士”前来台凤证券公司“拜访”黄宗德。台凤证券公司的人指称这些人有黑道兄弟的样子。同时，南投县警方接获情报说，股东会召开时，将有来自南北各地不同的黑道人士支持与护场，于是股东会当天，南投县警方动员了500名警察在台凤公司南投厂戒备。

在这次“马路股东大会”上，市场派全面改选了公司董事、监事，新的董事会推举台凤公司现任总经理黄宗宏之弟黄宗德担任董事长兼总经理，废除现有公司印鉴。市场派表示在野股东会不仅不合法，而且别有用心。这种自家兄弟阋墙事件在黑道与外力的介入下，问题变得更为复杂，对企业的经营与发展产生重大的不利影响。

1996年8月，高雄中小企业银行（简称高企银行）举行股东常务董事会及改选董事、监事，黑道上的兄弟在会场徘徊，甚至公开露面，引起银行员工惊慌。

以前，高企银行董监事改选，也有市场派与公司派竞争情形，但纯粹是两派人员的权利之争，从无黑道分子介入其中，但自1995年改选董监事起，黑道开始介入，矛盾变得尖锐，问题

变得复杂。

高企银行股东之一的现任“立法委员”郭金生在市场大量收购股东委托书，结果在高企银行董监事改选中获得大胜，郭金生的金嘉庄投资公司获得5席董事席位，郭金生还登上副董事长宝座，将高企银行大股东高雄王家赶出银行的权力核心。

郭金生还把任高雄市议员十多年的蔡庆源推上高企银行董事长的宝座，更引起外界的极大震动。因为蔡庆源背景复杂，与黑道关系密切。

不久，高企银行一名经理在办公室被人殴打，进而被调职。员工表示这位经理办事坚持原则，却被人打、调职，令员工个个不安。

然而，由于郭金生事前共投入5亿元的资金购买委托书以入主高企银行，结果遭遇极大财务压力，发生银行存款不足，被金融机构列为拒绝往来户，最后郭又被迫辞去副董事长职务，只能挂名顾问一职。

台湾国丰集团在取得国丰兴业公司的优势股权后，欲取得南港轮胎公司经营权，不料遭到黑社会的干扰。

南港公司原经营层也即公司派为阻挠国丰集团进入南港公司，也采取拖延战术，将于1995年年初的股东常会推迟到年底即12月28日才在台北市国宾饭店举行。在会议式的二层会场内，身着黑衣、身上刺青的黑道兄弟在会场内转悠，一楼也有持枪的黑道兄弟出入，气氛十分紧张。

在股东会上，一些个别黑社会分子对其他股东进行大声呵斥，对其发言进行干预。当会议主席借故宣布散会时，又有黑道兄弟大叫，试图闹事，幸亏警方事先得知南港股东会可能会发生意外，派出便衣警察在场内警戒，才未发生大的冲突与纠纷。

吸取这次黑道闹事的教训，国丰兴业公司将1996年第一次

股东会选在桃园厂举行。3月26日，国丰兴业公司以大股东身份自行召开南港轮胎公司股东会，聘请了大批保安公司的人员，严格检查进入会场的股东身份，并由国丰兴业公司员工进行警戒，以防黑道搅局。因此，这次股东会未发生意外，国丰兴业公司也取得南港轮胎公司的经营权。

高兴昌钢铁公司经营权之争更是激烈，黑道、白道均出马护航。

高兴昌公司有资本额34亿元，股票也为34万张。因“国际票券公司案”的发生，11万张股票被“证券会”扣押。公司派重要人物吕恩彰家族持有14万股左右，另近10万张股票在市场流通。其中普全电脑公司也是股东之一。

吕恩彰表示普全电脑并没有“实际”投资高兴昌公司，不希望别有用心的人影响高兴昌公司的正常营运。6月22日，高兴昌股东常会作出决议，将普全公司代表董事、监察人解任。但普全公司则要求继续执行高兴昌公司的董事与监察人职务，与公司派吕家发生冲突。随后“立法委员”郭金生（高兴昌公司市场派董事）、陈志彬及新偕中集团负责人梁柏薰等人介入，问题变得更加复杂。结果，台湾“经济部”虽表示高兴昌公司决议合法，但负责承办具体业务的商业司却一拖再拖，同时高雄地方法院驳回高兴昌公司董事、监察人的变更登记诉讼案，并同意普全公司“假处分申请”，这样普全公司仍有董事、监察人的决策参与权。这又进一步加剧了双方的矛盾。

8月5日，以普全公司为首的市场派以暴力手段，强行进入公司，高兴昌公司经营权之争再度白热化。由于黑道与政界人士的纷纷介入争夺企业经营权，已严重影响到企业的营运，引起员工的不满。

8月7日，高兴昌公司产业工会进行静坐示威，抗议黑金政

治介入高兴昌公司的营运，并与其他产业工会联合，动员所有人力、资源，发起罢免“立法委员”与公司董事郭金生的行动。高兴昌产业工会负责人指出，郭金生利用“立法委员”身份，对“经济部”与高雄地方法院施压，帮助普全公司破坏高兴昌公司经营活动。

公司工会还作出五项决议：（一）罢免以普全电脑公司法人代表身份接管公司董事的郭金生；（二）防范黑道分子混入公司，撤除市场派引进的财源保安公司；（三）“政府”主管单位及司法单位应于5日内，就公司经营权争议问题做出合理决议，否则北上台北“经济部”与国民党中央党部进行抗议；（四）工会未参与市场派与公司派在6日的协议，对其达成的同意市场派查账共识不予承认。

就在这时，即8月12日，又传出鸿信机构公司将以“第三势力”介入高兴昌公司。鸿信机构董事长于勇明表示将在证券交易市场购买股票，争取高兴昌公司的董事席位。高兴昌公司的经营权之争再次掀起高潮。

于勇明是前鸿源机构集团的总裁（前鸿源机构即鸿源投资公司是80年代后期台湾最大的非法地下投资公司），与“四海帮”关系密切，在高企银行经营权争夺战中，也曾传出前鸿源势力企图介入的消息。受此消息影响，高兴昌股价当天下跌4角。

原代表高兴昌公司市场派的普全公司人物黄自强（曾任高兴昌执行董事）是目前鸿信机构的总经理（于勇明是其董事长），他表示于勇明希望在拥有高兴昌公司相当股权的情况下介入经营，并以“第三者”的立场调解公司的纷争。由于于勇明的介入，高兴昌公司经营权之争再度变得复杂。

在上述公司经营权的争夺中，黑社会的介入主要是由某一方或双方主动找黑社会人物出面，以增强威慑力量。现在还出现一种新的黑道介入公司经营活动的方式，就是黑道不请自来，强行

进入公司，目的是争取分得公司红利。

黑道介入公司经营权之争愈演愈烈，已引起社会的普遍关注与台湾当局的重视。

一些企业家认为，黑道猖狂，是因为“政府”公权力不彰，未按法办事，给了黑道分子可乘之机。要杜绝黑道进入企业，必须伸张公权力，否则，企业只能消极抵抗，反而加强“黑”、“金”结合，这将是台湾企业界的悲哀。

如今，一些上市公司经营者为避免惹“黑”上身，被迫抱住大量股票，不敢在市场脱手，从而失去了股票上市、分散股权的意义，也影响到企业的正常经营活动。

也有人指出，企业经营者很难和黑社会分子对抗，也无法阻止黑道找上门来，要靠自己的力量“扫黑”、“防黑”，效果相当有限，只有“政府”出面，扫除黑社会分子在股东大会“展现实力”的威风，才能保障企业经营环境。

“政府”官员之所以态度暧昧不明，不敢秉公办事，就在于一些有黑道背景的民意代表像省议员、“立法委员”等，“挟民意”横行霸道，对“政府”官员施压。这就出现黑道、金钱与民意代表的结合，形成一个影响企业经营的恶劣环境。

黑道分子进入合法经营的上市公司，以合法身份为掩护，进行不法活动，已引起台湾司法部门的重视。

前“法务部长”廖正豪曾指出，部分黑道分子在上市公司中兴风作浪，介入董监事，操纵公司营运政策，进行利益输送，危害极大，有关部门已展开调查，决不容许黑道分子在上市公司中进行不法勾当。但从台湾社会环境的现实看，台湾很难遏制黑道介入公司经营活动。

其实，黑道介入企业不仅仅是上市公司，与企业经营活动相

关的各类行业公会、农会等，均有黑道的介入。

建筑业是台湾最赚钱的行业，许多大财团都介入这一行业，而不少企业就是全靠这个行当吃饭。而管理建筑业的营造业公会就是一个肥缺，谁掌握其大权，谁就能获得诸多好处与利益，也因此成为兵家必争之地，各路人马为争夺其领导权不断展开斗争。

1995 年 12 月，台湾地区营造业公会理事长进行改选，两派人马竞争十分激烈，不仅动员政商界要人，还纷纷引入黑道势力，使得这次选举更非同一般。

已掌握营造公会长达 12 年之久的杨天生，是台中地区长亿集团大老板，再次推出台北县的现任常务理事张庆忠出马竞选。人们以为有杨天生的支持，张一定稳居宝座。不料，台北市工信工程公司董事长潘俊荣强势介入，加入选举，形势变得十分复杂，各自便动员黑白两道的力量来为自己加码。

杨天生派的候选人张庆忠组织了一个强大的助选阵营，不仅有政界要人，商界闻人，更有黑道名人。其“竞选本部”的顾问名单依次为：罗福助、杨天生、杨登魁、张省吾、李照雄；主任委员是“国大代表”陈川，副主任委员则是现任理事长李有福；执行秘书依序是周承融、吴桐潭、施春成；总干事为梁英凡，另外还有 38 名委员。在这分名单中，“天道盟”、“竹联帮”的黑社会组织老大与“纵贯线”等南部黑道重量级人物均有。对方自然抵不过如此庞大的助选阵营，只能败下阵来。

同样，在遍布台湾城乡的各级农会，也成为黑道渗入的地方。农会也是一个有着巨大经济利益的机构，它可以经营信用贷款业务。有人指出，农会的信用部，形同一家银行，有庞大的金融周转能力，许多农会的存款在 50 亿、甚至 100 亿元以上，但却无健全的监督机制，使得问题丛生。特别是在选举期间，掌握权力的人为买选票，不惜动用信用部的钱为自己“服务”。尤其

是地方派系为争取农会大权，在选举中便展开激烈竞争。为能在选举中取胜，各路人马也纷纷找黑道人物作为自己的后盾，进而发生恐吓、威胁、枪杀等事件。1995 年 10 月，彰化县某乡镇农会理事长本人与住宅分别遭两次枪击。一些农会的负责人本身是黑道人物，1996 年 4 月，一位农会理事长被警方以黑道流氓罪逮捕。

“一手给钱，一手亮枪”，这是黑道介入农会选举的最常用的一种两手策略。黑道介入，花钱并不多，却可以轻意取得一座信用部的“金库”。

一位见识过黑道威力的农会代表指出，“我被人押上车时，车上坐着的全是不用介绍也看得出的混混，我这一票比较关键，他们硬是塞给我几十万元，车上的人则七嘴八舌地强调，这是礼遇、尊重，不要就是不识抬举。最后，临下车之前，还有人拿一把枪故意要借我‘玩’，问我有没有见过这一型的枪。”

就是这种利诱与威胁，许多人不能不低头，把票投给黑道支持的人。另一位身受其害的农会前辈深有体会地说：“我一身老骨头，随时敢拼命，用枪押着我都不怕。可是，时代变了，现在是什么手段都用得出来，我不怕没有用，因为太太、小孩会怕。黑道人物向家人托话要我改一改，我能不改吗?”

黑道介入农会选举的背后就是地方派系。派系在恶斗中，为求胜选而引进黑道，黑道则往往反过来钳制派系，或者两相结合，进行其他“投资”，如从事特种行业、进行赌博，或介入民意代表的选举，利用农会代表、小组长的基层网络与关系，积累“民意”，然后一步一步进入政坛。可见，小小的农会在台湾社会、经济，甚至政治活动中具有不可忽视的地位。正因为其在地方上十分重要，也就不可避免地与黑道、派系结合在一起。

第二十二章

演艺圈黑影幢幢

台湾的演艺界，除了令人眩迷的声色犬马之外，就是黑影幢幢，与黑社会有着复杂而密切的关系。“竹联帮”、“四海帮”、“天道盟”等黑社会组织在演艺界更是势力庞大，影响甚巨。

在电影界知名的“竹联帮”兄弟就有吴敦、周榕、沈晓印、帅岳峰、武打明星王羽等人，而与“竹联帮”关系密切的演艺界知名人士更多，其中包括“爱国千万大导演”刘家昌与歌手高凌风等人。

帅岳峰在台湾电影圈混迹多年，是个江湖气味很深的人，与黑社会的关系渊源甚深，也因此事业发展极为顺利。

他是名制片人，曾担任过入选“金马奖”电影《金大班的最后一夜》的制片，并以此片而名利双收，这也是他制片生涯的高峰。但谁也不会想到，他就是“江南命案”中的一个关键性人物。没有他的牵线，“竹联帮”老大陈启礼也就不会认识“情报局长”汪希苓，“江南命案”将成为另一种结局。

1984年，台湾电影界曾发生过一次牵连甚广的暴力事件。年初，为了争抢拍片，帅岳峰的锦华公司曾被“竹联帮”控制的昌江公司派人砸毁。为了息事宁人，帅岳峰便通过朋友向陈启礼说情，希望陈出面摆平此事，放锦华公司一马，帅岳峰从此认识了陈启礼。

同年4月，帅岳峰正式加入“竹联帮”，由“竹联帮”元老

柳茂川主持帅的入帮仪式。帅岳峰入帮时间虽晚，但在帮中地位却不低，任“竹联帮”“总巡察”，负责部分堂口的枪支。可是到了同年9月25日，台湾警方举办不良分子自首，帅岳峰随即通过朋友向当时的国民党“情报局长”汪希苓报备，两人的来往更加密切。

曾往来于港台的香港武打明星王羽与台湾黑道关系很深。

王羽曾是香港邵氏影业公司的武打演员。他确有点真功夫，是空手道三段。他以《独臂刀》一片成名，从此不可一世，经常与人话不对头，就动起手脚，大打出手。不但在港、台打出了名，还曾一度打到泰国去，结果引起曼谷黑社会人物上门寻仇。

这件事也使王羽认识到黑社会的厉害，他也因此与黑社会有着复杂的交往。他曾以百万港币的“乐捐”拜进香港黑社会势力最大的“十四K”。后来，他经常往来于美国、加拿大、东南亚、香港、台湾等地拍片，也因此又认识了美国的“华青帮”兄弟，他还出资帮助“华青帮”办企业，在美国华人黑社会取得不可替代的地位。

1970年，王羽来台拍片，结识“竹联帮”兄弟，但只是朋友般的往来，还没有加入“竹联帮”。

1976年4月23日晚8时许，王羽（香港）、关壮飞、陈伯裕（香港）、廖建法（香港）、邓国沣等几位朋友，共同应唐松雄之邀，一同来到台北市延平区民生西路杏花阁酒家畅饮。他们大多是“竹联帮”的兄弟或与“竹联帮”关系密切的人。10时许，陈伯裕在结账时，邀请酒家红牌酒女王秀花小姐（花名“贵妃”）“出场”。“贵妃”以已有客人点她陪侍为由婉拒，结果引起已有醉意的王羽不满，大声吼叫，还将杯子摔在地上。“贵妃”见状急忙答应，便讲上楼更衣。唐松雄、邓国沣一时不见人下来，便上楼找人。“贵妃”小姐为躲避纠缠，以上厕所为由，进入三楼厕所哭泣。此时，在同一楼层的“四海帮”高文樟、陈信仁、邱

文祥兄弟也在此吃饭。高文樟在上洗手间时，发现曾陪他们饮酒的这位姑娘哭得伤心，便上前问及缘由，却被唐、邓两人看见，因此发生口角，进而便大打出手。“四海帮”的邱文祥被刀刺及脾脏，住院昏迷多日；陈信仁被枪击，子弹擦额而过；高文樟也被人用刀柄猛击头部。这就是“杏花阁酒家喋血案”。

案发后，台北延平警察分局迅速赶往现场，展开调查。随后，延平警察分局建议上级单位成立“专案调查小组”，但上级单位却以本案“特殊”及涉案人员“非泛泛之辈”为由而按兵不动，引起社会的不满与批评，成为轰动一时的大新闻。

本案的“特殊”就在于王羽不是别人，是港台的红影星，在台湾有广泛的社会关系，且与黑社会有着复杂的关系。所以血案发生后，甚至还有台湾政界“权威人士”讲，“这件鸡毛蒜皮小事，被拿出来大做文章，完全是某影片公司的宣传人员，藉机拿来打击某人的”。这反映了黑社会人物，特别是知名黑社会人物或与黑道有关的人物与官方上层有着密切的联系，形成一层保护网。但案件的受害人家属不断提出指控。5月19日，邱文祥的家人正式向延平警察分局指控王羽涉嫌教唆杀人，并控告王羽的朋友邓国沣及关壮飞等共同涉嫌杀人。

在强大的舆论压力下，警方不得不表示彻查到底。就在这时，王羽的同伙唐松雄自动携枪投案，声明开枪是他个人所为。几日之后，就在将他押往“警备总司令部”审理时，唐松雄又推翻口供，否认曾经开枪，而是关壮飞所为，连枪也不是他的持有物。延平分局不得不传讯王羽。

经一段调查审讯，延平分局最后以“教唆杀人”、“公共危险”、及“伪造文书”等三项罪名，将王羽移送到台北地检处，并就事情经过发布新闻稿：

一、杏花阁酒家持枪、刀杀人案，经本局深入追查，除唐松雄于5月15日持枪投案，并自称持枪人予以移送台湾“警备总

司令部”法办外，涉嫌人王正权（艺名王羽）亦经本局于5月19日传讯到案。王正权对本案案情供述尚能合作，对于唐松雄冒名顶罪及教唐松雄用枪方法等事先参与，亦均供认不讳。

二、对于被害人邱文雄具状告诉王正权主谋教唆邓国沣、关壮飞杀人事情，则矢口否认。

三、王正权已于本（5）月22日上午九点半先行移送台北地检处侦办，有关在逃嫌犯邓国沣、关壮飞继续循线索追缉中。

这种“似有罪又无罪”的新闻稿，并没有让外界信服，媒体进一步对当局的做法进行批评。《台湾日报》这样评论到：“这件案子说穿了是流氓被‘特殊身份’的人杀成重伤，而无人过问。同时，流氓只好运用自己的‘武力’对待。对方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找出人来投案顶罪。”《民族晚报》讲，从这个新闻稿看，延平分局对王羽大闹杏花阁事件似乎并没有认真“追根究底”，而是把烫手山芋抛给了地检处。

邓国沣逃出国外，成为通缉犯。他后来在美国经商有成，以知名华侨的身份回到台湾。警方为政治考虑竟取消了对他的通缉令。关壮飞、唐松雄等人均被判刑。陈伯裕未能抓到，一直被通缉。直到1996年8月，因通缉超过12年，追诉权失效而判决免诉。王羽至今仍常居香港，1999年还发生了他亲自揭发他太太与他人通奸一事，成为一件颇受港台媒体关注的桃色新闻。

值得一提的是引发冲突的关键人物王秀华，却因该案扯出了她与连任两届台北县芦州乡乡长李文彬的婚外情，被李妻指控王妨害家庭而被判刑。她出狱后，与朋友合开了一家餐厅，因她的艳名远扬而生意红火。

这次大案后，王羽正式加入“竹联帮”，其气焰更为嚣张，出门身边皆有兄弟保护，出事后又有兄弟代为收拾残局，好不威风。

这不仅因为他是台湾最大帮派“竹联帮”的兄弟，还因为他是武打电影明星，手上多金。他在台湾的阳明山建有极为奢侈豪华的漂亮别墅，有劳斯莱斯名贵轿车。

一次，王羽到台中县后里马场拍戏，不慎从一匹马背上摔了下来。他便拔出手枪，将这匹马击毙。事后，他拿出30万元，赔给马的主人。这就是王羽的性格。

1981年元月，王羽与一帮朋友到台北天厨餐厅吃饭，结果被“四海帮”老大刘伟民派人刺伤。王羽急忙拔枪，但也被对方夺走，这次大明星王羽遭不幸的“天厨餐厅流血事件”再度震动了港、台两地。

王羽出院后，便对“四海帮”刺手提出上诉。

同年5月，台北法院开庭审理“天厨餐厅血案”。就在开庭审理当中，王羽手下兄弟当众在法院走廊砍伤为“四海帮”说情的刘台生，又成为震惊台湾的“法庭血案”。

一个电影明星与黑道恩怨不断，引发一个接一个的刀杀、枪击流血案，涉案人逃的逃，坐牢的坐牢，可王羽并未吃上大不了的官司，在牢里呆几天，缴上一大笔保释金，又出来演他的电影。

他在港台电影圈掀起过许多风波，受过他污辱或吃过他亏的人不计其数，知名者就有导演李行、蔡扬名、吴思源、香港国际武打明星成龙、香港“新义安”的头头、台北电影发行人王应祥、影星林青霞与吕秀菱、模特石苏珊等等。甚至一位颇具声望隐居台湾的青帮前辈，也因讲话不妥惹了王羽，结果被王羽从台北林森北路一路追杀到第一饭店门口，在保安人员劝阻下，他才罢休。

1983年11月，“亚太电影展”在台北来来饭店举行，典礼主题曲《亚太颂》的作曲人刘家昌应邀去排演。借空闲机会，到楼下的咖啡厅休息聊天。忽然，王羽怒气冲天地率一帮人马冲进

来，指着刘家昌大骂，讲为什么要派人砸他的两部车子，还给他的妻子王凯贞打电话？在台湾也大有来头的刘家昌也不吃这一套，刚骂出他的口头禅“你他妈的”，就被王羽当众掴了两个巴掌，幸亏众人拉开，而未展开一场激烈的搏斗。后经“竹联帮”的“鬼见愁”吴敦劝解才告平息，却也成为轰动一时的大新闻。

刘家昌是个以“爱国影片”发财起家的“大导演”。他因拍过吹捧国民党的《梅花》、《洪队长》等电影而成了名，也赚了不少钱，更因他与蒋家兄弟关系密切而能呼风唤雨，但因与黑道挂钩，在外界的声望并不好，也引起同界的忿忿不平。

据说，当年蒋孝武支持的《梅花》影片造成轰动，一度创下台湾票房的最高纪录。因该片导演刘家昌有功而得到蒋孝武的赏识，一跃成为“千万级大导演”，在该片多次庆功会上，蒋孝武与刘家昌常坐在一起，关系亲密，引起外界的注意。

后来，刘家昌导演的《洪队长》一片因粗制滥造而血本无归，却得到“内政部长”的颁奖。

不仅与官方有良好的关系，刘家昌还与“竹联帮”关系密切。“竹联帮”的“大护法”吴敦和义堂堂主“大锤”就是他拍片的左右手。他还与陈启礼合作开了一家欧帝威音响公司。陈启礼与蒋孝武的相识，据说就是由刘家昌这层关系而来。

刘家昌身跨黑白两道，为人霸道，曾迫使电视节目主持人张小燕小姐关闭“综艺一百”的黄金节目，曾殴打过《台湾日报》采访主任刘瑞林与名记者梁汝舟，也迫使影星谷名伦跳楼自杀等等，不一而足。任你在江湖呼风唤雨，在演艺界名满天下，但总有栽的一天。他当众遭王羽掴脸事件，让他尽失颜面，但面对如此结局，又无可奈何。这就是山外有山，人上有人，更何况无情的黑社会。

“青蛙王子”高凌风曾是台湾歌坛的一位红人。他是一个混

血儿，父亲是一位让人敬羡的飞将军，母亲则是他父亲在支援越南战争时认识的一位越南姑娘。

高凌风原名葛元诚，从小生长在高雄县的冈山镇。他有个聪明的头脑，考上了南部一流的高雄中学。因家境富裕，喜欢吃喝玩乐，并不爱读书，但是在父亲的督促下，他还是考上了台北的文化大学外文系。

上了大学，成了他人生的一个新起点。当时校园流行合唱团，像“青苹果”、“爱克逊”、“电星”等合唱团应运而生，受到许多青年学生的喜爱。葛元诚凭着自己天生的一幅好嗓子，与志同道合的同学组成了“时空合唱团”，并常到台北县市的大小餐厅唱西洋歌曲，既能锻炼自己，又能捞点外快。

一天晚上，他们唱完歌，葛元诚正要离开餐厅之时，一位不甚熟悉的朋友叫他过去坐坐。

他不能不去。因为在台湾餐厅这些地方，在台上唱歌，下了舞台，就变成“坐台”，一般人不得不应付，不然，过不了两天，你再上台演唱就会被客人砸杯子，丢酒瓶。

葛元诚过来之后，桌上已围了七八位男女青年。经这位朋友介绍，认识了一位女作家。这可让他乐坏了，能与女作家在一起吃饭，那是很难得的机会。

这位作家讲她一直在寻找好的爱情题材与故事，以便使她的作品更接近现实。

葛元诚这个混血儿，长得虽不怎么好看，从小就被称为“大头”，还有点佝偻弯背，但爱情故事却不少。他便现身说法，不断向作家大谈自己的爱情故事。

作家也并不食言，后来就以葛元诚的“爱情故事”写成小说《女朋友》发表，还将小说中的男主角“高凌风”这个名字送给他，还为他写了一首歌——“大眼睛”。

没想到这首新歌，竟使葛元诚一夜成名，成为文艺圈的一位

新人，葛元诚也变成“高凌风”而走红歌坛。

不久，又一首“泡菜”歌，高凌风红遍天下。追他的姑娘就更多了，他的爱情故事也就更加丰富多彩。

很快他就和时装模特林玉招结婚。但高凌风是个花心大萝卜，仍在外面拈花惹草，林玉招根本管不住他，只好任其自由，也就不断演出许多花边新闻。先后与他扯在一起的女艺人包括“蕃茄姑娘”萧瓦珠、刘兰溪、林青霞、汪庭欢、熊海灵、胡慧中、徐佳莉、彭雪芬等。

走红后的高凌风，不仅财源不断，收入大增，而且黑白两道、三教九流的朋友也特别多。他对朋友也是出手大方，只要开口，很少会遭到拒绝。

没想到，他却因此卷入黑道圈，惹出不少麻烦。

1978年2月11晚，春节刚过，出道不久的红歌星高凌风和他的太太林玉招去一家歌舞厅，准备登台演出。行到半路，突然遭到一位陌生年轻人的攻击，两人便展开搏斗，高凌风虽很顽强，但仍被大斧砍伤左胸。

高凌风确是一位硬汉，并没有因此影响他的登台演出，他仍带伤登台演唱“姑娘的酒涡笑笑”，造成一时轰动，他的知名度也水涨船高。

1980年，高凌风到华视电视台主持“临风高歌”节目，一时风靡台湾，不仅收视率高居第一，他的价码也成为台湾歌坛中最高的一位。

在主持节目之余，还四处登台演唱作秀，第二年还与朋友成立了一家“综一音乐传播公司”（简称“综一公司”），忙得不亦乐乎。

让人意想不到的是，高凌风在电视台的好景不长，因事务太多，分身乏术，没办法及时录制节目，“临风高歌”只维持了两年就告吹。

而这时，他与黑道的关系却越来越复杂。

1982年元月初，5名黑道分子手持武士刀、木棍冲进高凌风和朋友在台北市复兴南路开的“综一公司”，将房内设备砸了个稀烂。

不久，春节已到。“综一公司”策划了一连串高凌风的全省各地巡回演出，所到之处，万人骚动，掌声雷鸣，票房纪录直追歌仔戏大王杨丽花。但高凌风却在这时因报酬问题和自己人弄得很不愉快，相互找黑道兄弟出面解决，使问题更加复杂化，惊动了台北市县的黑道老大。

在这次财务纠纷中，高凌风深深体会到，任何解决不了的问题，只有找真正够分量、够资格的黑道老大出面，问题才能够迎刃而解，于是他和全省各道上有名气的黑道老大开始有所接触，而且最后自己也卷入黑道是非。

同年10月1日，高凌风再度到高雄市蓝宝石歌厅演唱。警方私下派了两名刑警24小时跟踪这位身价不凡的红歌星。但并不是要保护他，而是希望通过他这位红歌星，找到枪击要犯杨双五。原来高凌风与杨双五因赌场恩怨而成为仇人，杨双五四处寻找高凌风算账。所以警方判断，跟着高凌风，就能找到杨双五。

高凌风被杨双五手下的张文雄、陈春长枪击之后，一度远赴美国。但他又抵挡不住舞台的诱惑，4个月后，又赴东南亚演唱。在这里，他却公开批评台湾治安不好，流氓横行，引起台湾有关方面强烈不满，认为他这种说法有损台湾形象而从此对他另眼相看。

1984年底，高凌风回到台湾。他对外公开宣称，他已脱胎换骨，决心重新塑造自己的形象，以后将和黑道兄弟划清界线，不再有任何瓜葛。

然而上贼船容易下贼船难。你自己想脱离黑道圈就脱离，哪

会有那么容易。

1985年8月6日，昔日仇人杨双五已偷渡到日本，在南部不会再有人寻仇、找麻烦了，于是高凌风便在多年后再度决定南下高雄蓝宝石歌厅演唱。但就在他离开的前一天，就曾有人通知各大报社，说高凌风遭到枪击，生命垂危。报社迅速展开查证，发现这不过是一场恶作剧，却让高凌风深感不安，他心中明白这是仇敌的警告。

一位熟悉他的记者告诉他，辞去这次演唱会，不要去高雄了，以后再补偿组织这次演唱会的经纪人。可他还是坚决要去，并讲："我知道还有人要搞我，想整倒我，所以目前我正在渡过一个关口，这个关口一定要突破，否则我以后将无法再做人！也无法再立足了！"

为了证明他和黑道划清界线，也为了表现他不再受制于黑道的勇气与立场，他带着保镖南下，同时也接受了一位"大哥"的好意，叫保镖熊克斌带上一把左轮手枪，以防不测。

没想到，有人向警方检举，高凌风非法持有枪支。警方早就想教训这位在海外讲"政府坏话"的歌星，这正是时候。

警方一举将高凌风抓获，并被判刑。

可是一位"立法委员"钟吉荣在"立法院"质询时，为高凌风鸣不平，提出"为何像他这样被迫害的艺人，携带枪防身就被视同流氓，而真正的流氓却逍遥法外？"的质疑。不久，高凌风缴保出狱。

山茅是台湾电影界的一名演员，早年加入过"竹联帮"，但却没有利用黑势力在演艺圈打天下。可他还是与黑道结怨，躲不过一死。山茅原名丛复兴，1944年生，祖籍山东，兄弟6人，他排行老三。曾就读空军幼校第八期，虽然是文艺活动的积极分子，但学习成绩平平，没有领到毕业证书，就离开了学校。

1964年，山茅应征入伍，在桃园龙潭服役。在此期间，他参加了“竹联帮”，还同帮内的黄顺一起在中坜街头与一帮混混展开了一场搏斗，因他身材魁梧，还有不凡的功夫，将对方打得落花流水。

退伍之后，他有幸进入影视圈，最初是跟当时的临时演员领班骆明在电影里跑龙套，演一些只有几个露面镜头的戏。尽管没有什么成就感、事业感，但却与演艺圈结下不解之缘，还认识了名演员谢兴。俩人都有点功夫，一见如故，成为莫逆之交。

1966年8月的一天，巫敏雄率绍氏电影公司的一队人马到台中县丰原市拍外景。吃过晚饭后，几个武行演员酒后与当地流氓发生冲突，展开混战，流氓还真不是这些有功夫演员的对手，很快败下阵来。

第二天，巫敏雄班师北归，刚好碰到在台中拍完戏的山茅赶来搭便车。车子还没开多远，大批当地流氓手持武士刀拦住了去路，随即展开搏斗。山茅认为自己不是这场冲突的当事人，就想做个调解人，便未拿武器就下车，还没讲两句话，就挨了三刀。这还是他出道以来第一次遭此不幸。

1968年夏，香港导演张彻离开邵氏影业公司，自组长弓电影公司，计划开拍《八道楼子》与《海军突击队》两部武打电影，让刘家良担任武术指导，但因条件未能谈妥而找到了台湾的谢兴。

人选确定后，张彻、狄龙、姜大卫一行浩浩荡荡地到台湾拍摄外景。山茅也经谢兴结识了这批香港电影界的武打影星。这群武打演员，不论在戏内戏外，都是地地道道的江湖汉子，个性豪爽，不拘小节，这正合山茅作风，双方很快就一见如故，成为好友。

由于台湾电影界与黑道有扯不清的关系，所以香港电影界到台湾拍戏，也难免与当地黑道接触，甚至发生冲突。

一次，山茅与香港的周新贵到华侨舞厅跳舞，周在舞池里与“文山帮”的王科、“迷糊”发生冲突，双方大打出手，山茅也前来帮助客人，却被王科的朋友用扁钻从背后刺了一刀，住进了宏恩医院。这是不到3年时间里，山茅第二次在与黑道冲突中负伤，也因此在道上有了名气。

台北有一家菁菁餐厅，是影星祝菁所开。这里是台湾影星常来的地方，山茅就是一个老客户，也是“竹联帮”经常聚会的场所。一天，山茅与朋友在此喝酒，旁边的“竹联帮”兄弟与来此滋事的几个小混混干了起来，山茅爱管闲事与打抱不平的个性，促使他同“竹联帮”一起教训这批流氓，很快就将对方赶走，给“竹联帮”兄弟留下深刻印象。不久，山茅被邀正式加入“竹联帮”。

1977年3月22日夜，山茅与两名女子在一家餐厅吃完火锅后，乘出租车向北投驶去，当车行至国华饭店时，山茅与司机发生冲突，山茅被刺身亡，震惊台、港电影界。

据报刊报道，山茅乘出租车带两名女子到北投共进温柔乡，一女子不从，惨遭山茅修理，司机路见不平，用螺丝刀刺向山茅太阳穴，击中要害，导致山茅身亡。

但外界并不相信这一报道。一则山茅住在石牌，两名女子均住北投复兴岗，他是送女子回家，而不是司机所讲到北投风化区喝花酒；二则山茅身材高大，又有不凡的武功，一个司机怎是他的对手，令人怀疑；三则是事后发现山茅手腕上有瘀伤，可能是有帮凶抓住了他的手腕共同作案。

但不论怎样怀疑，山茅死了。他的死也许是偶然，但他与黑道关系密切，并有多次与黑道交手的纪录，其中的恩怨谁也讲不清楚，这也是事实。

3月29日，港、台影视圈在台北市立殡仪馆景行厅为山茅举行了隆重的葬礼，祭奠这位银河好汉，江湖道上的朋友。

1984年，台湾第21届电影金马奖揭晓，《老莫的第二个春天》获最佳影片奖，轰动一时。

它的导演就是被人称为“小花周”的周乃忠。就是这位驰骋台湾影坛的银色大亨，却金粉遮不住黑色的本质，也没能躲过“一清专案”的厄运，竟被送进牢里管训。

周乃忠天资聪颖，但却不爱读书，读到初中三年级就不愿上学了，被保送进了空军士校。但乏味的军中生活不能满足这个不安分守己的青年，在军中呆了不到两年就回家不干了。

回家后也无所事事，便和台北四维路一带的小混混搭上了线，进了“四维帮”。这个帮的不少兄弟后来加入了“四海帮”，一些还成为“四海帮”里“哥”字辈的人物。周乃忠从此与黑道走到了一起。

周乃忠因他的大哥帮忙而进了电影圈，也令人意外。

就在周乃忠18岁时，他的大哥已是电影圈的红人，便推荐弟弟当了挂名制片人，拍了一部《爱情骗子》。不久，他便跟随当时因《西施》一片而走红的大制片商祖康（此人也是中国电影界的元老之一），从中学到不少东西，为自己日后的电影事业打下了基础。

这时候，周乃忠又感到钱不够用，就想搞第二职业——经商。于是与几个好友合资，在台北南京东路口与中山北路之间建了一家号称台北最大的餐厅——荟欣川菜馆，高达四层，这在当时的台北确实并不多见，装修得更是富丽堂皇，可惜用巨资兴建的这家餐馆，因无内行管理，成本又高，没几天就关门大吉。

一事不成，再谋他方。周乃忠便与其大哥搞起贸易生意。为图利，兄弟俩搞起不法活动，乱开支票，结果因违反票据法，周乃忠一人担当，被判三年徒刑，送进了龟山监狱改造。

没想到，周乃忠因祸得福。在狱中，他结识了在台湾以生产

三枪牌内衣而著名的鲍家公子（这家企业解放前在上海，后随国民党到了台湾，如今也在大陆投资，以生产三枪牌内衣而闻名），此人家产万贯，却不学无术，是个标准的纨绔子弟，结识了不少黑道上的兄弟，还得罪了因“杏花阁酒家喋血案”而闻名一时的黑道分子关壮飞。

周乃忠在入狱前，就与关壮飞有往来，颇得关的敬佩。鲍家公子找同是狱中难弟的周乃忠帮忙出面解决。周乃忠向鲍公子拍了胸脯，保证摆平这场江湖恩怨。最后事情得到圆满解决，周乃忠获得巨额报偿，鲍公子也在次年远走美国洛杉矶。

出狱后，周乃忠重操旧业经商。先在台北仁爱路北欧大厦租了几间房子，专做进口名牌成衣。但因市场假冒名牌盛行，生意不好做而改行，转做小五金贸易生意。没想到，以销售门锁为主的小生意却让他发了不少财。

有了点钱，周乃忠就想做大生意，赚大钱，便在亚洲大楼做起了期货买卖。为了照顾旧日朋友兄弟，周乃忠请了不少“四海帮”兄弟参与期货买卖。道上朋友做这种生意，得心应手，稳赚不赔，没多少日子，就为周乃忠赚进数百万元。

周乃忠并不满足，进而说服一位军界知名人物共同出资，成立高仁期货公司。不到两年，就净赚了2000多万元。于是有人将周乃忠称为“期货王子”。

借此东风，周乃忠相继成立特安电脑公司、高仕电影公司、高仕传播公司、高仕室内设计公司等11家公司，员工最多时超过数千人，他也因此跻身上流社会，成为人们羡慕的青年企业家。

周乃忠有了钱，就更加重视享受。花了600万元在台北通化街买下一栋占地300多平方米的房子，室内装潢得美仑美奂，堂皇无比，主卧室就近100平方米，仅圆型巨床就有25平方米。他自己设计的大型圆桌更是称奇，暗藏玄机，书柜、小酒吧、录

放机等，一切均由电钮控制，自动升降。

他拥有的轿车在海内外华人社会中，可能独一无二，有三辆凯迪拉克，二部宝马房车，一部金色跑车。

他的女人就更多，台湾已很少人叫他的本名周乃忠，而叫他的花名“小花周”。他找的女人差不多都是知名影星、歌星、模特。他也曾结过婚，新娘是新加坡人，是曾获亚洲小姐选拔赛第三名的陈小姐。陈小姐是周乃忠在朋友安排下到一家大饭店接新加坡一个代表团时认识的，两人一见钟情，不到48小时就到法院办了结婚手续。不到两个月，两人又在离婚证书上签了字，陈小姐黯然回了新加坡，周乃忠则无了婚姻的束缚，玩起了没有爱情的男女游戏。

就在周乃忠名利双丰、事业兴旺发达之时，1984年11月，台湾展开庞大的扫黑行动，周乃忠不仅是“四海帮”的兄弟，也与黑道一起不法经营，被警方抓获，且被裁定送到绿岛管训六年。

出狱后，周乃忠仍我行我素，混迹演艺界，也不忘风流事。1996年6月，周乃忠与著名艺人甄妮互相控告官司再起波折。

甄妮本名甄淑诗，是台湾著名的节目主持人，却曾陷进了周乃忠的情怀，俩人成为一对野鸳鸯。1992年3月，甄妮计划将坐落在台北市仁爱路四段的房屋出售，乃委托周乃忠代为经办，以2450万元卖给余先生。周乃忠收款后，伪造台北税捐处发给的土地值税缴款单，将原应纳税款191万元改为248万元，再传真给在外地的甄妮。

甄妮发现后，不甘遭情人周乃忠的诈骗，乃提出上诉，控告周乃忠涉嫌侵占与伪造文书等罪。周乃忠也加以反制，反诉甄妮侵占他一批珠宝和国画。台北高等法院进行了审判，依伪造文书罪判处周乃忠两年半刑期，判甄妮无罪。事后，周乃忠上诉台湾最高法院。1996年6月5日，台湾高等法院撤销了台北高等法院

判决周乃忠有罪的二审判决。至此，周乃忠与甄妮的官司又起波澜。

就是在今天，台湾的娱乐事业仍是台湾黑道的天下。“天道盟”的顾问杨登魁不仅是台北县第四台有线电视协会的名誉会长，也拥有多家影视公司，而被称为“娱乐界教父”。最具实力的“竹联帮”与“四海帮”在影视、娱乐界也有庞大的事业。台湾的影视、娱乐业在“金色”的光环下，又多了一层“黑色”的影子。

第二十三章

黑道大哥入主政坛

议会是民主政治的象征，但在台湾却成为一个政治斗争与利益争夺的中心。谁会想到这里也是“黑”影幢幢，许多黑社会人物纷纷进入了这个民主的殿堂，成为黑社会分子的角逐场。

据台湾省刑事警察局统计，台湾省（不包括台北市与高雄市）有黑道背景的民意代表超过150人；1994年各县市新当选议员中，有帮派、管训纪录及刑事前科者共300多人，超过总数的三分之一。台湾中南部更甚，基层议会一片黑道天下。台湾各级议会大有“黑金遮断议会半壁江山”之势。

于是在台湾的黑道上，已有这样一套黑道漂白公式：“先当兄弟，再当议员”。“兄弟”就是台湾黑社会分子的通常称呼。

“漂白”不过是用合法的议员等政治身份掩盖黑道的罪恶。这些道上兄弟采取的办法就是：黑道运用地方势力帮助国民党进行选举，以维持国民党的执政地位；国民党则报之以李，提名有“功”的黑道兄弟竞选民意代表。那些当选者既可体验掌握权力的滋味，也可用手中的权力获取经济利益。

黑道介入选举，一般而言，视其帮会与黑道分子性质而略有差异。

台湾黑道有社会型黑道、经济型黑道与政治型黑道之分。社会型黑道是以勒索、恐吓、威胁方式索取金钱，常以流窜型黑道分子或本地黑道与外地黑道结合进行，是选举血腥暴力的主要来

源，给候选人造成巨大压力与威胁。经济型黑道多从事非法与合法的事业，介入助选则是以威胁、强迫等方式进行买票、盯票与护票，对选举结果影响甚大，与黑道及地方派系无关的中产阶级精英很难在这种选举中获胜，而有实力的黑道分子或受黑道支持的人物则常当选。政治型黑道是台湾黑道发展的高级形态，是由社会型、经济型黑道发展而来，这些黑道兄弟不是有刑事前科或管训纪录，便是曾被地方警察局列管或存有纪录的流氓。政治型黑道多半是本地黑社会出身，他们介入政治的途径就是通过参与选举进入地方政坛。

有人将台湾的这种选举称为“桩脚政治”与“中介政治”。在选民对民主政治认知不够与利益驱使下，候选人喜欢以送钱或送礼的方式来建立社会关系或收买选票，而协助候选人运作的便是邻（里）长、助选的亲友、派系成员与黑道分子等所谓的“桩脚”，从而通过这些中介“桩脚”的推荐、买票、送礼、固票、盯票等以达到当选的目的。

江湖黑道人物之所以对政治有兴趣，是希望借政治力量加强他们的人身保护。他们出钱投资“立法委员”、省议员等候选人，是希望有朝一日落难时，有“立法委员”、省议员为他们说话、出力。因而黑社会不太支持“国大代表”，因为“国大代表”没有实权，没有什么力量，除非大家本来就是朋友，有交情，否则不会拿钱支持你参选。至于地方民意代表，如乡镇（市）民意代表、县市议员、正副议长，很多人本来就是黑道兄弟，各有各的支持力量与人马，更是黑道人物全力支持的对象。

当今，台湾省地方政坛红人颜清标，就是黑道漂白的典型之一。

颜清标，1960 年出生在台中县沙鹿镇，家里做杂货生意。有兄弟 4 人，他是老大，二弟颜清通是埔子里里长，大弟颜清金与三弟颜清平做生意。堂弟颜炎成任沙鹿镇代表会主席。

他17岁就结婚，儿子现在已20多岁。儿子在18岁结婚时，各方贵客云集，“内政部长”吴伯雄做证婚人，民进党主席许信良也前来祝贺，“立法委员”、“国大代表”达40人，酒席600多桌。通过吴伯雄，颜清标也认识了台湾第一号人物李登辉。见面时，李登辉还说了一句：“我知道，你就是那个36岁当阿公的。”足见颜清标的名字在台湾多么响亮。

颜清标从小就在黑道上混，结识了不少黑道兄弟。他曾与枪击要犯绰号“美国博”的林博文结怨、对阵，打响了在道上的知名度，成为“海线”黑道上的后起之秀，是昔日有名的黑道老大之一。1984年因“一清专案”扫黑入狱，结识了后来“天道盟”的老大罗福助。

他在地方朋友多，黑道势力大，帮助地方选举有功而受到国民党的重视。1991年，他亲自出马参选埔子里里长，一举成功。靠着与上边的广泛关系为地方争取了5亿多元建设经费，建立了30多条公路，为自己步入政坛打下了基础。

1994年，颜清标出马竞选台中县县议员，尽管他曾在黑道犯有多起重大案件，却以一个黑道大哥的身份在选举中获得当地派系黑派与黑道兄弟的大力支持，竟以台中县最高票当选为县议员。有人形容这是“黑道搭黑派便车跻身政坛”，也有人讲这是“黑派借黑道之力巩固地盘”。原来，在台中县政坛上，黑派与红派是两大政治力量，斗争一直十分激烈。为了同台中县另一大派——红派推出的县议员张清堂（其兄长为“海线”另一黑道大哥张清池，被称为“海线军火库”，也是一枪击要犯，1996年5月被捕）抗衡，黑派才推出属黑派人马的颜清标竞选，结果成功。

年底，他又角逐台中县名额有限的省议员。最初他获得台中长亿集团老板杨天生支持。但不久情况有变，杨天生又支持别人，即支持红派人马。当时颜清标手下兄弟要教训这位大企业家，只是颜指示不要动手，杨天生才躲过一劫。但为了避免报

复，杨只好赔给颜清标一笔巨款。有了钱，颜清标就不怕选不上议员。果然，在年底的省议会选举中，更上一层楼，他当上了省议员，黑道再度进入省议会。

颜清标不仅在政界走红，事业也做得不小。他从事砂石业、混凝土、沥青、建筑等事业。

颜清标从一介黑道人物进入议会，并步步高升，成为政治型黑道的代表。但他仍不脱草莽性格，手上戴着满天星钻石手表，40克拉的大钻石戒指。问政风格也有“大哥”架势，不时口出狂言，脏话不断。

如今的颜清标成为台湾政坛的大红人，不论白道、黑道的纠纷他都能出面调解，其影响力之大可见一斑。在“四海帮”老大张永和的葬礼上，他也亲自到场祭奠。

尽管如此，颜清标还是不能摆脱黑道恩怨。1994年，颜清标在一件土地买卖中，被人“设计”，骗走500万元。事后，对方遭人挟持近两个月，有人怀疑是颜清标派人所为，警方曾试图依掳人勒索罪嫌逮捕颜清标，只是后来和解，才未被判刑。1995年8月，颜清标的坐车在台中警方临检时强行闯关，被开枪射击。1996年8月，颜清标接到一份署名周董的恐吓“血书”，说他“再不上道，就到地下去见被枪杀身亡的军火贩子许金德”。

台湾当局达成决定“冻省”（即实质取消省级行政机构）后，省议员也将在本届后不再存在，现任省议员开始寻找新的政治出路。颜清标便于1998年初重回台中县参加县议会选举，并高票当选，进而当选县议会议长，成为地方实力派人物。

像颜清标这样的黑道人物进入议会不是个案，而是通例，在地方议会，有许多黑道背景的人物。

黑道分子通过选举进入政坛在基层政权机构表现得尤为明显。自桃园县以南到屏东县的西部海岸，共有11个县市，占台

湾县市总数的57%，黑道分子通过选举纷纷进入乡镇（市）代表大会、县（市）议会，甚至当上乡镇（市）长、县市议长。特别是云林县、嘉义县、嘉义市、彰化县、屏东县、高雄县、高雄市及台南县，出身黑道的议员平均占总议员人数的25%，云林县更高达40%。

就是最基层的村（里）一级民意代表，也成为黑社会分子角逐的地方。一旦他们当选，就会成为地方一霸，为所欲为，不可一世。陈哲卿就是一个典型。

陈哲卿是台中县雾峰乡民代会副主席，也是黑道流氓。在1989年到1991年间，陈曾被警方认定为流氓进行管训，并有盗窃前科。1994年5月，乡代表竞选期间，他不满一位地方人士支持另一位赖姓候选人，教唆手下兄弟持枪将这位地方人士押到雾峰乡南柳宫，威胁他不要支持赖姓候选人，同时要其交出20万元的助选经费。1995年1月，因有人质问陈掌管的北柳村新柳宫收支账目不清，陈哲卿即率众在新柳宫前威胁对方不能再查账目。不久，另一位新柳宫管理委员扬言要揭发陈侵占公庙私款，陈哲卿率众兄弟到这位管理员家中，将其强行押出室外，威胁他如敢举发，将剁掉他的手脚。3月10日，一位村长检举陈开设地下赌场与钱庄，陈又率众黑道兄弟到他家进行威胁说："小小村长，竟敢教训我代表会主席，不给苦头吃，不知我们兄弟厉害。"最后因村长太太下跪求情，陈才放了村长一码。不然，这个小村长将会遭受一顿毒打。

陈哲卿侵吞公款引起许多人的不满与揭发，尽管受到陈的威胁与殴打，还是有人不断检举。4月27日，又一位新柳宫管理委员会成员要求陈交出短少的20万元公款，陈竟放火烧毁这名委员的轿车。第二天，陈哲卿得知有人联合欲向"法务部"检举他，即率一帮黑道兄弟对欲打算联合签名告发者进行殴打。

陈以黑道兄弟为后台，气焰嚣张，鱼肉乡里，引起公愤，终

于被人告发。1996年1月4日，台中县警察局传唤陈晢卿到案，准备将其移送治安法庭时，谁料这却引起地方政坛关注，多位地方政治人物出面为他说话，结果这样一个黑道人物、乡民代会副主席未受到惩罚就获准保释，再度显示台湾地方政治的黑暗与黑道势力的庞大。

同年6月，台湾司法部门展开扫黑活动，陈晢卿却没能躲过这次厄运，他被警方以暴力介入选举、开设赌场与地下钱庄等罪名，依检肃流氓条例，经台中地方法院治安法庭裁定交付管训。

然而，陈晢卿还是不服，认为他是遭地方政治派系陷害，要提出控告。不管他控告能否成功，也不能洗刷他的黑道兄弟身份。但谁也不能断定他在管训回来后，会否重新成为村代表会主席，横行乡里。

黑道人物为了能在选举中获胜，最大的本钱就是使用暴力。在选举期间，发生候选人或助选人员被杀害、纵火、殴打、绑架、恐吓、勒索等暴力事件十分普遍。以1982年的台湾乡镇（市）长（第九届）及1986年乡镇（市）民代表（第十二届）为例，全省乡镇（市）长、代表会主席、副主席及代表，遭杀害、杀伤、殴伤、恐吓、勒索、挟持等案件高达51起。而在上述乡镇（市）长及代表会代表等任内，涉及打伤助选员、贿选、枪械使用、妨害自由、勒索、伤害、开设赌场、妨害公务等案件，以致被收押或判处徒刑的案件，高达147起。在1989年“立法委员”选举期间，发生选举暴力事件45件，遍布14个县市。在这些暴力事件中，共有4位候选人或助选人被杀害；2位候选人遭绑架；11位候选人遭电话或刀枪恐吓；有5位候选人被殴打、住房被破坏；有6件相关的纵火案与勒索案。另外，在这次“立法委员”选举中，云林县黑道介入选举的案例占全台湾该类案例的16%，居第一位。在1992年的“立法委员”与1993年县市长选举中，暴力流血事件蔓延台中市、云林县等15个县市，占台

湾23个县市的65%。

70年代以后，地方经济实力派人士与黑道热衷选举，不仅选举暴力日益严重，而 贿选买票盛行，选举经费大增。如在经济不发达的云林县，村、里长（里相当街道，与村平级）竞选约需花50万—100万元；乡镇（市）民代表约需100万—200万元；乡镇市长约需1000万—2000万元；县议员需3000万—8000万元；“立法委员”约需5000万到1.2亿元；县长约需1.5亿元。台中市则一般高出云林县500万—2000万元不等。这样高的选举经费，没有地方派系、财主、企业界与黑社会的支持是很难办到的。如今，这个数字已经翻番，竞选经费更为庞大与惊人。

每到选举，台湾当局也会扫黑，但这只是给民众做样子，抓一些黑社会的小喽罗，而不会真正触动有势力的大黑道，甚至还要用这些大黑道为自己服务。

一位黑道兄弟说：以前选举也会扫黑，政府说是“清跑道”，但我们真正有影响力的兄弟根本不必理会或跑路，因为候选人需要我们，会设法维护我们安全。有的兄弟自己跳出来参选时，警方还要派员保护他们。

因扫黑而逃到海外的黑道分子，也不忘关心岛内的选举活动。在选举期间，这些黑道大哥便打电话回台湾，向手下兄弟与亲朋好友拉票，支持他们的候选人。有些黑道人物交代在台的小兄弟前往自己支持的候选人处捐款或暗中客串保票。

黑道更与商界巨子联手，进入政坛。黑道敢杀敢拼，商人有钱有势，两者结合威力无比，再共同携手合作进入政坛，形成黑道、金钱与权力的一体化结合，这就是人们讲的当今台湾的“黑金政治”。

专家指出，台湾新兴的地方家族、地方派系、财团、黑道形成共生结构。黑道势力已严重冲击地方政治，如果情况进一步恶化，黑社会将形成县市贯通“中央”的政治经济大结盟，其影响

力难以估计。因此一些县市出现有黑道背景的父子或兄弟联手的家族政治，甚至出现同一家族兼并县市政坛的怪相。

地方性的黑道兄弟与地方派系有着千丝万缕的共生关系。在地方派系壁垒分明的台中县，红黑两派各有黑道兄弟朋友护盘，必要时出面“解决”问题。

近几年来，黑道向政坛进军，可以说是长驱直入。据警方的调查，台湾每次的选举暴力，除地方派系倾轧外，大部分出自候选人勾结黑道，即使派系斗争也与黑道关系密切。黑道已不仅在地方议会大施威风，更进入“中央”级议会“立法院”。最典型、最具影响的就是台湾三大黑社会组织之一的“天道盟”老大罗福助。

罗福助是彰化田尾的农家子弟，后来加入了台北县新店黑社会组织“文山帮”。在 1984 年“一清专案”后，罗福助同其他许多黑道兄弟一同被关进了绿岛监狱。牢狱之灾不但未损及他一根毫毛，而　还成就了罗福助日后在政治中的更大发展。“天道盟”就是在这里由他发起创立的，并成为本省籍最大的黑社会组织。在狱中，他还认识了党外人士、后来的民进党中坚分子黄天福、郑楠榕等人。

罗福助出狱后，正遇上台北开放报禁，他便极力介入媒体事业，申请创办《公论报》，问政之心昭然若揭。在“天道盟”领导层的聚会中，他们开始讨论问政路线。他们首先推出自己的人马参加公职选举，这样既可漂白身份，从一介黑道变为政治人物，又可利用在政界的影响力在公共工程投标中取得承包建筑权，获得庞大的经济利益。

在罗福助这位大后台支持下，他的两个儿子也平步青云纷纷进入台湾政坛。在 1995 年底的“立法委员”选举中，罗福助这位黑道老大在台北县选区竟然击败众多国民党与民进党知名政治人物当选新的“立法委员”，在台湾引起极大的震撼，也正式标

志着黑道进入台湾“中央”级议会。

罗福助在接受一名记者访问时表示：“我们不偷、不抢、不搞毒、不做伤天害理的事，为何不能光明正大地站出来？凭天道盟目前在政经界的关系与实力，未来数年绝对可以发展成为跨国大企业。”这就是黑道逻辑。

其实，在“立法院”有黑道背景的也不只是罗福助，林明义也是典型的黑道人物。有人估计在“立法院”至少有20多位与黑道有关的“立法委员”。

台湾“立法院”的暴力也愈演愈烈，由初期“立法委员”在会场内互打，进而引进群众全武行，直到招来道上兄弟助阵，甚至动辄“修理”“立法委员”。

1993年5月，为了林明义打苏焕智、韩国瑜打陈水扁两起事件，双方各有群众前来声援对峙。在这些群众中，有许多留平头、身着黑色西装、头戴墨镜、手持大哥大的“兄弟”，引起“黑道”干政的强烈质疑。后来，曾靠拳头打出政坛道路、后退出民进党的“立法委员”朱高正在“立法院”的厕所里也遇到黑道兄弟的恐吓与毒打。

黑道介入政坛的阴影逐渐成为许多人的梦魇。不仅长久以来各级地方议会黑道暴力更加严重，就是“中央”级的“立法院”也是黑影幢幢。“立法委员”张普城、赵永清指控遭罗姓“立法委员”恐吓压制，更有“立法委员”彭绍瑾被砍伤，后有“立法委员”廖学广被绑架等，黑道已成为台湾政坛的黑色恶魔。

1996年2月底，民进党中常会发表谴责黑道介入政治的声明时，民进党发言人邱义仁点名批评无党籍“立法委员”罗福助是民进党推动“二月改革”失败的阻力。次日便有自称“立法院无党籍立法委员办公室”主任杨姓男子率四名彪形大汉前来找邱义仁沟通，但双方谈得并不愉快。

当时杨姓男子见到邱义仁后便怒气冲冲地说：“我们不是黑

道，我们如果是黑道，你们这里早就被放炸弹了。”临走时还表示希望邱义仁能主动澄清前一天的说法。“如果不澄清，有人必须负责，你敢负责吗?”他们说完便扬长而去。可见黑道从政作风仍是杀气腾腾。

3月2日上午，民进党秘书长邱义仁在前往中央党部上班时，在办公大楼门口的人行道上，遭4名不明身份者的袭击，殴打成伤，立即在社会上引起极大反响。

次日，民进党文宣部主任陈文茜指出：“无党籍立委罗福助曾利用黑道背景协助国民党阻挠民进党的二月政改，这次邱义仁被打事件与他批评罗福助有关。民进党近日将发起反黑大游行，反对的目标将是罗福助及无党籍立委办公室。”

民进党主席施明德表示，邱义仁遭攻击毫无疑问是政治问题，是对民进党的挑衅，民进党绝不会畏惧黑道力量，绝不坐视黑道如此破坏民主政治，更不会容忍李登辉纵容黑道介入政治。

民进党“总统”候选人指出，国民党靠黑金建立政权，是全世界绝无仅有的现象。黑道人物以选举来漂白，当了民意代表后，就可以“立法委员”的名义质询“警政署长”、“内政部长”，实在不可思议。

对于民进党的指责，无党籍“立法委员”罗福助表示，在真相未弄明之前，便有人直指此事是他所为，已损及个人名誉，他保留法律追诉权。罗身边的人也讲，罗董事长绝不会做这样的事。

几天之后，罗福助在回答记者问题时更指出，他当年被关是因为和党外走得太近，如果说他是黑道，他只是小黑道，被关得更久的施明德才是大黑道。这等于他已承认自己是黑道，只是个小黑道而已。

然而外界评论指出，从邱义仁被殴打的情境判断，是典型的帮派人士警告性质，说明了暴力介入政治已形成新的“黑色恐

怖”，让台湾的民主政治蒙上难以挥去的阴影。

事实上，在近年“立法院”的重大议案表决过程中，无论是国民党或民进党，都曾动员黑道绑票、固票，也曾有“立法委员”被绑架、被殴打的事件。各政党倚靠帮派力量的做法，已经让暴力与权力的界线难以划分。

让人想不到的是，在这一次对黑道介入政治的批判中，国民党主席李登辉竟然多次为黑道辩护。李登辉竟说，黑道古今中外都有，不独台湾才有，社会自由化了，各种力量都可出来。似乎在李登辉看来，黑道的存在是合理的。无怪乎台湾黑道如此明目张胆，大胆枉为，原来有“总统”大人护驾与支持，谁还能制服黑道？这也就是为什么在台湾受人尊敬的台湾“司法部长”马英九因扫黑过度而被李登辉革了职。

邱义仁被黑道殴打事件尚未平息，台湾政坛再爆发“立法委员”廖学广被黑道绑架事件。

1996年8月10日凌晨3时30分左右，四名头戴鸭舌帽、墨镜的男子，悄悄进入“立法委员”廖学广在台北县汐止镇中正路的住处，将其绑架，戴上手铐，拉到林口荒郊，塞进一个铁制狗笼，然后在上面贴了一张写有“替天行道”的纸张离去。而歹徒在绑架时却未伤害廖的妻子周丽美。周迅速与娘家取得联系，经商议后决定向警方求援。8时许，一位农妇上林口购物时，听到“救命”的呼喊声，发现了狗笼中的廖学广，马上转告村长。村长通报警方后，迅速赶到救出被绑架的廖学广。

这一旨在警告性的绑架案再度震动台湾最高当局，警方迅速展开调查。尽管案件尚未查明，但从“替天行道”的做法及警方初步判断认为这是黑道分子所为，是黑道分子对廖学广的警告。

政坛黑道横行，“黑道治国”再度成为台湾社会讨论的焦点。

民进党“立法委员”洪奇昌说，李登辉引进黑道作为个人斗争的力量，使整个社会价值观崩解。黑道在李登辉主政后坐大，

以致出现“黑道治县”与“黑道治国”一说，李登辉也因此成为历史的罪人。

国民党与黑道结合并不是现在才有，历史上一直存在。蒋介石就是靠青帮在上海发动“四·一二政变”，屠杀共产党，夺取革命政权。以后，也是依靠青、洪帮与地方军阀维持统治。

到台湾后，国民党失去了大陆的黑社会基础与密切联系，与黑道的关系一度有所减弱，但未从根本上悔过，又重犯了用黑社会清除异己、控制政权的错误。1984 年轰动一时的“江南命案”，就是台湾国民党高层与情报局联合利用黑社会组织暗杀异己者的最典型案例。

李登辉执政后，未见这方面的改革，不仅没有与黑道划清界线，而　有过之而无不及，政权与黑道进一步结合，实现了“黑道治国”。

国民党以前靠情治、军队、警察等势力来控制社会，主要对付反对势力。如今，国民党靠黑道、金钱来巩固政权，从而使黑道再度复兴，势力庞大，目前纪录在案的黑道帮派达 1200 多个。

国民党与黑道的关系之密切，甚至超过黑道兄弟之间的关系。在一次“立法委员”选举中，“四海帮”老大“大宝”陈永和，不支持自己的兄弟蔡冠伦，反而支持国民党的“立法委员”候选人，足见国民党对黑道人物的依赖程度。

1994 年台北市长选举，国民党上层通过警界高官请“四海帮”“大宝”陈永和召开帮派首脑会议，动员江湖好汉支持国民党候选人黄大洲。“大宝”鼎力相助，动员兄弟支持。但后来李登辉改变策略，进行“弃黄保陈”（放弃黄大洲，改为支持民进党候选人陈水扁，以共同对付可能当选的新党候选人赵少康）。结果选举结束后，陈水扁当选，这让“大宝”非常生气，大骂找他帮忙的国民党党工和警官不是东西。

在今天的台湾，黑社会已成为政坛上一支不可忽视的力量，已达到了黑白不分的地步。“黑”与“白”勾结已形成一整套运作模式。若无白道与黑道勾结共谋不法利益，则黑金政治绝不可能全面渗透到地方政府机关与各级议会；若无白道引人黑道力量来巩固政权，则黑金政治绝不会发展到今天“黑白一体”的地步。

台湾政坛不仅黑影幢幢，而 更是血腥风云，杀声不断。

1992年7月，黑道兄弟绰号“阿不倒”谢通运因为地方派系矛盾，在彰化县二林遭同乡谢惠仁枪击成伤。谢通运的儿子谢文川认定是黑道纵贯线老大、前彰化县议员绰号“条哥”洪丝条从中教唆，乃携枪为父报仇，在1993年6月洪丝条到台北参加朋友丧礼时，将其击毙。同年9月，和洪丝条属同一派系的大哥谢东松，又唆使手下谢惠仁及另四名小弟在彰化芳苑将谢通运的儿子谢文川及司机范明元乱枪打死。黑道纵贯线另一名老大绰号“唐高”陈庆荣于1993年6月被两名歹徒在家门口开枪打死。不过这些都是黑道兄弟之间的相互残杀。最令人震惊的莫过于因政治选举或利益冲突引起的台湾政坛的黑道枪杀案，3年间有多位议长、议员、“立法委员”等政治人物被黑道兄弟所杀。

1994年12月13日清晨，在台湾最南部的屏东县潮州镇永坤路一栋住宅里，突然响起了一连串的枪声，打破了小镇的平静。随后，数名手拎手枪的大汉急步冲向早已停放在街口的轿车，飞速离去。随即一位老妇人凄厉的叫声划破了天空：“天啊！议长杀了我的儿子！”

话说从头，领头开枪的郑太吉在屏东县可是一位人见人怕的黑道“大哥”。他生于1959年，职业高中毕业，早年混迹于黑道。1986年，台湾当局发起“一清专案”扫黑，郑太吉被捕入狱。在狱中，他结识了数位纵贯线黑道角头。郑太吉的嘴巴甜，

逢人便呼“大哥”，获得了这些人的好感，出狱后，便在这几位“前辈”的提携下，在黑道中的地位迅速窜升。

郑太吉具有黑道大哥固有的那种所谓“够狠，够义气”的素质，一夕之间几千万元的豪赌输赢，在他的身上时有所闻，更增加了郑太吉这个人的神秘性。为了巩固自己的地位，他开始向地方政坛进军。1990 年初，郑太吉首次参加县议员的竞选，便高票当选，随后在县议会副议长的角逐中，又巧妙地利用国民党内部的利益冲突，以无党籍当选副议长。黑社会的势力实在不可小视。据屏东县警方透露，当时曾经有被台湾警方列为“十大枪击要犯”的杨政隆等人介入选举，都被郑太吉摆平，也充分显示了郑太吉在黑道上的分量。

他是一个机会主义者，曾出面帮助走向衰落中的国民党进行政治选举，并因功绩不错，受到国民党高层的重视与栽培。那是1992 年屏东县进行县长选举，民进党派出前屏东县县长苏贞昌竞选连任。国民党则提名伍泽元参选。国民党与民进党两方人马竞争十分激烈，在政见会上发生多次暴力冲突与殴打。各自实力不相上下，打得难解难分。谁能在选举中取得最后胜利，都没有把握。但国民党已失去数县市的执政权，希望这次能从民进党手中夺回失去的屏东县县长，为此不惜一切代价，采取各种方法来打这次县长选举战。

在嘉南地方有实力的黑道就成为国民党拉拢的对象。身兼黑白两道的郑太吉在国民党的“号召”下，全力支持伍泽元，并打败苏贞昌的人马，伍泽元终于当上屏东县县长，为国民党夺回了执政权。

郑太吉辅选有功，被国民党中央党部提名出任屏东县议长，并在国民党籍议员的全力支持下当选，成为一个有实力的政治人物，气焰嚣张，不可一世。

1993 年 12 月，郑太吉正式加入国民党；1994 年，他顺利连

任县议员，并再次当选县议会议长。

郑太吉与台湾很多“黑道漂白”的政治人物不同，他身上长期养成的浓厚的黑道习气一点都未改掉。即使在县议会主持议事，郑太吉也毫不加掩饰，除拉拢为己所用的议员外，并常常不惜动用自家“兄弟”来直接威胁不肯就范的议员，借此完全掌握了屏东县议会。

这个被枪杀的人叫钟源峰，是郑太吉自幼就认识的好朋友，两人还曾合伙开设赌场。1994 年 11 月的一天晚上，当时身为屏东县议员的郑太吉亲信黄庆平正在郑太吉于屏东市和平路开设的赌场赌博，因为押注与调借现金的原因，遭到钟源峰的好友、绰号“五掌”的男子羞辱，双方大吵大闹，钟源峰当时也在场，但未及时出面劝解，一直以老大自居的郑太吉便认为钟源峰是存心让他难堪。随后，郑太吉又听说钟源峰意欲加害黄庆平，心中更加恼怒。为维护自身的“大哥”形象，12 月 13 日晨，郑太吉召集了手下黄庆平、许文奇、刘有光等人，各持手枪，开车直奔潮州镇。郑太吉一行先到钟源峰所开设的好莱坞 KTV 店内鸣枪示警，随即赶到钟源峰的住宅。郑太吉亲自上前按响钟源峰的门铃，钟源峰的母亲黄玉梅佯称钟不在，郑太吉回头走了几步，觉得不甘心，又回身再次按响门铃。这次是钟源峰应门，见是熟人郑太吉，便不疑有诈开门。钟母黄玉梅则觉得有异，便尾随出来，只见郑太吉与黄庆平持枪将钟源峰押到门口，郑太吉说了一声“你给我死!”对钟就是两枪，钟源峰应声倒地，其他诸人也上前一步，向钟源峰身上一阵乱射，钟源峰身中共计 19 枪，当场死亡。

由于有钟源峰的母亲在场亲眼所见，整个案情十分明朗。因此案发后，钟源锋的母亲指控郑太吉是杀害儿子的元凶。但台湾警方与监察单位却按兵不动，不去抓人。郑太吉还北上台北向一位曾姓的国民党籍“立法委员”求援，希望他向国民党大老“解

释”。直到民进党“立法委员”蔡式渊在“立法院”将郑太吉涉案一事公开，社会舆论压力强大，司法机关才不得不下令将郑太吉收押，进行调查。但没想到，屏东县县议会竟无限期休会，表示抗议，要求释放郑太吉。郑太吉的影响力之巨可见一斑。

经过半年多的侦讯，案情大白，郑太吉对所犯罪行也供认不讳。但以郑太吉的妻子钟秀华为首的家属却闹出了郑太吉“心神丧失”的说词，台湾监察单位动用高雄医院专家会诊，确认郑太吉并没有精神方面的问题，因此二审宣判郑太吉死刑。国民党方面也在一审判决后，于当年7月宣布开除郑太吉党籍。但本案并没有结束。自屏东县议会议长郑太吉因持枪杀人案入狱后，屏东县不少议员的住宅、坐车都挨了不少子弹。1995年1月2日深夜，副议长蔡侑展服务处又遭枪击。这一切都与黑道介入地方政坛及郑太吉被抓分不开。2000年冬，郑太吉被执行死刑，成为台湾历史上第一个被处死的议长。

1995年12月，台湾第三届“立法委员”投票选举将至，各政党、各候选人早已开始摩拳擦掌，展开激烈竞争与角逐。而在半年前，在野党便提出了具有诱惑力的竞选口号：“三党不过半”，很快便成了岛内各个媒体争相追逐的话题，国民党却陷入了近40年来空前的危机之中。

近年来，国民党在台湾北部，尤其是台北等大城市，得票率节节下降，只是在中南部农业县还有优势，这是国民党确保在“立法院”席次过半的主要依靠。高雄县作为台湾南部的第一大县，县长又是民进党人，身为国民党籍的高雄县议长吴鹤松便成了国民党争取选票的重要依靠，他要为国民党在高雄县“过半”负责。

1995年11月15日一大早，吴鹤松乘坐一辆劳斯莱斯轿车，匆匆赶到冈山镇平和路，向当地康姓地方要人的父亲灵位上香致

敬。礼毕，吴鹤松向地方人士一一问候后，便表示还要到另一“立法委员”候选人服务处去祝贺，在连连抱歉声中走出友人府邸。

吴鹤松沿小街向北走了150米，抵达坐车停车场，此时已是清晨7时50分。司机兼保镖陈晟益和往常一样，只是坐在驾驶室里等候，吴鹤松走向车门准备开门上车。这时，陈晟益突然看见在吴鹤松左后方闪出一个壮汉身影，手中提着一把枪，奔到吴鹤松背后三米处便是“碰”的一枪。陈晟益立即打开车门大喊，大汉随即朝陈晟益开了第二枪，陈晟益手无寸铁，只能躲闪。大汉掉转枪口，逼近吴鹤松，朝其头部和背部，又连开数枪。吴鹤松不支倒地，大汉飞快转身，直奔一辆黑色轿车，闪身而入，车子飞奔而去。整个过程前后只有两分多钟。陈晟益赶快与吴鹤松的同伴一起叫来附近冈山消防队的救护车，将血泊中的吴鹤松送到刘嘉修私人医院急救，但吴鹤松头部、心脏多处中弹，到医院时已出现瞳孔放大的现象，院方经初步处理后又转往高雄长庚医院，经半小时抢救无效，于当天上午8时47分宣告死亡。

枪声再次传遍台湾南北，轰动台湾。笔者正好当天下午4时抵达台北，前来接机的台湾朋友就告诉我们台湾发生的这一重大枪击案，也让我们为之一惊。因为正值台湾选举期间，我们在这个敏感时期来台本来就十分小心，又遇上这起枪杀案，是够让人吃惊的。

社会上到处都在谈论这起枪杀案。报道说有目击者指认凶手在附近停车守候多时，行凶过程不发一语，一看见吴鹤松走出院子即尾随在后，在吴正要上车之际，开枪射击，在吴鹤松倒地不起后，迅速逃离现场。

吴鹤松可说是台湾黑道人士借由选举转进政界、成为黑道“漂白”的又一个典型。吴本人常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就是：黑

道漂白的过程并不困难，但要脱离黑道的纠葛却难于上青天。作为“大哥”，吴鹤松有过不少昔日战友，但后来大多离他而去，一生中，不少曾是他亲近的人最终与他成为对头，甚至出卖了他。吴鹤松曾感叹：江湖事理不断，有时连自己都自顾不暇，怎能面面俱到？充分显示出一个“大哥”，心中有多少力不从心之苦。

吴鹤松出身在冈山镇一个普通的家庭，高中就读台南水产学校。上学时他便经常结伙与高雄水产学校的学生打架。从台湾军队中退役后，他在高雄市频频与当地的黑社会大帮“西北帮”接触，很快成为其中的要角，渐渐地，吴鹤松的名字便成了南部黑道响当当的角色，被称为“冈山三虎”之一。

吴氏长期把持冈山地区的赌场生意，在黑道中有关其打打杀杀的腥风血雨传闻并不多，反倒是他在赌场一掷千金的故事处处流传。道上兄弟讲，吴鹤松专攻牌九，　只喜欢做庄，常在赌场进出的人大都了解他的这个特性，所以每当他走入赌场，庄家常会让出做庄的座位。不过有一次，一位外地赌客做庄，　正赌得兴起，吴鹤松进场，左右踱步了好一阵，还不见庄家换手，吴实在按捺不住，便把庄家台面的钱一把全押，第一次输了，第二把加倍再押，又失手，第三把如法炮制，这时那位外地庄家额上全是汗，旁边有人点了一下，庄家一下就傻了，赶紧把牌一推，说声“大仔，失礼”，便马上让座。

吴鹤松对岛内先后流行的“大家乐”、“六合彩”赌博也乐此不疲，仍是一掷千金，豪赌大起大落。他曾与一位岛内知名演艺界名人签大注，一举赢了上千万元，那位演艺圈名人付不出，这笔账至今仍未结清。在赌桌上，吴鹤松结交了不少演艺界的名人，每逢选举，他的竞选班子都有不少明星捧场。

吴鹤松虽活跃黑、白两道，但他个人的事业却是起起落落。初期开歌厅，在岛内首创歌厅录影带，发行不错。1984 年底因

“一清专案”扫荡黑道，歌厅便转让给别人。不久，吴鹤松又随其堂哥做过海外渔船生意。死前，他还曾计划投资有线电视台，并要到大陆投资建筑业。

后来，吴鹤松进入政界发展。为何要进入政界？他说，原因很简单，因兄弟间常发生些事情，若求外人出面调停，常要看对方的眼色，不是滋味，干脆自己来选。在加入高雄县地方派系——白派后，吴鹤松又很快成为其中的骨干。1982 年，他代表白派回家乡角逐高雄县议员，一鸣惊人，以 6000 多票的最高票当选。此后，他连任四届高雄县议员，在此期间，又曾因与黑道有扯不清的关系，家中还被人丢掷手榴弹进行威胁。

真正令吴鹤松名声大噪的是发生在 1984 年初的屏东林边枪械走私案。以陈丁居、黄如意为首的走私集团，竟一次走私 88 支手枪、5 支冲锋枪，这在当时已是相当严重的走私案件。其中的黄如意是吴鹤松的同学，案发后黄在逃，警查局动员吴鹤松帮忙。后来吴自称，是他带黄如意到警察局投案的，当时警察局还发给他百万元奖金，然后他把这些奖金交给黄的妻子。同年底，台湾警方发动“一清专案”，扫荡岛内黑道，吴鹤松以被多次发现非法拥有武士刀、枪支弹药而名列其中，在台北市被警方逮捕。但适值县议会开会期间，他因具县议员身份获释，他进而逃跑，一度成为流亡者。

1986 年，吴鹤松以国民党候选人身份竞选“国大代表”，结果落选。到 1990 年初，他却步入县议会，　当选高雄县议会副议长，1995 年初进而当选议长。但不久便被竞选对手揭发他进行贿选，从此卷入议长贿选案，经检调单位调查确认，对吴鹤松初审判刑 1 年 8 个月。吴鹤松因此怪罪国民党不公开声援他，就此与国民党高雄县党部不相往来。没想到当上县议长不到一年，就被人暗杀身亡。

令人不解的是案发当天下午 1 时，年仅 22 岁的冈山镇一位

名叫黄文重的人携枪到刑警队自首，宣称因与吴鹤松的胞弟在赌场结怨，吴鹤松出面协调不公，加上吴凭借实力，阻止其开赌场，于是怀恨在心，当天碰巧遇上吴鹤松，临时起意行刺，并一再强调没有同伙，也没有政治因素。台湾当局对此十分重视，责令警方深入调查。台湾警方为此多方追查，但也只挖出一名唆使犯，案件便宣告终结。但其后面的政治与黑道之间的恩怨谁也无法说清。

1996年，更成为政坛人士的不祥之年，政治人物接二连三地遭到黑社会分子的刀砍、枪杀。政治成为黑道人物的护身符，而黑道却成为政治人物的噩梦之源。

第二十四章
扫黑大行动

1996年8月29日下午2时。

台北市警察局。

“目标晚上到点，正在监控中。”吴侦察员向总部汇报。

“继续监控，跟踪目标。”台北市警察局局长丁原进指示。

在接到侦控人员的汇报后，台北市警察局局长丁原进、副局长张四良、市刑警大队队长侯友宜迅速回到会议室，进一步确定行动计划。然后向“警政署”署长姚高桥报告。

“按原计划行动!”姚高桥下令。

这个计划就是台北市刑警大队专案小组以极秘密方式策划的“A10”扫黑行动。

30日凌晨2时，市刑警大队34名侦察员紧急集合，乘坐一辆辆侦防车，迅速奔向预定集合地。这些警员还不知执行什么任务。

这34名侦察员个个是出色的侦察能手，专门负责搜索、侦讯工作。为配合行动，台北警察局大安分局调出88名警察支援，特勤中队出动44名特警，宪兵部队也派人担当警戒工作。

与此同时，台北市警察局长丁原进、地检署检察长吴英昭等人率领一批警员进驻台北石牌“保一总队”总部办公室，坐镇指挥这次行动。

凌晨4时许，刑警大队队长侯友宜率领一批侦察员由设在东

湖派出所的前进指挥所，乘车急速驶向汐止珑山林别墅区。戒护的特勤中队警员已派重兵封锁周围所有路口。30多名警员手持防弹盾牌、催泪弹向珑山林一栋别墅逼进。

这栋别墅里住着“四海帮”老大蔡冠伦。

荷枪实弹的警员迅速缩小包围圈，将蔡的别墅层层包围。刑事重大案组警政杨哲昌按响了蔡冠伦家的门铃。

夜半铃声惊醒了正在甜睡中的蔡冠伦。他感到事情不好，最近，台湾岛内一片反黑声音，“政府”多次讲要进行扫黑，看来这次凶多吉少。

“是谁阿，那么早?”蔡冠伦的情妇郑方怡问道。

“我们是市刑警大队重案组，有重要的事情找蔡冠伦先生。”杨哲昌回答。

果不其然，被蔡冠伦猜中，他有点不安地前来开门。

门刚一开，杨哲昌随即表示自己是市刑警大队的，并与其他警员迅速进入室内。

蔡冠伦虽有点紧张，但并未反抗，只是问警察有无搜捕证和拘留证。这个曾进过监狱的人对法律程序还是十分内行的。

警方向他出示证件后将他拘留，并展开搜索。在屋内，搜出武士刀、匕首、大麻烟与“四海帮”入帮誓词。

随后，蔡冠伦换上西装，打好领带，随警察离开住处。

另一组警员同时包围了住在蔡冠伦对面的“四海帮”成员郑方平住宅。郑方平是蔡冠伦的司机兼保镖。警察在敲开门后，郑方平也没有反抗就被捕。在郑的住处，警察搜出三张向人讨债的支票。

警方同时还在台北市信义路4段一住宅内将蔡冠伦的妻子抓获，并搜出匕首和蛇刀，也随即将她带回“保一总队”侦讯。

一批干员则在新店市宝高路捕获“四海帮”分子刘孟颖及钟玄竣两人；另一组警察在台北市信义路4段275号查获“竹联

帮”东堂堂口，逮捕了薛同棋、陈志雄与王君义等“竹联帮”分子3人，搜出开山刀、手铐、帮派旗帜及防弹衣。

蔡冠伦被捕后，市刑警大队副队长邱丰光与大安分局局长黄升勇率领一批警员，兵分十路，前往安和路1段27号的安敦大厦，对13楼的钻石年代酒店、15楼的义胜投资公司、16楼冠伦集团总部、18楼的合家欢俱乐部等冠伦集团的相关企业进行搜索。其中，在15楼的“四海帮”安敦大厦总堂口，查获“四海帮”总名册，内容包括88个分支堂口及2000名成员资料。在这里，以通信器材公司、建设公司或电脑公司为幌子的公司，其实是“四海帮”的海德堂、海丰堂、海盛堂、海松堂等堂口。

警察将蔡冠伦带到“保一总队”，在这里受到严密保护，更出动治安特勤人员加以戒备，两架空警队直升飞机从清晨4时就停在附近操场待命。

检察部门随即展开侦讯工作。蔡冠伦表示只有聘请律师后，才肯接受侦讯，否则他什么也不讲。在1个多小时后，蔡的律师赶到，侦讯工作随即进行。

蔡冠伦，江苏省人，1941年6月28日出生，是“四海帮”创立者之一，在帮中地位甚高。1957年，进入空军官校，投身军旅生涯长达18年之久，1975年因伤退役，随后从事餐饮、贸易与工程等事业。1984年，曾因“一清专案”扫黑，在绿岛坐牢二年。出狱后，经商。他于1992年与1994年两次参选“立法委员”，均以失败告终。

蔡冠伦在黑道上也是教父级的人物，涉案事件甚多。早期，蔡冠伦因卷入一起枪杀警员伊雷霖案而名噪一时。

蔡冠伦以经营企业为名，一直进行帮派活动。平日，他以台北市安和路1段27号的安敦大厦16楼——冠伦集团总部为活动据点，楼下设立嵩安保全公司，作为眼线。

据调查，近年来，蔡冠伦假借空壳公司名义，多次参与公共工程围标，以暴力强行取得工程承包案，再转手让给其他承包商，从中牟取巨额暴利。他还挟持黑道势力向商家恐吓，强索保护费，替特种行业围事，介入土地纠纷。有证人指称，蔡还以暴力介入操纵股市，不断向多名股市大户施压，迫使他们提供股票的内线消息以操纵炒作股票。

蔡的情妇郑方怡则讲，“四海帮”早已由中生代的堂主们管事，赵“总霸子”（“四海帮”最高领导赵京华）现在人在美国，蔡冠伦虽是帮中老一辈的大哥，辈分高，但现在根本没有管事，警方抓他不公。

31日中午13时30分，蔡冠伦在警方的严密保护下，被送上一架直升飞机。飞机起飞后，蔡冠伦还有点自得，认为警方对他如此“重视”，专机护送。但不久，当他发现飞机不是飞往台北，而是飞往台湾东海上的绿岛时，显得心情十分沉重。他曾在这里坐过牢，知道关在这里意味着什么。不过，他想到自己一生闯荡江湖与多年军旅生涯的事情，很快就平静了下来。他还自嘲地说，以前自己开过直升飞机，这种飞机很容易开，他还问警官能否让他开一会儿。警官哪敢松口答应。

下午2时许，飞机降落绿岛。蔡冠伦不无伤感地说：“当初‘一清专案’在这里待了两年，如今又回来了!”然而，绿岛重游，对他来说是无奈的。

为避免意外，警方未敢将蔡的保镖郑方平与蔡同机押送，而是将郑方平与“竹联帮”的东堂分子陈志雄同机押送绿岛，并关在不同的牢房。

绿岛监狱是以收容重刑与难以管教的受刑人为主。凡是各监狱的顽劣分子，也会送到这里来关押。

8月29日。

高雄市。

市刑警大队、刑事警察局与宪兵等治安单位100多名人员整装待命。他们要执行一项重要任务，停止警员与外界的一切联系。

30日凌晨2时，在高雄市地检署四名检察官的指挥下，兵分四路，前往高雄市多个据点执行搜捕行动。这是台湾“警政署”“A10”扫黑行动的高雄行动。

上午3时许，市警察局侦二队队长林根江担任现场指挥，率领市刑警局、市刑警大队与宪兵等大批人员前往高雄市苓雅区三多3路204号“沙地仔帮”李约伯住处埋伏与守候。直到7时许，李住宅大门被佣人打开，警员迅速出动，进入李宅，将刚刚起床的李约伯抓获。

8时，一批警员在三民区鼎新路219号16楼缉获李的同伙孙锡奎。

8时30分，在苓雅区民权路2路333号6楼查获李的同伙陈敏尧。

10时，在前镇区一心2路25号8楼查获李的同伙施文东。

30日晚，高雄市新兴警察分局还出动大批警员，于高雄市、高雄县与屏东县逮捕“四海帮”多名分子，包括海武堂副堂主邱文将、付新荣、邱文锋，海武堂机动组组长申志杰、余修政（机动组副组长）、陈永和（海雄堂副堂主）、刘任法（海武堂成员）。警方指控这6人涉嫌电信工程围标及恐吓勒索商家。

同时，高雄县警察局刑警队于当晚深夜传唤情节重大黑道流氓、凤山市“台南帮”的新龙头陈谷昌到案。

随后，检察官对李约伯、陈谷昌、孙锡奎、陈敏尧、施文东等人展开侦讯。

李约伯，绰号“A伯”，41岁，曾是高雄市“沙仔地帮”的老大。最初在黑道上名气并不大，后来与人开赌场，赚了不少

钱，地位开始上升。1988 年始，他投入电子游戏机行业发展，在六和路夜市一带开了好几家电子游戏机店，生意兴隆，他一跃成为电子游戏机业的大亨之一。

他在高雄地区赫赫有名，黑道兄弟遇事，莫不让他三分。但他对身边的兄弟却很好，出手大方。甚至在半个月前，他还发给 700 多低收入户每户 500 元、一瓶沙拉油与 10 公斤大米，因此在地方颇有声望。

李在开设赌场期间，多次遭到高雄市刑警大队机动组组长黄连发的查获，李便对黄发生不满。1991 年 5 月 15 日上午，黄连发骑摩托车上班，在路过苓雅区时，遭到黑帮分子洪庆铭枪击，黄当场身亡。案发后，洪庆铭向警方自首，当时他只有 18 岁。经调查，洪是李约伯女友的弟弟，且是受李的指使所为。最后，洪庆铭被判无期徒刑。为逃避警察追捕，同年 9 月，李约伯从屏东海岸搭乘渔船偷渡菲律宾。

同年 12 月，高雄市刑警局派人前往菲律宾，将被菲国警方捕获的李约伯押解回台。经审判，李被判处无期徒刑。谁料，李约伯上诉，结果二审改判无罪释放。社会舆论大哗，原来承办此一案件的检察官不服上诉，李约伯又被改判无期徒刑。这时，李约伯又不服，上诉最高法院，直到李被捕，这一案还没有最后定案。

在侦讯中，检察官指控李约伯在 1995 年至 1996 年间，涉嫌连续多次以强暴威胁方式向商家勒索钱财，总计达数千万元，还对不肯屈服的商家进行恐吓与开枪威胁。

施文东是靠贩卖电子游戏机及从事修理业起家，生意做得很大，也赚了不少钱，被称为高雄电子游戏机“四大天王”之一。他也曾赴大陆海南岛与深圳等地投资，但却血本无归。由于他为人豪爽，结交了不少三教九流的人物，黑道上的兄弟更是不在少数。在大陆投资失败后，施文东回到高雄，投靠李约伯，向李借

钱开赌场。为了收回债务，他便派黑道兄弟四处讨债，因此发生多起动刀、开枪事件，而成为扫黑目标。陈谷昌，34岁，在1995年间，在凤山市经营职业赌场“天九赌局”，俗称“黑字仔”，并率人对欠债人讨债，进而砸毁被害人家宅。

8月31日，第二波扫黑行动展开。

台中县市警政单位出动200多名警力，于当日上午6时在台中县市展开扫黑行动，目标锁定为“四海帮”、“竹联帮”、“天道盟”等大帮派20多个堂口。

台中地检署检察长王炳辉率领120名省刑警大队、台中县市及台南市警察局干员于凌晨兵分23路，对台中市18处、台中县2处和台南市3处“竹联帮”与“十五神虎帮”的堂口和帮派成员住所及“竹联帮”所属6个企业营业据点进行突然搜索，抓获“竹联帮”分子包括地堂台中分堂代理堂主何昆明、“护法”叶庆成、“护法”杨宜君、成员王定华、黄曼锋、陈靖沛（20岁）、林秀洳（女，19岁）、陈燕玉与“十五神虎帮”分子王振辉等29人。

同时，警方在台中市大墩路“忠议同心会馆”查获“竹联帮”帮会选举名册、帮规、“龙头棒”、帮会教鞭、誓词、帮规训词等。

早在1996年3月，在接获“竹联帮”在台中市发展组织的情报后，警方就利用电信监测和其他侦察办法，查出“竹联帮”和“十五神虎帮”等不良帮派以加入大成、中阳、大通等保安公司为名，成立所谓的“保安机动组”，以此掩护身份，进行酒店围事、代人讨债与围标工程等。其中发现，“竹联帮”地堂分堂堂主许光峻早于1994年间涉及台电公司桃园段工程围标恐吓取财而被捕入狱。然后，地堂堂主由绰号“何哥”的何昆明代理，并由地堂大哥“宗奎”及帮中元老、顾问等进行指导。“竹联帮”

地堂分堂“护法”叶庆成以“机动组组长”身份率机动组成员以暴力方式处理各保安公司所遇到的问题。

王振辉是台中市“十五神虎帮”的老大，55岁，绰号“太空辉”。同时在王振辉位于台南市德光街及体育路的另两个住处，搜出王经营的赌场账册及与“竹联帮”大哥“钟魁”的往来书信。

经侦讯，何昆明、叶庆成、黄曼锋与王振辉等被收押禁见，陈文信、陈宜钊等人交保获释。

其实，1990年以来，台湾警方就开始扫荡黑社会行动。到1996年8月底，警察机关一共提报流氓11538人，经复审认定者9529人，其中情节重大黑道流氓5187人，一般黑道流氓4342人，移送法院审理者5908人。在审理者中，霸占地盘、敲诈勒索、强迫买卖、白吃白喝者1608人，非法制造、买卖枪炮弹药者980人。1996年1—8月，台湾各警察机关提报黑道流氓达1219人，经审认定者977人，其中情节重大黑道流氓585人，一般黑道流氓392人，移送法院审理者702人，经法院裁定交付感训的487人，而以霸占地盘、敲诈勒索者最多。

1996年8月底展开的这波扫黑行动已取得阶段性成果，到9月5日，逮捕“竹联帮”、“四海帮”与“天道盟”、“沙地仔帮”、“甘蔗园帮”、“十五神虎帮”等各帮派组织主要分子72人。

台湾“内政部”官员强调，最近强力扫荡帮派分子和检肃流氓仅是扫黑的开始。

这次扫黑是在形势逼迫下进行的。

1984年，台湾展开有史以来最大的一次扫黑行动“一清专案”后，大批黑社会分子被关进监狱，树倒猢狲散，帮派势力受到沉重打击，社会治安一度好转。谁料，在这些黑道分子纷纷出狱后，黑社会帮派再度坐大，甚至变本加厉，黑道横行，以暴力

介入政治选举，介入公司经营权的争夺，非法操纵股市，围标公共工程，恐吓、威胁、枪杀、绑架更是肆无忌惮，岛内笼罩在一片黑色恐怖之中。

近年来，台湾当局也曾采取了一系措施，如90年代以来先后展开“迅雷专案”、“治平专案”等扫黑行动，但雷声大雨点小，未见效果。而且由于执政的国民党利用黑社会势力进行地方选举，维持现政权，反而使黑社会活动更加猖獗，有更多的黑社会人物进入政坛，黑社会的猖狂活动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

1994年12月，黑道大哥、屏东县议长郑太吉持枪杀人；1995年11月，高雄县议长吴鹤松因黑道赌场恩怨被人枪杀；1996年1月，“四海帮”老大陈永和等人在餐厅被两名职业杀手杀害；7月，曾混迹黑道的台南县议员刘平和被人开枪打死；接着民进党发言人邱义仁因批评黑道政治人物被黑道分子殴伤，“立法委员”彭绍瑾被黑道分子连砍数刀成重伤，“立法委员”廖学广被绑架。与此同时，黑道介入公共工程、控制农产品交易、参与棒球赛赌博等重大案件接二连三爆发，在社会上引起一波一波的震动，人民反黑声浪也越来越大。《中国时报》于8月中旬进行的一项民意调查显示，有69%的人认为当前黑道威胁的阴影已渗透到政治、经济、社会等领域，状况甚为严重。该报更发表社论指出：“黑道问题虽古已有之，中外皆然，但台湾的黑道势力从偷偷摸摸经营不法行业，到今天跃上台面，升级为公开参政甚至干政，则是长期纵容的结果。如今大哥级人物或跻身企业大亨，宛如社会名流；或进入议会殿堂，与部会部长平起平坐。他们通过身份漂白后的政治网络，以组织形态对政府工程进行围标、绑标；以民意代表的职权钳制警方侦防，对不合己意者动辄开枪绑架，连议会都不能幸免。

“看看黑道大哥婚丧喜庆时冠盖云集的场面，看看某些政界人士拥黑自重或倚黑自保的奇特习尚，就足以了解‘黑道治国’

的说法绝非危言耸听。”

政治评论家庄佩璋写到：“郑太吉案发生，暴露出黑道几乎已全面控制各县市议会，黑白合流，围标围势，利之所在，无所不为，地方自治被侵蚀得几近瘫痪。近年黑道参政更上一层楼，他们开始在立法院呼风唤雨，朝野竞相巴结，黑道已一言九鼎。

“黑道如同上帝，无所不在，无所不能，从蒜头交易到职业棒球比赛，从老百姓的衣食住行到娱乐都笼罩在黑影下。

“执政者靠黑道保天下，在野者想靠黑道打天下，老百姓则只管完粮纳税，管他谁家天下，就在这种政治、社会土壤上，台湾终于变成黑道的天下。”

台湾律师公会联合会于8月26日还发表反黑声明，促请“立法院”迅速通过“组织犯罪防治条例”，以有效遏阻黑道势力的猖獗。“反黑声明”全文如下：

一、尽速制定反黑法律。目前社会秩序沦丧，黑道势力嚣张，“组织犯罪条例”的立法，不仅是社会一致所期盼，也是全体“立法委员”不负人民所托的职责，各党均有责任摒弃成见，通力合作，尽速完成立法。

二、不容黑道与政党挂钩。黑道势力之所以能够渗入民意机关，甚至控制地方议会，政党与其挂钩难辞其咎，因此各政党务必自清，与黑道划清界线，不提名具黑道背景的人士参加各项选举，以杜绝黑道渗透政治借漂白坐大。

三、全民唾弃黑道干政。遏阻黑道势力侵蚀民主的根基已经刻不容缓，全体人民应该觉醒，勿再纵容政党、民意代表与黑道挂钩，以选票表达反黑决心，致力维护民主政治的健全发展。

四、律师界当为反黑表率。律师以保障人权、社会正义及促进民主治制为使命，对于岛内黑道暴力严重污染民主政治，危害法制乱象，律师界当挺身为表率，发挥影响力，共同打击黑道势力，为建立良好民主法制而努力。

执政的国民党当局尽管曾为黑道进行辩护，但在社会的巨大舆论下，不得不表示反黑的决心。

8月13日，李登辉在“国民大会”上发表了扫黑的讲话，指示有关部门要在6个月内交出治安成绩单。新任“法务部长”廖正豪与“警政署长”姚高桥均表示有信心打击黑社会恶势力，“请大家拭目以待”。

21日，“警政署”召开扩大警务汇报协调会议，提出“立即全面改善社会治安工作计划”，坚决执行推动近一年的“治平专案”扫黑行动。

22日，“内政部”召开记者会，部长林丰正表示，为加强扫黑工作，已责成“警政署”于9月1日起全力加强“六项重点工作”、“四项检肃黑道措施”。“六项重点工作”为：全面检肃取缔非法枪械、遏止暴力介入工程围标、积极侦办重大管制刑事案、全力戢止毒品泛滥危害、彻底加强检肃盗窃犯罪、落实查捕追缉重要逃犯。“四项检肃黑道措施”为：检讨修正检肃流氓条例、研订组织犯罪防治条例、持续实施扫黑专案作业、全面策划扫荡帮派组合。特别是针对黑道帮派以合法掩盖非法活动，要持续收集证据，建立档案资料，严加监控，对帮派组合总部、堂口、据点与所经营的事业，在全岛同步实施专案检察与搜索。

26日，台湾“政府”高层人士表示，在国民党十四全会结束后，李登辉已经把扫黑视为当前的第一要务。“内政部长”林丰正指示“警政署”“民气可用，全力扫黑”，并对黑道介入槟榔摊、“六合彩”、股市等加以整顿。于是“警政署”提出将以小型舰艇巡防海岸，遏止黑枪流入，防治黑道暴力介入工程围标。

同日，“行政院”举行治安汇报协调会议。“警政署长”姚高桥指出，目前治安恶化的重要原因是黑枪泛滥，几乎每天都可查到十几支枪械，一年能查获3000多支。他同时透露扫荡具有黑

道背景民意代表的“治平专案”会持续进行，包括扫荡“地位不低”的人物。当日中午，“政务委员”马英九在会见高科技企业代表时表示，企业代表反映黑道介入一些上市公司的股东大会，影响公司营运，“政府”会尽快完成打击黑社会的立法工作，加强对黑社会的扫荡。

27日，台湾省长宋楚瑜召集全省21个县市警察局长会议，公开表示向黑道宣战的决心。

同日，《中国时报》发表评论指出，在事态糜滥与民气催促下，“政府”首长最近态度似乎转趋积极，相关部门也俨然全面发动一场大规模的扫黑行动正蓄势待发。

这一切显示大有“山雨欲来风满楼”的真正扫黑之势。

果不其然，在敏感的新闻界不知晓、甚至连一般警员也不知情的情况下，台湾司法部门于8月29日晚在南北两大都市——台北市与高雄市展开第一波扫黑行动，一举抓获近来锋芒毕露的“四海帮”老大蔡冠伦与高雄“沙地仔帮”李约伦等一批黑道分子。

“内政部长”林丰正随即举行记者会，表示“政府”有关部门已拟妥一系列扫黑方案，只要是危及社会治安者，无论其出身背景为何，都会依法取缔，接着还会有第二波、第三波扫黑行动。

为防治黑金所草拟的反黑法《组织犯罪条例草案》也在快马加鞭下，于8月30日在“行政院”审查通过。其中对犯罪组织的定义，指三人以上，有内部管理机构，成员加入组织，就构成犯罪，这就是针对黑社会组织制订的专门法律。

这次大规模扫黑在社会上引起巨大反响，但外界对当局的做法也表示了某种程度的不满与对扫黑真正意义的怀疑。

这次扫黑行动确实受到人民欢迎，显示了“政府”扫黑的决

心。台湾《新生报》在发表“扫黑要乘胜追击除恶务尽”的社论中指出，“这次的扫黑行动，非但具有震撼力，也显示了政府的公权力，行动出手明快，干净利落。在此人人痛恨黑道、民气可用之际，一定要乘胜追击，不要手软，务必做到除恶务尽，不达目的，绝不中止。”

《中国时报》在发表“三管齐下扫除全民心中的黑影”的社论中指出：“在经济奇迹之后，我们也创下政治奇迹。但是，如果因黑道势力蔓延而使民众恐惧，使社会生活品质日趋恶化，这些经济成就有何意义？如果经由选举过程，可以使黑道堂而皇之地监国甚至治国，这些民主成就又有何意义？扫黑，绝不只是定期的做几个业绩，而是要扫去全民心中的黑影。”

但社会也有不同的看法，民进党“立法委员”沈富雄讲，反黑行动虽大快人心，却有“作秀”之嫌，有一点专扫“外省挂”黑帮的政治斗争的味道。著名学者瞿海源指出：“在这一波扫黑行动中，我们似乎可以看到，对有政治职位作为护符者及其帮派大致是按兵不动，抓的是选立法委员没选上的。其实危害社会最厉害的是那些进省级以上议会的黑道人物，对这类人物的处理是执政当局整顿治安的试金石。”更有学者讲，若认为这次扫黑足以震撼黑道是吹牛！

不久前被人绑架的“立法委员”廖学广公开表示，“政府”扫黑不足为功，扫黑要抓就应抓“大尾”的，罗福助、施台生、林明义等“立法委员”才是“政府”应该抓的人。林明义是杀过人才选“立法委员”的；罗福助在“立法院”横行霸道；民进党的周伯伦也和黑道往来，也闹过事；国民党的沈智慧也是“四海帮”的，也应是“政府”扫除的对象。“政府”只捉像蔡冠伦这样“外省挂”的帮派人物是不对的。他还讲，“立法院”内与黑道有关的“立法委员”，或在选举时与黑道间接发生关系的“立法委员”，大约有 28 至 30 人；省议会里面大约有十几人与黑道

有关；县级议会则多达300人，如果连乡镇级民意代表算进去，在台湾各级民意代表1000多人中，就有700多人有“黑底”，黑道以民意代表漂白才是真正的“大尾”，罗福助、施台生、林明义是“立法院”三条“最大的尾”，“政府”为何不抓他们？他进一步指出，国民党有个黑底书记长，民进党有个黑底中常委，新党口说反黑，实际上也不敢动，希望台湾人民组织起来，改造台湾，否则黑道坐大，“国将以亡”。

对于廖学广的指控，相关“立法委员”反应强烈。林明义讲廖学广血口喷人，如同疯狗。有位被点名“立法委员”表示不排除诉诸法律。

事实上，在这次扫黑之前，有人走漏风声，许多黑道大哥纷纷出境。如“竹联帮”与“天道盟”等帮派的多位老大，因为在国外、大陆、香港等地都有公司，均以考察业务名义离境。也有部分黑道老大在扫黑后的次日即8月31日紧急出境，包括“牛埔帮”的一位老大。蔡冠伦也得到扫黑行动的消息，只是认为自己没做什么事，才没出境。

也有人指出，台湾扫黑是抓的都是“虾米”，包括蔡冠伦等之辈都算不上“大鲸鱼”。对于这次扫黑行动，法律的执行不能有选择性，无论是否具有民意代表身份，应该“一视同仁”彻底执行扫黑。

蔡冠伦情人郑方怡指出，1995年“总统”选举，李登辉可能认为“四海帮”的老大陈永和要支持陈履安，才对“四海帮”下手。但是蔡是空官军校毕业，国民党当久了，还是支持李登辉，当时他自掏腰包，每车200元鼓励出租车挂李登辉的竞选旗子，没想到国民党这样对待他。因此外界对警方只抓蔡冠伦表示了某种不满，认为这是“柿子挑软的吃”，并提出“若是蔡冠伦选了立法委员，警方敢这样抓他吗”的疑问。更有人指出，这场扫黑不要只拍苍蝇，不要只秀一场。

9月1日，台湾“法务部”进一步提出结合检察、警政、宪兵、调查等单位全力推动“扫除黑金计划”：一是重建扫黑法制，包括加速组织犯罪条例、洗钱防治法及检肃流氓的立法与修正工作；二是加强检肃流氓帮派，强化各治安单位统合全力侦办黑道罪犯；三是积极查缉非法枪支，持续肃枪专案，尽速完成修正“枪炮弹药刀械管制条例”；四是严防走私偷渡，严惩蛇头；五是加强工程招标过程监督，全面严防黑道介入。“警政署”向“内政部”进一步提出多项扫黑计划，包括将持续深入调查监控不良帮派，不定期实施“治平”、“迅雷”等专案检肃流氓帮派与黑社会分子，将“加强检肃非法枪械暨防治枪械暴力犯罪督考计划”延长到1997年2月。“警政署长”姚高桥指出：“反黑是一场永无休止的战争，今天的这场战争才刚刚开始。”

1997年，台湾继续展开“治平专案”、“迅雷专案”与“专案临检搜索”等一系列扫黑行动，先后计有九次大行动，总计拘提4625人。其中抓获的知名黑帮分子有纵贯线老大黄如意、“十五分帮”首恶郑仁坤、“四海帮”堂主刘一弘（原为“至尊盟”“尊信会”会长）与中常委潘升仁、“天道盟”大安会会长绰号“黑印度”的陈崇贤等。另外还包括“国大代表”蔡永常、彰化县副议长粘仲仁、7名县市议员及乡镇市长等计30多位身跨黑白两道的黑道分子。一些黑帮分子也被迫前来自首。如，1月21日，台湾四大黑帮之一的“松联帮”大哥朱伟立、王国栋率11名帮徒到台北警察局办理“自首”，宣布解散“松联帮”。随后，“竹联帮”的虎堂堂主张仁拳、忠堂堂主姚天齐及副堂主李项立、菊堂堂主谭守台及副堂主朱元辰等多个堂口负责人也到警察局自首。另外，“天道盟”文山会、“北联帮”、“四海帮”与“飞鹰帮”等知名帮派成员前来自首。对于未能抓到并不前来自首者发出黑色通缉令。1997年11月24日，台湾警方对“竹联帮”前帮

主陈启礼及现任帮主黄少岑、“四海帮”帮主赵经华及副帮主杨光男、“天道盟”太阳会前会长吴桐潭与现会长施春成、“松联帮”帮主江夏法、“北联帮”二帮主饶台生等8名黑社会头领发出通缉令，追诉及通缉时效长达25年。同时对被列为“治平专案”扫黑对象的嘉义县前议长萧登标等发出通缉令。

尽管如此，台湾黑社会有地位的老大并未抓获，黑社会的犯罪活动仍在继续。警方也不断展开扫黑行动，成为台湾历史上持续最久的一次扫黑行动。

1998年6月2日，台湾警方再次发出黑色通缉令，通缉在逃的各大黑社会帮派主要头目17人，其中包括陈启礼、黄少岑、张安乐、赵经华、杨光男、杨登魁、吴桐潭、吴桐茂等，要求国际刑警组织协助追捕。据台湾警方估计，潜逃海外的黑道分子通缉犯超过1000人，其中在东南亚地区就有300多人。

扫黑将是一场不会有结局的“战争”。台湾黑社会势力经过几十年的发展壮大，根深蒂固，已成为整个社会结构的一部分。若没有重大的社会变革，黑社会势力就不会在台湾消失。直到2000年，台湾的扫黑行动仍在进行。

附录：

今日台湾青帮与洪门

青帮、洪门曾是祖国大陆最有影响的黑社会组织。解放后，大陆黑社会组织逐渐消失，青帮、洪门不复存在。但因其与国民党关系密切而在1949年前后移入台湾，长期处于地下活动状态，不能公开。80年代中期后，台湾解除戒严，开放党禁、报禁，社会日渐开放与自由，青帮与洪门重新活跃起来。

洪门早期为地下秘密组织，并不是黑社会组织，只是随着历史与社会的发展与剧变，才逐渐变为黑社会性质的帮会组织。

台湾洪门历史甚久。清政府收复台湾后，以“反清复明”为主要宗旨的秘密结社从大陆传入台湾。顺治三年（1646年），清军攻入福建。这时镇守福建的正是明朝大将、郑成功的父亲郑芝龙。他年轻时是台湾海峡有名的海盗，人称“海上阎王”，后被明朝招安，任命为福建参将，但仍雄居海上。清军进入福建后，明延平郡王郑芝龙又被清军招降，但其子郑成功却率军抵抗清军。后来在大陆难以立足，郑成功便进军台湾，赶走荷兰人，以图在台湾进行反清复明。

郑成功据守台湾后，推广汉留组织（也称汉流，指汉族源流一脉，就是要“反清兴汉”，不让汉民族江山亡于清军之手），开山立堂，以谋灭清复明。在顺治十八年九月（1661年），明延平郡王郑成功与诸大臣在驻兵的台湾金台山结义为异姓兄弟，成立山堂，名为金台山“名远堂”。与会者约4000人，大家约定以兄

弟相待，生死与共，遵守山堂规则。事后，郑成功秘令蔡德英、方大成、马超兴、李式开和胡德帝等人到内地发展组织。这5位洪门前五祖原是大陆洪门始祖洪英的门生。郑成功是洪门“武宗”。可见台湾洪门源自于大陆，但洪门山堂的创立则始于台湾，即郑成功等人共创的“名远堂”。

1683年，清军提督攻陷台湾，洪门组织四散各地。但洪门兄弟乃以神道设都，建立各种变相的洪门组织，如“小刀会”、“天地会”、“八卦会”等，继续从事反清斗争。这一时期，台湾的帮会与大陆的帮会很相似，具有浓厚的政治色彩，曾组织了多次反清起义，如台湾的“小刀会”、“八卦会”、“天地会”的反抗活动就是洪门兄弟组织的起义。1772年，彰化县以林达为首的“十八王爷”结拜“小刀会”，抗清复明。以后几十年，几乎每年台湾都有“小刀会”起义。1786年，林爽文领导的“天地会”是台湾洪门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反清起义，抗议活动席卷全岛，历时16个月。在清政府镇压失败后，台湾又出现以张标、谢志为首的复兴“天地会”活动与1795年陈周全率领的“天地会”起义。1862年，台湾彰化又爆发了戴潮春领导的“八卦会”起义，并称国号“大明”，坚持一年多，成为台湾洪门组织最后一次较大规模的反清起义。

日本占据台湾前，青帮、洪门组织在台湾发展也十分迅速，遍及各个社会阶层。日本占领台湾后，青帮、洪门组织在台湾受到限制，一度衰落。日本殖民政府对秘密结社采取严厉整肃政策，取缔各种形式的洪门组织。但同时实行“以台制台”政策，有目的地保护若干依附他们的秘密帮会。

1949年前后，祖国大陆不少洪门、青帮重要人物大多到了香港与海外，一部分随国民党到了台湾。据知到台湾的青帮、洪门骨干分子达数百人。但在蒋氏时代，禁止其公开活动，只能在

地下存在与发展，且与台湾当地社会关系不深，较少经营事业，力量不大。不像过去在大陆时代，国民党与青帮、洪门关系密切，有许多国民党将领像何应钦、黄埔一期的刘润尧、三期的龙冠军、前台湾“警政署长”孔令晟等均是洪门成员，孔令晟更是九嶷山山主。在50年代，国民党当局为取得海外华侨支持，洪门在台湾一度公开活动。1956年，在马超俊等人发起组织下，“中国洪门恳亲大会”在台北举行，盛况空前。

青帮在台湾仍有一定的影响。据报道，1949年前后，随国民党来台的青帮骨干分子有300多人，不少人还混迹官场与商场。杜月笙的弟子陆京士、潘士浩是前“立法委员”，万墨林、王兆槐则为“国大代表”，朱士刚曾任台湾亚洲铝业股份公司董事长和台湾运输商业同业公会理事长。青帮在台湾组织总部就是“恒社”，每年阴历正月初五举办团拜，各地弟子聚集一堂，联络感情。同时，台湾青帮与海外成员关系密切。青帮重要人物万墨林曾讲，青帮在海外“是为政府做事的”，对外不能讲。青帮目前在军队中十分活跃。加入青帮的成员以中下级军官为主，也有少数将军级的。一位曾在军中服务的青帮成员讲：他加入青帮是因为长官邀请，在希望提拔照顾的情况下而加入；开香堂是在一家青帮成员开设的餐厅进行的，外面有人看守，旁人不得进入。场面盛大，气氛严肃，同时入帮的还有一个宪兵队队长与一个刑警队队长。由一个姓戴的老头子主持仪式，在台湾的辈分很高，任职于税务机关。特别是1975年，国民党当局为与大陆争取海外华人，允许青帮、洪门向海外发展，结果岛内青帮、洪门重新活跃起来，纷纷设立山堂，广收门徒。80年代后期，台湾军事管制取消，社会日渐开放，青帮、洪门活动逐渐公开化。

目前台湾的青帮力量不如洪门大，但在军队与情治部门，洪门的力量赶不上青帮。不过，现在不少人身跨洪门与青帮两界。

在1993年发生“尹清风命案”（台湾军事采购弊案发生后，军官尹清风突然死亡）后，引出了青帮人物与武器采购的复杂关系，军队中黑社会帮派逐渐成为外界注意的问题。

同时，在台湾最大的公营公司“中国石油公司”内部也有青帮与龙帮。其中，龙帮与青帮关系密切，也是按照青帮与洪门开设香堂与设山头的方式建立的，有一套叩首、上香、立誓、结拜等仪式。据知，由于“中油公司”与海军关系密切，“中油公司”高雄炼油厂又设在海军总部的所在地，因此原在海军中的一些青帮成员转业后进入“中油公司”，进而成立龙帮。事实上，龙帮是青帮的一个分支单位，只是它更重视商业利益，活动不受青帮的管制。近年来，“中油公司”弊案接连不断，特别是1998年初爆发的一起贪污案，再次引发“中油公司”内龙帮与海军中的青帮勾结共图私利内幕。

据报道，“中油公司”内高级主管级的龙帮成员常常平步青云，提升甚快。高雄炼油厂的一级主管和主要组长等干部相互介绍加入龙帮，如陈绳祖、关永实、陈国勇、裴伯渝与李庆荣等均被视为龙帮的人马。李庆荣就是这次贪污案中受贿40万美元的主角。

青帮还以政党形式出现。以青帮成员为主的中国民众党于1987年11月21日在台北成立，成员包括帮会人员、退休军官、商界人士与台湾海钓基金会人员等。其宗旨为“维护国家统一，保持国土完整，促进国际和平，保障全民合法权益”。政治主张为“施行安和乐利、自由平等的国家社会主义；以和平方式公平分配社会资源，实施全民保险，健全社会福利制度；反对官僚、反贪污、反特权、反暴力、反分裂，缔造共进共荣大团结国家；加速两岸统一”。党主席为王忠泉，副主席为高福运，秘书长为李宏，海外侨务部长为陆大樟，自称有党员近4万名。

洪门在台湾的势力与影响较青帮大得多。据报道，到1985

年时，洪门在台湾仍有30个左右的山头，有影响的计16个，即太华山、一华山庄、中华山、五圣山、南华山、九龙山、西华山、楚荆山、天目山、大同山、长白山、锦宝山、春宝山、红华山、栖霞山、洪发山。其活动遍布于台北、高雄、基隆、桃园、屏东、台中、台东、苗栗、彰化、宜兰、花莲和凤山等地。洪门成员据说有10万人。

台湾主要洪门山头如下：

太华山：山头原为“中国人民动员委员会”，指导委员刘伯琴，江苏江都人，曾在国民党军队中担任要职，颇得戴笠赏识。逃到台湾后，利用他与南洋洪门的关系，为国民党开拓海外关系，多次获得奖励。刘去世后，山务由淳于琰掌管。淳于琰，山东黄县人，1917年生，黄埔军校十三期毕业，台湾情报局将官。退役后，在港、台经商。现在，该山堂除在台北市士林区设立总堂外，还在其他地区设立分堂22处，主要分堂有一华山、义华山、春宝山、义本山、天目山，成员约5000人。

天目山：山主徐松山，源自太华山。在澎湖马公、高雄等地设有分会。

春宝山：山主胡少和，太华山支系。活动重视洪门传统，将活动拍成纪录片留存资料。

中华山：山堂大哥为黄大猱，下有基隆天仁联谊会、台北市复兴联合会、天龙联谊会和台中市同心联谊会。活动范围以影艺界为主，间有商人与民意代表，并出版《忠义论坛》杂志。

五圣山：创始人为向海潜等人，1949年向海潜被国民党特务挟持到香港，1953年去台，1974年去世，山务交其妻掌管，活动不多，但在国民党军政人员中较有影响。

大同山：山主为尹立言，忠实依附于国民党。尹曾在海外积极活动，倡议青帮、洪门的联合，希望建立昔日青帮、洪门统一组织“中国人民动员委员会”，但未能如愿。该山堂成员大多为

知识分子。

西华山：山主原为国民党退役中将蒋伏生，蒋死后，由黄震接任，先后在台中、台东设立分堂，成员多为商界人士。

南华山：山主是前“国大代表”崔震权，此人曾任台湾省警务处主任秘书及铁路警察局长。该山堂活动范围以警界为主。

洪发山：山主为盘达山，是由香港移设来台，成员多为广东籍的酒楼、饮食业商人及员工。在台设有国术馆，具有一定实力。

楚荆山：原山主为刘耀堂，约有成员200多人，目前由王桂林主持山务，活动范围以台中地区为主。

同德山：山主杨运涛，台中分堂大哥为蔡守礼。该山堂是由五圣山、太华山在中部地区少壮派兄弟为建立“中国洪门爱国同盟”而设立的类似组织。

金台山：原为郑成功所设。现在的金台山是洪门兄弟为纪念洪门祖先而设，活动以台中地区为限，有一定力量。

其他山头情况不详。

80年代后期以来，台湾政治环境迅速变化，洪门活动又重新活跃起来。不少政治人物成为洪门的成员。如前“立法委员”赵振鹏、前“立法委员”纪政（曾为100米女子世界冠军）与谢美惠等均为洪门成员，主要山头的山主曾大多为台湾当局拓展海外关系的主力。也有不少成员是前“国大代表”。特别是一些洪门组织也以政党形势出现，如洪门蜀龙山的“中国联合党”、洪门西华山的“中国忠义党”及与洪门五圣山关系密切的“中和党”等。尽管洪门政党在台湾政坛力量不大，但对入党要求仍很严格。“中国忠义党”主席黄震曾讲，要加入该党者，必须由党员推荐外，其行为、思想必须经过一段时间的观察才能加入，因而组织力量强，凝聚力大。

目前重要洪门政党组织如下：

中国中和党：1989 年 5 月在台湾成立，是洪门政治组织之一。其前身是 1894 年 4 月 5 日成立的帮会组织，已有近百年的历史。创始人为清末被视为“四大寇”之一的尤烈。他曾与孙中山共创国号为“中华民国”，1896 年（光绪 20 年）尤烈组织“中和堂”；1904 年，兴中会与中和堂合并，并改组为同盟会，直到中华民国成立。同盟会改组后分为两党，即孙中山领导的中国国民党与尤烈掌门的中国中和党。随后，尤永昌、尤崧先后任中和党主席。在大陆时期，曾与国民党一道参加过北伐和反共活动。

1949 年，该党随国民党到台后，基本上未公开活动，在海外以洪门帮会形式继续活动。1987 年，台湾当局宣布解严、开放党禁后，中和党公开身份，重新开始活动，并于 1989 年登记为合法政党。同年 6 月 16 日，还成立台湾省党部。其成员主要是从大陆到台湾的洪门帮会成员，其宗旨是“中正、和平、大公、博爱”。公开在台活动的目的是重新整合台湾洪门、青帮和一贯道组织，与海外洪门团体相呼应，参与台湾政治活动，在台湾前途问题上争取发言权。该党还因此获得某航空公司的经济支持。目前，中国中和党自称散布在岛内外的党员有十多万人。

中华全民均富党：1990 年 5 月 8 日成立。首任主席为尹立言，国民党退役将军，1949 年赴台后自创洪门“大同山”，现担任洪门组织“世界和平策进会”理事长，是台湾洪门的重要人物。该党成员以洪门人士、工商业者为主，据知 40 岁以下的中青党员超过六成，还有不少硕士学位的高学历成员。现任主席为郑祥麟，1912 年生于大陆，黄埔军校八期毕业，前国民党党员，原国民党中将军长，1957 年退役，是洪门五圣山山主，现为建筑业商人。副主席为吴静俭，台湾省党部主任委员为刘顺仁。

中国联合党：1989 年 2 月 12 日成立，创始人萧琳祥，1936 年生，台湾省人，高中毕业，洪门出身，曾任洪门蜀龙山陪堂。他原是青年党的革新派，曾任青年党中央执行委员与组织部长。

该党成员主要是洪门蜀龙山的众徒，同时包括从青年党分裂出来的原青年党党员与从国民党中退出来的大陆籍为主体的原国民党党员，所以自称是洪门政党。该党有醒狮队，与帮会会堂的活动形式类似，自称有党员 8 万人。萧琳祥为该党主席，蔡百鑫为副主席，许铭城为执行长，陈首为台湾省党部主任委员，陈信鑫为台北市党部主任委员。

中国忠义党：1989 年 3 月 26 日成立，成员多为洪门西华山、龙崖山的会众。组党宗旨是发挥洪门忠义精神。黄震任该党总裁，1918 年出生，黄埔十二期毕业，为洪门西华山、龙崖山两山头的山主，

民主共和党：1990 年 5 月 5 日成立，由洪门的第二、第三代弟子组成，与台湾情治部门渊源较深，六成以上党员在 40 岁左右。

忠义致公党：是另一洪门政党。1989 年 3 月 29 日成立，主席刁平。

中国复兴党：1989 年 5 月 30 日成立，成员多是原国民党党员与青年党党员，与洪门、青帮关系密切，在退伍军人协会也有一定影响力。总裁为王仲三。

中国全民民主统一会：1990 年 1 月 21 日成立，成员主要有黄埔、军统出身的党、政、军、警、特等中高级人员及退伍军人，青帮、洪门人物，另有华侨界与知识界人士，成员 300 多人，反对国民党台湾化，反对分裂和“台独”。

“中华民国反共爱国阵线”：1986 年 11 月成立，也与洪门关系密切。由国民党“爱国同志会”、“世界评论社”、“九人同志会”、“忠义救国会”、“香港流浪者协会”、“香港孙中山纪念会”、“美西炎黄总会”、“中华精忠会”、“同心联谊会”等十六个台、港、澳及海外团体联合组成。成员包括退役军人、眷村青年、洪门兄弟与国民党党员等，自称有万余人，反共，也反“台独”。

主席为张伟光，执行长为许承宗，副执行长为赵宏吾。

同时，洪门一直在军界存在与发展。洪门的许多山主大多为退役军官，如太华山山主刘伯琴、西华山山主蒋伏生（中将）、大陆山山主柳岳生等。他们的山堂吸收了不少军界官兵，在军界形成一定力量。

1989年5月19日，洪门组织成立“中华民国社会事业促进会”，宗旨为维护国民党在台“法统”地位，反对“台独”，主张“以三民主义统一中国”。该会是由洪门头领、前“国大代表”崔震权发起成立。会员主要是五圣山、尽忠山、龙虎山、龙凤山、蜀龙山、圣德山、大华山、天目山、义华山、新城山、一华山、大竹山等山头的洪门兄弟，与“中华民国救国自强总会”是一家。1992年，前“中国洪门总会”十二个山堂以“中国建设促进会”的名义向“内政部”登记，成为一个合法的民间团体。但在外界仍是很神秘的组织。据报道，现在台湾洪门有108个山头（也有说为70多个），40万洪门兄弟。

每年关公冥诞及农历七月二十五红花亭，各山头都会聚集一堂，开香堂集会。平时无重大事务时，各山堂独立开展活动。但长期以来，台湾洪门并无政治势力。据知在过去选举中几位号称洪门山主的“立法委员”候选人，均在初选中落选，可见影响力不大。

在洪门的山堂结构中，山主下设若干副山主，副山主下有“香长”，即一般所谓的军师；“香长”下有“盟证”、“护政”及“护印”；其下则又有“坐堂”，“坐堂”总理山堂内部各项事务；坐堂下又设“陪堂”、“礼堂”、“刑堂”及“执堂”，以上合称“内八堂”，总理山堂内部事务及相关重大决策。

1993年，在美国芝加哥举行的美国洪门致公总堂第19届恳亲大会上，台湾派出18位代表与会，由“中国洪门总会会长天

日山山主”赵正明担任团长，“中华民国洪门道德总会会长”大同山山主徐天华为领队。徐天华表示，洪门的力量是无形的，也是无法衡量的。洪门本来就是一个爱国团体，在国父孙中山的领导下，洪门就是中国国民党的前身。洪门兄弟“忠党爱国”，载在史册。黄花岗72烈士当中，就有69位梅县同志是洪门兄弟。如今洪门在台湾的复出，是时代的需要，洪门兄弟仍然秉持当年爱国的情操，为国家民族尽一份力量。他还表示，民间过去虽有“青门一条线，洪门一大片”的说法，但是洪门仍然依循最早的“太华山”、“五圣山”和“九龙山”三大系统发展至今。

台湾的“中国洪门联合总会副会长义华山山主”唐颇良讲，台湾所有的洪门兄弟一向“忠党爱国”，拥护统一，反对台独。当今洪门不分党派，不分省籍，一律反对分裂国土，反对更改国号、国旗和国歌，一旦有野心者出现，洪门兄弟决不袖手旁观。“中国洪门联合总会”秘书长丁重对于近年来各地洪门山头的联系表示满意。

台湾洪门组织与世界洪门联系也在加强。1992年10月，世界洪门总会在台北阳明山中山楼举行第二届年会，参与盛会的各地代表有6000多人，在中山楼外的洪门兄弟超过万人，盛况空前。

1993年6月7日上午，台湾“总统”李登辉秘密接见洪门十二山主，以安抚这些反对“台独”、支持统一、包围“总统”官邸的洪门兄弟。这次会面由“国际狮子会驻中华民国总会”秘书长蔡馨发、“国民代表大会”副秘书长陈川（洪门南华山与台湾兄弟会的成员）及大明报社长刘沛勋居间安排。当日上午10时，李登辉在“总统府”四楼会客室，接见“中国洪门总会”的十二位山主。这十二位山主包括了九龙山、佛华山、二龙山、中华山、大陆山、天目山、双圣山、九华山、忠义山、南华山及台湾兄弟会，人员包括赵正明、刘沛勋、徐福明、范贻泉、黄震、潘

贵珍、徐春亨、龚正、胡少和、崔同居、刁平、刘有才及陈川。“总统府”秘书长蒋彦士与蔡馨发作陪。

在洪门内部传出李登辉接见洪门人士的消息后，反李的洪门“中华爱国同心会”部分成员于当日下午前往“国军英雄馆”递交“谏书”，要求山主们坚持反李立场。据知，在会见中，赵正明谈了洪门的历史与现状，强调洪门以前是帮派组织，现在则是合法的公开“爱国”团体。

1996年7月，台湾洪门组织计划成立“台湾洪门协会”，并向“内政部”提出申请。但正赶上台湾的反黑道浪潮，在此敏感时期，“内政部”未能批准登记。看来，今天台湾的洪门已不是大陆时代的洪门，而出现了新的变化，但力量有限，无法与战后出现的新兴帮会组织相提并论。

[General Information]
书名=台湾黑社会内幕
作者=
页数=1000
SS号=10950567
DX号=
出版日期=
出版社=

封面页
书名页
版权页
前言页
目录页
前言
引子
第一章 北部黑社会的大本营
第二章 中部黑社会利益争斗
第三章 南部黑社会恩怨情仇
第四章 第一大帮“竹联帮”内幕窥探
第五章 第二大帮“四海帮”的沉浮
第六章 新兴大帮“天道盟”的崛起
第七章 黑道教父陈启礼的江湖人生
第八章 “硕士级”黑道大哥“白狼”张安乐
第九章 黑道小弟“青蛇”邓国沣的传奇经历
第十章 所向无敌的黑道杀手刘焕荣
第十一章 黑道军火大王许金德
第十二章 黑道大哥在东瀛的峥嵘岁月
第十三章 黑道兄弟杨双五大逃亡
第十四章 “萤桥帮”老大张真大陆起伏记
第十五章 “竹联帮”与情报局的暗杀行动
第十六章 黑道赌场揭秘
第十七章 职业棒球赛背后的黑色大赌
第十八章 黑道军火走私交易
第十九章 黑道与情报员联合跨海大洗钱
第二十章 黑道工程围标
第二十一章 黑道与公司经营权之争
第二十二章 演艺圈黑影幢幢
第二十三章 黑道大哥入主政坛
第二十四章 扫黑大行动
附录：今日台湾青帮与洪门
附录页